主编　阎纯德　吴志良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列国汉学史书系

美国汉学史（上册）

熊文华　著

苑出版社

主编　阎纯德　吴志良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列国汉学史书系

美国汉学史（上册）

熊文华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汉学史 / 熊文华著.—北京 ：学苑出版社，2015.1
（列国汉学史书系）
ISBN 978-7-5077-4699-0

Ⅰ. ①美… Ⅱ. ①熊… Ⅲ. ①汉学－历史－美国 Ⅳ. ①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9845号

责任编辑：杨　雷
封面设计：徐道会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ress@163.com
联系电话：010-67601101（销售部）　67603091（总编室）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河北保定彩虹艺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10×1000　1/16
字　　数：655千字
印　　张：41.75
印　　数：1500册
版　　次：2015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20.00元（全两册）

本书系之出版获澳门霍英东基金会与澳门基金会赞助

北京语言大学列国汉学史书系
编辑委员会

顾　问：季羡林　李学勤　汤一介　王路江　李宇明
主　任：崔希亮
副主任：韩经太　曹志耘
主　编：阎纯德　吴志良
编　委：王晓平　乐黛云　安平秋　许光华　刘顺利
吴志良　张国刚　严绍璗　李明滨　李海绩
陈开科　侯且岸　柴剑虹　钱林森　耿　昇
阎纯德　阎国栋　熊文华

序

经过近30年多位学者的辛劳努力，现在我们可以说，国际汉学研究确实已经成长为一门具有特色的学科了。

“汉学”一词本义是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的研究，而在国内习惯上专指外国人的这种研究，所以特称“国际汉学”，也有时作“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以区别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至于“国际汉学研究”，则是对国际汉学的研究。中外都有学者从事国际汉学研究，但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国际汉学研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汉学研究改变了禁区的地位，逐渐开拓和发展。其进程我想不妨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仅限于对国际汉学界状况的了解和介绍，中心工作是编纂有关的工具书，这是第一个阶段。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国际汉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大量翻译和评述汉学论著，应作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里，学者们为深入研究国际汉学打好了基础，准备了条件。新世纪到来之后，进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国际汉学的可能性应该说业已具备。

今后国际汉学研究应当如何发展，有待大家磋商讨论。以我个人的浅见，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应当并重。国际汉学研究不是和现实脱离的，认识国际汉学的现状，与外国汉学家交流沟通，对于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以至于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曾经提议，编写一部中等规模的《当代国际汉学手册》，使我们的学者便于使用；如果有条件的话，还要组织出版《国际汉学年鉴》。这样，大家在接触外国汉学界时，不会感到隔膜，阅读外国汉学作品，也就更容易体味了。必须指出的是，国际汉学有着长久的历史，因此现实和历史是分不开的，不了解各国汉学的历史传统，终究无法认识汉学的现状。

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汉学史的著作及论文。实际上，公推为中国最早的汉学史专书，是1949年出版的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尽管是通史体

裁,也包含了分国的篇章。这本书最近已有经过校勘的新版,大家容易看到,尽管只是概述性的,却使读者能够看到各国汉学互相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有组织、有系统地考察各国汉学的演进和成果,将之放在国际汉学整体的背景中来考察,实在是更为理想的。

这正是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阎纯德教授、吴志良博士主编的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的原因。

阎纯德教授在北京语言大学主持汉学研究所工作多年,是我在这方面的同行和老友,曾给我以许多帮助。他为推进国际汉学研究,可谓不遗余力,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是学术界周知的。在他的引导之下,《中国文化研究》季刊成为这一学科的园地,随之又主编了《汉学研究》,列为《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其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一直敬服无地。特别要说的是,阎纯德教授这几年为了编著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所投入的心血精力,可称出人意想。

在《汉学研究》第八集的《卷前絮语》中,阎纯德教授慨叹:"《汉学研究》很像同人刊物,究其原因,是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太少,尤其是专门的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每一集多是读者相熟的面孔。"现在看"列国汉学史书系",作者已形成不小的专业队伍,这是学科进步的表现,更不必说这套书涉及的范围比以前大为扩充了。希望"列国汉学史书系"的问世成为国际汉学研究这个学科在新世纪蓬勃发展的一个界标,让我们在此对阎纯德教授、这套书的各位作者,还有出版社各位所做出的劳绩表示感谢。

李学勤

2007 年 4 月 8 日

于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

序 二
汉学历史和学术形态

汉学历史和学术形态历史是既抽象又具体的存在，是浩瀚无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会让我们兴奋，也会使我们悲哀，有时会令人觉得它又仿佛是一个梦。但是，当我们梦醒而理智的时候，便会发现——自然史、时间史、太阳史、地球史、人类社会史，一切的一切，不管是曾经存在过的恐龙，还是至今还在生生不息的蚂蚁社群，天上的，地下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历史。一切都有过发生，一切都还在发展，一切都还会灭亡。

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一个有形或无形的孕育过程，“汉学”（Sinology）也是这样，其孕育和成长，就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相互交媾浸淫的历史。这个历史，始于公元1世纪前后汉代所开通的丝绸之路，接下来是七八世纪的大唐帝国、十四五世纪的明代、清末的鸦片战争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之潮时起时伏直到今天，还会发展到永远。这是历史，是汉学的昨天、今天和未来，是其孕育、发生和成长的过程显现出的文化精神。但是，昨天有远有近，我们可以循蛛丝马迹地探讨找回其真；而今天，只是一个过渡，一俟走过，便成为昨天的陈迹。写作汉学史是一件艰难的劳作，尤其对象是遥远的昨天，尤其是“遗失”在异国他乡的昨天，更非一件易事。时至今日，朦胧面纱下的汉学还不为一些学人所认识，因此有必要取下面纱，让人们看个究竟。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尤其90年代以降，“汉学”（Sinology）便逐渐成为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学术名词。中国大陆重提“汉学”（Sinology）至今，汉学就像隐藏在深山里的小溪，经过30年的艰辛跋涉之后，才终于形成一条奔腾的水流，并成为中国文化水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个变化是时代和历史变迁带来的结果，也是文化自己发展的规律。

那么,究竟什么是汉学(Sinology)呢?首先,这里的汉学非指汉代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的"汉学",而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考古及社会、经济、法律、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那种学问,这起码已是200多年来世界上的习惯学术称谓。李学勤教授多次说:"汉学,英语是Sinology,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汉学'一词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等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把它改译为'中国学',不过'汉学'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谈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比较方便。"① Sinology一词来自外国,它不是汉代的"汉",也不是汉族的"汉",不指一代一族,其词根sino源于秦朝的"秦"(Sin),所指是中国。

在历史长河里,汉学由胚胎逐渐发育成长。当汉学走过少年时代,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互示友情后,中学开始影响西方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事件。中世纪以来,欧洲视中国为"修明政治之邦",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与好感,当"中国热"蜂起欧洲,19世纪初期法国便成为西方汉学的中心,巴黎成为"汉学之都"。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曾说汉学的先驱是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但是,汉学作为学术研究和一种文化形态,举大旗的则是法国人。1814年12月11日,雷慕莎(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在法兰西学院首开"汉语和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启开了西方真正的汉学时代。但指代汉学的"Sinologie"(英文"Sinology")一词则出现在18世纪末,应该早于雷慕沙主持第一个汉学讲座的时间,更不会晚于1838年。从此之后,"Sinology"便成为主导汉学世界的图腾、约定俗成的学术"域名"。在世界文化史和汉学史上,外国人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汉学",研究中国学问的造诣深厚的学者称为"汉学家"。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必要标新立异,根据西方大部分汉学家的习惯看法,"Sinology"发展到如今,这一历史已久的学术概念有着最广阔的内涵,绝不是什么"汉族文化之学",更不是什么汉代独有的"汉学",它涵盖中国的一切学问,既有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包含"敦煌学""满学""西夏学""突厥学"以及"藏学"和"蒙古学"等领域。但是一直以来人们对汉学的理解和解释相

① 李学勤:《国际汉学漫步·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左,因此便有了“中国学”“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域外汉学”“国际汉学”“世界汉学”“国际中国文化”等不同的叫法;如果咬文嚼字,推演下来,一定还会有“国内汉学”“国内中国学”,甚至“北京汉学”“河南汉学”等。由于汉学的发展、演进,以法国为首的“传统汉学”和以美国为首的“现代汉学”,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研究内容、理念和方法,已经出现相互兼容并包状态,就是说Sinology可以准确地包含Chinese Studies的内容和理念;从历史上看,尽管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所负载的传统和内容有所不同,但现在却可以互为表达、“雌雄同体”同一个学术概念了。话再说回来,对于这样一个负载着深刻而丰富历史内涵的学术“域名”,我以为还是叫它Sinology最好,因为,Sinology不仅承继了汉学的传统,而且也容纳了Chinese Studies较为广阔的内容。另外,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应该称为国学,而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那种学问则称为汉学。汉学是国学的有血有灵魂的“影子”,而汉学不是国学,是介于中学与西学两者之间,本质上更接近西学的一种文化形态。说它与国学同根而生,说它们是一条藤上的两个瓜,都不为过,然而瓜的形象与味道却不相同,一个是“东瓜”,一个是“西瓜”。我认为这样认识汉学,既符合中国文化的学术规范,又符合世界上的历史认同与学术发展实际。

汉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是外国学者阅读、认识、理解、研究、阐释中国文明的结晶。汉学作为外国人认识中国及其文化的桥梁,是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撞击后派生出来的学问,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另一种形式的自然延伸。但是,汉学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它与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既是中外文化的“混血儿”,又是可以照见“中国文化”的镜子,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Sinology’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的学术,它以‘中国文化’作为研究的‘客体’,以研究者各自的‘本土文化语境’作为观察‘客体’的基点,在‘跨文化’的层面上各自表述其研究的结果,它具有‘泛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①以上两种表述虽有不同,但学理一致,基本可以厘清我们对于Sinology(汉学)的基本学术定位。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说过:“中国是欧洲以外仅有的这

① 严绍璗:《我对Sinology的理解和思考》,载2006年《世界汉学》第四期。

样的一个国家:自远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传统一直流传至今。"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也说:"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审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①他在《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提出:"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为了获得一个"外在的视点",他才从遥远的视点出发,并借此视点去"解放"自己。这便是一个未曾断流、在世界上仅存的几种古老文化之一的中国文明的意义。中国文明是一道奔流不息的活水,活水流出去,以自己生命的光辉影响世界;流出的"活水"吸纳异国文化的智慧之后,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也就是说,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抑或说是一种亦中亦西、不中不西有着独立个性的文化。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具有跨文化性质的学科,是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借鉴的结果。汉学对外国人来说是他们的"中学",对中国人来说又是西学,它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西学"。

汉学研究是指对外国汉学家及其对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再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反馈,也是对外国文化借鉴的一个方面。凡是对历史或异质文化进行研究,都有一个价值判断和公正褒贬的问题。因此,对于外国汉学家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研究,必得有我们自己的判断,然后做出公正的褒贬。我们说汉学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但是这句箴言并非只是适用于中国人,对外国人也是一样。汉学也像外国的本体文化一样,对我们来说有借鉴作用,对西方来说有启迪作用——西方学者以汉学为媒介来了解中国,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完善自己的文明。人类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和文化语境的不同,思维方向和方式也会不同,因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讲出不同的道理。"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又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以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如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人类

① [法]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迂回与进入》,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

学、社会学诸多领域，时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①汉学的学术价值往往不被国人重视，并利用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些误读贬低汉学的价值。其实，这并不公平，有些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确实有其独到的见解，能发中国人未发之音。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对中国上古文化和上古宗教的研究就有独到的贡献，被称对中国宗教研究有“先河”之功。他研究中国宗教的宗教社会学的方法，促进和推动了中国学者采用宗教社会学来研究中国宗教，被称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创始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终生的最高成就是根据研究古代韵书、韵图和现代汉语方言、日朝越诸语言中汉语借词译音构拟汉语中古音和根据中古音和《诗经》用韵、谐声字构拟古音，写出了著名的学术专著《中国音韵学研究》《汉语中古音与古音概要》《古汉语字典重订本》《中日汉字形声论》《论汉语》《诗经注释》《尚书注释》和《汉朝以前文献中的假借字》等，他对汉语音韵训诂的研究是不少中国学者所不及的，并深刻影响了对于中国音韵训诂的研究。20 世纪著名的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著述甚丰，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人事本位文化”，其核心是“帝王文化”，其他认识上尽管有偏颇，但也有其独异性和深刻之处。这就是“他山之石”的意义和价值。当然，不可否认，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读或歪曲也是常见的，诸如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n Gunnar Andersson）于 1921 年 10 月对河南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之后，便说中国彩陶制作技术源于西方，并在他的《甘肃考古记》和《黄土儿女》著作中反复强调他的这一错误观点。这一观点亦为“西方文化东移造成中国文化之说”提供了说辞。日本学者石田幹之助也推波助澜，闭门造车地推测出西方文化东渐的路线；甚至连我们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也被“忽悠”得认可了“中国文化西来说”。② 美国现代汉学（中国学）的奠基人费正清对中国历史尤其近代史的研究独具风采，为美国人民认识中国搭建了一座桥梁；但他在研究上的所谓“冲击—回应”模式，却近乎荒谬，认为是西方给中国带来了文明，是西方的侵略拯救了中国。综上所述，对于汉

① 季羡林：《汉学研究·序》第七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

② 《章太炎全集·〈訄书·序〉·〈种姓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思念祖国〉·〈华夏篇〉·〈国土原始论〉》。

学成果的研究，只有冷静、公正、客观、全面，才能在沙中淘得真金，拥抱“他山之石”。

在中国，汉学的接受与命运，诚实地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基本上是无视它的学术价值，更没人把它看做是中国文化的延伸。此外，由于民族心理上的历史“障碍”，我们还曾视汉学为洪水猛兽，甚至觉得它是仇视中国、侮辱中国的一个境外的文化“孽种”。这种“观点”，虽嫌偏颇，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自19世纪“鸦片战争”前后，直至20世纪40年代，偌大的中国曾经惨遭蹂躏，整个历史写满了炮火压迫和宗教怀柔，其间也不乏为列强殖民政策服务的传教士、“旅行家”和“学者”深入中国腹地，以旅行、探险、考古之名而实行搜集社会情报、盗窃和骗取中国大批文物。

人类思想的飞翔，是受社会和历史禁锢的，山高水远的阻隔也使得人类互相寻找的岁月特别漫长。交流是人类文化选择的自然形态，汉学就发生在这种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之中。

公元前后，中国人被称为赛里斯(Seres)，中国叫赛里加(Serice)，这是陆路交往关于中国最初的叫法，时间较早；另一种叫法，把中国人称为秦尼(Sinai)，中国叫秦(Sin)，这是海路交往关于中国的叫法，时间较晚。由商人输往西方的中国丝绸绢绘是当时帝王贵族倾慕的奢侈珍品，Seres和Serice两字系由阿尔泰语所转化，是希腊罗马称谓中国绢绘的Serikon、Sericum两字简化而来。西方人当时称中国为“秦”(Sin)，称中国人为“秦尼”(Sinai)，则是源于秦朝。①

人类在互相寻找的初级阶段，中国和西方试探性的商业交往还很原始，那时的人类，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族群处于相对落后和封闭的状态，人类各个角落的不同文化还处于相对不自觉或是相对蒙昧的历史时期。在人类最早的沟通中，中国人走在最前边。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越过葱岭，亲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安息等地，直达地中海东岸，先后两次出使中亚各国，历时十多年，开创了古代和中世纪贯通欧亚非的陆路“丝绸之路”，为人类交往开创了先河，也为汉学的萌发洒下最初的雨露。

---

①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北平文化出版社，中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第3页。

在文化史上，以孔孟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最先影响朝鲜半岛，然后才是日本和越南等周边国家。这些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复杂，甚至被说成同种同文，因此可以说它们的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公元522年，中国佛教渡海东传日本，从那时开始，中国典籍便大量传入日本，但这只是一种“输入”，只是日本创建自己文化的借鉴，并没有形成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研究。及至唐代，由于文化上承接了汉朝的开放潮流，那时与异质文化的交流相对更加频繁，商贸往来和文化沟通有了发展，西方和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域的人士通过陆路和水路进入中国腹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城市，都是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汇的重要都会，尤其是前者，更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商业文化之都；而后者，由于东南沿海经济崛起、人口增多、手工业发达、农田水利的改善，为海外贸易发展创造了条件，再由于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切断了陆路“丝绸之路”的缘故，曾称为“鲤城”“温陵”“刺桐城”的泉州，便成为联结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第一大港”，是那时以丝绸、金银、铜器、铁器、瓷器为主的国际贸易之都。通过频繁的往来和交流，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汉学也便在这种交流中不知不觉慢慢衍生。

但是，源远流长的汉学，人们习惯地认为其洪流和网络在西方，西方是汉学的形象代表。这一看法一是源自近代以来西方强势文化和中国人的崇洋心理；二是西方汉学的某些特征也确实有别于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汉学。其实，如果我们从世界汉学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汉学要早于西方的汉学，比如日本在十四五世纪已经初步形成了汉学，而那时西方的传教士还没有进入中国。因此，对于汉学的研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我们都不能顾此失彼，要以同样的关注和努力探讨其历史。当然，汉学的历史藏在文献里，而隐性源头却在文献之外。

文化往往伴随经济流动，其交流也会在不自觉或无意识状态下发生。到了明代初年，郑和率舰队出使西洋，前后七次，历经二十八年，到过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抵达非洲东岸和红海口，真正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

在公元八九世纪至十六七八世纪期间，关于中国，多见于西方商人、外交使节、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文化人所写的游记、日记、札记、通信、报告之中，这些文字包含着重要的汉学资源，因此有人把这些文献称为“旅游

汉学”。这些来源于文艺复兴,因为思潮的开放影响了欧洲人的思想和生活,他们或通商,或传教,或猎奇,但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却是一致的,于是汉学便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主要的西方国家逐步发展起来。

这类游记和著作较早的有约在公元 851 年成书的描述大唐帝国繁荣富强的阿拉伯佚名作者的《中国与印度游记》,吕布吕基斯的《远东游记》(1254),意大利的雅各·德安克纳的《光明城》,贝尔西奥的《中华王国的风俗与法律》(1554),《利玛窦中国札记》,亚历山大·德·罗德的《在中国的数次旅行》(1666),南怀仁的《中国皇帝出游西鞑靼行记》(1684),费尔南·门德斯·托平的《游记》,李明的《关于中国现状的新回忆录》(1696)和《中华帝国全志》(《中国通志》)等,以及罗明坚、金尼阁、汤若望、卫匡国等名士的著作,还有大量名不见经传的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的各种记述,都成为日后汉学兴旺发达的必然因素。这类著作主要涉及中国的物质文明,较多描述、介绍中国的山川、城池、气候以及生活起居、饮食、服饰、音乐、舞蹈,也涉及一些中国的观念文化。这些“旅游汉学”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可·波罗纪行》(《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Marco Polo)于 1275 年随父亲和叔父来中国,觐见过元世祖忽必烈,1295 年回国后出版了这本书,它以美丽的语言和无穷的魅力翔实地记述了中国元朝的财富、人口、政治、物产、文化、社会与生活,第一次向西方细腻地展示了“唯一的文明国家”——“神秘中国”——的方方面面。

这些包罗万象的文献,不仅记录了不同时代的中国,还以自己的文化视角开始了中西文化最初的碰撞。作为文献,这些游记、日记、札记、通信和报告,有赞美,有误读,也有批评,但因为其中包含大量中国物质文化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科举等多方面的文化记载,而成为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史上有重要价值。

汉学的发生、发展与经济、政治、交通以及资讯分不开。有学者把汉学的历史分为“萌芽”“初创”“成熟”“发展”“繁荣”几个时期,也有的分为“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三个阶段。但汉学的真正形成是在明末兴起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互动之中。

从 16 世纪到十八九世纪,在数以千计的散布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中,有不少人成为名载史册的汉学先驱,他们为汉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自1540年罗耀拉(S. Ignatins de Loyola)、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等人来华,开始了以意大利、西班牙传教士为主的第一时期的耶稣会的传教活动。接着,意大利的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罗明坚(Michel Ruggieri)等著名传教士来华。1583年,即明朝万历十一年,罗明坚将利玛窦神甫(Matteo Ricci)带到中国,从此,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宗教活动无论是对于西方或是东方,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西班牙的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于1588年问世,这部世界汉学史上的第一部汉学著作,名副其实地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地理、文字、教育、科学、军事、矿产、物产、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做了百科全书式的介绍,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以七种文字印行,风靡欧洲。以利玛窦为核心的耶稣会士的历史意义在于他们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开垦",不仅著书立说,还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中国文化经典译成西文,不仅开西学东渐之先河,也推动了中学西传,使中国文化对西方科学与哲学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这位思想家当仁不让地被视为西方汉学的鼻祖。与其先后到达中国的著名的传教士都著书立说、传播中国文化,对推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作出了贡献。在世界汉学史上,除了以上提及的,还有许多汉学家的名字十分响亮,诸如曾德照、柏应理、卫匡国、殷铎泽、南怀仁、汤若望、龙华民、金尼阁、罗如望、熊三拔、李明、张诚、白晋、马若瑟、宋君荣、钱德明、翟理斯、安特生、雷慕沙、儒莲、德理文、安东尼·巴赞、蒙田、冯秉正、尼·雅·比丘林、巴拉第·卡法罗夫、瓦西里耶夫、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斯文赫定、马礼逊、斯坦因、理雅各、翟理斯、李约瑟、韦利、霍克斯、卫礼贤、福兰阁、孔拉迪、高本汉、卫三畏、费正清、戴密微、石泰安、谢和耐、欧文等。他们和东方日本、朝鲜半岛的富有建树的汉学家以及当今散布在各国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铸造成汉学史上的思想学术之碑,开垦了汉学成长的沃土。

"西方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创立的。"但是,在欧洲全面研究中国文明的问题上,"法国的先驱是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① 戴密微把以上三个国家誉为汉学的先锋,"他们于16世纪末叶,为法国的汉学家开辟了道路,

① 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而法国的汉学家稍后又在汉学中取代了他们”，真正建立起作为学术的汉学传统。就传统汉学而言，法国是汉学家最多的国家之一，有许多汉学界的学术巨擘，不断为汉学的崇高而添砖加瓦。

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不仅意味着中国文化“外化”的传播，也意味着异质文化对中国文化“内化”的接受。汉学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使者，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也是人类和谐与进步的推动者。

汉学诞生在与异质文化碰撞、交流和相互浸淫之中。这个结果无异于一枚果子的成熟，只有“风调雨顺”才生长得好。和谐、宽容、理解与尊重，是异质文化彼此借鉴的保证。作为文化形态的汉学，其成长和生存离不开良好的国际语境。就中国而言，历史上凡是开放的时代，文化交流多，汉学就发展；反之，汉学就停滞，这似乎成为一种规律。

作为学术公器的汉学，文化上有其自己的成长过程。汉学是发展的，这一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生存于异国他乡的文化，同样深受不同时代语境的极大影响。这里所说的语境，既包括中国的历史演变，也包括异国和世界的历史变化。也就是说，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汉学的发展方向和内容；换句话说，汉学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受制于中国历史的更迭，也受制于他者社会的变化。这就是以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汉学发展的基本轨迹。

汉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总体上可以分为“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传统汉学以法国为中心，而现代汉学兴显于美国，20 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其他国家葆有传统汉学的同时，现代汉学也很繁荣。随着中国与世界政治关系的变化，随着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拓展，现代汉学有了显著的发展。

虽然 20 世纪的后五十多年，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接触开始多了起来，但就整体而言，1949 年后约有三十多年是一个相对“闭关锁国”的时期。公正地讲，这道意识形态的“长城”也并非就是中国的政策，是那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对我国全面封锁的结果。这个时期的“汉学”涂满了政治色彩，以法国为代表的汉学较多地保持着传统汉学的学术精神，而美国的“中国学”却成了充满政治意识的现代汉学的代表。美国的“中国学”所关心的不是中国文化，更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问题。这种

政治特征，是那个时期美国汉学的基础，这一特征也影响了其他国家汉学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由于中国与世界的隔离，由于西方与中国少有交流，因此汉学家不了解中国最新的文化进展（比如新的考古发现），致使汉学处于断炊或“无米之炊”的状态，没有中国文化的支持，西方汉学要想取得研究上的突破也很困难。陌生感和神秘感困扰着汉学家，这不仅是文化的尴尬，也是汉学家的难堪。

人类文化包含了物质文化和观念文化等。物质文化表现在衣食住行生活方面，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又极易变化的“具象”文化，例如饮食、服饰、住房、音乐、舞蹈等；观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核心，表现在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家庭观、宗教观等诸多方面，以及关于自由、平等、民主的理解，观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思维经过高度抽象后形成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它通过文化灵魂——哲学、文学、语言、宗教、历史等来表达。① 观念文化，一俟进入外国汉学家的研究视野，他们的研究也就进入了对中国文化核心的深层研究。

汉学家从对中国物质文化到观念文化的研究，其领域越来越广越来越深。现在，汉学不仅包括对中国的哲学、文学、宗教、历史领域的研究，还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Sinology（汉学）和 Chinese Studies（中国学），它们已经发展到可以“异名共体”的地步。

时至今日，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这两种汉学形态不仅同时存在着、共荣着，而且还互相浸透着。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美国汉学悄然嬗变为中国学，并以自己独有的个性特点和极强的生命力出现在世人面前。美国汉学始自 1830 年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建立，这个学会虽然代表了欧洲那种对东方学文学的兴趣，但这个学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为美国对东方的扩张政策服务”。② 这个特点也与“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向中国派出基督教传教士的宗旨相

① 任继愈：《汉学发展前景无限》，载《中华读书报》2001 年 9 月 19 日。

② 侯且岸：《费正清与中国学》，载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一致。可见,美国汉学一开始就和美国的国际战略和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48年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观》就带有较为浓厚的社会科学特点,与欧洲具有人文科学特征的汉学颇有差异,但它依然属于Sinology的范畴。

美国从南北战争后的统一中走向强大,加入强国之列。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是列强联合的第一次尝试。从那时起,承担着相当"政治"角色的传教士进入中国。真正美国式的"汉学"——中国学,就从那时开始,而奠基人和开拓者是之后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作为美国首席中国问题专家的费正清,他的中国学研究不仅影响了美国,也对其他国家的汉学研究或中国学研究有强烈的影响。

在西方,费正清的魅力在于,没有谁能像他那样以更清晰、更富于洞察力的笔触来表述中国。"在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纷扰不安的近代史,以及中国神秘莫测的现状等方面,谁的贡献也没有像他那样大"。费正清等一批知名的美国中国学家都参与过战时情报工作,在战后作为美国政府的智囊而直接为制定对华政策服务。费正清的研究虽然充满了实用和功利色彩,立场和观点也有偏见,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历史上作为一个贡献巨大的汉学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的光辉。美国学者从事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是"使命感""学术个性"和"反唯理智论倾向","蔑视学问,更为强调实用性知识","更为明显同自己以外的社会,即政治家、实业家及其实践家始终保持紧密的联系"。① 这就是美国中国学家的基本心态,他们讲究功利和实用,不理会学术上的理智倾向,这与法国汉学家的学术心态、学术个性与学术传统几乎大相径庭。

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 Studies)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它们包括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而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汉学(中国学)则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其兴趣根本不在那些负载着古典文化资源的"古典文献",而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但是,汉学发展到21世纪,其研究内容和方式已经出现了融通这两种形态的特点。这种状况既出现在欧洲的汉学世界,也出现

① [美]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

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之中，可以说世界各国汉学家的研究中，都兼有以上两种汉学形态。

汉学（Sinology）对中国研究者来说，被尘封得太久，所以它的空白很多，浩如烟海的资源还有待于深入开掘。这种开掘，不仅可以收获汉学，还可以无意中发现被历史“放逐”和“遗失”在异国他乡的中国文化。编撰“列国汉学史书系”的目的和宗旨，不仅是为了梳理已有的汉学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追踪中国文化的外传历史状况、经验及影响，同时探究汉学的产生、成长、发展与繁荣，还要尽可能厘清这块“他山之石”对于中国文化的作用。当然，“列国汉学史书系”还期望对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有所裨益。

“列国汉学史书系”作为一个文化工程，其撰写的难度非一般学术著作所能比拟。严绍璗教授谈到 Sinology 的研究者的学识素养时提出四个“必须”：①必须具有本国的文化素养（尤其是相关的历史、哲学素养）；②必须具有特定对象国的文化素养（同样包括历史、哲学素养）；③必须具有关于文化史学的基本学理素养（特别是关于“文化本体”理论的修养）；④必须具有两种以上语文的素养（很好的中文素养和对象国的语文素养）。这几点确实都是汉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文化和语文素养，否则很难进入汉学研究的学术境界。

写作“列国汉学史”艰难，而出版可谓难上加难。人间的事好像天上的云、地上的风，飘忽不定没有根，铁板钉钉是没有的，因为钉子可以用“权力”拔出来，一切承诺和协议，都可以化为乌有。虽然“列国汉学史书系”一直受到经济的困扰，但它终没有自毙于摇篮之中，冬天之后是春天，接着便是收获的季节。这套富有创意和价值的书系，将对中外文化交流和汉学的发展及其比较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有人认为“汉学史中国人写不了”，当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立论”。日本人石田幹之助写了《欧人的中国研究》（1932）、莫东寅写了《汉学发达史》（1949），接下来又有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1991），张国刚的《德国的汉学研究》（1994），张静河的《瑞典汉学史》（1995），何寅、许光华主编的《国外汉学史》（2002），刘正的《图说汉学史》（2005）和李庆的《日本汉学史》（2005）相继面世。在人类的文化长廊里，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各种史书琳琅满目，这其中有外国人写中国的各类历史，也有中国人写外国

的各类历史。历史,是往事,是记录,是选择,并有相对独立的评论和褒贬。但是,事实上任何一部历史都不是最后的历史,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演进,修史很难一步到位,它需要一代代学者“积跬步”才能“至千里”,只有“积土成山,积水成渊”,方能“风雨兴”“蛟龙生”。学问之事非一夕之功,非得有前赴后继者敢于赴汤蹈火“流血牺牲”,才会达至光明顶峰。

开拓者也许会在某个时候将自己的真诚劳作化为欢乐,因为在以后的岁月里,定会有人踏着自己的肩膀或是踩着自己的鼻子和头顶攀上高峰,以鸟瞰美丽风光。21 世纪是经济的大空间,对汉学来说也是一个“大空间”。但是,要探索这个“大空间”,需要有个和谐的“太空站”,需要大家联袂共建;当然世界上需要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历史语境,共同创造彼此接近、认识、理解、尊重、沟通、借鉴与融合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汉学研究发展的机会。

时间在行走,历史在行走。人类创造过历史,书写过历史,但是没有最后的历史。汉学有历史,而且还正在创造新的历史,汉学及其研究将以自己的品格和个性在人类文化的世界里放出异彩。

阎纯德

2006 年 12 月 5 日

于北京半亩春

前　言

呈献于读者之前的这本书所讲述的是有关美国汉学群体在过去200多年中所创造的辉煌业绩，以及那些先后闪亮登场的美国汉学家的前世今生。在回首那流光溢彩的历史同时，我们可以从稍纵即逝的记忆片段中找到启迪睿智的章节。

在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聚居北美之前，那儿只是一片蛮荒之地。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46—1506）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之后，航海业发达的欧洲各国纷纷前往建立殖民地，并开始探索通向亚洲的新航道。法国人建立了新法兰西（包括圣劳伦斯流域下游和密西西比河流域），西班牙人建立了新西班牙（包括现在的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荷兰人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1664年改名为纽约）。1607年英国建立了第一个殖民据点詹姆士城，到1733年英国人从北方的新罕布什尔到南方的佐治亚，先后开拓了紧靠东海岸的13个殖民地。

1775年北美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独立战争爆发。1776年7月4日在费城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推选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为新组建的大陆军总司令，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建立美利坚合众国。1787年美国制定了第一部宪法，确定建立权力分享的联邦体制目标，到1812年完全摆脱了英国的统治。1860年共和党人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当选为第16任美国总统，第二年9月著名的《解放黑奴宣言》发表后引起了南方奴隶主的不满，导致了南北战争的爆发。五年后北美上空翻卷的战云随风而逝，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1869年第一条横穿美洲大陆的铁路竣工，南方纺织厂犹如雨后春笋，出现了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1839—1937）和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等巨富财团。电话、电灯、照相、电影和交流电发电机等近代技术的应用推动了工业化进程。

到1900年,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之一,吸引了世界各地文化、政治和商业精英前往考察、交流和加盟。19—20世纪期间,美国的领土范围从大西洋沿岸扩张到阿巴拉契山脉、密西西比河和科罗拉多山脉,先后从墨西哥人手中夺得了得克萨斯、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利亚,又用战争和购买手段兼并了原法国、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使原来的13州逐渐扩大到东西海岸的50州及其所有的海外属地。

在过去两个世纪经济发展的潮起潮落中,美国凭借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平等"和"自由"口号和清教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催生了一个又一个亿万富翁,与之相伴的还有一个又一个未完的"美国梦"。"苹果之父"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1955—2011)和互联网开拓者比尔·盖茨(William Henry Bill Gates,1955—),不仅通过集成化的电子产品给美国带来了财富,同时也通过对人类智慧的汇集和开发方向的图解,赋予了以"淘金热"为先导的"美国梦"之魅力。

由于美国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移民主要来自于欧洲各国,欧洲文化的影响在当时的美国知识界一直占主导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美国文化几乎就是欧洲文化的新版本。随着人文环境的改善,教学和科研规模的扩大,留学中国和侨居欧洲的美国学者一批批回国,充实并壮大了教师和研究人员队伍,提升了美国的汉学水平。

美国前汉学时期有关中华文化和中国国情的研究是在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华文化的研究、诸多学术团体和高校东亚专业的学术探索与教学活动以及相关基金会联合营造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1842年创立的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主要开展对远东、近东、北非和阿拉伯的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广泛涉及语言学、文学、历史、考古、哲学、宗教、艺术和民俗等领域。该学会与耶鲁大学关系密切,拥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美国东方学会季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一卷于1843出版,以主题宽泛学术性浓厚为其特色,内容包括对阿拉伯音乐、波斯楔形文字、中国象形文字和历史、印度佛教等方面的研究,编辑部成员多半都是公认的权威学者。

1919年创建的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聚焦于区域研究,1941年开始出版《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1956年改名为《亚洲研究学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25年7月成立于檀香山的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由国际总会和各国分会组成,总部设在夏威夷,后迁往纽约,学术活动一直持续到1960年。国际总会曾经出版会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学会成立之初,美国的亚太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专职学者不足50人,只有少数美国大学开设了此类专业课程。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学会多次召开了亚太问题学术研讨会,采取各种方式开展研究合作,为美国现代亚太区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3年《太平洋事务》主编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研究成果广为人知。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汉学的发展中,太平洋关系学会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1925年组建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旨在激发美国学人开展汉学研究,为中华文化的传播、教学和出版提供方便,促进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以及中国其他教会大学之间的合作。1928年学社建立了汉和图书馆,1936年开始出版《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哈佛燕京学社虽然历经战乱和重组的波折,但是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中美学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国际学术交流史上的佳话。

1926年创建的美华协进会(China Institute),是在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1891—1962)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John Dewey)的联合呼吁下,以中国基金会(China Foundation)的名义利用从美国庚款中连续三年每年25000美元的拨款创办起来的。该会创建的目的是为在美国传播中华文化打开一个窗口,为西方人学习中国历史、语言和艺术架设一座桥梁。该会在纽约曼哈顿的会所,是早期中国留学生经常聚会之处,第一任会长为当时南京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

第二任会长孟治,上任后曾分别拜访耶鲁、哈佛和剑桥大学的一些学者,邀请他们加入协进会的理事和顾问团,并呼吁美国企业界捐款赞助。1930年2月,梅兰芳(1894—1961)应协进会邀请到旧金山、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地演出,还登上了纽约百老汇的舞台,让美国观众第一次领略到中国京剧的艺术魅力,《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曾争相报道演出盛况。美国政府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对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提供奖助金,由华美协进社代为审批和管理,早期的受惠者包括梅兰芳、冯友兰(1895—1990)、赵元任、吴一方、赛珍珠、老舍(1899—1966)和林语堂等知名人士。1930年2

月，华美协进会为美国部分公私立中小学教师开设了中国文化与历史课程。1943 年，华美协进会接受美国和中国政府委托负责 250 万奖学金的申请和评审工作，同时还负责对全美 40 个文化交流机构的统筹协调事务。

汉学涵盖面很广。有人从历史学角度研究中国，有人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中国，有人从人类文化学或者哲学角度研究中国，从社会学、文学、哲学和语言学等角度研究中国的人数更多。一部分美国大学东亚系早先曾经侧重研究汉语、中国历史和文学，如芝加哥大学东亚系研究中国古代史，斯坦福大学的亚洲语文系只教汉语和中国文学。

早期研究中华文化和中国国情的美国人大多数来过中国，其中有传教士、洋行雇员或者在华服务的美国外交和军事人员。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并非专职从事东方人文学科研究，甚至缺乏必要的专业素养，但是他们的在华经历和知识却是当时美国汉学研究的宝贵资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汉学的涉科范围偏重于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献学和人类文化学。20 世纪 40 年代后原西方殖民国家先后独立，以美苏为中心的两个阵营形成对峙状态，美国迫切需要加强对新兴国家的了解和研究。出于政治需要，20 世纪下半叶美国开始积极资助学术界进行跨学科的区域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整个高校中社会科学的重新分类。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民俗学分别纳入汉学，吸引了各国汉学精英，出版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在此学术语境中西方的汉学中心由西欧转移到了美国。

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常用术语有“古代中国”（Early China，多指秦汉时期）、“中世纪中国”（Medieval China，主要涵盖唐宋时期）和“帝国后期”（Late Empire，主要指代明清时期）。① 中国各个历史时期都是美国学者的研究选题范围，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使美国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规模进一步扩大。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美国院校主要集中于西海岸的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与洛

① 用欧美史学界的三分法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汉学研究中的常用套路，但是如何具体划分却有不同观点。例如“中世纪中国”的开端有东汉说和魏晋说，“近代中国”的开端有唐宋说、明末说或清中叶说等不同见解。传统中国史书编写通常以各朝代或皇帝登基年份为分期依据的表述仍不失其参考价值，但是查阅或翻译欧美汉学著述时应该知道西语常用术语的汉语对应含义。

杉矶分校，以及中西部的芝加哥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对于中国近现代和当代史研究的美国院校主要有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

研究中国国情的美国政府部门、基金会、思想库（think tank，又译“智库”）、团体和人员包括：白宫（The White House）、国务院（Department of State）、五角大楼（the Pentagon）、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和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等部门的中国问题专家、东亚或中国事务官员和相关情报人员；各类基金会、思想库和咨询公司的签约学者和从业人员；媒体和汉学期刊的编辑、记者和专栏作家；高校以及具有大学背景的汉学研究所的教授和研究生。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后美国国会众议院先后成立了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美中国会交流小组（US－China Working Group）、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和中国连线（Congressional China Caucus）等七个机构。由于隶属关系、经费来源和工作对象定位不同，因此在研究范围、数据采集、理论依据、分析手段的把握都表现出不同的针对性和使命感。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上述涉科人员的职责和学术兴趣的变化，他们的评审方式也经常有所调整。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学者对于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的传统研究属于“汉学”（Sinology）范畴，内容“狭隘保守”，有很大的“局限性”；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学者对于中国国情的研究属于“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性质。据此，有关中国文化的严肃研究都应该叫作“中国学”，因为“汉学”这个术语“在西方学术界已经不再使用了”，只有拘泥于传统的华人学者才仍然使用这个术语。其实，上述说法与事实并不相符，对于所谓美国汉学“转型”的观点有明显的主观推测和过度解读成分。

笔者曾从随机抽取的大约 40 万字符的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学者撰写的英文汉学资料（时间跨度为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现在）的翻译和考察中发现“Sinology”现在的使用频率仍然相当高，还常常看到“Sinology”和“China Studies”作为同义词或近义词并列使用的情况，如：“Sinology, or China Studies…”；“Sinology is also known as China Studies”；“Sinology (Chinese studies) is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economics, politics, philosophy,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China"; "Sinology in general use is the study of China"等。美国汉学转型现象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最近一次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应该说它属于美国汉学在新的学术生态中研究范围的扩大和务实性变化。认为"汉学已经过时"或者把"中国学"作为一种标签随意粘贴都是不恰当的,许多汉学家对此并不认同。

诚然,美国汉学是该国人文学科中的富矿,也是国际汉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汉学界汇聚着各类学术精英,人才辈出,思想活跃,观点新颖,专业化和团队化实力雄厚,数字化手段发挥超常。在多元化和商品化的氛围中成果井喷,实用性和前瞻性为其一大特色。

但是把美国汉学研究与欧亚汉学研究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在资源占有、学科分类、研究方法和手段的使用、乃至读者用户的定位,彼此都有明显的不同。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有些美国汉学家的个人研究领域较为宽泛,有些人甚至凭借手中的《中国文献目录》(China Bibliography)和《东亚宝库》(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之类的工具书就可以著书立说。在美国,有关中华文化的课程(包括汉语、中国文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多半都被纳入东亚系,只有耶鲁等少数大学按照"区域研究"划分系科、分配师资和图书资料。美国汉学研究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化"大约出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在"区域研究"的语境中,欧洲学者一般认为"汉学"就是"中国研究",而美国学者则认为"汉学"只不过是多学科的"区域研究"中的一个分支领域(subfield)。以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和亚太史学家白洁明(Geremie R.Barmé)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学者则提出了涵盖外国人对中国和华人世界的传统和当代研究的"新汉学"(New Sinology)概念,高屋建瓴地把该项研究纳入了一种具有高度学术性的共享人文体系之中。①

客观地说,美国汉学是美国学者按照西方理论和价值标准通过长期实践所形成的一套考察、分析、解读和评价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的路径、范畴、方法和话语体系。不管美国汉学家是否选择使用"Sinology"、"China

① 乾嘉汉学曾经历"化经为史"的提升,在中国史学界也曾被称为"新汉学",但是与澳大利亚学者提出的"新汉学"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如果译为英语,前者应为"Neo-Confucianism",即"新儒家",有别于译自"New Sinology"的后者。

Studies”或者“Chinese Studies”，我们在对他们的学术成果进行翻译和引介的过程中都应该遵循“名从主人”的历史学、翻译学和语言学规则，“汉学”和“中国研究”均不失为最佳选择。至于“中国学”，如果是脱胎于日文的“支那学”就值得斟酌，在西语的译文中响应“shinagaku”者几乎寥若晨星。许多欧美学者并不认为“汉学”是一个有贬义色彩的过时术语，在保持与时俱进的同时，他们仍然坚持阅读古典汉籍，教授学生文言文，认读繁体字，甚至还喜欢在自己研究中保持传统的路数和风格。在许多欧洲学人（尤其是老一辈学人）的心目中，“传统”是财富，“汉学”也许是他们的家学渊源，研究有厚重史学价值的中国学问是一种学术贡献和他们的毕生追求。但是用“传统”一词来评价现代欧洲汉学有时容易产生歧义，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汉学家的研究选题和方法是根据当时的学术需要决定的，年轻一代的欧洲汉学家在这些方面一直不断地更新和扩大，并有新的价值取向。

2011 年 5 月 16 日，美国耶鲁大学讲座教授孙康宜在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和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举办的一次题为《美国汉学的研究现状和学术动向》的演讲中说：美国汉学是中国文化与美国现代学术碰撞、融合的产物，它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汉学”研究（Sinology），也包括中国问题研究（China Studies）。今日中国的方方面面，包括当代中国文学，中国乡村的文化遗产，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学与文化，中国文学与日韩文学的关系，海峡两岸的‘记忆’和建构主义等，都是美国汉学的研究对象。① 孙教授的讲话给美国汉学作了准确的注释和解读。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1945—　）在分析危机四伏的当代汉学时写道：

> 二战之后，英语在高奏凯歌的同时，也在中国学研究领域造成了这样的印象：第一流的汉学研究似乎多半只存在于美国。……今天美国汉学的主流（尤其是在现代领域）主要遵循两条思想路线和一个方法论——政治的正确性、后殖民话语和从历史角

① 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新闻：《耶鲁大学讲座教授孙康宜在北大畅谈美国汉学研究》，2011 年 5 月 26 日。

度分析很成问题的教科书的博大精深(课本知识+流行的文学理论)。

顾彬认为“政治正确性”把西方抬升为唯一的尺度,把实际更代表欧洲特点的东西给予了中国,借此顺便将中国纳入自己的西方价值体系和思想框架之中。以这样的方式,使中国失去了自身的独特性。对此,他批评说:

汉学家们几乎无法驾驭古代的欧洲语言,起码美国汉学家是这样的情况。他们不懂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出于误解,他们认为应当使中国的现代色彩比以往更加突出,他们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这种独特的文化。在这点上,众多的德国专业权威明显受到了美国的影响。但无论如何,隐藏在研究背后的,是古老的欧洲与年轻的美国在汉学领域展开的文化争斗。历史悠久的欧洲将长期成为这场斗争的胜利者,尽管它目前处于非常不利的起步状态。它的缺陷在于语言的多样性和教人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复杂历史。①

美国汉学家马森(Mary Gertrude Mason)在回顾美国汉学发展进程时曾经有这样一段的低调陈述:

美国人在汉学领域的研究工作是非常落后的。诸如卫三畏、卑治文一类的学者型传教士和其他一些人对中国语言和文学感兴趣,但是迟至1875年,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中的汉语研究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这些情况都是真实的。②

顾彬和马森的上述观点,代表了部分欧美汉学家对于当代汉学研究的

① 顾彬:《汉学:路在何方?——对汉学状况的论辩》(王卓斐译),载《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11期。

② 马森:《西方的中华帝国观》(杨德山等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

思考和忧虑，值得重视。

白云苍狗，岁月悠悠，在200多年的美国汉学研究历史上曾经精彩纷呈，涌现了众多耀眼的星座，见证了中美文化交流的曲折历程。在以时空为座标，以人物和事件为中轴的历史长卷中，向读者演绎着昔日的荣光，并展示其来日的辉煌。中美两国史学界曾经有过许多交流和合作，也存在着诸多认知差异。在由单极向多极发展的当今世界，中美两国关系已经超越了其政治和地域范围，一切歧见、误解和防范都亟待化解，需要双方做出更大努力来增加互信。回顾两个多世纪的美国汉学史可以增加我们在人文领域的沟通信心和了解方式，因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应该恪守严谨学术规范，站在客观理性立场上来对待每一项研究、分析和评价工作。

本书的编撰酝酿多年，曾查阅了上千万字中英文著述和资料，并咨询了数十位中外专家学者。在撰写过程中，除理论新旧取舍、素材真伪鉴别和论述繁简的科学定位外，笔者还尽力兼顾海内外不同读者的实际需求。书中所提供的部分人名、专名和关键词语的英语翻译，均选自所参考的英语文献，以备读者检索、回译和专业文献选读之需。有关前汉学阶段的美国传教士学者、各个历史阶段的美国汉学家和美籍华人汉学家的译介，主要依据他们在史料中出现的频率和代表性。因为篇幅和时间所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但是在综合性分析章节中仍尽可能推介更多人物。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方和海内外学术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交流频繁，使得研究观点和方法的交流切磋变得比以前更为容易，这是最值得庆幸的学术界盛事，笔者从中获益匪浅，并愿与读者共享其中快乐。

作者谨识

2013年5月1日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章　美国汉学发展的漫长轨迹 …… (1)
一、美国汉学史钩沉 …… (1)
二、中美早期往来的广州记忆 …… (13)
三、通过茶叶和瓷器启动的中美双边贸易 …… (22)
四、中美文化的双向互动交流 …… (27)
五、中美关系语境中的美国汉学发展 …… (32)
六、国际政治和学术生态中的美国汉学研究 …… (37)
第二章　从科际整合角度扫描美国汉学 …… (44)
一、美国多维视域中的儒学:课题与精神资源 …… (46)
二、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旷达进程 …… (52)
三、中国文学在美国的翻译、研究与接受 …… (57)
四、美国学者对中国宗教的独辟蹊径研究 …… (64)
五、中华文化与文艺复兴、民主思潮和地理大发现 …… (78)
六、美国宏观视野中的中国政治研究 …… (84)
七、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三大美国流派 …… (93)
八、美国汉学与社会学的美满联姻 …… (98)
九、作为美国汉学家感知中国桥梁的汉语语言学 …… (104)
第三章　新教传教士为美国汉学问鼎天下创造契机 …… (112)
一、美国汉学萌发于19世纪末的海外传教运动 …… (113)
二、美国前汉学时期的历史见证人裨治文和雅裨理 …… (118)
三、开发心智与传教并举的文惠廉、狄考文和明恩溥 …… (121)
四、期待以基督精神培养变革人才的施约瑟和丁家立 …… (127)
五、丁韪良和林乐知在激流勇进中的追求 …… (132)

六、伯驾、嘉约翰和柏乐文的医药传教赢得称赞 …… (138)
七、美国传教士对西方来华鸦片商的谴责 …… (143)
八、芮思娄、高鲁甫和卜凯的农业传教新思维 …… (146)
九、传教士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期待和影响 …… (154)
十、美国传教士后代的中国情结和多维世界 …… (157)
第四章 洋务帮办合力推动美国汉学的发展 …… (168)
一、李鸿章幕府中的美籍幕僚 …… (171)
二、晚清美籍关员与中美经济文化交流 …… (173)
三、美籍雇员与晚清军事近代化 …… (180)
四、洋务文化教育中的美籍教习 …… (183)
第五章 美国汉学家团队及其建树 …… (187)
一、美国前汉学酝酿时期(18 世纪下半叶至 1876) …… (188)
二、美国建制化和常态化的汉学研究形成时期(1877—1945) … (211)
三、美国多科与多元化汉学综合研究时期(1946—1971) …… (271)
四、美国具有现代性特色的汉学研究时期(1972 年至今) …… (358)
第六章 华人学者对美国汉学发展的持久贡献 …… (413)
一、考据学、文本研究和中古音韵学专家赵元任 …… (415)
二、以中国史学和文献研究蜚声海内外的洪业 …… (418)
三、长期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林语堂 …… (420)
四、学贯中西的政治思想史专家萧公权 …… (424)
五、西方朱熹思想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陈荣捷 …… (427)
六、对非汉语语言学研究有杰出学术贡献的李方桂 …… (430)
七、明清史和文献学知名专家房兆楹和杜联喆夫妇 …… (434)
八、美国著名国际华裔历史学家邓嗣禹 …… (436)
九、为中西文化交流和比较研究培养人才的柳无忌 …… (439)
十、毕生致力于图书馆学和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钱存训 …… (441)
十一、以中国经济史和制度史研究闻名于学界的杨联陞 …… (444)
十二、在经济史和社会思想史研究中贡献卓著的何炳棣 …… (447)
十三、提倡以大历史观解读中国历史的黄仁宇 …… (453)
十四、享誉美国学术界的口传历史学家唐德刚 …… (457)

十五、以中国现代小说史奠定文学评论家地位的夏志清 …… (462)
十六、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徐中约 …… (467)
十七、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精神的余英时 …… (469)
十八、基于语言与文学的中国人文研究开拓者周策纵 …… (477)
十九、对中国考古学和台湾史前史研究贡献杰出的张光直 …… (486)
二十、从比较视野中探索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陈启云 …… (490)
二十一、汉藏语言比较、汉语语法史和方言史专家梅祖麟 …… (494)
二十二、中西哲学比较和儒家哲学与本体诠释学专家
成中英 …… (500)
二十三、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李欧梵 …… (505)
二十四、以多元化发展的目光审视传统儒学的杜维明 …… (511)
第七章　中国通:美国汉学史中的华丽一族 …… (517)
一、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充满热情的罗德里克 …… (521)
二、具有务实前瞻精神的东亚政治学家施乐伯 …… (524)
三、中美关系的重要推动和维护者鲍大可 …… (527)
四、中美首脑峰会的铺路者和见证人基辛格 …… (530)
五、中国政治和亚洲事务研究资深专家何汉理 …… (533)
六、聚焦于中国政治体系和政策制定程序的奥克森伯格 …… (535)
七、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跨国投资的专家李侃如 …… (538)
八、重视著述中的经验价值和前瞻功能的蓝普顿 …… (541)
九、研究中国政治学和台湾海峡和平前景的包瑞嘉 …… (544)
十、对中国政治有与众不同见解的谢淑丽 …… (547)
十一、精通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和亚太关系的柯庆生 …… (549)
十二、美国制定对中国政策的核心人物杰弗里·贝德 …… (552)
十三、研究美中关系、国际政治和亚太安全的权威沈大伟 …… (553)
十四、研究军控、软实力以及军事与环境的专家季北慈 …… (557)
第八章　美国汉学的文化基因与普世意义 …… (561)
一、关于“美国特殊论”与“中国特殊论” …… (564)
二、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符号的理解与诠释 …… (569)
三、意识形态与美国汉学 …… (573)

四、美国汉学研究中的学术代沟与话语权 …… (580)
五、美国汉学与中国形象的构建 …… (587)
六、美国汉学研究方法论 …… (591)
参考文献 …… (601)
附录一　汉英人名索引 …… (607)
附录二　汉英术语索引 …… (619)
附录三　美国汉学史大事记 …… (624)

第一章
美国汉学发展的漫长轨迹

一、美国汉学史钩沉

中美文化交流始于美国独立战争之前。殖民时期的密西西比三角洲和东海岸等地的北美城镇居民可能曾从欧洲转运去的中国茶叶、瓷器、南京布(nankeens)、雨伞、首饰、刺绣、蜜饯、编织物和奇彭代尔中国式家具(Chippendale furniture)之类的商品中获悉中国的存在,但是一般人对中国并不了解。1735 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在巴黎编辑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 or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收录了有关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教、风俗的典籍和"四书""五经"中的一些章节,以及中国古典戏曲和小说片段,在欧洲广为人知,不久就传到了美洲。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中美早期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曾对美国的社会变革和新大陆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和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都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推崇者,曾经试图将中华文明的积极元素引介到美洲的政治生活中,用作解决他们在建国过程中所遇到问题的参照依据。早在 1771 年杰斐逊就曾向他的内弟罗伯特·斯基普威思(Robert Skipwith)推荐北美所能看到的各类中国书籍,认为是最有价值的经典。1785—1789 年思想开放的杰斐逊一度侨居英国,有机会接触到丰富的中国文化。他把中国建筑中的栏杆造型融入了他所设计的意大利式

建筑中,形成了北美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影响延续至今。

美国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一度居住在英国,1757—1775年曾任驻法大使。他喜欢阅读中国书籍,是一位"实实在在的中华文化追随者"。① 1723年他从波士顿移居费城,有更多机会接触中华文化,兴趣广及儒家伦理哲学、中国历史、工艺生产和农耕作物等方面。1738年他在自己主办的《宾西法尼亚报》(Pennsylvania Gazette)上发表了《孔子的伦理》(From the Morals of Confucius)一文,节录了《大学》中的大量内容并加以评论。他还摘引了《中华帝国全志》的部分章节,在他的书信和函件中谈到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思考和借鉴。他称赞孔子为"东方著名的改革家和道德思想家",并以儒家伦理来提升自己。他认为领袖人物的典范作用对培养公民道德非常重要,通过自己的文章和传记与年轻一代分享中华智慧是他的实践原则。1788年5月他发表的《中国来信》(A Letter from China),是以一位葡萄牙人在写给巴黎友人的信中讲故事的方式,描述了跟随库克船长到东方的一位英国海员如何与探险队失去了联系,在中国居住了三四年后才回到欧洲,后来移居美国。那位英国海员曾与当地一个中国农民家庭友好相处大约一年时间,后来又在一家皮鞋厂打零工,做出的皮鞋很受村民欢迎,农妇把他制作的皮鞋送到集市出售每周可得一盎司银子的报酬。他的房东希望他能定居中国,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他,但是她爷爷不同意。英国海员慢慢地习惯了中国的生活方式,每天吃到的猪肉和豆腐都很可口,唯独不爱吃狗肉。应该说,《中国来信》属于当时西欧流行的一种文学题材,发表在法国和英国杂志上的这类虚构故事多半借外国人的书信来评论本国的社会和政治现象,例如1721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出版的《波斯人信札》(Letters Persanes)、1739年阿尔更斯侯爵出版的《中国人信札》(Letters Chinoisess)和1760—1761年英国作家奥利维尔·哥尔斯密发表的《中国人信札》(Chinese Letters)都属于此类作品,但是富兰克林却通过《中国来信》介绍当时美国人心目中向往的中国地理和社会风貌,内容显得更为充实,无论从文学价值还是社会知识传播方面来看都别开生面。

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如果我们有幸引进中国的产业、生活艺术和

---

① A. Owen Aldridge: *The Dragon and Eagle: 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Detroit. 1993.

畜牧改良技术以及他们种植的作物，到时候美洲就会象中国一样人口众多，超过其他任何国家。”18 世纪中叶北美各个殖民扩张势力之间以及殖民者与印第安人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居民没有安全感。1760 年，富兰克林在一次公开辩论中提出了借用中国人修建长城治国安邦策略的建议，认为那是保护北美 13 个聚居地的最佳办法。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他的建议没能付诸实践，但是他仍然坚持己见，在独立战争期间再一次提出了修筑美国长城的建议。为了帮助定居者解决冬季御寒的问题，他建议生产类似中国北方民居取暖的设备，而且还根据资料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锅炉。独立战争结束后部分革命军旧部有功之臣和政要希望建立可以世代传承的爵士制度（a hereditary aristocracy），进一步扩大辛辛那提协会的规模，以便在国民中凸显自己的功绩，并让子孙分享荣誉。此事一提出就遭到富兰克林的反对，他引用中国史料说：在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和智慧超群的中国人中荣誉可以光宗耀祖，但是不可传承。如果一位中国人因为自己的大智大勇和学问得到了皇帝赏识，他的父母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他教育自己儿子中的表率精神就会得到肯定，并使他能永远效忠国家。而承袭的荣誉制度是让子嗣无功受禄，这不但于理无据，显得荒唐，而且有百害而无一利。富兰克林认为，应该引进中国的农业资源发展北美的农业，为此他曾将在欧洲获得的中国大黄和大豆种子寄给费城的约翰·巴特拉姆，让他试种。①

思想家和文学家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是美国的文艺复兴旗手，曾通过自己的论文和演说表达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的理想。他把孔子视为中国文化的灵魂，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也是哲学上的华盛顿。他认为孔子所珍爱的是人世间的实践伦理和社会道德，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是具有入世精神却又能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美国自 1776 年 7 月 4 日宣布独立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很快就加入了西方列强在亚洲的殖民主义扩张竞争。1784 年美国有一艘特意用“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命名的商船经好望角初访广州。这一年被看作是历史上美国对华南贸易开始之年，此后美国商人竞相来华从事转

① Dave Wang: *From Confucius to the Great Wall: Chinese Cultural Influence on Colonial North America*, pp. 6-11, 2009.

口贸易。1786 年美国政府委任原“中国皇后”号管货人山茂召(Samuel Shaw,又译“萧三畏”,1754—1794)为驻华无给职领事,12 年后设领事馆于广州。随着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中美经济文化交流在民间方式基础上又增加了官方渠道。

19 世纪 20 年代已有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和澳门开堂礼拜。1827 年美国人吴特(William B. Wood)在广州创办《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又译《澳门纪事报》或《澳门杂录》)。1830 年 2 月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奉派前往广州,拜威廉·亨特(William C. Hunter,1812—1891)和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为师学习汉语。两年后他在广州创办了《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旧译《澳门月报》或《中国文库》)并任主笔,经常发表有关传教工作和中国国情研究以及中国问题分析的文章,还翻译过汉语启蒙读本,为早期中美文化的沟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早期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为了便于与中国人沟通,向开放口岸的中国居民宣讲福音,深感学习中国文化、历史和社会习俗的必要性。随着传教、贸易和外交的发展,来华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的美国人逐年增多。美国各教会在中国各地建立布道站、开办教会学校、医院、书局和译馆,纷纷选派人员学习汉语、中国历史和文化。1858 年英国人在上海成立了皇家亚洲协会华北分会,并创办刊发汉学研究文章的会刊,裨治文任第一会长,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担任会刊主笔。1868 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保灵(Stephen Livingstone Balwin,1835—1902)在福州创办中英文月刊《教务杂志》(原英文刊名为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69 年改名为 Chinese Recorder),原以英美侨民为主要读者对象,但实际上却成了联系西方在华各教派的纽带,出刊时间长达 72 年。该刊除了报道中国新教运动开展情况外,也经常发表有关中国研究的稿件。

1882 年英美学者在北京创立北京东方学会(Peking Oriental Society),第二年出版会刊,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和麦嘉温(John Macgowan,? —1922)为该刊主笔。这一时期,美国传教士学者学术活动频繁,英美学者彼此联系广泛,除了翻译圣经、撰写阐发教义的文章和报道传教消息外,还经常刊发研究汉语、中国历史、文化和民俗民情的文章。那些在学术界极活跃的美国传教士,除了具有宗教献身精神外,还有较高的人文素养。

大约从1820年起就有华人移居美国，中美双向经济文化交流逐渐发展。据统计，1820—1848年间，一批中国造船技师及航海专家受雇于西班牙政府，在洛杉矶一带制造远洋航船。30多名华商从广东雇佣了1800名技术工人，以他们在华南用甘蔗制糖的技术在夏威夷设立了多家制糖厂。1849—1882年，大约有30多万华人先后进入了美国西部参与黄金开采和铁路建设。修建铁路的男壮工工薪低，条件艰苦，每天都拼命赶工期。进入工程后期，铁路沿线开始有人出售食品和提供家庭服务，工地上搭起了大排档，或者替工人们照顾子女，或者代人浆洗衣服。1862年加州大约只有两万华人矿工，10年后当地工厂的华工已增至工人总数的一半。美国南北战争期间（1861—1865）除了华人在海军中服役外，还有50多名华人陆军士兵直接参战。华人为美国独立战争、中美文化交流和美国早期的一些主要行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1862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生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奉派为首任驻华公使，五年任期届满后被清廷聘任为总理事务衙门官员率团出访美国、英国、瑞典、丹麦、荷兰和俄罗斯等国，商谈修约事宜。1872年咸丰进士陈兰彬以留学生总监身份率领第一批中国留学生30人赴美，1878年以首任驻美公使身份在华盛顿白宫蓝厅递交国书，翻开了中美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

1901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卡朋蒂埃（Horace W. Carpentier）向母校校长塞斯·洛（Seth Low）捐赠了10万美元的发展基金。他在信中写道："此款系本人50多年来从威士忌和烟草开支中节省下来的。我谨以诚悦之心助您筹建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系，并希望以'丁龙汉学教授讲座'命名。"他的中国管家丁龙（Dean Lung）也慷慨寄去一张支票，并在附言中写道："谨寄上12000美元支票一张，作为贵校汉学研究之用。中国人丁龙。"按照当时美元与黄金的比价，1美元可购买1.37克黄金，对于一位憧憬中美美好未来的普通中国管家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可观的赞助。

1879年，美国驻牛庄领事鼐德（Francis P.Knight）致信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W.Eliot），建议根据时势需要筹集一笔款项聘任中国教师到哈佛大学开设中文课程。鼐德是美国麻萨诸塞州波士顿人，曾供职于旗昌洋行（Russell & Co.），1864年以后任美国驻营口领事，并先后兼任瑞典、挪威、法国、荷兰、德国、日本等国驻营口的外交代表，深知中国

文化和语言知识在洋务中的重要作用。埃里奥特欣然接受他的进言，通过当时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和杜德维的关系，与曾任湘军幕僚6年的美国驻沪领馆和英国驻宁波领馆通译戈鲲化签订了一份为期三年的任教合同。不久，41岁的戈鲲化便携妻子儿女乘船前往美国赴任。50天后他在哈佛大学开始了每周授课五天的教学生涯。据说最初的教材只是一篇小说，不过他还根据教学需要编写了《华质英文》（Chinese Verses and Prose）等教材。该教材收录了戈鲲化本人创作的15首中英对照诗词，每首诗词后都附上相关词句和典故的解释，并标出了诗句的平仄韵律。这是他为美国学子首创的授课方式，在没有同类教材可供参照的情况下设计出这样别开生面的课本，集发音、词语学习和文化要点注释于一体，即便从现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观点来看也显得很专业很有见地。

戈鲲化应聘赴美任教比美国退休外交官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接受耶鲁大学汉学教席（1877年）晚两年。他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第一位有据可考的正式从中国聘任的中文教师。对于“君臣有别”的中国封建礼教并不敏感的哈佛人，曾把身穿朝服的戈鲲化照片与慈禧太后画像同时挂在当年哈佛燕京学社交谊室的墙上，凸显了第一位中国汉语教师在那里受人尊敬的地位。

1921年中国学者赵元任（Yuen Ren Chao，1892—1982）应母校哈佛大学邀请，担任中国语言和哲学教席，使该校的汉学教学和研究在戈鲲化去世39年之后重获生机。后来加盟哈佛中国语言和文化教学与研究工作的还有梅光迪（1890—1945）、洪业（William Hung，1893—1980）和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1880—1950）等学者。

美国第一代汉学家中的不少人在20世纪30年代曾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或者美国各基金会的资助来华留学或者短期深造。其中有毕格（Cyrus Henderson Peake，1900—1979）、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1901—1986）、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戴德华（George Edward Taylor，1905—2000）、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1906—2001）、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1907—1988）、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2）、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1908—1997）和卜德（Derk Bodde，1909—2003）等人。

他们来北京后先到英国传教士瑞思义（William Hopkyn Rees，1859—

1924)为培训西方传教士(后来也招收使馆官员和商人)在东四开办的华北协和语言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学习。20世纪20年代初该校学生人数已经达到200多人,分别来自26个在华的西方教会、12家洋行和5个公使馆。

韦慕庭于1932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来到北京,因为奖学金不敷日用,还得在语言学校兼职图书管理员。费正清1932年以牛津大学研究生的身份来华,享受了一年的罗德斯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此后他两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都未获批准,经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推荐到他任职的大学兼课。1934年费正清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资助,在北京结婚成家后继续深造。

年轻的美国学人来到北京后结识了不少中国知名学者,与知识界联系密切,对于他们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研究中国学问并提高汉语水平,都有极大帮助。民国前后留学英美的许多中国学人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成为中国高校和学界的精英,曾经在生活和专业研究方面热情地帮助过那些美国学人,例如费正清与蒋廷黻、胡适、丁文江、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陶孟和金岳霖都有过深厚交情。

第一批来华的美国学人回国后分别执教于各大学,例如宾板桥加盟于加利福尼亚大学,顾立雅加盟于芝加哥大学,戴德华加盟于华盛顿大学,毕乃德加盟于康奈尔大学,费正清加盟于哈佛大学,韦慕庭加盟于哥伦比亚大学,卜德加盟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他们充实了美国汉学研究的队伍,在不同学科领域研究中国学问,把自己积累的丰富知识传授给学子们,为打造金碧辉煌的美国汉学大厦作出了奉献。

美国的中国史学家马若孟(Ramon H. Myers)和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1933—　)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1980年第四期《澳大利亚中国事务学刊》(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上发表的《汉学的影子:当代美国中国研究之现状》一文中说:

>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世界上的主要强国,但处理中国事务却是个世界难题,也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棘手问题。显然,如果我们的政治家对于中国的现行政策和政治潮流缺乏充分的了解就无法跟中国打交道。然而,我们的学者们现在对于中国的了解是否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实在令人怀疑。至于为政坛内外

的门外汉提供可靠的指导似乎就更谈不上了。其结果是,卡特总统最近决定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并没有就这一举措可能付出的代价在公众中展开讨论。美国至今仍然不清楚在跟北京发展友好关系或者信守台湾安全承诺方面到底要迈出多大步子。从1958年至1970年为我国高校的中国研究已经投入了4100万美元。如此巨大的投入是否已经取得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并培养出一支可信赖的中国通团队(corpse of China experts)?没有。几乎没有一个美国出生的当代中国研究学者既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又能读懂各类汉籍,通过在专门分支学科领域培训出来的学者也几乎没有人能消弭各种误解。许多研究政治学或共产主义学问的人,尽管所研究的都是十分精通这一传统的中国人物,但是他们除了懂得教科书中的普通常识外却几乎没有掌握什么中国学问,也不了解中国思想政治传统。而那些终日埋头研习复杂传统的学者,也很少有人能向关心当代中国问题的人提供一些让人茅塞顿开的见解。①

从理论上讲,美国当代汉学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政界、学术界和各类基金会开始重视对当代中国社会和政治进行研究。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曾经投入巨资,配合美国国防法案(National Defense Act)的实施对包括汉语在内的当代"重要语言"开展研究。1955年哈佛大学成立了东亚研究中心,部分美国大学开始设立中国研究专业课程。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美国家关系仍处于隔绝封闭状态。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阴影使美国的汉学研究举步维艰,一批在国务院的知华派官员被排挤,不少同情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美国学者、外交官和记者先后被调查,费正清和拉铁摩尔等中国问题专家受到了质疑,有的甚至受到了人身迫害,给转型期的美国汉学发展造成严重内伤。坚持汉学研究的少数学者,部分做些应景文章以迎合当时的政治,部分转入低调,对于"谁丢失了中国"、"毛泽东思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复杂和敏感的选题普遍持谨慎态度。直到1959年以后情况才有所好转,随着当代中国研

① Ramon H. Myers and Thomas A. Metzger: *Sinological Shadows: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The U.S.*, i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4, pp. 1-34, 1980.

究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的成立,史华慈和鲍大可(Arthur Doak Barnette,1921—1999)等学者获准公开发表研究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专著。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了收集大陆资料,与台湾地区一些大学开展交流项目,在香港地区设立了"大学服务中心"。据统计,当时大约有200多部有关中国大陆研究的学术著作是在该中心完成的。

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在《美国的中国研究60年》一文中写道:

> 尽管学者们不能进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仍然尽量运用归纳法来理解和评价中国的事情。南加州大学成为当时中国研究方面的重镇。当然,中国研究也受到演绎法的影响,一些学者将苏联研究中得出的理论框架加之于中国。由于中国当时的封闭状态,美国学者们只能从香港和台湾等地进行远距离研究。他们当时只能用研究苏联的方式研究中国,于是中国研究成了所谓"克里姆林学"(Kremlinology)的一个变种:"北京学"(Pekingology)。资料不足和研究方法的制约导致了一种精英中心(而非社会中心)的视角,中国被视为一个由领袖、纪律和意识形态(ideology)严格管控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这种研究态势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①

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对于美国国情和文化的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苏联和东欧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许多普通中国人的心目中,美国文化就是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广岛原子弹、可口可乐、摇滚乐、嬉皮士、华尔街股市、越南丛林的美国大兵,以及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老人河》歌声等所代表的那种理念和形象。直到1972年2月21日,主张实行"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新和平战略"的尼克松总统携夫人在北京首都机场与周恩来总理握手的画面通过卫星向世界转播,中美关系史才翻开了新篇章。美国汉学随着中美学术界的频繁交流和互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亚洲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the United States-

① 沈大伟:《美国的中国研究60年》(张小溪译),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第2期。

China Relations)等机构都积极鼓励并支持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汉学研究。

克里斯琴·卡里尔(Christian Caryl)在2010年12月《纽约书评》上发表的《揭开中国的面纱》一文中说:

> 不从历史和文化源头上思考就不能准确了解现代中国。英国记者马丁·雅克和美国政治分析家克里斯托弗·福特力求通过探讨中国知识传统来说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可能表现。他们说,极其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认为中国并不属于西方通常所说的"民族之国"(nation-state),而是一个建立在儒家传统基础之上"重德行、人事管理至上、稳定团结压倒一切"的"文明之国"(civilization-state)。这一世界观强调对于等级关系的尊重,集体优先个人,认为对抗国家不仅危害现有的社会秩序,而且是彻头彻尾的不道德行为。①

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的近期新著《论中国》(On China)是一部从中国文化和哲学观的角度来考察和分析中国外交活动的重要著作,视觉独特,别开生面,印证了克里斯琴·卡里尔的上述观点。基辛格在书中把外交事务比喻为"下围棋",通过公元前3世纪就流行于中国的围棋的独特原理来揭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历史上最高深莫测的内窥文化(inward-looking cultures)如何对外部世界进行观察的奥秘。正是对这一原理的把握帮助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他本人在1971年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并建立了友好国家关系。与象棋不同的是,围棋双方各执180个黑白棋子,均用战术包围获得功能性优势而不是彻底击垮对手。他指出,赢家的身份并非一目了然。换句话说,中国人并不对对手采用将军的办法,而是乐于让对手一次次陷入僵局,为战局共存(combative co-existence)留有余地。1949年在具有神机妙算才学的毛泽东领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大陆的政权时美国人并不懂得这一招。基辛格说,在此后的20多年中美国的外交政策硬把台湾地区捧为所谓的"真正中国代表",帮助该岛

① Christian Caryl: *Unveiling Hidden China*,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9, 2010.

与海峡对岸为生存竞争而博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位与资本主义斗争一辈子的毛泽东主动向美国迈出了第一步，因为他成竹在胸：中美双方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美国在外交上第一次放弃了为争取彻底胜利所作的努力，从而为双赢留出了空间。令人觉得唐突的是美国竟然也下起了“围棋”！①

在书中基辛格还谈到他发现美国外交官常常倾向于把问题剥离之后才寻求解决的办法，而中国外交官则习惯于从整体上综合分析各类问题，以便达成最终谅解。美国人可以就某些问题达成共识的同时保留着对另外一些问题的歧见，而中国人则倾向于在整个局势框架内区分轻重缓急，允许暂时搁置一些有分歧的争论，但是在时局有利时却不断向对方施压。总之，美国人关注的是外交事务中的交易，而中国对手则善于把握外交心理。

美国有各种类型的智库，例如：综合性战略智库兰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行使美国政府政策研究功能的和平研究所（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国防部下属的防务分析研究所（The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和亚太安全研究中心（The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具有政党背景的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无明显党派倾向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Policy）。具有大学背景的研究所有：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 Research）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Asia Studies）等。此外，美国还有布鲁金斯研究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和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在美国政府处理对华的重大问题时，上述一些智库在不同程度上都起到幕僚体系的作用，那些研究所和基金会都与美国汉学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制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仅胡佛研究所一处就长期收编各类英才，前国务卿赖斯曾是该所的高级研究员，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一度供职于此，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1946—　）的防务政策研究小组中有 8 名成员来自该所。据专家估计该所每年预算经费曾高达 2500 万美元，美孚、

① S.Srinivasan：*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In *Forbes India Magazine*，15 July，2011.

福特和通用等公司都对其倾注过巨资。那儿也是隐藏中国近代历史机密最多的地方,《蒋介石日记》就秘藏于此。

2001 年,成吉思汗(1162—1227)、和珅(1750—1799)、伍秉鉴(1769—1843,商名"浩官",英文名为"Houqua")和宋子文(1894—1971)与洛克菲勒和比尔·盖茨(William Henry Bill Gates,1955—)等 50 人一起,被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为 20 世纪全球最富有的人。广州怡和行富商伍秉鉴当年出资价值相当于今天的 2600 万美元与约翰·福布斯(John Forbes)在波士顿合作投资。相比之下,1828 年欧洲金融家内森·罗斯柴尔德(Nathan Rothschild)所持有的资本只有 530 万美元,就算不了什么了。少数人富有不等于全民富有,因此,这一案例与其说是中美两国历史名人的财富比较,毋宁说是中美文化交流史的一种解读方式:广州曾经是美国富商的基地,更是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始发站。

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加速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和学术交流,进步令人欣喜,但是双方在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的一次次争辩和博弈也使学者和网友深感不安。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波折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国家利益的较量,其结果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了汉学研究的世纪工程。

据统计,1951 年美国的汉学专业研究生只有 143 名,1959—1969 年增至 3000 多名,其中学士 1700 名,硕士 1000 名,博士 412 名。目前美国各大学和智库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已有 3000 多人,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知名华人学者不少于 300 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等机构有 1000~2000 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中国问题。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现在都设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或者项目,部分州立大学、地方大学和民办大学也开设了中国研究课程。① 20 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开设汉语专业的院校约 30 所,1968 年增至 108 所,20 世纪 70 年代已达 260 所,到 90 年代多达 486 所,遍布 39 个州。目前学习汉语课程的人数约 7842 人,汉语进修生人数超过 1.7 万。自 2004 年起,美国相继建立了 100 所孔子学院和 366 个孔子学堂,其中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设立时间最早,密歇根州立大学还创建了全球第一家网络孔子学院。据报道,在家中或者其他场合

① 梁怡王爱云:《西方学者视野中的国外中国问题研究——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2010 年 6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说汉语的美国人已高达200万人。此外,还有成千上万关心中美关系发展的学者和个人学术领域与中国研究关系密切的专家,都在为金碧辉煌的美国汉学大厦贡献自己的才能和智慧。

二、中美早期往来的广州记忆

1783年《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签署后,美国赢得了独立,但是政治和经济上却陷入了重重困难。残酷的战争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国家内债和外债总额高达4000万美元,财政紧缩导致了通货膨胀和工商业凋敝。城市满目苍凉,码头破败不堪。独立战争前的200多艘捕鲸船仅剩下了几艘。原来马萨诸塞州一年可以建造125艘船,战后却减产至45艘。

英国取消了过去在帝国范围内对北美各州实施的优惠政策,不但不再提供任何免税或减税的商品,还对美国运往英国的货物征收高额关税。更有甚者,英国还禁止美国商船进入英属西印度群岛,早先以玉米、牲畜和木材交换咖啡、棉花、染料和朗姆酒的生意因此不再继续。当时以物换物(barter)原本可以帮助美国解决在国际贸易中白银紧缺的问题,但是后来英国却从中作梗,无疑是不愿看到独立的美国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西班牙和法国在历史上都跟英国一样在北美占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1784年,西班牙乘美国危难之际封锁了密西西比河入口,不准美国船只进入航道。法国也违背了在美国独立后对其开放所有海港的承诺,虽然象征性地允许美国船只进入西印度群岛的部分水域,但是却严禁载货量超过60吨的美国商船通航。这一切使美国的对外贸易雪上加霜,邦联政府国库日渐空虚。

为摆脱这一困境,美国决心发展经济,扩大对外贸易。1783年11月,大陆会议(the Continental Congress)财政总监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1734—1806)在祝贺国务卿约翰·杰伊(John Jay,1745—1829)成功签署《巴黎协定》的信中写道:"我正要派几艘商船去中国,以鼓励其他商家也参与此类商业冒险。"①莫里斯原籍英国,1747年跟随从事五金买卖的父亲移居美国马里兰州。他自幼好学,勇于开拓,20岁时就与他人合作成

① Jean Gordon Lee: *Philadelphia and the China Trade, 1784—1844*.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p. 63. 1984.

立了商贸海运公司。独立战争期间他是华盛顿军队的军火供应商,后来事业飞黄腾达,还组建了专门筹款的北美银行。他早就预见到中美贸易前景美好,正跃跃欲试将一批货运发往中国。

当时北美的造船技术和航海经验已经相当成熟,涌现出一批具有航海专业知识的人才。美国海岸线长,海域宽广,盛产制造单桅小帆船(sloop)所需的橡木和松木,波士顿就是遐迩闻名的造船中心。1770 年英属北美殖民地每年建造船只 300 多艘,4 年之内船舶载货总数已达 21 万吨。独立战争后美国的造船业进一步发展,海上贸易的发展召唤着大批青年加盟,其中一些人自幼就随父母出海,眼界开阔,胆识过人。这些因素使美国商人有可能远涉重洋,于是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亚洲。

当时美国各地都有计划到东方开展贸易的商团,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有的未能成行,有的中途改变了计划。例如 1783 年 12 月,波士顿西尔斯(Sears)商号的一艘排水量 55 吨的"智慧女神"号(Pallas)满载着从新英格兰收购的野西洋参,从欣厄姆(Hingham)启程驶向广州。但是在南非好望角,一位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船长表示愿以两倍重量的茶叶交换货船所载的全部西洋参,船主当时无法预测前往中国航程的艰难程度,眼下见有利可图就与对方成交了那桩买卖。

此时康涅狄格州也有一艘商船准备东渡中国,但由于资金不足只好放弃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令人惊喜的是,探险家约翰·雷雅德(John ledyard,1751—1789)从可靠渠道获悉:在北美西北海岸花 6 便士就能买到的一张海獭皮(sea otter pelt)运到广州即可成为抢手货,售价可达 100 美元。许多美商为之振奋,决心前往中国掘回第一桶金。

在中美交往史上雷雅德被视为第一个有据可考的到过中国的美国人。他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曾对中美直接贸易做出过特殊贡献。1772 年他就读于达特茅斯神学院,后来加入了英国海军。1776 年 7 月他参加了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1728—1779)最后一次赴太平洋的考察,到过广州。1782 年返美后他曾到各地游说,把当时中国出口优惠价格的茶叶和生丝看作千载难逢的商机,鼓励美国人去广州做生意。这一想法与莫里斯一拍即合,他作为独立战争的财政资助者正苦心孤诣地策划着赴华贸易大计。

1784 年年初,由罗伯特·莫里斯和纽约的丹尼尔·帕克公司(Daniel Parker & Co.)共同出资,把配备了 10 门火炮的美国私掠船(Privateer)改造

成一艘远洋三桅帆船，命名为“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该船长30多米，载重量360吨，首航广州时满载着从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采购的30吨花旗参、316捆棉花、2600张毛皮、1270匹羽纱、26担胡椒和476块铅锭以及焦油和松脂等总值为12万美元的货物。

“中国皇后”号船长是约翰·格林（John Green，1736—1796），管货人（Supercargo）为山茂召，商务助手托马斯·兰德尔（Thomas Randall，？—1811）。随船人员有：高级职员3人，普通船员1人，外科医生及助手各1人，事务长1人，木匠2人，铜匠1人，木桶维修工1人，海军见习生2名，水手34名，火炮手1名，服务生若干名。

格林自幼喜爱航海事业，有丰富航海经验，28岁就被选拔为船长，在独立战争期间曾任海军上尉。

山茂召1754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一个商人家庭，曾就读于拉丁学校，学习过会计专业。1775—1784年他在军队服役，担任过炮兵少校，因为表现出色受到华盛顿总统的嘉奖。退伍后他转入了托马斯·兰德尔船长的公司旗下从事对华贸易。加盟“中国皇后”号时他正处于精明强干的而立年华，经营管理有方，擅长与外国人打交道。

“中国皇后”号得到国会颁发的航海准证后原计划从费城启航前往广州，但是天不作美，数度延期。后来船长决定2月22日（华盛顿总统生日）从纽约启程，在12响礼炮声中“中国皇后”号驶出了纽约港，途经非洲佛德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时补充了食物和淡水后继续航行，越过好望角便进入了印度洋。7月18日抵达巽他海峡（Sunda Strait）旁的爪哇头（Java Head），当地马来人纷纷驾着满载鸡鸭、乌龟和椰子的小船前来兜售，十分热闹。港外停泊着两艘法国船，其中一艘的目的地是华南，于是两船相约结伴而行。

到达澳门后他们从中国官员处申领到前往广州的通行证，然后循例雇佣了领航员和通事。1784年8月28日越过了虎门炮台到达黄浦港，两艘中国小艇停在“中国皇后”号两侧，海关官员登船查验后开出纳税单据，船长随俗向他们赠送了时钟、手表、八音盒和香水之类的礼品。客船仪仗鸣炮13响以示敬意，港内其他船只也鸣炮答谢。

纳税完毕便有中国舢板前来将货物运到指定仓库，船长、管货人及其助理被送至广州市内办理相干手续，按例委托一家中国商行代理货物销售并照顾船员的生活起居。据传最初这类商行在广州有13家之多，故称“十

三行”(Chinese hong; Thirteen Guilds)。客商及其雇员不能进入广州城,但是可以在十三行附近的街区活动。商行离岸约300英尺,都是2~3层高的楼房,楼前的旗杆上飘扬着代理客船所属国的国旗,几天后星条旗也在此冉冉升起。

“中国皇后”号所载货物在4个月内由中国代理商行全部售罄,除去各项成本及开支外一共赚了37700美元,令众人喜出望外。

回国前格林和山茂召首先购买了近千箱瓷器作为压舱货物,然后又购买了2460担红茶和562担绿茶。有携带私货特权的格林船长,还特地为船东罗伯特·莫里斯买了四把折扇、四盒瓷像、窗帘和石刻宝塔。他自己也买了大量丝绸、缎鞋、南京布、桂皮、花伞、瓷碗、漆器、牙雕、扇子、墙纸以及130条丝绸衬裤。

1784年12月27日“中国皇后”号得到了清关许可,离开广州回国,于1785年5月11日回到纽约。不久,巴尔的摩的“智慧女神”号又被派往广州装运“中国皇后”号返航时尚未交验的瓷器。同年8月这批货抵港后便登广告销售。

“中国皇后”号的最大成功在于它帮助美国摆脱了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垄断,为美国打开了通往中国的贸易之路。这次历史性航行,不仅开拓了中美之间的直接贸易,同时也为两国以后的文化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美国工商、经济、科贸、文化的全球化发展方向释放出风向标。当时纽约等地的报纸都在显著板块对这次航行做了专题报道并发表长篇评论,描述此行是“具有远见卓识和成果丰硕”的壮举。波士顿的杂志还发表了船长山茂召的航行日记,证券公司发行了每股300美元的对华贸易股票,商家争相建造远洋贸易帆船,准备迎接声势更大的经贸浪潮。纽约和费城等东海岸商埠纷纷为中美贸易的乐观前景呐喊造势,短期内就成为对华的投资和贸易中心。对华贸易的热情关注掀起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中国热”,是许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始料未及之事。

华盛顿总统从“中国皇后”号带回的物品中购得302件瓷器和一些精美的象牙折扇。其中一把中国茶壶款式新颖,把手为双耳交叉造型,并绘有飞龙图案。总统爱不释手,特命工匠在壶外一侧画上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爱国组织辛辛那提协会的会标,以表示他本人作为该会首任会长对那件珍品的喜爱,一直摆放在他的弗农山庄。“中国皇后”号第二次去广州采购之前,华盛顿总统特地交给了船长一份订单,嘱咐代购中国生产的白色大

瓷盘和小瓷碗以及花色上乘的薄棉布等物品，可见他和家人对于中国产品的良好印象。

此后一批批美国商人纷纷到广州寻找商机，大西洋沿岸的港市几乎每周都有发往中国的货船。从波士顿或塞勒姆前往广州的美国商船有两条基本路线：一是从东海岸出发，绕过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然后进入太平洋；二是横渡大西洋，从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再穿越马六甲海峡，最后驶入南中国海。这一商贸浪潮席卷了从美国西海岸到阿拉斯加、檀香山、菲律宾和萨摩亚群岛等地。到 1790 年，中国输往美国的货物已占了美国进口货物总量的七分之一，美国同中国的贸易额仅次于英国。据统计，1800 年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商船来华，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南北战争时期，美商赴华贸易每年所得利润竟高达 3000 万美元。毛皮和人参等输往中国的商品堆满了离中国最近的太平洋岛屿贸易据点，对华贸易的经济效益成为美国向西部和太平洋扩张的动力。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的商人在对华贸易中所积累的巨额资本投入到工商业后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工业革命的进程。频繁的中美贸易催生了美国历史上首批百万富翁。

1734 年莫里斯出生于英国利物浦，1757 年与托马斯·威林（Thomas Willing）合伙创办一家公司，并先后在英国、葡萄牙、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开展业务，到 1773 年已经拥有 10 艘货船的运输船队。1775 年他被推选为宾夕法尼亚安全委员会副总监，分管银行和军火供应业务，后又当选为大陆会议代表，具体负责外贸、军务、海防和外交。独立战争时期他以宾夕法尼亚议会代表身份出席了第二次大陆会议，签署了多项联邦法令。1787 年他参与了起草宪法，在美国国会分管贸易和商务。1778—1791 年他还担任了费城学会和费城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前身）董事。因为长期从事对华贸易，莫里斯后来成为美国的金融巨子。

约翰·普金斯·顾盛（John Perkins Cushing，1787—1862）出生于波士顿，是富有的海商和慈善家。他年幼时母亲死于天花，由叔叔抚养成人。1803 年 16 岁时在叔叔开办的中国商号中任职，表现出商业经营的才能，后接管了全盘业务，1806 年在广州创建普金斯洋行。有一年华南发生饥荒，他乘机从他国进口大米获利。1812 年的战乱给对外贸易带来重创，普金斯洋行伺机以 18%的高额利息向广州商家放贷。当硬通货坚挺皮货生意利润下滑时，他的洋行就着手以鸦片生意取代对华贸易基石的皮毛和硬通

货策略。19 世纪 20 年代,顾盛在广州的外商中颇具影响力,与十三行的富商伍秉鉴私交甚笃。1820 年顾盛打算破格提拔他的表弟托马斯·腾诺·福布斯(Thomas Tunno Forbes),但是福布斯还未掌控洋行就英年早逝。1827 年,顾盛为退出商界将普金斯洋行并入旗昌洋行。1830 年他返回波士顿,娶三一教会牧师约翰·希尔维斯特(Rev.John Sylvester)的女儿为妻,购得 200 英亩的地产建起了新英格兰最豪华的一处公馆。顾盛在广州经商 30 年,积聚了 60 万美元的财富,去世时资产高达 240 万美元。

约翰·雅各布·阿斯托(John Jacob Astor,1763--1848)是德裔美国商人,靠皮毛、房地产和鸦片贸易发家的亿万富翁(multi-millionaire)。他的事业得益于父亲的德国奶业。1779 年 16 岁时他移居伦敦,投靠从事乐器制作的哥哥乔治。1783 年他移居美国,发现那里有一个前景喜人的潜在皮毛市场。他把从西部原住民手中购买的大批皮毛销售到欧洲和亚洲,利润十分可观,最高竟达 1500%。美国革命战争期间他把企业扩大到格雷特湖区、加拿大、美国西部和太平洋沿岸商埠。后来他在伦敦申领到一张在东印度公司港市做生意的执照,然后联合纽约的朋友向广州派出一艘商船,贩卖运去的毛皮和花旗参后立即在当地购进丝绸和茶叶运回美国,一次盈利就高达 5.6 万美元。他又将这部分资金用于纽约地产和银行业投资,获利所得成为他的亿万家产的又一笔巨额进账。皮毛贸易加速了美国西部的开发,从政治上和经济上使美国很快成为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大国,同时也有利于南非西海岸和太平洋诸岛的开发,因此他的事业备受关注和支持。但是皮毛贸易也使多种珍稀动物濒临灭绝,美商与原住民的社会冲突日渐加剧。他去世时占有财富大约 2000 多万美元,其实际价值相当于 2006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100 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四位巨富。

伊莱亚斯·哈斯克特·德比(Elias Hasket Derby,1739—1799)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一个海商家庭。虽然他自己没有下过海,但是他的海船(独立战争期间常装饰成私掠船)却去过菲律宾、俄国、印度、非洲和东印度群岛。1785 年 12 月下旬,他旗下 84 吨排水量的“大突厥”号(Grand Turk)曾装运价值 9000 英镑的货物,在广州转手后得利 1.9 万英镑。回国时又在中国购得热销的茶叶和瓷器,在纽约市场轻而易举地赚回 3.7 万英镑。1776—1799 年他的商船在 100 位船长的率领下总共航行 330 次,在从塞勒姆开出的 158 艘私掠船中有一多半是由他调遣的,但是他从未染指奴

隶贩卖。他曾把新英格兰出产的烟草、水果、蜡烛、火腿销往世界各地，同时又在世界各地大量购进土特产运回美国销售，因此很快就坐上了来华美国富商的宝座。

斯蒂芬·杰勒德（Stephen Girard，1750—1831）出生于法国波尔多一个海商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船长。14 岁时杰勒德在一家商店当学徒，24 岁任职于纽约一家海运公司，3 年后在费城独立开业。在后来的 30 多年中他的海船往返于西印度群岛、欧洲和亚洲，日进斗金。

他把对华贸易中积累的资财主要用于美国银行、铁路和土地投资，成为实力雄厚的北美银行家兼企业家。

对华贸易利润丰厚，但是风险也大。一些美国商人致富后将部分资金投入风险较小的房地产、制造业和铁路建设，或者创办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学，加速年轻共和国的文化发展。据 1998 年《美国遗产》杂志的统计数字，美国历史上几位亿万富翁都是通过对华贸易发家致富的，其中包括总排行第四位的阿斯托、第六位的吉拉德和第三十九位的德比。

1786 年以后从事中美贸易的商船还有“希望”号（Hope）、“联盟”号（Union）、“华盛顿将军”号（General Washington）、“亚细亚”号（Asia）、“广州”号（Canton）、“詹明”号（James）、“爱利奥诺拉”号（Elio Nora）、“马萨诸塞”号（Massachusetts）等。美国费城商人还组建了一支特别船队，加入了在印度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广州航线上日趋激烈的中美贸易竞争。

美国对华贸易促进了远洋航海技术的发展。19 世纪 30 年代美国人造出了跨越太平洋的“飞剪快船”（clippers），是一种载重大速度快的远洋帆船，创下了 109 天从纽约到达广州的最佳纪录，极大地推动了中美贸易。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美商经实地调研发现可以从太平洋沿海城市经陆路前往中国，不仅可以缩短时间，还可以节省各项费用。此计一出，许多美商纷纷取道阿巴拉契亚山口来华。

参加首次中美直接贸易的关键人物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船长格林后来成为对华贸易顾问，专门为各方商家出谋划策。山茂召在“中国皇后”号出访广州回到美国后，向邦联政府递交了一份详细报告，同时转交了广州官员嘱托带回的两匹绸缎。他在报告中谈到了中国人如何友善和好客，力主扩大对华贸易。报告先后被呈送到国会和政府相关部门，后又向媒体散发。1785 年 2 月 4 日，山茂召再度启程来华，8 月 15 日到达澳门。1786 年 1 月美国国会任命山茂召为驻广州无给职商务领

事。四年后,总统华盛顿签署了对山茂召第二期的任命。1788 年 1 月 8 日他先后访问了孟加拉和广州,回国休假后在弟弟本杰明·萧(Benjamin Shaw)的陪伴下于同年 11 月 2 日重返广州途中染上肝病,1794 年 3 月 17 日启程返回波士顿途中病逝。

1798 年美国在广州正式建立领事馆,中美贸易发展速度与日俱增。1790 年美船进黄埔港数已增至 14 艘,贸易额也跃升为 300 万美元。史料显示:1784 年只有英国、荷兰、法国、丹麦和瑞典等西北欧国家的商船停靠广州,但是 5 年之后,在所有停泊广州黄埔海面的外国商船中,美国商船的数量已经跃升为第二位。1786—1833 年美国来华的船只共计 1004 艘,相当于英国来华总船数的一半,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来华船只总数的 4 倍。至此,由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直航广州的大西洋沿岸商埠对华贸易圈已经形成,中美两国商贸交流如云蒸霞蔚,气象万千。

1800 年东印度公司迫于形势宣布放弃对华贸易垄断,除颁发执照外将中西贩运贸易业务全部让予散商公司,外商在华代理行号因此应运而生。18 世纪末,广州的英美代理行号已经超过 24 家。18 世纪 90 年代以后,欧洲战事频仍,美国却成为对华贸易最大赢家,贸易额超过了荷兰、丹麦和法国。广州的美资普金斯洋行(Perkins & Co.)、旗昌洋行、同孚洋行(Olyphant & Co.)、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和魏特摩洋行(Wetmore & Co.)先后创建。到 1894 年美商在华洋行已达 111 家。

1818 年康涅狄格州籍商人塞缪尔·罗素(Samul Russell)在广州创办罗塞尔公司(俗称"老旗昌"),1824 年改名为"旗昌洋行"(Russell & Co.)。该行初期代理几家美国和欧洲公司在华销售业务,采办生丝和茶叶,还贩卖鸦片。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废除,旗昌势力进入了中国各通商口岸,许多西方驻华领事都成为旗昌洋行股东。1853 年动乱频发,从广州到茶叶产地的交通受阻,旗昌洋行便设法直接去武夷山收购茶叶,循闽江运至福州,成为西方洋行最早的福州口岸开拓者。在业务鼎盛时期,旗昌洋行在中国沿海遍设趸船,囤储货物,增加机器缫丝和焙茶,甚至兼营货运、银行、保险和军火,财大气粗无人可及。1862 年 3 月 27 日,旗昌轮船公司(又称"上海轮船公司")成立,统领沪粤和长江两大航线运营,1867 年至 1872 年几乎垄断了全部长江航运,是上海港历史上第一家外资轮船公司。

琼记洋行原是 1840 年旗昌洋行合伙人奥古斯丁·赫德(Augustine Heard)、约瑟夫·库利奇(Joseph Coolidge)和约翰·默里·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在广州创建的一家美国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茶叶和鸦片等大宗进出口货物,由赫德家族(主要为其侄辈)掌控全盘业务。长期居留中国的赫德因为健康原因曾一度回国休假,1841 年又返回广州主管公司发展事务,直至 1844 年。由于飞剪快船已经投入使用,琼记洋行得到了迅速发展。该行是 19 世纪广州的第三大美国公司,仅向中国出口汽轮(steamships)一项就获利无数,后来还代理多家洋行业务,包括 1861 年成立于利物浦的约翰·施怀雅父子有限公司(John Swire & Sons Limited)。因为茶叶利润逐年下滑,该行竟不顾国际公理和中国禁令,铤而走险鸦片买卖。

威廉·谢泼德·魏特摩(William Shepard Wetmore,1801—1862)出生于佛蒙特镇,在新英格兰接受了基础教育,14 岁就离家闯荡世界,23 岁时在普罗维登斯他叔叔友人爱德华·卡林顿的一艘货船上当管货人。1831 年他离开艾尔索普商号后前往广州拼搏,创办了魏特摩洋行,1839 年回到纽约开业(后改名为"魏特摩·克莱德洋行"Wetmore Cryder & Co.),同时兼管广州商号,直至 1847 年退休。1841—1842 年间中国商界断绝与英商往来,外贸生意几乎全由美国商家独揽,魏特摩成了最大赢家之一。他凭靠自己的诚实和善意白手起家,很快在南非和广州生意兴隆,之后又在上海另开分号。1847 年他在纽波特购置一处豪宅,身家财富已过百万,此后又在俄亥俄州的马西隆曾购置良田万顷,在田纳西州置地达 7 万英亩之多。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美国商人就开始向中国销售鸦片,"瞪羚"号(Ariel)、"气精"号(Sylph)和"西风"号(Zephyr)都是美国的鸦片运输船。英国商人在中国大规模走私鸦片时,美国烟贩也不甘寂寞。因为当时产量最高的印度鸦片为英属东印度公司所垄断,美国烟贩只能到土耳其和波斯寻找货源,或者在伦敦进行转口交易。1806—1834 年美国烟贩从土耳其运到广州的鸦片一共 8901 箱。19 世纪 20—30 年代的普金斯洋行和旗昌洋行是美国向中国走私鸦片数量最多的公司。

此后中美贸易的商品结构和结算方式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美国国内可供出口的产品除了花旗参、皮毛、羽纱、棉花和铅块外,其他可与中国交换的产品不多,早期只能携带白银来华直接换取中国的丝绸和茶叶,然后再到土耳其、孟加拉或波斯换购鸦片转口华南。中国开展禁烟运动展后,虽然一些美国有识之士仗义执言,但是唯利是图的美国鸦片贩子却暗中协

助英国,贸易摩擦时有发生,增加了许多不稳定因素。

1984 年 2 月,美国 5 个城市先后举办了 8 个展览会纪念中美通航 200 周年。纽约自然博物馆展出的 350 件当年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被视为珍贵的文物展品,其中刻着“中国皇后”号图案的瓷器及各种雕刻艺术品最吸引参观者的眼球,勾起他们对往事的深思和回忆。

三、通过茶叶和瓷器启动的中美双边贸易

美国在独立之前与中国基本上没有直接贸易关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在广州购买茶叶、瓷器、丝绸、棉布、砂糖、粮食和漆器运到英国后,将部分商品转口到北美波士顿市场,然后又将哈得孙河流域新英格兰地区出产的花旗参等产品运到中国,如此形成中国—英国—北美的三角贸易。开展类似形式贸易的还有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商人在厦门和台湾购得茶叶、瓷器、丝绸和香料后运到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雅加达),然后通过阿姆斯特丹市场转口北美。

1664 年英国商人开始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移民北美的大批英国人把饮茶习惯也带到了新大陆。1690 年,波士顿开辟了第一个出售中国茶叶的市场,药店也张贴了出售绿茶的广告。1720 年北美商人开始直接从广州进口红茶和武夷茶。1760—1766 年,北美城市居民的茶叶消费量平均每年为 120 万磅,饮茶已成了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茶叶贸易因此被纳入了殖民地商人的主要经营项目。

1765 年英国政府因财政困难,打算通过增加税收来缓和危机,决定在北美殖民地开征印花税(Stamp Duty)。当地居民群起反对,英国当局便改征“茶税”(Tea Tax)。1773 年英国政府颁布了《茶条例》(Tea Act),把在北美销售茶叶的专利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又用《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来限制殖民地商人与外界往来,禁止居民购买所谓的“私茶”(smuggled tea),对其他来源的茶叶均征收茶税。当地人民不堪重负,组织了多个秘密社团,其中的“波士顿茶党”(Boston Tea Party)活动最频繁。该党反对东印度公司对茶叶的垄断,呼吁美商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同年 12 月中旬,“达特茅斯”号(Dartmouth)、“海狸”号(Beaver)和“埃莉诺”号(Eleanor)满载着大吉岭茶先后停靠波士顿港,茶党党员便化装成印第安人秘密登船,把价值 18000 英磅的 342 箱茶叶全部推入海中。这就是历史

上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Tea-Dumping Incident),后来发展成为北美殖民地人民抗英斗争的导火线。

王戴夫在一篇题为《从孔子到长城:中国文化对殖民时期北美的影响》中写道:

> 饮茶关乎民生的重要性发展到影响北美的历史进程。饮茶已经成为殖民时代北美社会的基本要素。18世纪人们在家饮早茶,在社会交往中饮午后茶或者晚茶已成“习惯”。当代的统计显示有三分之一的人每天饮茶两次。一位瑞典观光客发现几乎没有那位农妇或贫民妇女不饮早茶的。……在波士顿茶叶党事件之后,被激怒的殖民地市民,包括商人、船运商和普通百姓开始上街游行。就在爱国者在波士顿海港倾倒茶叶事件一年半之后在列克星敦打响了第一枪。由饮茶不增加额外经济负担的正当权利引发的冲突导致了政治对抗和美洲的独立战争。①

法国大革命(1793—1799)和拿破仑战争(1805—1815)期间,罗马帝国、英国、沙俄、普鲁士、奥地利、荷兰和西班牙等国七次结成反法同盟,跟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战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欧洲对华贸易。许多国家自顾不暇,但是美国却利用这个机会扩大了对华贸易的规模,当时广州海面上停泊的美国商船总数超过了任何欧洲国家的商船。中国茶叶因此在美国找到了最佳商机,美国对华贸易额随之节节攀升。

1789年美国国会为保护对华贸易通过了航海法,对外国商船每吨载重量征收46美分的吨位差别费,对美商从亚洲进口的货物除茶叶外都给予12.5%的关税优惠,还对美国从中国进口转销欧洲的茶叶予以免税。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新法案,减征从中国进口货物的关税。1791年国会再次通过法案保护对华贸易,禁止外国商船运茶进入美国,为中国茶叶经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1844年7月3日签订《中美望厦条约》(Treaty of Peace, Amity and Commerce with Tariff of Duties,简称Treaty of Wanghia)之

---

① Dave Wang: *From Confucius to the Great Wall —Chinese Cultural Influence on Colonial North Ammerica*. 2009.

后数十年间，两国贸易迅速增长。其中茶叶一项就占输美商品总值的58.04%。

飞剪快船是美国造船业对于“超级商业”的茶叶贸易的一大贡献，到19世纪20年代汽轮开始广泛用于货运。往返于东印度群岛的货船（East Indiamen）船身长度为50米，载货量从18世纪的400顿逐渐增加到19世纪的1400顿，成了对华贸易的主流运输工具。1831—1840年中国输美茶叶平均每年为113600担，此后增幅逐渐加大：1860年中国输美茶叶总数是128000担，1870年提高到160000担，到1880年增至200000担。美国从中国进口茶叶数量激增的原因，一是在城镇居民中饮茶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和乐趣；二是茶叶贸易不需要大量的启动资金和设备，但是获利丰厚；三是给美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实惠，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商业和运输业等相干产业的发展。

瓷器和茶叶是美国汉学史上的两朵商业奇葩，见证了中美两国之间贸易的历史性发展。

中国瓷器进入美洲市场的历史晚于亚洲和欧洲。据历史记载，1520年中国瓷器经西班牙商人初次引进美洲。奥尔巴尼的欧洲殖民者早在1662年就开始使用中国瓷器。19世纪40年代，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支考古队曾经在旧金山以北德鲁克海湾附近发掘出70余件中国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生产的青花瓷。

17世纪北美东岸的弗吉尼亚原是英国殖民地，那儿很早就开始接触亚洲商品。在保存下来的家庭财产清单和遗嘱中专家发现中国瓷器已在当地出现。弗吉尼亚詹姆斯河畔遗址的考古挖掘也找到了各个时期不同品质的中国瓷器，其中多半带有青花图案。17世纪初新阿姆斯特丹（1644年改名为“纽约”）是荷兰在新大陆建立的领地之一，当地家产清单和考古发掘显示居民曾经使用过中国瓷器，一些荷兰商人和大家族都曾收藏过大量中国瓷器。

随着北美殖民地饮茶风尚的传播，对中国瓷质茶具和餐具的需求也逐年增加。明代和清代初期，美洲市场的中国青花瓷器多半都经欧洲进口。18世纪后美国商人才得以直接到广州购买名贵的中国瓷器。1784年“中国皇后”号在广州购得中国瓷器近千箱作为压舱货物。1786年“中国皇后”号第二次前往广州，又采购了大批瓷器，除了青花瓷外，还有观音像和宝塔之类的艺术瓷雕。

1796年美商运回的中国瓷器占进口货物总量的15%，到1818年增加到24%。1804—1809年，美商在广州购买的中国瓷器中部分是有英文标记“EHD”的青花餐具和花瓶，部分是金边青花瓷女神、雄鹰、小宝塔和带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肖像或家族纹章的瓷器（又称“纹章瓷”）。

外销广彩瓷（广州织金彩瓷）采用粉彩、五彩或青花加彩等多种装饰方法，融合了西洋油画技法，增加了立体感。初创期广彩瓷的原料和绘画风格与景德镇大致相同，但是鼎盛期广彩瓷的绘画已经非常接近西方用户的美学鉴赏情趣，彩料也加入了鹤春色、西洋红、粉绿和茄色，把早先零碎和分散的设计巧妙地组合了起来，变成连续和完整的图案。题材上既有中国国画的山水、人物和花鸟元素，也有欧派纹饰和族徽标志，以及西洋帆船、欧洲城堡和中世纪人物，凸显西洋画异国情调的技法。18世纪出口到美国的中国瓷器，绘制的多半是柳树、鸟禽、蝴蝶、花卉、亭台或楼阁，底色均为蓝色和白色。随着美国国内经济和科技的发达以及海外影响的扩大，广彩瓷的装饰内容也根据客户需求逐渐发生了变化。美国商人在广州订购中国瓷器时常喜欢选择带雄鹰、飘带或盾形图案，以及飞剪快船之类纹饰的产品。

18世纪来华美商开始代客户订购纹章瓷。据美国古董专家估计，1685—1860年中国向英国和美国大约出口了6000套纹章瓷。这类瓷品是明清时期专门为欧洲皇室贵族订做的家庭用瓷（包括餐具和茶具），上面印有象征家族标志和荣耀的徽章，色彩浓重，装饰图案通常为骑士、盾牌、佩剑、雄鹰、马头和狮子。纹章瓷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浓缩了16—18世纪中叶美国一些显赫家族的历史，从纹章瓷上的图案可以看出持有人的社会地位、历史变迁、生活方式、兄弟排行、婚姻状况，甚至祖先历史和配偶的信息。广东瓷器商当年在接受客户订货后将订单发送给景德镇厂家，瓷器做好后再由代理客商验收，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是皇家贵族用品，几乎无一流落到市井民间，只有世袭名门才可收藏。中国纹章瓷对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起到了无法代替的作用，使中国文化在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著名的《自传》中曾经谈到家中使用中国瓷器的故事，揭示了中国瓷器如何在北美社会广为欢迎的历史：

有一天早晨太太唤我吃早餐时，我发现瓷碗里放着一把银

勺。这些是太太瞒着我悄悄买回来的，足足花了3.20镑，这样做她无需寻找任何借口，或者表示歉意，可她真的认为丈夫也跟自己邻居一样该享用银勺和瓷碗。这是舍下首次使用瓷盘和瓷碗，若干年后随着我们家的财富增加，瓷盘瓷碗的价值也增至数百镑之多。①

本杰明·拉什（Benjiamin Rush，1745—1813）是为在北美筹建瓷器厂奔走呼号的第一批人物之一，因为瓷器生产是摆脱英国对北美商品和贸易控制的有效手段，其意义远非限于瓷器制造，而是为了减少从英国进口付税商品和受控于英国的商品，最终赢得北美的独立。1769年一家瓷器制造公司筹资15000镑在费城组建起来了，推出的产品广受欢迎，更重要的是赢得了爱国者的支持，与英国同行的激烈竞争从此开始。虽然该公司的营业只维持到1772年，但是它挑战了英国对中国商品的垄断，为美国的独立事业做出了贡献。

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华盛顿大学里夫斯收藏馆（Reeves Collection）珍藏着2000多件中国明清出口瓷器，是美国第四大收藏中国明清出口瓷器的博物馆。其他三个博物馆分别为波士顿的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和特拉华州的杜邦家族博物馆（Winterthur Museum）。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建于1880年，收藏着中国古代陶瓷80多件，其中还有明代福建德化著名陶塑家何朝宗（1522—1600）雕塑的秃头长耳菩提达摩立像。

美国塞勒姆航海博物馆珍藏着画有著名“塞勒姆友谊”号（Friendship of Salem）的瓷盘。该船是一艘载重量为342顿的三桅帆船，1796年注册于美商杰拉斯米尔·皮尔斯（Jerathmiel Peirce）和阿伦·威特（Aaron Waite）名下，曾远航中国、爪哇、马德拉斯、伦敦、汉堡、圣彼得堡等亚欧城市16次，1812年在美英战争中为英军所缴获。1820年，广州陶瓷画师把美国画家的一幅“塞勒姆友谊”号水彩画复制到特别订购的一个10英寸的瓷盘上，并写上了英文说明文字。画面运用了西洋透视技法，周围有宽边锦地

① Dave Wang: *From Confucius to the Great Wall—Chinese Cultural Influence on Colonial North Ammerica*. p. 5. 2009.

花饰，还有蝙蝠和铜钱等吉祥图案。这件艺术品已成为研究美国18—19世纪航海、远东贸易、造船和绘画等方面的宝贵资料。

2010年4月16日在费城举办的第49届古董展览会上，近50位古董收藏家展出了中国纹章瓷，吸引了伦敦、纽约、波士顿、费城和弗吉尼亚州等地的古董爱好者前来参观。入场券售价125~600美元一张，1200张门票在开幕前几天就全部售罄，盛况空前。①

四、中美文化的双向互动交流

满族军队入关定鼎中原后江山一统，为防止台海外患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只允许广州、香港和澳门等几个南方港埠对外通商，西北边境的少数入境口岸基本上只允许陆路来华的俄国和西亚的神职人员和商人通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几个经过工业革命处于“海上贸易扩张时期”(Era of Maritime Trade Expansion)的欧洲国家，先后来华探求建交和商机。

当“中国皇后”号到达黄埔港办理入境手续时，广州海关官员曾误认为格林和山茂召是英国人，反映出他们是多么孤陋寡闻。而当时美国人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又如何？1954年记者伊罗生(Harold Robert Issacs，1911—1986)在对181位美国亚洲问题专家和媒体同行访谈中，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中小学地理教科书平均只用了7%的篇幅介绍亚洲，虽然介绍中国的篇幅较多，但是内容不外乎是中国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大米饭、火药的发明，以及一两张寺庙插图。在当时美国的中小学世界历史教科书中也只用了9%的篇幅介绍亚洲，内容只涉及马可·波罗来华、成吉思汗出征、大航海时代的东西方接触、对华贸易、福音传播和殖民化等问题。②

英国通事洪任辉(James Flint，1720—?)少年时代曾就学于岭南，供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时被视为一位小有名气的中国通。1755年他和喀喇生(Samuel Harrison)携带20000元鹰洋、1560瓶红毛酒和2箱蜡烛，向粤海

① 潘美龄：《中国陶瓷演绎西方百年梦想》，美国中文网博客2011年7月。

② Harold Robert Issacs：*Scratches on Our Minds：Am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John Day Co.，New York，pp. 47-48，1958.

关申领前往宁波和舟山等地的关防文书，希望开辟广州以外的贸易新点。他们意外地发现江浙的关税低于粤海关，陋规杂费少，商业环境也优越。在此后两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多次直接去宁波开展贸易业务，粤海关的关税收入因此受到影响。于是两广总督李侍尧（？—1788）奏请乾隆责令江浙海关加倍提高关税，并在两年后关闭了宁波口岸，使英商锐气受挫。

1759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派洪任辉就此事向乾隆皇帝告状。他和美国人塞缪尔·鲍恩（Samuel Bowen）乘坐一艘载重量 70 吨的商船抵达天津，通过行贿走关系将一纸诉状呈送到乾隆皇帝的御案上，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成风，处处刁难洋商，求清廷恩准改变现有贸易方略。乾隆皇帝派钦差南下，查处了一批广东官员和商人，但是鉴于洪任辉违反禁令学习汉语、窥测官场动向擅自上书有辱天朝体制，他和鲍恩被圈押于澳门前山寨，刑满后逐出国门。

1763 年鲍恩带着一些中国大豆的种子到达伦敦，1764 年回到美国乔治亚的萨凡纳，请求在当地总测量师亨利·杨（Henry Yonge）的农场试种他的中国大豆，当年获得意外丰收。1765 年 5 月鲍恩购买了 450 英亩土地大规模种植大豆，并与洪任辉合作向英国出售豆制品。此事成为中美交流史上广为传诵的佳话。

早期美国商人把个人发财看作高于道德、法律、荣誉和传统之幸事，冲破了英国对其国际贸易的限制，开辟了来华贸易的新航线，为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皇后”号首访广州后，在派驻商家无人通晓汉语和中国国情的情况下保持了 40 多年的双边贸易，今天看来似乎有些不合常理，其实这与“洪任辉事件”的前因后果有一定关系。缺乏中国语言和历史知识，不了解华夏风俗习惯，跟中国人打交道无疑会碰到种种困难，但是既然清廷规定不许洋人学习汉语和广东方言，他们只能用无师自通的“洋泾浜”（Pidgin）官话进行交流，不过也有少数美商和传教士在来华前后私自去澳门或者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学习速成汉语课程。

1842 年 8 月 29 日，清廷代表在长江江面英国“皋华丽”号上与英国代表签订了《南京条约》，标志着清朝所奉行的“朝贡体制”（Tributary System）的终结。1844 年 2 月在澳门郊外的望厦村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的第 18 条款具体规定来华美国人可以延师开馆授课，客观上为中美文化交流消除了原来长期存在的体制和心理障碍。

19 世纪 20—30 年代，西欧来华散商先后取代了本国的东印度公司，试

图凭借个人或者商团的经济实力影响官方对华政策，在广州、香港和澳门抢占舆论工具，推翻早期欧洲来华耶稣会士对于中国文化的褒扬立场，以自己利益集团的政治主张和人文观念对中欧关系进行重新评价。后来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很多方面都采取了与英美商人相同的做法，通过办学、办报、译经和出版书刊，在宣扬宗教理论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文化主张，利用媒体建构中国形象，为他们在华的事业营造气氛，形成了欧美汉学的思路。

早期美国儒商和新教传教士在澳门和广州办过几种中英文报刊，通过当地西侨和各类教会组织扩大影响，一方面传播福音和神学思想，另一方面也译介一些重要汉籍和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献，把传授中华文化知识和展示西方人文学科成就的两方面任务结合起来。与此同时，中国晚清的维新派和改良主义者也从东洋等渠道获得不少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思考如何帮助国人改变封闭保守和排外的观念，实现变法图强，以期彻底推翻封建帝制。随着这一文化浪潮影响的扩大，兴学办报成为西方来华学人和世俗化传教士的一种职业，大批天文学、造船学、工程学、机械学、物理学、生物学、兵器学、舆地学、医学、数学和化学的书籍和文献资料进入了中国知识阶层的视野，赋予了国人新的学科生命和政治追求。

《广州纪事报》是 1827 年吴特创办于澳门的半月刊，英国鸦片商马地臣（James William Matheson，1769—1878）接管后改为周刊，每周四出版，主编为史赖德（John Slade）。1838 年 5 月迁至广州，后又迁至香港。魏源刊印的《海国图志》第 94 卷关于外币和外汇的文章即译自该刊。

《中国丛报》1832 年创办，1851 年终刊，共发行 23 卷，裨治文、马礼逊和卫三畏任主编。该刊发表了许多介绍中国语言、历史、地理、宗教、商业、文学、艺术和道德方面的文章，常常就中国茶叶、禁烟和西方反华军力的集结等一些重要问题展开讨论，虽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但是对于了解中国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早期中美文化的沟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总体来看不失为一份对中国进行全面报道和研究的学术性刊物。1842 年郭实腊（Karl Frfiedrich Gützlaff，1803—1851）在《中国丛报》上曾撰文介绍《红楼梦》，是把中国白话小说介绍给西方读者的第一人。1850 年 3 月号的《中国丛报》刊登了《海国图志》的第 12 编译文，5 月号还刊发了魏源的《大清圣武记》，都在中外读者中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早期美国商人和船员在华的所见所闻、有关中国印象和经历的书面记

录，虽属凤毛麟角，肤浅直观，但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是当时美国读者认识中国的主要文字依据，也是研究中美贸易和美国人中国观的重要史料。1847 年出版的《山茂召日记》(The Journal of Major Samuel Shaw, the First American Consul at Canton)、1882 年出版的《广州番鬼录》(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by an Old Resident)和 1885 年出版的《旧中国杂记》(Bits of Old China by William Hunter published by Kegan Paul, Trench, London)，是根据作者的第一手资料写作或者编辑成的三本重要著述，见证了中美关系的建立和贸易的发展，反映了中国南方社会的生活现实，具有一定真实可信的价值。

1847 年《山茂召日记》由乔赛亚·昆西(Josiah Quincy)在波士顿编辑出版，全书共分三部分：山茂召传记及书信；广州之行航海日记；致国务卿杰伊的信件和杰伊的复函。该书记录了中美贸易的发端，山茂召的 4 次广州之旅以及中美航线的成功开通。日记对所观察到的中国社会生活作了详细描述，例如：一位广州行商的住宅花园内的曲径和亭台给山茂召留下的深刻印象，他对中国皇帝和商人所给予的肯定评价，佛寺内信徒烧香拜佛的虔诚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迷信色彩等。但是，广州的一些规定和社会现象也使他反感和迷惑。例如：来华美商只能住在夷馆不能进入广州城，销售货物必须通过十三行代理；广州贸易官员令人震惊的欺诈行为；为他在所订购的纹章瓷上绘制美国辛辛那提协会会标使他失望的广州画匠技艺，等等。澳门大学教授若热里奥·米盖尔·普加在《首开美国至澳门之行：山茂召日记(1754—1794)》中写道：

> 尽管山茂召日记的绝大篇幅是介绍贸易和外交策略，但是其中不乏对澳门风貌、葡萄牙居民以及其它欧洲人生活的描述。由于作者印度之行受阻，而且美国对华贸易的重心在广东，作者被迫停留在澳门这座边境城市。这片中国领土上既奇特又熟悉的休闲之所，在葡萄牙人的管理下成为国际大都会。作者在此收获了对葡萄牙、中国政治和当地名胜的第一手资料，为后续来到广州的美国同胞们提供了翔实的信息，使他们了解中国的途径不再囿于英国人的早期游记、基督教徒诸如安森航行的所见所闻或是透过那些巍峨的修院和教堂了解这座天主教城市。山茂召，这位大班兼外交官在澳门遇见了天主教欧洲人和中国人两位'他

者'。澳门逐渐变成了一座建立和促进美国对华贸易事业发展的东西方交汇之地。①

《旧中国杂记》作者威廉·亨德(William C.Hunter,1812—1891),1911年由上海凯利·沃尔什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内容丰富,包括:作者造访过的十三行商馆、糖果铺、香木串珠铺、长寿寺、河南传教士墓和潘启官的乡间住宅;对花地饮宴、中国人吃"番鬼"餐、乌龙茶和午时茶之类的描写;对补瓷器的工匠、澳门的老侨民、从悉尼到达广州的逃犯等人物的刻画;以及一些事件,如对钦差大臣耆英巡游、审讯印度水手、考克斯医生出诊、罗马天主教信使被捕、公债案件的审判和玉石小铭官从军等情节的陈述。书中涉及中国历史内容的章节有:"中央王国"的由来、中国的土著居民和龙舟节的起源、广州的大旱灾,为读者展示了一幅18世纪华南港市的多彩多姿社会风情画,蕴含着此前西方所出版的中国著述所没有的文化信息。

《广州番鬼录》也是威廉·亨德的著述,1855年由伦敦基根·保罗出版社出版。该书描述了1825—1844年作者在广州的所见所闻。内容包括:前往广州的旅程,伶仃洋和珠江上的沉思,旗昌洋行的任职和业务,与商馆、东印度公司、行商、通事和买办的关系,鸦片、茶叶和丝绸贸易,外国报纸和禀贴以及接待浩官和律劳卑的繁文缛节,商馆大班和雇员的生活与赏格,西方商业的危机、商馆被围困、美国人战时生意和旧广州城的破败。在作者的笔下,妻妾成群的广州行商养尊处优的生活,衣衫褴褛沿街叫卖的鱼贩,兜售各式工艺品的手艺人,凄苦哀号孤独无助的乞丐,为家人苟活偷生替人受刑的苦主,向洋人扔石子的西关烂崽,无不栩栩如生。作者曾参观过几个印刷作坊,因此能把从雕板、印刷到半夜装订的过程记载得非常详尽。作者认为,14世纪自称发明了航海罗盘、火药和印刷术的欧洲人的一番言论,其实不过是马可·波罗从中国返欧之后西人所散布的惑众妖言。

历史上平等的文化交流都是双向互动的。19世纪的鸦片之祸打破了清廷"天朝上国"之梦,激发了多少仁人志士为探索强国之路而努力学习西法西学,收集并翻译了许多外文书籍和报刊文章,寻找有价值的历史、地

① 若热里奥·米盖尔·普加:《首开美国至澳门之行:山茂召日记(1754—1794)》,载澳门印务局《行政》季刊第21卷,总第81期。

理、政治、法律、军事和科技信息，帮助国人了解西方，正确判断时局。1839年林则徐（1785—1850）前往广州赴任后便组建由袁德辉（曾就读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和马六甲学校）、梁进德（师承裨治文）、林阿适（Liaon Ashee，留美返国学子）和亚孟（曾就学于萨伦布尔教会学校）等人组成的翻译小组。林则徐经常咨询旗昌洋行的商人亨德、传教士眼科医生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9）和澳门马礼逊学校校长勃朗（Samuel Robins Brown，1810—1880）等人，甚至不耻下问洋行通事、买办、引水和归侨。1839年6~8月间林则徐曾两次通过南海知县和高级行商跟伯驾接触，第一次是求索戒鸦片药方，第二次则是请他帮助翻译瑞士人滑达尔（Emeric de Vattel）所著《各国律例》（Law of Nations）中的部分段落，了解国际法中关于战争以及伴随而来的封锁禁运等问题的处理办法。同一时期，闽浙总督徐继畬（1795—1873）广泛搜集资料，利用公务之暇跟传教士和其他洋人访谈世界历史和地理，其中与雅裨理的访谈共6次之多。

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都被称为“开眼看世界”之宏论。林则徐“师夷制夷”的远见卓识得到了魏源（1794—1857）、左宗棠（1812—1885）、姚莹（1785—1853）和梁廷枏等觉醒人物的支持。

1872—1875年先后有4批共120名中国学童赴美就读，1880年其中50多名学童升入了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深造。

这些就是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潮流中用于创作背景音乐的美妙音符，正由期待着美国汉学横空出世的团队谱写其庄严序曲。

五、中美关系语境中的美国汉学发展

美国汉学孕育于北美的学术生态环境，反映了美国汉学家的中国观和美国学术研究的方式。它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受到美国学术自身规律的制约，伴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而发展。

综观美国汉学史就会发现：中美两国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变化的脉络始终折射其中。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访问广州后两国在平等基础上开始友好往来，文化交流催生了美国前汉学时期的中国研究。但是从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到1899年国务卿海·约翰（John Milton Hay，

1838—1905)宣布实施"门户开放"政策(Open-Door Policy with China),美国逐年扩大其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渗透。不平等条约损害了中美关系,"苦力贸易"(Coolie Trade)成了歧视并排斥华工的借口,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因此遭遇到各种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但同时美国与日本和苏联之间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冲突也不可避免地给中美关系带来负面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之后20多年间中美关系处于对抗状态,两国政府部门、文化界、工商界、科技界、教育界和军队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考验。美国汉学研究的一些仅存项目部分与官方的中短期世界战略规划挂钩,部分为泛亚研究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中美关系开始解冻,邦交正常化使两国关系逐渐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推动了经济和文化的全方位交流和发展,美国的汉学研究获得了勃勃生机。美国汉学史发展轨迹清晰显示:中美两国代表着不同文化和不同的发展道路,美国的中国研究伴随着中美关系的脉搏节奏跳动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也只有在中美外交、经济和文化的宏观背景下才能对美国汉学史进行准确地透视。

汉学家的"中国观"是指导他们考察、研究、分析和评价中国事物的标准,因此汉学研究最容易与政治意识形态挂钩。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指形成于特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之上的系列观念,包括政治、思想、伦理、科技、文艺、哲学和宗教等方面的观念,具有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特点。政治意识形态是最具普遍意义的一种观念表现方式,每个社会政权代表的意识形态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历史。

冷战时期在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曾经导致了长期的东西方军事对抗,现在对立营垒的概念已经封存于博物馆。虽然意识形态分歧没有完全结束,但分歧的背景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民族和民生的因素正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每一个文明群体在致力于发展的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力图从自身的文化遗产中总结成功的奥秘和经验教训。几十年来费正清与其他美国汉学家有关中国对外来入侵的"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传统—现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和"中国中心观"(China Centered Approach)的总结,就是这一思维历程的写照。

普通美国人似乎不喜欢"意识形态"这个说法,更不愿承认自己国家

意识形态的存在,因为长期以来他们曾被告知意识形态就是极权主义和西方理想的敌人,从立国之日起“民主”和“自由”就与联邦共和国并存。多数美国人一直都认为自己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是今日世界的典范,而共产主义则被视为异端邪说。后来这种思想方式就演变成冷战思维,直接影响着中美之间的关系。其实,美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一贯夸张表现就是无处不在的美国意识形态,也是与他人比照时自我夸耀的资本。美国的意识形态为本国的内政外交决策创造了特别的氛围,引导着政策制定者对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深刻理解,并最终使之顺利进入国会审议程序。意识形态甚至还为美国留华学生对中国大学的教学安排提供了思想尺度和接受准则,他们往往把港澳台的汉语课本或者美国人自编的教材作为教学首选,个中原因除了对于意识形态的敏感之外别无其他。美国汉学家的许多选题都是汉学史中的重大课题、当今学术界最关切的命题或者个人学术兴趣执着追求的领域,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哲学思考,使他们想回避政治意识形态都很难。

在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美国人看来,社会主义是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遇到的最严峻挑战。1947 年杜鲁门总统下令对全美 250 万公务员进行安全审查。1950 年 9 月 23 日美国第 81 届国会通过的麦卡锡法案(McCarthy's Act)导致了许多科学家、新闻记者、艺术家和外交官接受调查和指控,其中有: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 Jr.,1889—1977)、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钱学森(1911—2009)、阿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s Smedley,1892—1950)、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stein,1879—1955)和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1909—1999)等人。长期以来美国不遗余力地宣扬自己的价值观,歪曲东方“他者”的人权状况,排斥对抗他们的意识形态,实行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和“人权外交”。

1973 年第 5 卷第 5 期《变迁》(Change)发表了一篇题为《汉学危机》的文章,作者彼得·西博尔特写道:

> 美国汉学研究的博士生多半是 1960 年前培养的。20 世纪 50 年代麦卡锡的清洗运动和麦卡坦委员会有关颠覆责任的追究涉及到谁把中国输给共产主义的问题,心灵和智力方面的损失是惨重的。谢伟思和约翰·佩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1908—1999)等人蒙羞离任使美国国务院失去了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虽然对于他们的指控没有一条得到证实,但是他们的事业却因此被断送。

……1958年以后联邦政府根据《国防教育法案》资助了106种语言和区域研究项目,提供了2100个国防外语研究员职位,支持了为提高教学和"濒危语言"参考资料水平的研究项目。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资助可以覆盖1973—1974财政年度,从事汉学研究的许多人对于这一虽然略存幻想但是又觉得顺理成章的事都抱有乐观态度,相信当局近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修建良好的密切关系,伴随而来的必然是为汉学研究增加资助。但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当局已经把投入预算从1394万美元削减至100万美元,仅用于勾销对比反差。这对于亚洲研究来说预计每年将减少455万美元经费。这个数字的精彩之处还在于它在数千亿的联邦预算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目。《纽约时报》近期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它仅仅是买一架战斗机的价钱,然而取消投入的后果却极为严重,明显表现在已经投入经费的院校所做出的反应之中。例如拥有美国最佳汉语和日语暑期班课程的佛蒙特米德尔伯里学院,目前正向朋友、母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呼吁资金救助,以免造成课程大幅度的削减。达特茅斯学院汉学研究中心负责人也担心,如果得不到外援他们的教学研究将无以为继。哈佛大学的汉学研究过去得到联邦政府千百万美元的拨款,但现在已经大幅度减少本科生的招生。①

早先研究汉学的欧洲传教士、海关洋员和洋行通事多半缺乏严格的专业训练,因此他们的研究随感式个案较多,缺乏理论系统,分析和判断往往失诸笼统。但是在传教士和学者出身的研究人员中也有不少人人文学科素养好,知识面广,经过多年磨炼渐渐进入佳境者不乏其人。第二次大战以后美国汉学研究专业化得到了加强,高等院校的东方学专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使研究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1]此外,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善于吸

① Peter J. Seybolt: *China Studies in Crisis* in *Change* Vol. 5 No. 5 June 1973, p. 18, Taylor & Francis, Ltd, U.S. 1973.

收中国学者和国际同行的研究成果,那些成功的汉学专著几乎都是西方治史手段和传统与汉学史料研究相结合的典范。

美国汉学家研究成果的水平高下与他们是否基于中美关系语境来解读史料关系至为密切。因为英语在国际交流中的通用性赋予了英语使用者太多的优越感,这影响了部分美国学者对于中国历史传统的理解和表述所需要的现场感和虚怀若谷的心态。为了避免在短期内无法克服的自身缺陷,他们选择通过社会调查、媒体技术和数字信息等手段来弥补不足,往往也能有声有色地干出一番事业来。但是经验证明,田野调查(fieldwork)和媒体手段并不总能取代研读史籍之类的功课。

对此,顾彬曾感慨万千地说:

> 作为讲英语的汉学家,其优势在于享誉世界并拥有遍及全球的读者。这种优势是福祸相依的:谓之福,是因为人们可以利用广泛得到理解的母语在世界各国进行出版工作,并且无须主动掌握其它的外语(也许汉语除外);谓之祸,是因为上升为规范的独特语言机制与孤立的思维体系令忽视其他的语言和反常的观点如同必要之举。今天,如果人们无法做到像讲母语者一样地书写英文且不受北美汉学共有思想的支配,那么想在美国专业杂志发表文章是根本不可能的。……由于语言和世界观的原因,在美国出版的国际会议论文将欧洲的研究成果排除在外。①

传统的史学和汉学研究离不开考证和话语分析,"言必有据,无征不信"是老一代汉学家的座右铭。清代考据学的成就对于早期欧美汉学研究的影响最为直接,其中一个原因是来华深造的西方汉学家当年师承的多半是这方面的中国专家。但是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和思维模式的变化,年青一代中不少人不愿为数据考证所累。

与传统西欧汉学研究相比较,美国现代汉学的最大特点是贴近现实的跨学科多元化研究。学者们不把中华文化视为历史化石,研究不是为了猎奇或消遣,几乎很少人从事纯理论纯学术的研究。"新儒家"、"新道家"、

---

① 顾彬:《汉学:路在何方?——对汉学状况的论辩》(王卓斐译),载《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11期。

“新文化”和“新史学”汇聚成浩浩荡荡的汉学研究大潮。美国汉学家的主体属于务实派，不把目光仅仅瞄准社会精英，更多关注的是大众群体。早在18世纪，美商发表有关在华生活的体验和感受的随笔就是为了给来华的同行提供信息和指导，新教传教士对于汉语、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也是为了满足培养神职人员的需要，译介儒家经典和其他汉籍为的是打造开启中华文化大门的钥匙。由于他们的影响，在美国几所大学都先后建立起东亚系或东方研究机构，比较文化学、比较历史学、比较社会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为美国汉学领域的开拓做好了充分的铺垫。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的学者群体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除了原有的老一代华人学者仍孜孜不倦地做出自己的奉献外，来自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的学者以及海外华人学者在当地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或者通过知名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和译著数量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多。由于家庭、阅历和受教育背景的关系，他们对于一些敏感的中国问题比美国同事有更深入的了解，观察问题更为全面，更容易摆脱西方舆论界的偏见和国内同事因不掌握第一手材料所产生的误解，并善于使用外国学者所熟悉的语汇来阐述问题。他们在中国和美国大学或研究所接受的训练赋予了他们攻克难题的新技术，他们的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中美两国协调关系下所孕育的智慧。

总之，对于美国汉学的研究离不开中美关系的语境。文明史的话题既要从中美两国的历史视野中展开，也要从中美两国现状的视野中进行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对美国汉学史做出准确的解读。

六、国际政治和学术生态中的美国汉学研究

要深入了解美国汉学发展的进程及其在世界众多学科中的地位，首先必须回顾一下与其相关的国际思潮在人文社会科学共生过程中的推波助澜作用。

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开展后，西欧人文主义思潮在经院主义神学衰落中高涨起来，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在知识分子中迅速传播，反对禁欲主义和教会专制的呼声不断深入人心。随着自然科学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欧封建主义开始解体，罗马帝国和教廷对人民的精神统治每况愈下。

18 世纪美国工商业的发展引起了物质主义(materialism)的膨胀,自然神论和唯理主义不断冲击着社会。欧洲移民带来了欧陆各国的新科学理念,激发了广大教众对于社会进步事业和生产发展的投入,然而他们的宗教热情却逐渐下降。1730—1740 年旨在复兴教会权威的"虔敬运动"(Pietism)和"清教主义"(Puritanism)在"大觉醒运动"(The Great Awakening)的旗帜下逐渐展开。18 世纪末,被称为"第二次大觉醒"(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的福音奋兴运动再次在美国新英格兰和肯塔基展开,不久之后进一步扩大到美国其他各州。野营布道讲经的活动成了连接美国不同宗教背景的欧亚移民、黑人、印第安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桥梁。福音派新教势力成了美国建国和后来的海外扩张中的一支中坚力量。这样一个主要由讲求个性和实际的自由移民建立的国家,历史上不存在需要推翻的封建势力,也没有需要摆脱拘束他们的思想和专业传统,只靠自己创建的法律、经济、科技和宗教体系运作,保守主义、民权运动、阶级冲突、过激行为和反战示威都发生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一个多世纪以后。19 世纪末美国登上国际政治霸权舞台后便开始了海外角逐。

1810 年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又译为"美部会")正式成立。1829 年 10 月 14 日裨治文奉派来华,掀开了美国新教传教士东渡传教的序幕。此后来华的美国新教教派还有:美国浸礼会真神堂(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1834 年来华)、美国圣公会(American Church Mission,1835 年来华)、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1835 年来华)、美国归正会(American Reformed Mission,1842 年来华)、美国南方浸信会(American Southern Baptist Mission,1845 年来华)、美国监理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1847 年来华)、美国南监理会(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1847 年来华)、美国南长老会(American Southern Presbyterian Mission,1867 年来华)、美国圣经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1876 年来华)、美国路德会(American Lutheran Mission,1890 年来华)、美国教友会(American Society of Friends'Mission,1890 年来华)、美国基督复临会(American Advent Christian Mission,1897 年来华)、美国长老归正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Reformed Mission,1897 年来华)、美国路德同庚会(American Lutheran Brethren Mission,1902 年来华)等。1844 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五个条约港口购地建教堂、医院和墓地,大

批美国人便涌入了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汉学界普遍重视对中国古代史、文献学和语言学的研究，美国汉学家亦步亦趋地跟随一段之后很快就选择了另一条发展道路：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强调汉学研究与近现代史和社会学科结合的更宽泛研究，涉科范围包括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和文学等学科。西方汉学研究中心逐渐从西欧转移到北美，是因为美国汉学的发展方向更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形势要求。在国际化、专业化和团队目标的指引下开创了新局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美国汉学脱离欧洲汉学传统有其“顺应形势”的因素，但是当初的尝试充满了各种变数，从汉学史角度来看其中利害得失颇值得回顾和反思。

20 世纪下半叶美国的汉学研究在组织上经受了重组和挑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美国大学大多按照“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划分系科，有关中华文化的课程基本上安排在东亚系（有的大学称为“东亚研究系”、“东亚语文和文明系”或者“东亚语文和文化系”），但是耶鲁大学等院校却按照“多元化学科研究”（multidisciplines）来管理汉学课程，把汉语和中国文学课程安排在东亚语言文学系，把中国历史课程安排在历史系，把社会学课程安排在社会学系，把人类学课程插入了人类学系。图书馆也按这种学科区分编排藏书，慢慢地各个科系都可以根据需要发展跨学科研究的分支机构。这样的组合方式便于教师广泛了解其他语种的相关学科，有机会与不同领域的同事切磋业务，交流经验，这正是全球一体化思路的初衷。早先的美国汉学研究把中华文化当成固化了的文物来对待，中文书籍成了解读“他者”文化的工具，部分欧美汉学家以译介中文作品为主，专业著作只在汉学界的范围内交流，很少进入其他科系领域。但随着美国汉学研究领域的扩大，用比较方式来研究汉语、中国文化、历史、文学、社会学和宗教已经蔚然成风。当然，在开始阶段中西学术比较往往以西方学科为对比基点，把相关汉学学科作为参照点，研究偏重于中西本质差异比较。学术结构的改变必然引起研究方式、评价标准和分析手段的改变。①

19 世纪以实证主义方法和信念为指导的实证主义史学（Positivist Historiography）在西方史学界占主导地位。代表人物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主张通过史料的评价如实再现历史。他撰写的 16～18

① 孙康宜：《谈谈美国汉学的新方向》，载《书屋》2007 年第 12 期。

世纪的西欧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特别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并以史书编撰中的叙事和描述代替分析和概括。这种治学方法和手段对于美国汉学家有很大启发。

1955年以后新史学（New Hstory）在西欧和北美崭露头角，德国的“社会科学史”（Scientific Social History）、英国的“新社会史”（New Social History）和法国的“年鉴学派”（Annals School）都属于新史学派。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是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提出了许多新理论和新概念，例如他提出历史研究可以分为长时段研究（注重宏观、结构和规律）、中时段研究（聚焦于人口、物价和社会变化）和短时段研究（偏重于革命、战争和历史事件）。他主张从宏观、规律和结构性方面进行研究的同时兼顾历史的一致性、普世性和共同性，不赞同史书编写中采用描写和叙述手法，认为虽然叙述文本可读性强，但只是表面功夫，并不能表现实质。第一代新史学家还提出了“总体史”（histoire totale）设想，反对仅仅从一个角度来考察社会历史，认为历史是一个整体，应该从政治、文化、经济和科技等角度进行考察。布罗代尔通过自己的著作将“总体史”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开创了一代史学研究新风，许多学者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　）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个“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与文明研究中心”（Fernand Braude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s，Historical Systems and Civilization），可见他的思想对美国学术界影响之大。

近现代中国历史成为美国汉学研究的中心议题与费正清的倡导是分不开的。1958年费正清在自己的论著《美国与中国》中提出了用新方法“从历史深度”来研究中国。1959年6月，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召开了包括费正清、卡尔·威特福格尔（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约翰·林德贝克（John M.Lindberk）和戴德华等19位科学家和行政人员参加的古尔德会所会议（The Gould House Conference），就美国的汉学研究领域、结构和范围展开了讨论，确定了与历史学相结合的中国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和政治学为主攻方向，并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简称JCCC）和相应的分会（Satellite Committees）。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思潮闪亮

登台，最初出现于建筑、艺术、哲学等领域，渐渐地影响到历史学。这是西方由工业社会进入到信息社会所引发的新思潮，代表人物有：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富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和美国文学批评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　）等。这一思潮给欧美历史研究带来的变化表现在多方面，比如利奥塔反对此前史学研究中的宏大叙事（包括思辨宏大叙事和启蒙运动式的宏大叙事），不承认任何无须怀疑和证明的事物，主张正视个人思想的差异和事物的多样性。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交流”（change of public sphere）的理论，认为交流可以使人们达成共识。富柯强调“话语”（discourse）可以反映潜在的“权力”。后现代思潮进入历史学以后也提出了一些激进的观点。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　）在1975年写了《元史学》（Meta-history）一书，认为历史著作普遍具有诗学本质，历史的客观性并不存在，目的是为了促进读者对于史学实质的探讨。这一切标志着欧美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全球一体化”既是当代经济领域的潮流，也是当代学术研究的潮流。美国汉学家在这一多元视域中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国际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推动美国汉学研究朝着现代形态变化发展，不断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

法国年鉴派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50年代以后在国际史学界占领了主导地位，60年代渗入到美国史学研究领域。该派学者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总体史”为研究的最终目标，把人类社会在不同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文明进程视为研究重点。由于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各民族文明彼此独立和多元的特点导致了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们有意识地把汉学与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把数量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等新技术手段用于史料分类和处理，由此产生的史证和结论无法不让人不信服，从而激发出以“中国中心观”对中国历史和文明进行研究的新认识。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对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社会所暴露问题的一种深刻的反省，影响到对年鉴学派观点的反思和批判，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历史学发展的重大转折，研究焦点转变为对琐碎、断裂和变化历史往事的关注。曾经有很多美国汉学家加入了新史学潮流，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史学方法来确定和撰写选题。例如被称为西方史学研究

"碎片化"的微观汉学和新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及从实证主义到宏大叙事的选择,都是美国汉学家受到世界学术潮流启发而采用的新手段。对新史学变化的跟踪,对其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美国汉学发展过程中脉络的正确把握。

顾彬对于美国汉学的国际性有这样一段评价:

> 美国汉学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独占鳌头,不是毫无道理的,但情况也并非一直如此。美国在1933年以后,开始吸纳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紧接着把英语变成了唯一的科学用语,因为当时许多科学家被迫离开德国,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中国的科学家也不愿返回自己的家乡。美国汉学所取得的第三项巨大成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一种科学的讨论方式,这是一种反形上学(metaphysics)的,也可以说是反欧洲的讨论方式。今天,任何一位想有所建树的中国学学者,都必须用英文发表其有关中国的论著,同时还必须使自己的词汇和思维结构屈从于美国的主流思潮。①

顾彬的观点虽然非常直率尖刻,但是在欧洲汉学界有一定的代表性。

虽然美国的汉学研究免不了受到所处时代学术潮流和本土的学术生态环境的制约,但是总体来看,美国不是一个基于强大主导思想体系的国家,无须强调对某一学术传统的特别尊重,也不必在意其史学研究中的孤立和自满倾向。这就是美国汉学研究宗旨和方法自由多变,学派林立的原因所在,只要自成系统自圆其说,谁都打倒不了谁。美国学者把数量分析和科际整合手段(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引进汉学研究的时间早于欧洲国家。学术观念的异化导致了专门化甚至超专门化(overspecialization)的闪亮登场,伴随而来的是新的研究选题、新的解读框架和模式,这一切都直接为美国的汉学研究灌输了新鲜血液和锐气。

从欧美的汉学发展趋势来看,作为现代学科的汉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并很快成为中国研究领域的主流倾向。世俗化传教士学者是西

---

① 顾彬:《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序》(李雪涛著),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方汉学领域的先行者，其中许多人倾其毕生所有为之奔走呼号奋斗拼搏，方法和成果都得到了学界的肯定和认同，在绚丽多彩的现代科学观的充实和后续开拓之下汉学研究传统得到了传承并将进一步发扬光大。

当前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高度关注着中国的发展方向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对外来优秀文明和学术成果的吸收和学习。这一形势特点反映到各学科领域，已经为美国当代汉学家提供了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机遇。

第二章
从科际整合角度扫描美国汉学

如前所述，国际汉学不是一门单纯学科（monodiscipline），而是一个跨学科、跨文化和跨语种的学科门类。汉学发展史经历了由传统的实证性微观研究、学科思维比较、历史价值定位、文献真伪辨别、名物制度考订，到当代的科际整合、田野调查、定性定量分析，以及多维语境中的宏观对比研究。

美国汉学的涉科范围主要包括：人文学科的文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艺术史、宗教学，以及社会学科的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地理学、人类学、伦理学、教育学、考古学、民俗学、心理学、管理学和传播学。这些构成了汉学研究的主流学科。但是在学科分工严格细化的今天，仅凭单一学科的资源、理论和方法不足于对相关系统中的核心成分进行充分的透视和分析，更谈不上对其中规则和理论的科学概括。自然科学的数学、逻辑学、统计学、电子计算机学（computer sciences）和系统科学（systems science），以及跨学科的视觉艺术、区域研究、形式科学和性别研究（gender and sexuality studies）等新学科的知识和手段，在很多学术分析框架中也是必不可少的。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ity）的方法，将一些原本缺乏内在联系的素材、数据和现象加以归类和梳理，使之在一个宽广的新视角下的研究和解读成为可能。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当今学术领域已经进入了学科重组的时代。

“科际整合”或“多科组合”（multidisciplinarity）是指两个甚至多个学科研究的理论、技术或者人员在一个共同目标下进行相互合作的跨领域学术活动。学者在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内通过拓展视野对材料进行审读和分析，以发现新信息或者寻求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但是并不追求构建共同的理论框架。与它平衡的另一种模式则为跨学科研究（transdisciplinarity），

通过打破学科传统规范的界限以取得对问题更准确的切入，在相互认可的新理论系统中探讨新思路和新方向。

许多学科专家认为，只有通过科际整合才能消除当前学科过度专业化所形成的障碍，取得新突破。例如：可以“大观园小社会的历史”、“经济管理模式”、“人力资源调配”、“家务管理中的女权主义”或者“晚清封建官僚体制”等选题来研究《红楼梦》；也可以从“文学形象塑造”、“创作技巧的运用”、“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和“批判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或者从语言学、民俗学、饮食、服饰、婚俗、丧葬制度的变革等角度来揭示《红楼梦》的百科全书价值。最近半个多世纪科际整合开拓了不少研究新领域，如：“数理语言学”、“政治经济学”、“人类文化学”、“学术生态学”、“地缘政治学”、“教育心理学”、“地球物理学”和“生物信息学”等，就是把一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对另一种学科的研究之中的实例。另外，史料文本化（textualization）、图像数字化（digitalization）、信息视频化（visualization）和科学格式化（formalization），则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来提升研究水平的一大发展。

科际整合是当代美国汉学的一大特色，既包括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也包括相关方法和资源的科际联合，与其通用性、实用性和商品化关系密切。

无论是大型的汉学研究项目（如《中国总论》、《清代名人传略》和“剑桥中国史”），还是微观个案研究（如卜德的《中国物品西传考》、柔克义的《佛陀传》、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和费正清的《中国的兵法》），实际上都融入了与其相关的边缘学科知识和理论。经验表明：只有在综合了多个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研究才可能有新发现。

有些学者认为美国汉学家倡导的“区域研究”本质上就是一种科际整合。当今学术领域许多彼此链接但又未成一体的课题研究，客观上还是相互独立的领域，但正是这些“异体组合”（unity-in-variety）和“组合异体”（variety-in-unity）已成为优级学术研究的标识。对于真正意义上的科际协同区域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ynergistic area approach）的探讨，有助于相辅相成的不同学科的构建。学者所期待的“区域研究”应该是精品，是盛宴，而非文化补丁或者快餐之类的赝品。应该强调的一点是，虽然饱读经史子集的中美学者大有人在，但是在学科分工高度专业化的今天他们也不可能都是通才。科际整合所提倡的只是国际化和专业化团队的分工合作。

因此,对于自己专业之外的学问如有力不从心之处,应该请教专家里手,研究工作开始之前多做功课,凡事务必慎言。①

一、美国多维视域中的儒学:课题与精神资源

殖民时期的北美学者对于儒家学说的了解主要通过欧洲耶稣会士的汉籍翻译、东渡传教的通讯和回忆录,以及欧洲儒商、海员和旅行家的来华报告和观感。

1733 年费城政治家科际协同区域研究曾为自己的私人图书馆收藏了一套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2)等人编译的《中国圣哲孔子》(Confucius Sinurum Philosophus),该译著收录了儒家典籍《大学》、《中庸》和《论语》。这是中国文化信息辗转进入北美社会的早期纪录。

王戴夫在一篇题为《从孔子到长城:中国文化对殖民时期北美的影响》的文章中写道:

> 中国文化对殖民时期北美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被视为中华文明象征的孔子对于殖民时期的北美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一些杰出人物,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佩恩(Thomas Pain,1737—1809)、约翰·巴特拉姆(John Bartram,1699—1777)和杰迪代亚·莫尔斯(Jedidiah Morse,1761—1826)对于孔子及其伦理哲学都敬仰有加。早在 1727 年富兰克林就按照孔子道德修养方式开始自我修身养性。为了在更多的殖民领地推广孔子的伦理哲学,1737 年富兰克林在他广泛发行的《宾夕法尼亚报》上刊发了《论语》的部分章节,同时他还明确表示孔子就是自己的榜样。被人们视为与孔子齐名的托马斯·杰斐逊把自己的榜样看作像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国君一样的人。托马斯·佩恩在 1791—1792 年出版的《理性时代》一书中把孔子与耶稣和几位希腊哲学家并列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伦理导师。杰迪代亚·莫尔斯在自己的著作《美

① Hans Kuijper: *Area Studies versus Disciplines Towards An Interdisciplinary, Systemic Country Approach* . 2008.

洲地理通志》中列举了《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赞扬这两部典籍'以雄辩、高雅和简洁的语言写下了智慧和道德之最佳箴言'。北美杰出科学家约翰·巴特拉姆在论文《中国哲学家孔子的生平和品德》中向读者介绍了孔子的生平。一位作家因为喜欢孔子，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孔门弟子'的笔名，在1793年9月号的《新汉普郡杂志》上撰文告诉读者孔子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①

1869年美国政府向中国赠送了一批西文图书和种子，作为对中国人口历史资料的交换。同治皇帝批准以明清10种130函900余卷古籍刻本回赠美国，其中包括《皇清经解》、《五礼通考》和《理性大全》等书。这些古籍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推动了美国学术界对儒家学说和中华文化的研究。

美国传教士对于儒家学说的系统研究始于19世纪上半叶。在如何看待中国儒家文化问题上他们当中的基要派（the Fundamentalists）认为要传播福音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儒学在中国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地位。而自由派（the Liberals）却牢记耶稣会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首次进入中国时的感悟：如果传教士不熟读儒家经典就不会被认为是有教养的人，这样就不可能规劝士大夫阶层皈依基督教。因此应该对他们所熟悉的儒学经典进行充分的研究，以便寻找宣传福音的共同语言。这在客观上为后来美国的儒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833年，卫三畏以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传教士身份到达广州。在他1913年出版的权威著作《中国总论》第十一章中对于儒家典籍《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经》、《书经》、《礼记》、《诗经》、《春秋》，以及孔子生平、儒学要义、孟子及其学说作了简要介绍。他认为："孔子哲学的要点是服从长者，和蔼并正直对待同辈；他没有提及人人都对其负有责任的那种隐形力量，只把目光对准这个世界以求支持，让国君个人对更高裁判负部分责任。对于孔子理想中的'君子'以及这一观念提出之后对其民族的积极影响和所产生的强大力量作出怎样的评价都是不会过分的。"②

---

① Dave Wang: *From Confucius to the Great Wall: Chinese Cultural Influence on Colonial North America*, pp. 1-3, 2009.

②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Vol. One, p. 622.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3.

他还说："毫无疑问，孔子的许多言论都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在他的信条中也有一些可能被人反对的部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对于孔子在《春秋》以及他平生中不尊重事实方面持极度怀疑的态度。然而与希腊和罗马的圣贤相比较，孔子的著述总体上是好的，在适用于他所生活的社会和卓越的实践性方面，超越了西方哲学家。"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已经成为西方儒学的研究中心。对儒学与民主理论的比较研究是这一时期美国学界研究的一个焦点。学者们提出了开展科际整合研究的新思维，聚焦于儒学与现代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比较阐释，既有政治或社会经济角度的研究，也有哲学层面的探讨，促成了美国儒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美国学者研究儒学的观点和方式各有不同。其中有以顾立雅为代表的承继传统汉学研究学派，还有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外交史学哈佛学派。

顾立雅以研究孔子和儒学著称。他认为孔子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符号（cultural symbol），而且还是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主张通过历史背景的介绍真实地还原孔子的政治、哲学和教育思想。他的《孔子与中华之道》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儒家研究水平，对17—18世纪儒学在欧洲的影响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他注意到杰斐逊和孔子都强调众生平等，执政者要行为端正（"政者正也"）。杰斐逊对教育的关切以及选拔贤能不必问门第出身的民主教育思想与孔子的"有教无类"的观点也是相通的。②

费正清则从社会政治角度研究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将儒家文化纳入到西方现代性的研究视野中，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解析。在费正清看来，儒学不可能是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动力。作为费正清的嫡传弟子列文森（Joseph Richmond Levenson，1920—1969）继承了恩师大部分的研究思想和模式。在他看来当代儒学只不过是一种博物馆的哲学，中国的儒学体系无法产生现代民主，儒家的"民意"并不具有任何现代"民主"的含义。

这两大派别的学术分野实际上是传统的汉学研究向现代中国研究过

---

①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Vol. One, p. 663.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3.

② Herrlee Glessner Creel: *Confucius—The Man And The Myth* , New York, The John Company, p. 275. 1949.

渡的具体表现。

20世纪50—60年代，以费正清和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1913—1976）为代表的学院派儒学研究把重心由古代切换到近现代，认为只要注入了新的活力儒学就可以一种意识型态和观念系统运作。1959年芮沃寿与倪德卫（David Shepherd Nivison，1923—　）合著《行动中的儒家》，1960年与杜希德合撰《儒家的规劝术》，1963年还出版了专著《儒家人格》。20世纪60年代以后陈荣捷（Chan Wingtsit，1901—1994）和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1919—　）等人的儒学研究开始重视儒学内部的哲学课题以及儒者的人格世界。到70—80年代以后，部分美国儒家研究学者把儒学定位为仍在支配人们行为的一种观念系统，同时就儒学与民主、人权、宗教、学科现代性以及经典文本核心术语的理解和翻译等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分析和研究。一些美籍华裔学者对此做了开创性的研究，根据西方现代文化背景和西方读者的价值观念对儒家传统进行新的阐释，为儒学的现代发展作出了贡献。

以波士顿神学院院长南乐山（Robert Cummings Neville，1939—　）和副院长约翰·白诗朗（John H.Berthrong，1946—　）为首的美国学者主张在儒学与基督教文化之间开展对话，以杜维明（Tu Weiming，1940—　）为首的学者则强调儒学与伊斯兰教等东方文明之间的对话，因此波士顿儒学又被称为“对话派儒学”（Confucianism in Dialogue）。2000年南乐山在纽约出版了专著《波士顿儒学——后现代可发展传统》，正式宣告了这一学派地位的确立。有趣的是波士顿儒学派别又以查尔斯河为界进一步划分为以南乐山和白诗朗为首的河南派，以及以杜维明为首的河北派。

曾任美国宗教学会会长并致力于东亚哲学研究的南乐山认为：孔子、孟子，荀子、朱熹和王阳明就像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B.C.~322B.C.）、柏拉图（Plato，427B.C.~347B.C.）、奥里利厄·奥古斯丁（Aureliu Augustinus，354—430）和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都是国际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儒学应该成为哈佛研究的重点，对于礼乐教化的现代意义尤其要深入研究。南乐山不同意西方学者只能研究儒家学说而不能成为儒家的说法，认为儒学不仅是一种学说，也可以成为当代美国人的精神生活资源；儒学应该参与世界哲学对话，因为儒学是发展的，因时因地而异。他长期致力于比较哲学和神学中儒家思想影响的研究，把柏拉图、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实用主义与泛亚佛教

(Pan-Asian Buddhism)、儒家思想、基督教神学(Christian Theology)融为一体,为思辨哲学传统注入了活力。白诗朗积极倡导各宗教之间的对话,认为儒学已经成为国际性的思辨潮流,构成了欧洲思想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影响广及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沿岸国家。总体来看河南派注重荀子学说的研究,强调"礼"的作用,把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建成为北美神学界的儒家学说道场。他们都自称为认同儒家的基督徒,因此他们的理论被称为"基督教儒学"(Christian Confucianism)。

河北派以主持哈佛儒学研讨会20多年的杜维明为代表。他注重孟子学说(Mencius)研究,强调在吸取思孟、陆王和牟宗三(Mou Tsung-san,1909—1995)的学说过程中心性修养的重要性和人文精神的重建。杜维明研讨会按照欧美大学的研讨会(Seminar)和日本汉学的"会读"模式构建,参加者有东亚和西欧的访问学者、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的教授和研究生,讨论专题包括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基督教、佛教和新道家等。从儒学与现代价值观的对话切入,通过交流和辩论引导与会者在儒学的界定、现代性和发展前景方面达成共识。杜维明关注外界对儒学的批评并予以积极回应。关于儒学的后续发展问题,他认为必须对西方文明所体现的科学精神、民主运动和宗教传统加以研究,理顺儒学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关系,以及生存条件和再生契机的问题。儒学也应该与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印度教、犹太教(Judaism)、锡克教(Sikhism)和神道(Shintoism)等宗教进行必要的交流。杜维明还特别强调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话的深远意义。现在新的世界秩序已经取代了超级大国的两极对立,全球化和地域化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应该关注建立在不同种族、语言、地区和宗教基础上的多元现代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危险性,彼此开展对话至为重要。

成中英(Chung-Ying Cheng,1935—　)、郝大维(David Hall,)、安乐哲(Roger Thomas Ames,1947—　)和田辰山等学者倡导的夏威夷儒学被称为"诠释派儒学"(Hermeneutic Confucianism)。成中英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提出本体诠释学(Ontological Hermeneutics)的构想,从语言、概念、观念和本体上对中西哲学进行沟通,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通过重建和创新使之现代化和国际化。本体诠释学深受西方哲学理性分析方法的影响,但它却植根于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一直是他的关注焦点。他撰写了《原始本体诠释学的雏形:周易哲学》一书,为的是从理论和方法上完善本体诠释学的系统,并用于重新解释中西方哲学史。他把"诠释"划分为两

类，一类是“基于本体的诠释”（用已有的本体概念来解释外部世界），另一类是“寻找本体的诠释”（反思过程中形成的世界观与个人自我观结合作为诠释、寻找、归纳外部世界的依据）。具体的诠释包括现象分析、本体思考、理性批判和秩序开端等四个部分。“本体诠释学”就是“本体辩证学”，包涵了多种对立的范畴，时间发展与空间包容统一的前提，既可作为建构中国现代哲学的导向，也可用于对西方现代哲学的补充。

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田辰山认为儒学有与西方主流割裂式思维不同的通变方式，它不仅是儒家的，也是道家的和普通百姓的思考方法。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安乐哲和已故的得克萨斯大学哲学教授郝大维曾经长期合作研究，他们共同的兴趣是美国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安乐哲和郝大维都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代表了两种文化系统，都有自己的基本语法与词汇。他们将自己的理论概括为比较哲学，而将学术界和报刊上常见的比较研究称作跨文化比较，认为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波士顿儒学和夏威夷儒学受到西方哲学理性分析的启发，采用了多科整合的方法，把诸如现象学（Science of Phenomenology）、逻辑经验论、语言分析、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实用主义（Pragmatism）以及社会批判等理论融为一体，对中国哲学进行新的解读，建构起新型的对话派儒学和诠释派儒学，丰富了传统儒家思想的内涵。他们的贡献有利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在东西方学术沟通过程中实现人文精神与科技精神的结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兼容，促进儒学的国际化和多元化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顾立雅、费正清、列文森、史华慈、柯文（Paul A.Cohen，1934—　）、墨子刻和狄百瑞等美国学者先后就儒学与民主、人权、自由精神和宗教性等现代命题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儒学中有许多与民主和人权等积极观念一致的语汇，儒学所代表的东方精神并不会对现代文明构成任何威胁，但是中西价值观的比较不宜停留在抽象理论层面上，而应该通过文本解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探讨。儒学的宗教性有其以“礼”为核心的独特性。事实上，由“礼”所建构的社会既是世俗的，也是宗教的。总之，儒家传统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资源，新儒家倡导的沟通、对话、协商和谦让（compromise）必将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些研究为深入了解儒学的现代价值开辟了新思路。至于探索如何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实用方式当然也应该求助于被正确理解了的儒家资源。

1937年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1885—1972）出版了《论语》节译

本,1950 年又出版全译本。此外他还翻译过《大学》、《中庸》和《孟子》等儒家经典。1950 年魏鲁男(James Roland Ware,1901—1990)出版了《论语》节译本,1955 年又出版了的全译本。1997 年美国诺顿出版社出版了澳大利亚籍的比利时汉学家西蒙·利斯(Simon Leys)翻译的《论语》。译者声称该书是从现代作品欣赏的角度来翻译的,译文中的选词被公认有独到之处。同一年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也推出了华裔学者黄治中翻译的《论语》,除了正文以外该译本还编写了"术语"、"中国历史年代表"、"孔子生平"和"索引"等附录。

二、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旷达进程

美国知识界早期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部分得益于耶稣会士拉丁文和法文的汉籍翻译,部分得益于 19 世纪 30—40 年代传教士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研究。当时美国的教会派遣部门要求传教士把在华的所见所闻写成报告发回国内,他们寄回的函件以及与亲友的通信成了当时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的重要信息资源。

1832 年裨治文、马礼逊和卫三畏主办的《中国丛报》经常刊登有关中国历史、语言、地理、宗教、文学、社会、艺术和道德方面的文章,帮助西侨了解与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该报还不定期刊发介绍中国古代文献、历史著作、神话传说、风俗人情以及古人对历史的解说和史学撰写原则的论述。如 1840 年 5~12 月号的《中国丛报》有关司马谈、司马迁、司马光(1019—1086)和马端临的史学研究情况介绍;1841 年 1 月号有关中国历史记载及其方法的文章,3 月号有关中国纪年方式、内容和特点的讲解,11 月号有关中国历史年表的说明。1850 年 3 月号的《中国丛报》刊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第 12 篇译文,5 月号刊登有关魏源《大清圣武记》的介绍。此外,该刊还译载过《大清一统志》和《八旗通志》等清代典籍。

卫三畏的《中国总论》是 1845—1846 年他返美述职期间在各地所作有关中国历史、政治、文化、地理、文学和艺术等内容的 100 多次报告汇编,于 1848 年出版。这是一部美国早期汉学领域的权威性著作,上至中华民族史前传说,中国的疆域气候、人口分布、自然资源、朝代更迭、中外交往,下至作者来华前后发生的八国联军侵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太平军造反、"常胜军"解体等历史事件。其中的第一章至第五章谈到了中国的行政区

划、边疆和人口；第六章至第八章谈到了中国自然历史和法律法规；第十一章至第十二章谈到了中国古籍和纯文学著作；第十六章至第十九章涉及了中国科技成就和宗教；第二十章至二十六章涵盖了中国商业、外交、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和其他重要历史事件。书中的资料源于他个人在华的观察报告、对中国典籍的研究以及对《中国丛报》稿件的审读评价，其文献价值，正如美国汉学家马森所说："他的著作在今天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美国文献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①

历史学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1884—1969），以研究中国史、东南亚与美国关系史和基督教传教史著称，曾任耶鲁大学神学院宗教系教授多年。1910 年他在长沙雅礼学校任教两年，20 世纪 20 年代初第二次来华。1928—1937 年他担任美国学会理事会中国研究促进委员会委员，1934—1939 年任雅礼会和湘雅医学院理事，曾出版一系列著作，促成了远东协会等美国汉学研究机构的成立。他先后出版了《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784—1844，1917）、《中国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hina，1917）、《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1929）、《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The Chinese：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2 Vols，1934）、《基督教扩张史》（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7 vols 1937—1945）和《远东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Far East，1947）等。

1938 年嘉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1900—1966）撰写的《中国传统史学》（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是美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有关中国史学史专著，堪称美国中国史学研究专业化的里程碑，推动了美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对比较史学和不同朝代不同地区史家的思路、宗旨以及与政治现实联系的研究。虽然内容简要，但是作为一部供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史学的指南来说却具有开拓性价值。

《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是 20 世纪 40 年代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起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编撰的一部大型中国清代人物传记辞书，分为上下两卷，于 1943—1944 年在美国出版。主编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1884—1975）是该馆的第一任馆长，1931 年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长期从事清史研究。撰稿人包括费正

① 马森：《西方的中华帝国观》（杨德山等译），第 39 页，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 年。

清、房兆楹和杜联喆夫妇以及50多名研究生。他们查阅了1100多卷正史和数百卷笔记史料,并充分吸纳了欧美汉学界的研究成果,对清代800余名人物作了详尽介绍,以严谨文字把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民族、宗教、文化、艺术和科技等领域的历史概貌勾勒了出来。这部著作反映了美国早期汉学的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史料价值,是清史研究方面的重要集体成果。1943年傅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与房兆楹合作编写的《中华民族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以大量的专著为依托,吸纳了一些美国学者以及在美国工作的欧洲和中国学者的文字研究资料,对中华民族的天文、历法、数学、医药、工程、建筑、舆地诸方面作了系统介绍。该书对安阳考古发掘中的重大发现作了及时报道并予以高度评价,使西方人对华夏文明的成就有了新的认识。该书出版后受到美国学术界的重视,被誉为有助于美国汉学向更具社会科学意义方面发展的一部专著。傅路德是传教士富善(Chauncey Goodrich,1836—1925)之子,出生于北京通州。美国大学毕业后以传教人员身份回到中国,任北京协和医学校体育教师,兼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药委员会助理研究主任。第二次返美后任哥伦比亚大学汉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他还著有《乾隆朝的文字狱》(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 Lung,1935年)、《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最早的接触》(China's Earliest Contacts with Other Parts of Asia,1962年)、与同芳·亨利合编《中国文明和文化史纲要》(A Syllabus:the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与房兆楹合编《明代名人辞典》(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等。

美国汉学界重视中国史籍的翻译。例如:柔克义(William Woodwille Rockhill,1854—1914)与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ich Hirth,1845—1927)合译的《诸蕃志》(Chau Ju-kua: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1912年),德效蹇(Homer Hasenplug Dubs,1892—1969)翻译的《汉书》(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1973年),克伦坡(J.I.Crump)翻译的《战国策》(Chan-Kuo Ts'e,1970)、方志彤(Achilles Chih-tung Fang,1910—1995)翻译的《资治通鉴》(Tzu Chih Tung Chien)、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　)翻译的《史记》(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徐中约(Immanuel C.Y.Hsü,1923—2005)翻译的《清代学术思潮》(Trends in the Ching Perio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等。

清史研究在美国的汉学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哈佛大学是美国清史研究的重要基地，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书超过947000册，在其50多万册中文藏书中有古籍20万册，包括宋、元、明、清刻本3500余种，抄本1200种，原版方志3525种，丛书1400种。

耶鲁大学是最早开始汉学教学和研究的美国大学之一。该校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中有1878年容闳捐赠的1280册40种，清廷赠送的《古今图书集成》5040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家简又文教授捐赠的太平天国资料320种，640册，以及300多名来华传教士撰写和摄制的文稿、日记、信件、照片、报告、地图，其中不少内容涉及清代历史。①

清朝对外关系史是美国汉学研究中的重要选题。美国学者研究清代对外关系的主要著作除了前述的赖德烈和恒慕义等学者的出版物外，还有供职于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85—1934）于1918年出版的三卷本专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1910—1918）和1926—1929年出版的五卷本《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922年泰勒·丹尼特（Tyler Dennett，1883—1949）出版的《美国人在东亚》（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New York），1930年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1900—1970）出版的《早期中美贸易》（The Old China Trade，Boston，New York，Mifflin Company），1932年拉铁摩尔的《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Cradle of Conflict，New York）和1940年出版的《中国亚洲腹地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New York），1942年阿诺德·罗博塔姆（Arnold Horrex Rowbotham，1888—1970）的《清廷宫中的耶稣会士》（Missionary and Mandarin：the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China，Berkley and Los Angel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等。此外，美国学者还就清代前期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撰写了多部专著和论集。

1933年费正清利用清廷档案撰写了《1858年鸦片贸易的合法化》（The Legalization of the Opium Trade of 1858），1936年发表了博士论文《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设，1842—1854》（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1941年与华人学者邓嗣禹（Teng Ssu-yu，1906—1988）合作发表的《论清代的朝贡制

① 朱政惠：《美国清史资料及其研究情况述略》，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1~2期。

度》(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1942 年发表论文《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 with the West),1954 年与邓嗣禹合作出版《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1839—1923》(Research Cuide for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

清代历史在时段上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承前启后的关系,搜索各类原始史料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美国学者把清代研究作为一个重要选题的原因也许就在这里。汉学家们在清代历史研究和编撰中分别运用了现代性、全球一体化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以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等概念。此外,他们的史学观还体现在对中国古代史、民国史、贸易史、外交史、哲学史、思想史、地方史、妇女史和性别史的研究,少数美国学者在多维视域的语境中还对稗官野史和街谈巷议之类的非主流史料表现出特殊的偏爱。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些来华美国传教士和怀着各种政治文化心态的美国人就对中国妇女的生存状况和生活感到关切,从封建社会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买卖婚姻、缠足、守寡等男女不平等现象中发现了妇女受迫害的证据,做了一些社会调查,并发表过一些令人振聋发聩的评论。在 20 世纪下半叶女权主义(feminism)运动的浪潮中,学术界掀起了填补史学空白的妇女史研究热潮。1995 年高彦颐(Dorothy Ko)发表的《闺训:17 世纪中国的妇女与文化》(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通过江南上层妇女的诗文分析她们的生活和思想状况,从对缠足歌颂的诗文中,作者肯定她们是发自内心而非出于愚昧或无奈。1997 年曼素恩(Susan L. Mann)的《宝卷:漫长 18 世纪的中国妇女》(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是汉学家向读者所展示的一幅中国社会的妇女画卷,曾经两次获奖。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性别"(Gender)成了研究两性关系中的社会结构的重要命题。1975 年马杰里·沃尔夫(Margery Wolf)、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和埃米莉·马丁(Emily Martin)合编的《中国社会的妇女》(Women in Chinese Society),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中国妇女作了详尽论述。2001 年罗溥洛(Paul Ropp)与保拉·赞皮耶里(Paola Zamperini)和宋汉理(Harriet Thelma Zurndorfer)合编的《性情暴躁的女子:晚清的女性自杀情况》(Passionate Women:Female Suicide in Late Imperial China,Leiden:E.J.

Brilll)也是一种可贵的探索和反思。作者通过对清代妇女地位的分析,表明妇女解放的追求并非始于20世纪,中国妇女反抗封建礼教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存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性别史研究把妇女史的撰写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学者们通过该项研究来重新审视历史。1991年华如璧(Rubie Watson)和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主编的《中国社会的婚姻与不平等》(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对于中国社会妇女的婚姻和地位的状况进行全面扫描和回顾。1999年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出版的《兴旺的"阴":960—1665年中医史中的性别理论》(A Flourishing Yin: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960—1665),是对中国传统社会性别和生理观念的系统研究。妇女史的研究是后现代主义新汉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美国汉学家所聚焦的对象不仅有平民妇女,也包括官宦人家的太太和小姐。在这一新视域中学者们的目光由近代延伸到唐、宋、明和清各朝,甚至更远古的中国社会。应该说美国汉学家不仅看到了历史上中国妇女受压迫的一面,也注意到她们生活中的积极元素。"中国女性很早就懂得如何善用她们的道德权力。因此,汉代班昭做《女诫》,主要为了传授给女儿们一种基本的道德教育。明代永乐皇帝的徐皇后(即明初功臣徐达的女儿)更加扩充女教的范围。她著《内训》一书,共20篇,有'德性'、'修身'、'慎言'和'谨行'诸篇。"①

三、中国文学在美国的翻译、研究与接受

美国学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大约始于19世纪中叶。

1867年法国女学者朱迪思·戈捷(Judith Gautier)师从旅法华人丁敦龄,从《诗经》至近代中国诗歌作品中选择了100余首译成法文,按照内容分为言情、咏月、咏秋、咏酒、咏战、咏怀、宫廷和行旅八类,以《玉书》(Le Livre de Jade)为书名出版,虽然译文不够专业,但却是19世纪下半叶欧洲书肆中最有影响的中国诗词译本。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有几位美国学者先后把该书从法文转译成英文,如1897年旅法美国诗人斯图尔特·梅里尔(Stuart Merrill)的译本。1918年詹姆士·怀特尔(James Whitall)的

① 钱南秀:《美国汉学研究中的性别研究——与孙康宜教授对话》,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21期。

《译自〈玉书〉的中国诗词》(Chinese Lyrics From the Book of Jade, New York, B.W.Huebsch)和1927年伊恩·柯尔文(Ian Colvin)翻译的《步汉诗诗韵》(After the Chinese),也都以《玉书》为蓝本。

1915年4月美国诗人庞德在伦敦出版的《华夏集》(Cathay,又译《神州集》),是根据东方学学者费诺洛萨(Ernest Franciso Fenollosa, 1846—1908)的遗稿译成,14首中国古诗中的一首选自《诗经》,其他几首选自屈原、李白和王维的诗作。1916年9月以《驱邪》(Lustral)书名再版时增译了另外4首。庞德是美国意象派(Imagism)的代表,与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同为象征主义诗歌的领军人物。他从中国古典诗歌和日本俳句中归纳出"诗歌意象"理论,为东西方诗歌之间的借鉴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庞德曾在罗马电台发表了数百次广播讲话,抨击美国的战争政策。1943年他被控叛国罪,第二年被美军监禁在意大利比萨俘虏营中,1945年押往华盛顿,以后诊断出他神经失常而免于受审。此后十几年他生活在精神病院中,在热心学者的帮助下把《诗经》、《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译为意大利文,并写出《诗章》第71~84章。他的作品借鉴了中国诗词和日本俳句的写作形式及特点,在《诗章》中还用诗歌语汇表达了儒家思想。他心目中的"意象"就是把诗人的主观情感和客观物象融合在一起,在诗歌翻译中强调"意象并置"(juxtaposition of images)和"细节明快"(luminous details),甚至追求译文与原诗结构的对应,忠实地再现词汇与意象的先后顺序。意象派是1909—1917年一些英美诗人倡导的文学运动,也是一个诗歌流派,其宗旨是要求诗人以鲜明、准确和含蓄的意象进行创作。1912年庞德首次使用了"意象派"这个术语,他把《论语》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奉为自己的座右铭和诗歌创作的原动力。1915—1917年他每年都出版一部意象诗集。他退出意象派后,诗人洛厄尔(Robert Lowell, 1917—1977)继续领导该派活动。

虽然都是意象派诗人,但是翻译主张却有所不同。洛厄尔曾批评庞德的译作"完全不像中国诗的翻译"。1921年洛厄尔与艾斯库(Florence Ayscough)合作翻译的《松花笺》(Fir-Flower Tablets)在纽约出版。艾氏久居中国,曾把自己喜欢的一些古诗逐字逐句译成英文后寄给洛厄尔,经他修改润色后再由艾斯库对照原文校订。他们还请了一位中国博士帮助把关。该诗集出版后受到部分评论家的肯定,但也有人说那些译诗堆砌辞

藻，失诸繁复。

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1942—　）是研究汉赋和六朝文学专家。1960年进入华盛顿大学攻读中文学士学位课程，四年后受业于哈佛大学汉学家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1915—2006），1965年获得硕士学位。1968年以论文《扬雄生平及其赋的研究》获得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有关中国古代诗歌和诗人的研究专著及论文数量大增，盛况空前。1978年詹玛丽（M.Chan）在波士顿刊发的《高适》评传，1981年克罗尔（Paul W.Kroll）在波士顿出版的《孟浩然》评传，1983年华盛顿大学研究生高德耀（R.J.Cutter）发表的博士论文《曹植及其诗歌》，1988年多尔·利维（Dore J.Levy）在达勒姆出版的《中国诗词》，同一年马瑞志（Rechard B.Mattter）在普林斯顿发表的《诗人沈约》等，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　）以研究唐诗著称，善于以中国古典诗歌的精妙手法表现深奥的思想内涵。在研究过程中他尤其重视诗歌文本形式和观念的变化，以及诗人与前代作家之间的承前启后关系。他在《1911年以来的中国文学选集》（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中曾经这样形象地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文学："如果谁希望开阔胸襟，那里有李白的诗；如果谁向往简朴的生活，那里有陶潜和王维的诗；如果谁深陷爱情难以自拔，那里还有李商隐的诗和汤显祖的《牡丹亭》。"1977年他在纽黑文出版的《初唐诗》共5编25章，第一编论述了宫体诗，第二编介绍了初唐四杰，第三编分析了陈子昂等诗人，第四编专论宫廷诗人，第五编陈述了有关中国诗歌向盛唐发展的细节。1981年宇文所安出版的《盛唐诗》分上下两编，分析了王维、孟浩然、李白、高适、岑参、杜甫、元结和韦应物等诗人，一气呵成，气象万千。1992年他根据自己多年的讲稿，就中国文论的脉络以文籍举要的方式，整理出《中国文学思想的解读》，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和引述。

早期美国研究唐诗的人数不多，套路以译介为主，这在欧美汉学史中几乎是一种规律性现象。当代的美国研究团队已经发展壮大，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对于唐诗的肤浅解读，都普遍深入到诗人的生平、诗歌的历史背景、社会意义、美学价值和学科影响等方面，成果丰硕。

我国元代的戏曲由于其进步的思想性和高雅的艺术性早已闻名海外，成为世界文艺花园中的一朵奇葩。美国最早译介《西厢记》的学者是汉学

家甘琳(George T.Candlin),他撰写的论文已为1898年芝加哥出版的《中国虚构作品》(Chinese Fiction)所收录。囿于当时的文论水平和条件,19世纪美国学者对元曲倾向于一般性研究,论述散见于文学史和戏剧史之类著作中。美国学者阿灵顿(Lewis Charles Arlington,1859—1942)1930年出版的专著《古今中国戏曲概论》和1937年出版的《中国名剧集》,分析比较深刻系统,展现了新一代的汉学研究水平。元曲的现代研究权威柯迂儒(Jammes Irving Crump,又名柯润璞)1980年出版的专著《元世祖时代的戏剧》(Chinese Theatre in Days of Kublai Khan),在戏曲界有较高的声誉。1983年他发表的《上都乐府》(Songs from Xanadu:Studies in Mongol Dynasty Song-Poetry)技高一筹,创见颇多。他的弟子中佼佼者甚多,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文学系主任奚如谷(Stephen H.West,1944—)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12—15世纪中国戏剧注评》一书别开生面,拉近了读者与作品的距离。1991年他还与荷兰汉学家伊维德(Wilt Lukas Idema,1944—)合译《西厢记》,保留了原作的风格、用字和意象,还对原文生僻深奥的文化和语言要点详加注释。戴尔·约翰逊(D.R.Johnson)多年来师从柯迂儒,先后推出了多部问鼎之作,如他的专著《元杂剧的韵律》、文章《元杂剧:旧戏新注》等,对于一位西方学者来说实属不易,没有深厚的学养是不敢涉足该领域的。此外他的得意弟子中还有艾里诺·克罗恩(E.H.Grown)和夏威夷大学助理教授任友梅,也非等闲之辈。

美国近年出版有关元曲研究的高水平著述还有:1975年乔治·华盛顿大学中文系教授时钟雯出版的《窦娥冤:研究与翻译》和《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杂剧》,197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南加州大学教授乔治·海登(G.A.Hayden)的《元朝的包公戏》和《元明杂剧中之包公案:中国宋明时期戏剧中的罪与罚》,1982年荷兰汉学家伊维德与奚如谷合著的《中国戏剧:1100—1450》,以及夏威夷大学华裔学者罗锦堂的《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和《锦堂论曲》,杰罗姆·西顿的《关汉卿及其著作评论》,谢臣武的《窦娥冤主题的演进》,杰罗姆·卡瓦诺的《元代剧作家白朴的作品》等。

1976年格茨(Michael Gotz)在他的《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中说:

> 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认真研究,其规模已经发展到可以称为'领域'的程度。它不只是

汉学的一个层次，而是已经从语文学、历史学、考古、文学及其他与中国有关但又与传统学科尚不协调的奇特学术混合体中独立出来。各学科的中国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在这一新领域中采用多种研究手段。可以肯定，这一领域比其他国家的文艺批评相对少些，然而，倾向于文学分析的学者们却已大批涌入。这一领域比较新，正不断地扩展和发展，已成为各种学术态度、手段和方法的比武之地。①

中国晚清四大名著在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是《水浒传》，早年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1973）的译本曾广泛流行。其次是《西游记》，许多美国人都熟悉"美猴王"的故事。汉学教科书把《红楼梦》评价为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甚至还被一些书评家比附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些美国大学的东亚系开设了《红楼梦》研究的课程，有些大学还将《红楼梦》列入推荐学生阅读的书单中。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浦安迪（Andrew H.Plaks，1945—　）对明清小说有独到研究，曾经编撰《明代四大经典小说》（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1987）一书，从更广义的人文主义审美立场来分析《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但是更早以前他也出版过专著《〈红楼梦〉中的原型和寓意》（Archetype and Alegory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1976 年）。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提供的检索数据显示：近年来《三国演义》全部研究论文已有 110 篇，硕博论文 24 篇；研究《水浒传》的论文有 107 篇，硕博论文 21 篇；研究《西游记》的论文有 32 篇，硕博论文 15 篇；研究《金瓶梅》的论文共 102 篇，硕博论文 34 篇；研究《聊斋志异》的论文有 70 篇，硕博论文 6 篇；研究《儒林外史》的论文有 25 篇，硕博论文 5 篇。②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将，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只有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和阿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05）等少数美国媒体人士对鲁迅的文学作品加以关注。1961 年夏志清（Hsia C. T.）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

① Michael Gotz：*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West：A Critical View*. In *Modern China* Vol. 2 No. 3，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p. 397，Berkeley：Sage Publications，Inc. 1976.

② 张惠：《美国红学学术范式与价值》，注释[9]，载《红楼梦学刊》2011 年 第 4 期。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肯定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和沈从文等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而对鲁迅却多有批评,因而引起了苏联和东欧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挑战。1969 年费正清在《70 年代的任务》的演讲中表达了对"忽视中国实际情况的危险"的慎思,学界世风的改变与当时中美国家关系的改善潮流几乎是同步进行的。1974 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了尘封 40 多年的伊罗生(Harold Robert Isaacs,1910—1986)委托鲁迅和茅盾编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其中收录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药》、《孔乙己》、《风波》和《伤逝》等小说。1975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汉学研究中心创办《中国现代文学通讯》(半年刊),发表了白之(Cyril Birch,1925—)的"五四小说"讲义、曹淑英关于张天翼小说研究的博士论文,以及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1948—)关于沈从文研究的博士论文。1976 年耶鲁大学远东出版社出版了威廉·莱伊尔(William A.Lyell,1930—2005)主编的《鲁迅选集》,其中收录了《〈呐喊〉自序》、《狂人日记》、《肥皂》、《阿 Q 正传》、《随想录三十五》、《随想录四十》等 6 篇小说和文章,并附作品分析和英文注释。1981 年加利弗尼亚州蒙特里举行了"鲁迅及其遗产"(Lu Xun and His Legacy)国际学术会议,在文学批评史上进一步确定了鲁迅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此后有关鲁迅的研究便在美国各大学的东亚中心和汉学研究机构中相继展开。1987 年李欧梵(Leo Ou-fan Lee,1939—)在《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中运用了艺术、心理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开创了鲁迅研究的新思路。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现在,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广度、深度还是研究成果方面,都呈现出新的局面。各种新理论和新观念,诸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儒家和现代性等,对于开阔文学批评视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产生了冲击力。

此前很少人对中国女作家的命运表示特别的关心,学术界也没有把中国女作家作为专题集中研究。1936 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撰文首次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丁玲:"当今中国女作家最负盛名的一位,她在中国青年当中威望尤高。在日本,她也拥有很多读者。她的某些短篇小说已被译为俄、日、法文。"①1977 年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加里·约

① 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第 24 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

翰·布乔治以《丁玲的早期生活与文学创作》为题撰写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对丁玲1927—1942年的创作道路和作品进行了详尽分析。① 1997年康涅狄格学院东亚语言文化系助理教授艾米·杜丽(Amy D.Dooling)与杜生(Kristina M.Torgeson)合编的《现代中国女作家》(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版，收录了中国女作家秋瑾、陈撷芬、陈衡哲、冯沅君、石评梅、庐隐、陆晶清、陈学昭、凌叔华、苏雪林、袁昌英、谢冰莹、丁玲、沉樱、林徽因、冰心、罗淑、萧红等人的作品。编者在《导言》中对每位作家都作了简要介绍。2005年艾米·杜丽还发表了另一篇力作《20世纪中国的女权文学》(Women's Literary Feminism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Palgrave Macmillan)，对中国女性作家团队作了详尽的描述。

美国圣母大学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latt, 1939—　)是一位充满激情和才华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家，曾先后把25位中国大陆和台湾当代作家的作品介绍给了西方世界，其中包括老舍、巴金、莫言、苏童、冯骥才、贾平凹、阿来、刘恒、张洁、王朔等人的作品。他翻译的姜戎小说《狼图腾》(Wolf Totem)自2004年出版后引起了很大轰动，三年中该书中文版在中国大陆销售了多达200多万册。为了准确翻译小说中的大量蒙语词汇，葛浩文专门请来一位内蒙古大学的学生为他提供咨询。2007年11月姜戎凭借《狼图腾》英译本在香港国际文学节上获得了首届曼氏亚洲文学奖(the Man Asian Literary Prize)。2008年年初葛浩文翻译的毕飞宇的小说《青衣》(The Moon Opera)成功入选了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的复评名单。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中国作家的作品被译成英语介绍给英语国家的读者。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莫言的《红高粱》和《丰乳肥臀》英译本在美国受到追捧，印数均在1万册以上。贾平凹获得了美孚飞马文学奖，张炜获得过美国总统亚太顾问委员会杰出成就奖。

美国汉学家编写的《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上卷已于201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负责唐代文学部分的编写，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研究系教授艾朗诺负责北宋文学部分的编写，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及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奚如谷负责元代和明代文学部分的编写。下卷由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孙康宜教授负责。这是美

① 《丁玲研究在国外》，第101—166页。

国汉学界翘望期待的重大研究项目，必将进一步推动美国汉学事业的发展。

关于美国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现状，威斯康星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1954—　）曾经做过这样中肯的评述：

> 如果说现代中国文学在欧美的学院已经建立了一个制度和学科的话，它应该始于20世纪50—60年代，……在美国是夏志清先生，1961年《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这可能是在美国典范化建制化研究的开端。……美国汉学毕竟有一个从海外看中国的位置的假设，也许因为（地理、知识、感情）距离，造成偏见和误读，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了"距离的组织"，自然提供了不同的、相对冷静的视角看待问题。这20年来，大批大陆留美人才加入美国汉学研究的阵容，的确大幅改变了研究、教学生态。……至于以往部分学者挟洋以自重的姿态，现在应该有改变的趋势吧，毕竟这个年头在国外未必代表学问和见识就高人一等。①

四、美国学者对中国宗教的独辟蹊径研究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大学增设了中国哲学和宗教课程。1974年欧大年（Daniel L.Overmyer，1835—　）在美国宗教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的会议上建议成立中国宗教研究会，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赞同，第二年美国中国宗教研究会（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正式成立，标志着美国这一领域研究的系统化和正规化的开端。

1975年以后美国的中国宗教研究会每年都在亚洲学会年会和美国宗教学会年会期间举行中国宗教专题讨论会。该会的《中国宗教杂志》（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以及美国的《道教资料》（Taoist Resources）、《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和《中国哲学杂志》（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等刊物经常发表有关中国宗教研究的论文。不少美国大学还开设了中国宗教课程，出版了相关教材，如欧大年的《中国的宗教》（旧金山哈柏出版公司出版，1986）和谭维理（Laurence

① 木叶：《汉学研究趋向融通》，载《文汇报》2010年10月18日。

G.Thompson)的《中国宗教导论》(华兹伍德出版公司出版,1989)等。

中国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被称为全国五大宗教。美国研究和媒体资料显示:中国佛教信仰者人数为1730万(美国普度大学2007年调查),道教信仰者人数为4800万(美国电报局1948年世界年鉴记载),伊斯兰教信仰者人数6480万(1979年美国《新闻周刊》专题记述),天主教信仰者人数为550万(美国普度大学2007年调查,下同),基督教信仰者3000万。①

2010年7月26~2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第7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上,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公布了2007年所做的关于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CSLS)结果。该调查在新疆和西藏以外的56个地区,包括3个直辖市,6个省会城市,11个地级市,16个小城镇和20个行政村范围内抽取的16~75岁之间的7021个对象所作调查结果显示:85%的中国人信仰某一宗教或者参加某些宗教活动,只有15%的中国人不信仰任何宗教和超自然事物,也不参与任何宗教和民俗活动。认同基督教的3000万中国人中只有38%接受过洗礼。在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的佛教最近30年来发展迅速,有约1.85亿的佛教信仰者,但是只有1730万人是正式皈依的佛教徒。②

1.道教

法国道教研究学者石秀娜(Anna Seidel,1938—1991)曾编撰《西方道教研究编年1950—1990》(刊1989—1990年《远东杂志》第5卷),就西方汉学界对道家、道教教义、道教经典、道教史、教派史、炼丹术与医学、摄生法、道教仪式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概括。她指出:"作为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诸要素之一,道教在西方是最后被发现和研究的。大约在1950年,保罗·戴密微(1894—1979)发表了亨利·马伯乐(1883—1945)

---

① 据中国网2007年《宗教信仰》统计:中国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徒1亿多人,宗教活动场所10万余处,全国和地方宗教团体3000多个。藏语系佛教信徒约760万人,巴利语系佛教信徒150多万人,出家僧尼20万人。道教主要在汉族中流行,一般没有严格人教仪式和规定,信教人数难以准确统计,已知乾道和坤道约2.5万人。在回、维吾尔、塔塔尔、柯尔克孜、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东乡、撒拉、保安等10个少数民族的2000多万人口中,绝大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其中伊玛目和阿訇4万余人。天主教教徒近500万人,每年约有5万余人接受洗礼。基督教信徒总数已达1600万,其中农村信徒占70%强。

② 李向平、王莹:《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中国最多有3000万基督徒》,载《中国民族报》2010年8月24日。

的译著。从那时起,人们才开始共同严肃地从道教自身文献出发去理解道教。之所以对道教的认同跚跚来迟,更多地是由于思维方式上存在盲点,而非现实中存有障碍。"①

关于道教教义的哲学基础,波士顿大学宗教系副教授李维亚·科恩(Livia Kohn)曾有过这样的分析:

> 与其他宗教比较起来道教很难把握。它既不是确定无疑的小宗教,也不是普行天下的大宗教,而是兼而有之。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具有古代宇宙论观点,认为世界是轮回的,并且创造了顺应季节变化的礼仪和其他相关模式。太空在其视野中呈明显的直线状,理想世界中的人性被彻底征服了。②

19世纪前只有少数美国学者研究道教。南长老会传教士杜步西(Hampden Gait Du Bose,1845—1910)曾于1872年来华,先后在杭州和苏州传教,著有《中国的三教:儒、释、道》(Dragon, Image and Demon or, 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1886)一书,对中国神话、偶像崇拜和鬼神崇拜作了系统介绍。

20世纪20年代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研究生约翰逊(Obed Simon Johnson)来华进行学术考察,1928年撰写论文《中国炼丹术考》(A Study of Chinese Alchemy, 1937年由黄素封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出版),论述了炼丹术在道教史中的作用,肯定了炼丹术对于医学和化学工业的影响,同时指出欧洲的炼丹术曾受到中国炼丹术的启发。

魏鲁男1929年以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身份来华,1932年返美,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他曾发表《论道教——基于魏隋编年史的论述》(A Discourse on Daoism Based on the Chronicle of the Wei and the Chronicle of the Sui),1963年他出版了《庄子语录》(The Sayings of Chuang-Tzu)一书,1966年出版了《公元320年中国的炼丹术、医学和宗教:葛洪的内篇》(Alchemy, Medicine and Religion in the China of AD320: Ge Hong's Inner Book of the Man Who Embraces Simplicity),是美国早期研究道教的重

---

① 郑天星:《美国的道教研究》,李养正主编《当代道教》,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

② Livia Kohn: *Daoist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A Survey of Scholars and Recent Trends* . 2009.

要著作。

原芝加哥大学马丁·赖尔森讲座教授顾立雅专攻中国古代史和哲学史。1970年他撰写的道教著作有《道教和中国文化史及其他》(What Is Taoism? And Other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e History)也是一部有影响的专著。

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科学史和中国文化史教授席文(Natham Sivin,1931—)是1960年哈佛大学硕士毕业生和1966年科学史博士毕业生,虽然专业方向并非研究道教,但是他多次参加国际道教研究会议,授课内容部分与中国炼丹术和天文学相关,1977年曾随美国天文学者代表团访华。他的专著有:《中国炼丹术初步研究》(Chinese Alchemy:Preliminary Studies.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和《中国古代的医学、哲学和宗教:研究与回顾》(Medicine,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China:Researches and Reflections. 1995)。1978年他曾在《宗教史》杂志第17卷3~4期上发表《论令人困扰的"道家":古代中国科学与宗教之关系》(On the Word Taoist as a Source of Perplexit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Relation of Science and Religiom in Traditional China),还为1987年版第1卷《宗教百科全书》撰写了词条《中国炼丹术》(Chinese Alchemy)。

近年来美国学人对于道教研究另辟蹊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1990年美国学者韩森(V.Hansen)出版了《宋明时期中国诸神的演变》(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一书,研究了历史上道教诸神的概念和形象的演变。卡西尔(Suzanne Cahill)曾发表有关西王母的信仰论文多篇,1993年还出版了一部关于西王母传说的专著(《升迁与殉道:中国唐宋时期的西王母》(Transcendence And Divine Passion: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in Medieval China)。1990年晁时杰(Robert L.Chard)的博士论文专门研究灶王的传说及灶君崇拜的历史(《一家之主:中国灶君祭拜的历史发展》)。1993年祁泰履(Terry F.Kleeman)的论文《文昌祀的扩张》探讨了文昌(梓潼帝君)从一个蜀地小神逐步晋升为受尊奉的文神的历史(收入《唐宋宗教与社会》,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还翻译了《梓潼帝君化书》(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1956年李维雅·科恩生于德国,1980年在波恩大学获哲学博士后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波士顿大学任教。她的研究领域主要在神秘主义和道教神话,论著有:《七步得道:司马承祯的〈坐忘论〉》(Seven Steps to the

Tao:Sima Chengzhen's Zuowang lun,1987);与日本板出祥伸教授合编《道教的禅和长寿秘诀》(Taoist Meditation and Longevity Techniques,1989 年);《道教的神秘主义哲学:西升经》(Taoist Mystical Philosophy:The Scripture of Westrn Ascension,1991);《早期的中国神秘主义:道教传统中的哲学和救世信仰》(Early Chinese Mysticism:Philosophy and Soteriology in the Taoist Tradition,普林斯顿大学,1992 年);编译《道教体验文萃》(The Taoist experience:an anthology,1993);《笑谈中国唐宋时期佛道之争》(Laughing at the Tao:Debates among Buddhists and Taoists in Medieval China,1995)。此外她还发表了一些有关养生、《天隐子》、内观、老子、陈抟和尹喜等方面的论文。

迪安(Kenneth D.Dean,1936—2010)通过对福建某些地区的深入考察,撰写了《华东和华南的道教仪式和民间信仰》(Taoist Ritual and Popular Cults of South-East Chin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一书,对道教的实践和仪式进行了全面考察。1996 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道藏手册》(Handbook of the Taoist Canon),可按历史顺序编排检索。

一些美国学者探讨了道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影响。例如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1952—　)著文论述了道教科仪斋醮的政治内涵,在《礼拜仪式与君权:道教仪式在西蜀建国中的作用》中指出道教在三国时期建立过程中联系中央帝王政权与基层社会纽带的载舟覆舟的关键作用。侯斯孟(Donald Holzman,1926—　)在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过程中对游仙诗与道教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柯罗尔(Paul W.Kroll,1923—2011)和斯恰佛(Edward Schafer)对唐代的道教、唐诗中的道教人物、道教与唐代文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2.佛教

美国人对佛教的了解始于东亚移民的迁入。1849 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时期大批华人移民北美,1853 年华人泽亚公司(Sze Yap Company)在旧金山建立起第一座佛寺,到 1900 年美国西海岸的佛寺已经多达 400 多座,香火鼎盛。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只有少数美国学者研究中国佛教。据史书记载,第一位皈依佛教的美国人是亨利·斯蒂尔·奥葛特(Henry Steel Olcott,1832—1907)。他出身于一个英格兰清教徒家庭,曾就读于纽约大学,专修农业科学。1861 年国内战争期间他任陆军上校兼作战部专员。战后退役

参与创建灵智会(The Theosophical Society),1878 年被任命为会长,长期侨居印度,为人施药治病,后来致力于神谕的宣传。他还前往锡兰(今斯里兰卡)声援受到天主教长期打压的当地佛教徒,坐牛车到各地帮助发展教育。他认为佛教是智慧之教,是古老的世界信仰之魂。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美国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佛教文献和论著。1844 年 1 月波士顿《日晷》杂志(The Dial)第 4 卷第 3 期上刊发了从法国学者布尔努夫(Eugene Burnouf,1801—1852)法文本转译的英文版《妙法莲华经》(The Lotus Sutra)。探险家和外交家柔克义曾编译过《藏经韵文集》(A Collection of Verses from the Buddhist Canon,1883 年),撰写过《释迦牟尼生平及其教派的早期历史》(The Life of Buddha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His Order,1884 年)。他是第一位学习过藏语的美国人,两次到蒙古和西藏探险,回国后撰写了《喇嘛之国》(The Land of Lamas,1891 年)和《1891 至 1892 年蒙藏旅行日记》(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in 1891 and 1892, 1894)等书。1891 年美国学者朗曼(Charles Rockwell Lanmann,1850—1941)等人在巴利圣典学会(Pali Text Society)的资助下出版了《哈佛东方丛书》(Harvard Oriental Series),其中收录了若干部佛教论著。1959 年芮沃寿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的佛教》(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年)。这些重要的书刊和论文推动了美国学者对汉传和藏传佛教的研究,进一步扩大了美国汉学研究领域。

1893 年在芝加哥举行世界宗教会议后,美国学术界的佛学研究风靡一时。20 世纪 50—60 年代美国掀起了禅宗热,禅宗理念逐渐渗透到医学、哲学、艺术、音乐、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在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是杜姆林的《现代世界佛教》(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World,1960)、亚米斯(Van Meter Amies)的《禅与美国思想》(Zen And American Thought,1962 年)、卡普洛(Philip Kapleau)的《禅门三柱》(The Three Pillars of Zen)、福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的《心理分析与宗教》(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1950 年)、《爱之术》(The Art of Loving,1956)和《佛教禅学与心理分析》(Zen Buddhism And Psychoanalysis, 1960)、格雷厄姆(Aelred Graham)的《天主教禅》(Zen Catholism:A Suggestion,1963)等。禅宗美国化之后又分化为颓废禅、杂禅、方禅和禅外禅等流派。此后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设置禅宗课程。近年来美国出版了一些关于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华严宗、天台宗和净土宗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与

库罗达佛教与人类价值研究学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佛教研究的论文集与专著。一些学者研究中国佛经中的伪经问题,并把中国佛经与梵文原经进行对比研究。罗伯特·巴斯韦尔(Robert Buswell)曾编撰《中国佛教伪经》(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收入此类论文多篇。

1976年国际佛教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uddhism Studies,简称IABS)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成立,中国佛教是该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从而带动了美国学者对中国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的研究。当时美国的一些高校,如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和芝加哥大学都加大了对中国传统和民间宗教研究的规模和力度,培养了一批批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出版了一些名家专著。耶鲁大学的埃杰顿(Franklin Edgerton)编辑了《佛教混合梵语:文法与辞典》(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哈特编写了《梵语速成学习法》。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一套关于东南亚、南亚诸国与宗教研究的丛书。哈佛大学世界研究中心霍姆斯·威尔奇(Holmes Welch, 1924—1981)曾出版三部关于中国佛教的著作:《1900年至1950年中国佛教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Chinese Buddhism: 1900-19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年)、《中国佛教的复兴》(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年)、《毛泽东时代的佛教》(Buddhism Under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早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学者对南传佛教就有所接触。美国报刊曾经报道1873年在斯里兰卡举行佛教和基督教大辩论。1894年保罗·卡罗斯(Paul Carus)在美国出版的《佛陀的福音》(Gospel of Buddha)和1999年发表的《佛陀教义》(The Teachings of Buddha)就引用了上座部佛教(Theravada Buddhism)的史料和语料。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会议上锡兰僧人达摩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 1864—1933)在演说中呼吁众生皈依佛教。1895年一群关心宗教发展的美国人在纽约成立了灵智会,佛教的轮回理念和涅槃学说开始广泛传播。不久摩珂菩提会(Maha Bodhi Society)美国分会成立,觉音的名著《清净道论》(Visuddhi Maga)的出版标志着南传佛教已经在美国学术界产生了影响。波士顿人亨利·克拉克·沃伦(Henry Clarke Warren, 1854—1899)童年时因车祸致残,在研习柏拉图和康德哲学的同时皈依佛教,将个人大部分财产捐给了巴利圣典

会，资助出版事业。沃伦和朗曼等人编纂的《哈佛东方丛书》译介了多部佛教著述，标志着美国与欧洲的东方学研究水平并驾齐驱。朗曼专修印度文学与梵文，曾任哈佛大学教授，编纂过《梵文读本》一册。1890 年他被任命为美国文献协会主席，兼任外国学术委员会委员。他出版的《佛教翻译》、《法句经注释》和《经集》被认为是最好的译本，但因为他站在西方立场来看待东方的宗教和文化，他的学术观点常常受到批评。

西方学者与藏族僧众的频繁互访推动了藏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20 世纪 20 年代初访问美国的蒙古族活佛迪洛瓦（Dilowa Hutukhtu）是最早进入美国的喇嘛。1959 年大批藏人流亡国外，带走了大量藏文文献、档案和文物。达赖喇嘛在印度建立流亡机构，创办刊物，整理和翻译出版藏文典籍。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西方财团的资助下，欧美学界争相购买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献，各大学也相继成立藏学研究机构，聘请国外藏人学者开展合作研究，还到锡金、尼泊尔和印度藏人聚地区进行考察，撰写藏学论著。1978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西藏和其他省份的藏区大门向外国来访者敞开，各国藏学研究人员经常进入藏区考察，中国藏学家也到国外讲学或参与合作研究，大大推动了世界藏学的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涌现了大量的研究和宣传藏传佛教禅法的著作，许多大学都开设了佛学学位课程，各类刊物如《国际佛教研究协会会刊》（Journal of IABS）、《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和《金莲》（Golden Lotus）等经常刊发研究文章。韦曼（Alex Wayman，1921—2004）是哥伦比亚大学梵语教授，研究藏传佛教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先后发表和出版的论文和专著有《密教》（Buddhist Tantras：Light on Indo－Tibetan Esotericism，1973）、《宗教百科》（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1987）、《藏传佛教中的灯与风》（The Lamp and the Wind in Tibetan Buddhism）等。此外，还有印度语言哲学史学者吕埃格（David Seyfort Ruegg，1931—　）出版的《对藏传佛教研究的一个新贡献》（A Propose of A Recent Contribution to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1962）、《布顿法师传》（The life of Buton Rinpoche，1966）、《印度和西藏思想研究：问题和展望》（The Study of Indian and Tibetan Thought：Some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Inaugural lecture，Chair of Indian Philosophy，Buddhist Studies and Tibetan，University of Leiden，E.J. Brill. 1967）、《关于西藏和蒙古宗教的最新研究》（A Recent Study of Tibbetan And Mongolian Religions，1975）和《论印度和西藏佛教的传播与接

受——从比较角度看佛性、思想和渐进主义的问题》(Buddha-Nature, Mind and the Problem of Gradualism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of Buddhism in India and Tibet, London,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9)。埃克沃尔出版的《西藏的宗教习俗》(1964年)和《西藏佛教的实践与典礼》等。

旅美的藏传佛教代表人物有藏族高僧曲嘉仲巴(Chogyam Trungpa)和蒙族僧人旺格格西(Geshe Ngawang Wangyal)。旺格格西在拉萨取得过格西的学位,①1955年以后在美国大学教授蒙文和藏文。1958年他在新泽西建立了第一座藏传佛寺,几年后规模逐渐扩大。他的弟子中有杰夫瑞·霍普金斯(Jeffrey Hopkins, 1940—)、罗伯特·瑟曼(Robert A.F.Thurman, 1941—)、亚历山大·别尔津(Alexander Berzin)和安妮·克莱因(Anne C. Klein)。20世纪70年代初他创建美国佛学研究所,1973年翻译出版了噶举派(The Kagyu Lineage)和格鲁派(The Gelug Lineage)的教义论集。旺格主要继承格鲁派学说,被称为美国格鲁派的开山祖师。

旅美藏传佛教徒多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新泽西州、华盛顿州、马萨诸塞州、科罗拉多州和佛蒙特州。较重要的佛事中心有:宁玛派(又称"红派")禅定中心、噶举派(又称"白教")禅定中心和萨迦派(The Sakya Lineage,又称"花教")研究中心。1969年土尔库(Tarthang Tulku)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建立起一个宁玛坐禅中心(The Nyingma Meditation Center for Berkeley)。土尔库熟悉密法,精研教义,陆续开办了宁玛佛学院、佛法出版社、宁玛乡下中心、甘珠尔与丹珠尔印经计划等组织,向国际社会介绍西藏的传统和佛教文化。

美国现在有20万~30万佛教徒,有40个较大的佛教团体。藏传佛教在美国传播的几十年中,对美国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教士们把医学、心理学和营养学中的一些现代科学元素与藏传佛教的传修挂钩,使科学与宗教相融合,将修炼与人性回归串联,对传授禅定的饮食控制与催眠术加以协调。现代宗教如是被纳入了文化产业,藏传佛教与西方其他宗教彼此交流,打破了美国原来基督教、天主教和犹太教的一统天下。学者名流诸如奥葛特、柔克义、沃伦、朗曼、芮沃寿以及好莱坞影星理查·

① "格西"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侣学位,在拉萨三大寺系统中格西分为四级:拉然巴格西、嗟然巴格西、林赛格西和朵然巴格西。

基尔(Richard Gere)和马丁·斯科瑟斯(Martin Scorsese)等人对藏传佛教的宣传,帮助把佛教教义提升到美国的主流意识。作为美国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藏传佛教已经培养出多批具有新意识的信徒,帮助美国人对西藏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扩大了藏传佛教的国际影响,促进了美国藏学的发展。但是毋庸讳言,藏传佛教的美国化和世俗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传统性和民族性的丢失。

3.伊斯兰教

鸦片战争之后,欧美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纷纷到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等地传经讲道,建立教堂、学校和诊所,散发阿拉伯文的《圣经》。1877 年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在陕西设立了传教点,还成立了中华穆斯林之友会。知味墨(Samuel Marinus Zwemer,1867—1952)是美国基督教教会派往穆斯林地区的传教士代表人物,曾在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地区传播福音长达十余年,撰有《朝向基督的伊斯兰教》等多部专著,他曾在各类场合强调到中国穆斯林地区传教布道的重要性。1917 年他应邀访华,第二年经他的努力在中华续行委办会(The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特设了回民布道特委会,后改名为"中国穆斯林交际会",成为一个专门推动传教工作的机构。美国传教士深入中国穆斯林地区,加速了西方对中国穆斯林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和交流。

一些美国大学图书馆收藏了当年部分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地区传教的文献和史料。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了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毕敬士(Claude L.Pickens,1900—1985)等人的档案,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也收藏了北京青年会干事胡籁明(Lyman Hoover)等人的档案。公元 9 世纪两个西方穆斯林在中国旅行回国后用阿拉伯文写了一本书,1733 年由奥伊泽比乌斯·勒诺多(Eusebius Renaudot)翻译成英文,并增加了有关注释和图例。一部有关上述穆斯林中国之行的书评,就书中涉及的穆斯林何时进入中国以及中国穆斯林的人口和生活状况等问题,根据勒诺多的资料发表了长篇评论。勒诺多在书中考证出穆斯林最早是通过海上和陆路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而且都是为了做生意而非传教。早期传教士还对广州周边的清真寺遗迹和穆斯林墓地碑刻进行了研究,并把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丛报》上,为研究伊斯兰教的西方学者提供了可信的史料。

美国传教士撰写了一些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专著和论文。1921 年安德鲁发表了《中国西北的新月地带》(The Crescent in North-West China),

论述了西北门宦①和回民起义的问题。毕敬士与其他西方传教士于1935—1936年在西北、华北和华中穆斯林地区进行考察,拍摄了许多照片,在报刊上发表。20世纪40年代毕敬士曾在汉口创办杂志《穆斯林之友》(Friend of Moslems),刊发了许多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具有价值的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方学术界与中国社会的联系一度中断,对中国穆斯林的研究陷入了停滞状态。中美建交后情况有所改善。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一些西方学者纷纷到中国的穆斯林地区进行田野考察。其中有美国学者李普曼(Jonathan Lipman)、罗萨比(Morris Rossabi)和白蓓莉(Barbara Pillsbury)等。李普曼的博士论文《甘肃边境社会:1895—1935年》(The Border World of Gansu)研究的是近代甘肃史上的回—汉关系。其中用了大量的汉文原始资料,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回族的关系以及封建王朝对回族的法律应用有独到的研究。他的论文谈到甘肃回族军阀和回族"大分散和小集中"社会。罗萨比是明史和忽必烈研究专家,对元明时期的中国穆斯林历史有独到研究。他还为《宗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Religion)写了《中国伊斯兰教》(Islam in China)的词条。白蓓莉的博士论文《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中的凝聚和分裂》(Cohesion and Cleavage in a Chinese Muslim Minority)聚焦于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的穆斯林社团的研究。此外,她还发表了一些有关中国穆斯林妇女的文章,并制作了中国伊斯兰教重大事件年表。

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多着眼于宏观分析,不注意中国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存在的差异。20世纪70年代后他们开始关注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和变化,一时间有关中国穆斯林的研究成为美国汉学的主流学科,新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敏感的历史问题和多民族的社会背景而备受关注。目前,美国学界对新疆问题的研究倾向于更多地从某一社会层面切入,辅以细致分析,将得出的结论应用于对整个新疆社会的解读。这一研究方法体现在许多专著和论述中,如: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1952—)的《清代中叶的流放:发配新疆,1758—1820》(Exile in Mid-Qing China: Banishment to Xinjiang, 1758-1820),米华健(James

① 具有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和中国封建色彩的一种教主体系,明末清初流行于甘肃和宁夏回民聚居地。

Millward）的《嘉峪关外：1759—1864 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大清帝国》（Beyond the Pass：Economy，Ethnicity，and Empire in Qing Xinjiang，1759-1864）和《欧亚十字路口：新疆历史》（Eurasian Crossroads：A History of Xinjiang），迈克尔·迪隆（Michael Dillon）的《新疆：中国中亚区域的民族、分裂主义和控制》（Xinjiang：Ethnicity，Separatism and Control in Chinese Central Asia）以及弗雷德里克·斯塔尔（S.Frederick Starr）主编的论文集《新疆：中国之穆斯林边陲》（Xinjiang：China's Muslim Borderland）等。

1991 年美国学者杜磊（Dru Gladney）根据自己的博士论文扩写成的专著《中国穆斯林：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Muslim Chinese：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用人类学理论对中国大陆回族社会所作的四个个案分析：宁夏纳家户的虎非耶派，北京牛街回民区，北京常营回民村和泉州回族。他在田野调查中根据自己的观察体验指出，宁夏纳家户的回民通过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来保持伊斯兰教的特性；牛街回民通过坚持清真饮食习惯发扬了伊斯兰教传统；常营的回民以村内的回族固守他们内部的关系来以保持穆斯林的特征；泉州的回民通过对阿拉伯祖籍的认同来排斥与汉族文化的融合。作者认为，国家的民族政策在强化民族感并发展民族主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 年他出版的《中国的民族认同：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形成——社会人类学个案研究》（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Case Studies in Social Anthropology）。

近年来一些西方青年学者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许多人选择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地方化特点进行专题研究，他们的成果将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谱写出新的篇章。美国汉学界对中国新疆地区的研究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思想。论文集《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陲》的主编弗雷德里克·斯塔尔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亚洲—高加索研究所所长，熟悉边疆问题的专题研究，视野开阔，所收论文的作者都是美国各大学或研究机构的领军人物，他们的研究成果对美国政府的决策具有重大影响。

4.民间宗教

美国对中国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的研究大体上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之间。除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建制型宗教之外，中国还有一些缺乏系统教义和独立组织的分散宗教信仰，

有大约2亿多人定期或不定期参与此类活动。中国民间宗教不但不与道教和佛教互相排斥,而且还常常彼此影响和包容。许多学者把祖先崇拜、迎神赛会、丧葬礼仪、占卜算卦、驱邪除魔等纳入民间宗教的范畴。

一些学者对民间宗教鬼神谱系中的诸神,如城隍、灶君、关帝、文昌、天后(妈祖)、陈靖姑(临水夫人)和职业或地区守护神(财神、药师和土地爷)等,分别作了专题研究。如约翰逊(David Johson)在分析唐宋时期城隍神的供奉时直接把它与新兴城市商人阶层价值观和官府对民间宗教政策的变化联系起来。一些美国汉学家曾对祖宗祭拜在维系宗族繁衍和家族和睦方面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另一些学者的学术研究兴趣则聚焦于地区宗教帮会和自发组织,认为这些自发组织独立于家族宗法和地区社规之外,与中国的传统信仰有所不同。不少欧美学作者还对龟甲占卜、观星象、看风水、算卦、占梦、求签、扶乩分别作了研究。诞辰、婚礼、葬礼等也是民间宗教的重要研究课题,学者们试图对其功能和意义作出自己的解读。

最近20余年西方汉学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潮流,出现了一批批新成果。过去的研究多半取材于当代社会,但近年一些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历史上的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其代表作品有:

1970年堪萨斯州大学历史教授达德斯(John Wolfe Dardess)在《亚洲研究学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发表《白莲教的变化和明朝的建立》,1972年发表了《神、鬼和祖先:台湾农村的民间宗教》。同年纽约州伊萨卡学院哲学与宗教教授裘明中(Chiu Min-chuong)也发表了《两种民间信仰:台湾两种民间宗教之比较研究》。

1974年斯坦福大学沃尔夫(Arthur P.Wolf)主编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和礼仪》也是一本可读性强的论文集,因为作者从人类学角度对中国民间宗教进行了探讨,给读者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

韩书瑞(Susan Naquin)1944年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从1966—1974年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完成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业后分别获得了学位。1966—1967年他到台湾地区学习汉语,多次来大陆访问,现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他对于中国民间宗教,特别是清代民间信仰有独到研究。主要著作有:1976年发表的《至福千年之叛逆:1813年八卦教起义》(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考察了清代中期白莲教起义者的宗教背景,八卦教门的成立,1813年攻打北京紫禁城以及起义被镇压的情

况。该书吸收了中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丰富的的史证和分析，受到广泛的好评。1979 年韩书瑞还在《宗教史》上发表了《1774 年的王伦之乱》。

1977 年密执安大学教授佩利（Elizabeth J.Perry）在国际杂志《近代中国》发表《崇拜者与勇士：白莲教对捻军起义的影响》，同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教授孔裴德（Erederic Wekemann）在《亚洲研究杂志》发表了长篇论文《叛乱与革命：中国历史上的民众运动研究》。

拉尔夫·撤克斯通（Ralf Thaxton）和罗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先后在《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 Studies）、《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tely）和《亚洲研究学刊》发表多篇书评，1981 年还发表了《1774 年山东的王伦起义》（Shantung Rebellion：The Wang Uprising of 1774，New Haven），1992 年又与于芳君（Yu Chu Lunn－fang）合编《中国的进香者和圣地》（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Studies on China，1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年美国一些学者举办了“中国社会中的混合教派”讨论会，宣读的论文有：华盛顿大学的哈勒尔（Stevan Harrell）和佩利的《中国社会的混合教派导论》；萨克拉门托加利福尼亚大学石汉椿的《没有起义的太平盛世信仰：华北的黄天教》；宾夕法尼亚大学韩书瑞的《诸起义间的联系：清代教派宗族体系》；奥伯林大学凯利（David E.Kelley）的《庵堂和斋堂——18 世纪的罗教和漕运水手团体》；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乔丹（David K. Jordan）的《中国教派组织：先天道的历史》；杜克大学韦勒（Robert P. Weller）的《中国的秘密宗教和政治活动》。哈勒尔和佩利的文章通过对中国民间教派的逐一分析后认为，那些教派可以分为分裂教派、混合教派、秘密教派、拯救教派、太平盛世教派、破坏教派和异端教派等类别，指出国家与社会的影响对教派起义都起到一定作用。

学者们在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同时也在更宽泛的视野中体验到中国民间文化的多样性、地域性和普遍性，这些观点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他们的专著和论文中。其中有：1976 年欧大年的《民间信仰——传统中国晚清的异端宗派》（Folk Buddhist Religion：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年姜士彬（D.Johnson）等撰写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民间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年韩森（V.Hansen）的

《宋明时期中国诸神的演变》。

太史文(Stephen F.Teiser)是近年美国汉学界出现的一位多产的中国民间信仰研究专家。他毕业于欧柏林学院,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宗教学系攻读东亚宗教课程,1986 年获博士学位后任普林斯顿大学宗教学系教授。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宋明时期的盂兰盆节》为他后来研究中国宋明时期的民间信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6 年他撰写了《唐宋时期宗教中的鬼与祖先——作为葬礼的盂兰盆节》(Ghosts and Ancestors in Medieval Chinese Religion:The Yu-lan-p'en Festival as Mortuary Ritual,History of Religion),同年还发表了《母亲、儿子与饿鬼——目连神话中的性别与救赎》(Mother, Son,and Hungry Ghost:Gender and Salvation in the Mythology of Mülie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in Atlanta)。1988 年他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修订后出版了《中国唐宋时期的鬼节》(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对传统汉学和佛学研究领域的突破得到了学术界普遍好评,荣获了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颁发的当年宗教史最佳处女作奖。1994 年他出版了《十王经与中国唐宋时期佛教冥间的形成》(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5 年发表了《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9 年发表了《绘画中的冥间——插图本〈十王经〉》(Picturing Purgatory:Illustrated Versions of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Images de Dunhuang,Paris)。《十王经与中国唐宋时期佛教冥间的形成》是太史文研究中国唐宋时期佛教与民间信仰的又一部力作。该书取材于敦煌文献,以中晚唐出现的佛教伪经《佛说十王经》为全书主题,对中国宋明时期佛教冥间说的根源作出了详细的分析和令人信服的考证。

五、中华文化与文艺复兴、民主思潮和地理大发现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泛的概念,早期学术界常常把它与艺术、历史、地理和人类学相联系。19 世纪中叶以后欧美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研究学者都把文化作为重要涉科内容纳入自己的学科。学者们的共同看法是:"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可以传播,可以通过社会习得,具有非个人生理遗传性,既是抽象的又是经验的;在一个共同

体中主流文化具备鲜明的一体性，但是在单一群体中存在的文化则可能属于亚文化层次。就表现形式而言，“文化”有精神文化（spiritual culture）、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和建制文化（institutional culture）之分；就地域而言，又有域外文化和本土文化之别；就历史阶段而言，还可以划分为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就风格和对象而言，常以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和民间文化（folk culture）作为标识；就涉科范围而言，也可以扩展至科技文化、法律文化、政治文化、稻作文化、企业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等。“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属于语言学家的共识。总之，生活中文化无处不在（ubiquitous），它制约并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它的存在又通过人们的言语和行为来体现，因此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素养以及社会现象中的文化意义，也常常被笼统地冠以“文化”的标签。美国人种学家克罗伯（Alfred Louis Krober，1876—1960）和文化理论家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1905—1960）曾经查阅并比较过大约300个有关“文化”的定义，发现学者们的说法有很多一致和不一致的地方。

“中华文化”涵盖着大至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二里头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三星堆文化、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小至青铜文化、风水文化、生肖文化和玉文化等中国文明史中的事物。欧美汉学家通过长期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在历史上曾经是催生文艺复兴、民主思潮和地理大发现的一个重要因素。

德裔美籍汉学家夏德1870年被录入中国海关，先后任职于九龙、淡水、厦门、上海、镇江、宜昌和重庆等口岸。他曾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对中华文明的独到见解表现在他早期的一些著述中，如：《古瓷》（Ancient Porcelain，1888年）、《中国研究》（Chinesische Studien，1890年）和《论中国艺术的外来影响》（Uber fremde Einflusse in der Chinesischen Kunst，1896年）等。1902年他应聘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文教授后出版了《一位收藏家笔记片断——当朝中国画师往事，附部分先贤暨艺术史家传略》（Scraps From A Collector's Notebook，being Notes on Some Chinese Painters of the Present Dynasty，with Appendics on Some Old Masters and Art Historians，1905）、《中国的铜镜》（Chinese Metallic Mirros，1907）和《晚周前的中国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to the End of the Chou Dynasty，1908）等文化专著。

德裔美籍汉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曾在柏林大学

和莱比锡大学攻读东方语言，1898 年移居美国后多次率团来华访问考察。他的著作《汉代的中国陶器》(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1909)、《中国的基督教艺术》(Christian Art in China，1910)和《中国与伊朗：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Sino - Iranica：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1919)，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分析和解读了中华文化的渊源、影响和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美国学者贾德(Thomas Francis Carter，1882—1925)年轻时就开始研究中国印刷史，曾两度来华进行考察研究，在安徽宿州北长老会任职长达 12 年之久。《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西播》(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1931)便是他这一时期研究的鼎力之作。他在书中用详尽的史料论证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西传的过程，结论令人信服，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55 年该书由中国史学者傅路德校订和增补后再版了两次。

1931—1935 年美国学者卜德曾以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身份来华深造，1942 年他撰写了《中国物品西传考》(China's Gifts to the West)一书，旁征博引地论证了从公元前 200 年到公元 1800 年中国对西方世界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馈赠多于从西方世界所得到的回报。他在书中谈到中国对西方的物质文化馈赠有：丝绸、瓷器、茶叶、纸张、火药、印刷术、指南针、漆器、风筝、纸牌、折叠伞、轿子、金鱼、皮影戏，以及柑橘、柠檬、银杏、菊花、茉莉、牡丹、山茶花、杜鹃花等植物，风子油和麻黄碱等药物，煤和锌等矿物。卜德认为中国的物质文化在改变西方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为西方现代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纸张和印刷术，人们可能生活在更漫长的愚昧世纪，纸张对于后来西方文明发展的影响也功不可没。没有火药和指南针，大航海时代就可能要推迟若干世纪才能到来，新世界的开发也许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期待，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美好愿望无异于痴人说梦。1948 年卜德又撰写了《中国思想西传考》(Chinese Ideas in the West)，详尽介绍了中国哲学、政治体制、经济理论、文学艺术、科技发明和教育思想对西方学术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在欧洲兴起中国文化热的时代中国的哲学思想成为欧洲知识界启蒙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动力，儒家文化的理性观念和民贵君轻意识成为新时代民主思想的源头。他认为两千年来中国与西方从未中断的文化的交往是对人类文明的最伟大贡献。

傅路德在 1943 年完成的《中华民族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书中指出,中国人是一个富有高度智慧的民族,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现代科学体系,但是在天文、历法、数学、医药、工程、建筑和舆地方面都有杰出成就。中国人在社会管理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该书还通过安阳考古重大发现的资料,为美国读者对华夏文明的了解和认识提供了丰富信息。

美国人类学家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1962)曾在芝加哥大学研修宗教心理学、人类文化学和考古学等课程。1911 年他被费尔波特浸礼会按立为牧师,同年 10 月他和妻子阿丽西娅从旧金山抵达上海,在浙江学习汉语两年后移居叙府(今四川宜宾)。1919—1939 年他在中国一共进行了 14 次夏日探险,搜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和人类学材料,曾为三星堆考古发掘提供咨询,帮助当地少数民族保护自己的庙宇和习俗。他在自己的探险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在四川和西藏边境地区进行民俗调查的情况。1931 年他以美国国家博物馆合作者身份受聘于成都的美国浸礼教会传教会。1932—1948 年,他一直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教授人类文化学和考古学,并担任该校考古、艺术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他还是美国人类文化学会、美国民俗协会、远东研究所成员和皇家地理学会成员,也是美国纽约动物学会终身会员。1948 年他退休后返回美国,曾到各地谈自己在华经历和文化考察的感受,并利用在华 37 年中搜集到的丰富材料撰写文章,先后发表于《中国边疆》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等刊物上。他的主要著述有:

1.《四川省的宗教》(Religion in Szechuan Province,他的博士论文,1928)。

2.《西南联大考古博物馆汉墓藏品说明》(Notes on the Han Dynasty Grave Collection in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Museum of Archaeology,1930)。

3.《汉口发掘启动报告》(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1934)。

4.《四川省树神》(Tree Gods in Szechuan Province,1936)。

5.《四川省奇特习俗》(Some Strange Customs in Szechuan Province,1936)。

6.《四川苗族歌谣故事》(Songs and Stories of the Ch'uan Miao)。

7.《四川苗族习俗》(The Customs of the Ch'uan Miao,1937)。

8.《四川苗族礼仪》(The Ceremonies of the Ch'uan Miao,1937)。

9.《四川苗族语汇》(Vocabulary of the Ch'uan Miao,1938)。

10.《四川苗族的传说》(The Legends of the Ch'uan Miao,1938)。

11.《四川苗族歌謠和故事》(Tribal Songs and Tales of the Chuan Miao,1978)。

1952 年他的论文《中国西南部羌族的习俗和宗教研究》曾荣获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s)。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白鲁恂(Lucian Witmot Pye,1921—2008)出生于山西省汾州一个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家庭,1939 年就读于明尼苏达州卡尔顿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五军的文职官员身份返回中国,战后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56 年他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直接参与了该校政治学系和香港研究中心的重建,还先后执教于马来西亚和缅甸。学生时代他就开始探讨如何把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用于指导国际关系的分析,文化差异在第三世界政治现代化发展中的作用是他长期研究的课题之一,因此他被誉为政治文化概念最早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他曾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并揭示积淀在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底层中的积极和消极因素,以及影响亚洲权威和政治中的文化成分,表达了新一代西方学者对中国和亚洲政治文化的认识。他指出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土壤中不可能产生宪政和民主制度,但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包容着构建民主制度的动力;认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必须在内部有效整合过程中借助外力的激发。他的学术见解反映了他对亚洲和中国文化特点的深刻理解,他主张从文化、传统价值和心理等方面理解亚洲意识形态的特质,不相信普遍适用的政治发展模式。但是他对于权威依赖、文化优越和政治文化作用的过分强调在学术界也引起诸多争议。他积极倡导成立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比较政治委员会与中央情报局联系密切并接受资助,社科研究协会的多项比较政治研究成果一直是历届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冷战状态的终结,西方大国的霸权文化(cultural hegemony)逐渐被多极世界的多元文化所取代。美国学者认为,虽然文化的多样性可能引起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导致全球性的文化危机,但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基础是牢固的。

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艾恺(Guy Salvatore Allito)长期从事中华文化和梁漱溟(1893—1988)哲学思想的研究,从1973年到现在先后来华访问20余次。近年来他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变化,预测在今后20—30年内中国将面临贫富悬殊、城市化和环保方面的问题。他曾出版《最后一位儒家学者:梁漱溟与中国现代性的困境》(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1986)、《中国文化形成的要素及其特征》(The Essential Elements in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ir Special Features, 1995)和《21世纪的世界文化会演化成儒家文化吗?》(Will 21st Century Culture Evolve into A Confucianized Culture? 1996)等专著,在对现代化提出尖锐批评的同时也提出了解决弊端的办法。他在最近一次对采访的媒体记者说:"建立在儒家学说基础之上的中国文化强调伦理价值,极具变通性和包容性,能兼容各种各样的文化,其独一无二的优势是可以应对社会道德的滑坡,有希望成为21世纪人类的共同信仰。"①

198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姜士彬(David Johnson)、黎安友(Andrew J.Nathan, 1943—　)和罗友枝编撰的论文集《晚清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是由美国学术委员会中华文明研究会发起并资助的一个重要科研项目。全书456页,共分三部分:一、绪论:晚清文化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晚清的社交、阶级和思想意识;二、正文:乡间文化专家和文本;明清白话文学的不同层次读者;明清戏曲的社会和历史语境;地方戏及其观众;宗教与大众文化;明清教派文学《宝卷》的价值,晚清白莲教的传播;960—1960年间华南沿海的天后敬奉;流传圣旨中的语言和意识形态;大众文化之滥觞:晚清以降的期刊和小说;三、结论和展望。关于该书的编撰主旨,编者在《序言》中写道:

> 本书的宗旨之一是把非精英文化的研究引介到中国传统的学术主流之中。谁都无法相信仅仅研究知识阶层的特权文化就能了解中国,但是大部分文档源于此类文化,因此它过去和现在仍然得到了人数大大超越了历史学家的读者关注。对于精英文化的过分强调曾经导致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印象的严重扭

① Guy Salvatore Allito: *Chinese Culture can Ease Moral Crisis*. 2011.

曲，补救的唯一办法是认真并系统地去研究统治阶级掌控范围之外的世界。……大众文化涵盖了从国内建筑到世纪崇拜，从灌溉技术到皮影戏等种种事物。① 该书开拓了中国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内容丰富，视觉独特，赢得好评如潮。

芝加哥大学教授霍普金斯（Dwight Hopkins）在谈到中国文化时，曾语重心长地说道：

21 世纪的中国，有能力利用自身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帮助世界各国建造更加良好的关系，可能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因为除了经济以外，中国还可以给世界贡献四个核心的价值，这就是家庭、和谐、创造性地吸收和工作效率。如果世界能推崇这四个美德，那么 21 世纪的世界可能会享受更多的和平、繁荣并保持持续的发展。②

六、美国宏观视野中的中国政治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的政治学研究一般只聚焦于少数经济发达国家。欧洲除了英国和荷兰的少数汉学家外，其他各国认真关注并熟悉中国政治的学者人数并不多。战后美国学者对于“精英和宗派政治”（elite and faction politics）开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他们看来中国政治精英制定并执行各项法规和公共政策，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对于中国政治体系的运作发挥了关键作用。学者们普遍以对苏联体制的理解方式来认识中国，认为中国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官方意识形态直接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甚至深入到家庭和邻里关系之中。囿于当时区域研究的思维和资料的缺乏，美国学者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偏重于传统的史学分析和解读，方法上仅着眼于对事实的客观陈述，不失为学者风范。

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普遍受到国际汉学的转型、美国政界

① David Johnson et al.: *Preface to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② 霍普金斯：《中国文化贡献给世界的四个核心价值》，载《人民日报》2009 年 11 月 5 日。

和学界的关注焦点的重新定位、中国和国际重大政治事态的发展，以及汉学家个人研究目标和兴趣转移的影响。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如：东西方对峙的冷战（1945—1989）、朝鲜战争（1950—1953）、越南战争（1965—1975）和中苏两党论战（1959—1966），使美国的汉学研究带上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色彩，也使美国政界和学界体会到对当代中国政治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国际学术环境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学者的价值取向、选题范围和对于中国政治局势认识的深度。

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学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联合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于 1959 年成立了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将美国政府、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项目合并成当代中国研究并获得资助。美国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工作和研究生的教学主要集中于哈佛、哥伦比亚、密歇根、斯坦福和华盛顿等大学以及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参加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原来大都从事东亚或者政治学研究，其中有费正清、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白鲁恂、施乐伯（Robert Antony Scalapino，1919—2011）、亚历山大·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1915—1976）、鲍大可、乔治·泰勒（George Edward Tayler Jr，1905—2000）和约翰·林德贝克（John.M.Lindbeck）等。他们来自于不同的专业背景和领域，为适应新的研究选题和对象，都经历了观念和方法上的诸多转变。初期常常聚焦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上层决策人物，著述由描写性和解读性倾向逐渐转向分析性和理论性风格，后来理论性逐渐淡化，少数理论专著也只就事论事，强调其事实的准确性而非理论上的贴切。研究方法的改变，是因为在 20 世纪 50 年代所能搜集到的有限资料基础上以描述性和想象性的方式作出的分析往往与客观实际有一定的距离，深度自然受到限制。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培养了第一批美国中国政治研究专家，还出版了许多有战略价值的研究专著。

西方的汉学研究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语境中很难回避立场和观念的政治表述，时局要求美国学者重新评估自己所选课题的政治因素和研究方法。虽然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分别延续到 15—20 年之后，但是美国汉学家的政治研究人员毕竟还是从这一顿悟中获得了智慧的力量。

尽管当时美国的汉学研究生可以从接触到的中国官方文献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和数据撰写学位论文，但是中美关系的僵持状态影响了他们直

接进入中国社会。因此部分学生前往几所台北大学学习中文课程,或者到香港大学服务中心(University Service Center)短期进修,通过广播、媒体和与移民和观光客的访谈收集中国社会动态,阅读中共党史文献和剪报,涉猎台湾的情治报告以及日本的档案资料,一般不涉及当代中国文化、社会和政治理论的研究。香港大学学服务中心1963年建于九龙,20世纪80年代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基地。

然而,发展变化毕竟是社会生态新陈代谢的规律。20世纪60年代之后比较政治学在美国受到了推崇,非正式行为成了重要选题,假设验证中辅以理论分析和内涵揭示一时成为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时尚。凯文·奥布赖恩在《专业化时代的中国政治研究》一文中写道:

> 在美国学术界,有两种中国政治学研究倾向近期得到了强化。第一种不断发展的学科倾向主要为年轻学者所追捧,虽然就像任何政治学研究领域一样始终保持着活跃态势,但是它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融入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验证之中。第二种倾向是美国的中国政治学研究者通常喜欢通过比较小的选题,把自己的心得谨慎地与中国政治体制运作的大问题联系起来。他们不追求宏大叙事(Grand Statements),而是深揭其中奥秘,坚持在可能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方面作出实事求是的概括。这种学科选题专业化的结果,使研究者们在深入政治学研究中大大超越前辈学者,有更多实实在在的发现,但是他们并不拘泥于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广泛解读。①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两国学者之间的联系逐年增加。20世纪70年代许多美国学者随教育、文化和科技交流团来中国大陆访问,亲身体验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获得了无尽的灵感和最新的选题。1979年中美关系全面正常化后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再次提速。美国学者和研究生获准在中国进行相关领域研究,使得地区档案调阅、人物专访和田野调查成为可能。密歇根、哥伦比亚、哈佛和斯坦福等大学以及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先后扩大了有关中国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课程,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出现了

① Kevin J.O'Brien: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in an Age of Specialization*, 2010.

空前发达和繁荣的局面。密歇根大学因为培养出所罗门(Richard Solimon,1937—　)、奥克森伯格(Michel Charles Oksenberg,1938—2001)、艾伦·惠廷(Allen S.Whiting)和李侃如(Kenneth Guy Lieberthal,1943—　)等名人而被誉为美国中国政治和历史学研究家的摇篮。一些美国大学还为中国政治研究生增设了统计学、调研法、政治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等课程。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9)、改革开放(1978年至今)和"6·4"风波(1989)进一步激发了美国对于中国政治研究的积极性。美国的中国研究一度主要关注中国政坛的人事和政策变化,以及中国对外交往的动向。1975年前后美国出版了约20卷《红卫兵资料》,共1064种、10343页。许多美国学子和年轻学者被文化大革命这一研究课题所吸引,红卫兵的大字报、海报、信函和各类出版物披露了据信为中国政府和中共领导体系中许多不为人知的内情和秘闻。美国出版界还推出了各类当代中国政治文献资源研究指南,在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资助下召开了多次中国问题的专家会议,为年轻的中国政治研究人员展示自己的成果构筑了平台。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通过新理论新方法把汉学研究与比较政治学结合起来,开拓了新的领域。随着中美两国政界和学界交流互访增加,可接触到的资料和实例不断增多,学者们对于中国政治学研究日趋多元化,视野更加开阔,研究进一步与国家-社会关系、政治文化和大众政治行为的选题相结合。在他们详尽系统的调研中开始触及经济发展、工业化、环境保护、军事建制和安全政策中的政治问题,同时也关注具有政治理论导向意义的中国先锋文学。

这一时期美国学者有关中国政治调查报告中的意识形态内容逐渐淡化,分析比例增加,选题范围扩大,但是精英和党派政治继续受到关注。赞成改革与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作家和记者曾经建立俱乐部和沙龙,举办研讨会,出版诸如《自然辩证法》和《面向未来》等刊物,选登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1910—2003)、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oseph Arrow,1921—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西里尔·布莱克(Cyril Black,1920—1991)和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亚历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1920—2010)等学者著述的译文。熟悉西方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新一代中国学者的思潮引起了部分美国学者的关注,他们开始在自己

的研究和著述中选择有关中国领导层、政策制定、地方政治、乡镇企业和特区发展等方面的课题。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为美国中国政治研究生来华撰写论文提供了更多便利。山东邹平县被选为美国学者开展田野调查的基地,使他们有可能零距离考察中国。据统计自 1985 年以来先后有 200 多人次的美国学者到该县进行蹲点式社会研究,经费多半由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资助。尽管当时美国学界仍然沿袭此前阶段聚焦于中国高层领导、机构、政策和政治运动的研究路数,但是微观政治和政治经济改革的研究开始排上了日程。很多学术会议都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赞助下召开,研讨的主题聚焦于中国政治和经济改革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一时期有三个新的研究课题成了美国政治学者的首选:中国的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与共产主义国家体制;中央政府和 31 个省之间的行政机制和财政关系;列宁主义转型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美国学者对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的关注再次纳入了研究计划,以期推动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前景的更专业研究。① 这表明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方式有了较大变化。除了采用建制主义(institutionalism)或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分析方法,强调各种政治行动所受到的结构限制外,还关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国家建设、市民社会、市场发展与民主化等问题。美国的中国政治学研究者不再从前苏联学术研究中获取灵感,而是从欧洲学术传统中寻找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辩证模式。

2009 年 6 月号《中国政治学刊》刊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林恩·怀特题为《中国政治研究:该领域研究现状综述》的文章。作者认为近几十年来美国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者所关注的领域已经发生了变化。原因之一是大批中国学者和华裔学者的加盟,原因之二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学者们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基层信息。该文从"政治合法性"、"政治经济学"、"政治领导层"、"政治平等"和"政治科学"等角度来分析

① Richard Baum: *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 Watching: Perspectives from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Robert Ash, David Shaumbaugh & Seiichichiro Tagagi, chapter 7, pp.147-168, London: Routledge, 2007.

中国的政治现状。他引用了许慧文(Vivienne Shue)的著述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认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就是国家繁荣、社会经济福利提升以及领导人对普遍真理的掌握。作者还引用了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论证说:对中国的领导层而言,经济的繁荣是至关重要的政治合法性,虽然21世纪头10年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较中国出现了更多的反对派和抗议活动,但是他们的行为多半属于正统主义、反应性和利益驱动的性质,而不是革命性、主动性和理想主义的范畴。社会批评常常因为不满基层官员对民众工作、工资、土地和家庭生活等方面权利的被剥夺,却很少提出其他要求,也不是针对高层领导者。关于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者认为通货膨胀与调整以及腐败与繁荣并存的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需要从政治上作出解读的一种综合症。越来越严重的低效率与非货币化成本对政治产生了影响。虽然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有利于中国的改革繁荣,但是严重的水、空气和土壤污染却滋生了新的政治问题。作者还通过引述玛丽·加拉格尔(Mary Gallagher)的观点指出,全球贸易和投资使中国劳工的民主化之路更不平坦,全球化必然延缓民主化。关于中国领导层,作者认为:在经济和技术领域中官员常常作出使自身受益的决定,在没有干扰时也能作出有利于民众的决定。各地方之间缺少政策上的连贯性是个人主义政治的必然结果。①

关于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前景,作者写道:1959年美国学术团体协会联合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和福特基金会组成了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使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变得比以前成熟。20世纪90年代,除了一些美国学者所做的个案研究外还出现了中国和美国机构倡导的合作研究。对于台湾的政治研究中美两国学者也开展了一些合作项目,主要聚焦于台湾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问题,推出了相当一批研究成果。各类高校专业(包括语言、历史、经济和文化专业)和刊物是维持西方高质量中国研究的支柱机构,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南京大学共同创办的语言学习项目、斯坦福大学与台湾大学联合创办的研究生语言学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数据库等。中国政治研究学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组织的研讨会轮流在美国和中国的大学召开,吸引了许多

① Lynn T. White: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Overview of the State of the Filed*, in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ume 14, Issue 3, pp. 229-251, 2009.

资深学者参加。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中国各地经验丰富的政治学家的参与拓宽了访谈、调查和文献资料收集的范围。中国政治研究客观上有助于西方的学术传承。未来的发展必定进一步丰富美国的政治科学,研究的需要还将催生更多新的研究方法。

中国政治文化是美国汉学家的政治研究拓展领域。社会成员经历的客观政治过程,包括政治认知、信念、感情、态度和价值观,以及他们对于政治性质和功能的理解,参与政治的热情,对待公共权威的态度,评测政府政策的价值标准,内心遵循的行为准则,共同构成了属于主观价值范畴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

"政治文化"是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概念,但是学者们认为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 B.C.)就曾经专门研究过政治革命和变迁中的心理文化因素。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1911—2002)发表的论文《比较政治体系》(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首次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他认为政治发展就是在社会经济现代化环境中发生的一系列相关的政治系统、过程和政策的变化。政治现代化的标志是文化现代化(如人们的参政愿望增强)和结构分化(如专门化的结构和角色的出现)。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源于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反过来说,政治发展也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动因。此后"政治文化"逐渐替换了传统政治学中的"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等术语。60年代以后政治文化成为美国政治学者研究的重要选题。问卷调查、访谈和数据分析等实证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文化研究之中,世界各国的政治学专家开始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中国政治学界的相关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

学者们认为,国际汉学研究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作为选题的理由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作用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不能用西方术语来解读中国,只有参照中国文化才能准确理解中国政治。传统上西方学者经常以文化为切入点来研究中国,中国政治话语也经常围绕着传统文化展开。这种研究与政治学中以科学方法为导向是一致的,体现了政治文化的现代理论特征,使之成为世界汉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在众多饱受青睐的现代学科中传统文化的优越地位可能已经风光不再,中国文化自当不属例外,但是在理论界学者们仍然坚持"不重视中国文化就无法正确理解中国政治"的观点。

2009年6月号《中国政治学刊》还发表了印第安纳圣母大学政治学教授穆磐石(Peter R.Moody)的《政治文化与中国政治研究》,文中引述了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之三部曲》(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A Tri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年)中的一段经典分析:

> 按照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接受的官方观点,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从此中国被强行纳入了世界体系。中国在历史上的某几个阶段曾经很软弱,处于他人统治之下。但是以前的那些征服者们只是按照中国的方式统治中国,接受中国的帝国制度和儒家学说。那些西方入侵者并没有征服这个国家,而只是让中国屈服于他们的意志……西方人对于这一过程的一种有影响的解释回溯了这一进退两难的进程:中国被拉进一个新的国际环境,而要适应这种新环境只有放弃现在的更高的文化。然而,文化是价值的标准和源泉;所以激进的文化变革将无法维护任何值得维护的东西。如果换成另一种文化传统,中国会赢得世界,但代价是失去其灵魂。随着中国国力日益衰弱,年轻一代开始把这种宝贵的文化看作是问题所在,对这种文化越来越敌视,认为只有放弃它才能挽救国家。①

美国是最早关注并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西方国家之一。白宫的政策制定者、思想库的中国问题专家和美国汉学界的学者们对于新中国历史上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是全面、及时和深刻的,所投入的人力之多和物力之巨也是空前的。原因之一是当时世界形势正处于由两极争霸转向多极并存的过度阶段前夕,美国政客从中苏两党的争论中敏感地发现了共产主义阵营面临的危机。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群众大字报和红卫兵的各类出版物暴露了许多虽然未经证实但确是闻所未闻的机密,直接涉及中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组织结构和重大决策,以及中国的今后的发展方向。再者,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年轻一代的造反精神对于欧美

---

① Peter R. Moody: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in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ume 14, Issue 3, pp. 253-274, 2009.引文转自《政治文化与中国政治研究》(郭虹霞译)。

社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学子们抵制征兵入伍和传统授课与考试制度的新闻不时从媒体传出。美国研究者对于所谓的中国“精英和宗派政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预感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可能出现重大变故。更具体一点是，当时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无法自拔，五角大楼的东亚事务官员担心文革的爆发有可能导致中国出兵越南，美国将重复20世纪50年代初在朝鲜半岛上那样的“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跟错误对象打一场错误的战争。”因此，直接关系到中国政治、文化、历史、经济、教育和军事的中国文革，很快就成为美国汉学研究的新领域和中西方关系的首选课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官员向总统特别助理提交的有关中国形势分析的备忘录，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发给国务院有关中国动态的传真和电报，中央情报局通过对各国驻港领馆外交人员和过境观光客的访谈收集到的中国情报，都有利于对中国政治现状的分析和评估。兰德公司对中国政治、经济、中苏关系和工农业生产先后写出了调研报告。许多有影响力的中国通和汉学家也纷纷发表文章，其中有：兰德公司顾问鲍姆（Richard Dennis Baum）和白鲁恂、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1930—）、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研究员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学院院长何汉理（Harry Harding，1946—　）以及中国史教授迈克尔（Franz Henry Michael）和托马斯·鲁宾逊（Thomas W. Robinson）、波士顿大学的中国史教授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美国家安全国委员会的刘易斯（John Wilson Lewis）和李侃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奥克森伯格、密歇根大学教授所罗门等。直至40多年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政界仍不忘联手汉学界，采用文档研究和口传历史（oral history）形式意欲对中国“文化大革命”选题进行重新发酵，该项目的重要政治含量由此可见一斑。

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领域，包括对民主化与现代化、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和农村基层选举等方面问题。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以及共产党内民主的讨论与实践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社会资本的走向和国家政策的制定、改革大潮中的劳资关系、市场转型中的腐败、边疆地区的民族主义问题、社会动员与公民抗争、国家对社会变迁的反应及应对方式等都是热门的考察选题。美国学者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进行政治变革，使自身较好地适应时局变化，具有持久的稳定性和协调性。美国学者尝试把统计学中

的量化分析手段用于自己的汉学研究之中。此外，经济学的制度主义理论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引介也扩展了他们的视野，比较政治学的再度兴起继续推动着美国当汉学研究的发展。

七、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三大美国流派

许多美国汉学家研究中国经济或者与中国经济有关的专题，因为经济关系到国计民生，是国家状况的晴雨表。

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是最早关注并考察中国商务和经济状况的美国学者之一。1874 年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华，考入了中国海关，经过上海三年汉语学习先后任职于北京总税务司、同文馆、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河内战俘交换所和李鸿章招商局，还担任过上海、北海和淡水副税务司，龙州、汉口、广州和上海税务司，有机会直接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接触大量经济信息和资料。他署理淡水海关税务司期间见证了甲午战争爆发后当地人民的反应，耳闻目睹台湾军民反抗日军侵略的运动。他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往来书信是研究当时中国物流和外贸的珍贵资料。1904 年他出任海关总署上海造册处（Statistical Department）税务司，从平日经手的大量表册和统计报告中了解到侨汇在中国财政金融中的重要作用，对如何保持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提出过许多独到的见解，还指导过费正清撰写有关中国海关史的博士论文。1907 年马士曾在上海接待来华访问的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此后彼此过从甚密。塔夫脱担任第 27 任美国总统期间力荐马士出任驻华公使，但是他却以健康原因婉谢。

雷麦（Charles Frederick Remer，1889—1972）也是早期研究中国外贸的一位美国学者。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一度任职于菲律宾教育局。1912—1915 年他作为经济学讲师任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7 年晋升为经济学教授。1924—1928 年他被马萨诸塞州威廉斯学院聘任为经济学教授，1928—1959 年执教于密歇根大学。在此期间他还在纽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持一项有关中国国际经贸关系的研究（1928—1931），先后担任信息协调事务所远东部主任（1941—1942）和战略服务部远东处处长（1942—1944），受聘于美国国务院任远东投资金融顾问（1944—1945）。他的主要著述和参编的教材有：

《中国对外贸易》(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Shanghai, 1926)。

《美国对华投资》(American Investments in China, Honolulu, 1929)。

《外国对华投资》(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New York, 1933)。

《中国经济学读物》(Readings in Economics for China, 1922)。

《中国抵制外货及其经济效益之研究》(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Effectiveness, 1933)。

卜凯(John Lossing Buck, 1890—1975)1914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1916年到达安徽淮北传教,1920年受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芮斯纳(John Henry Reisner)的邀请到该学院执教。他先后开设了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学、农场经营和农场工程等课程,据说他的案头常用的一部参考书是1913年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教授华伦(George Warren)就如何经营300英亩规模的标准家庭农场所编写的《农场经营》。1922年卜凯组织学生对安徽芜湖102个农户经济展开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1922—1924年他把调查范围扩大到7省17个地区的2866家农户,1929—1933年又以《土地使用》为专题对中国22省168个地区的16786家农户进行了调查。虽然这些项目的实施主要得益于来自中国各地学生的协助,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能如此井井有条地开展田野调查实属难能可贵。他经过分析比较得出了这样的的结论:华北农村自耕农约占农业人口总数的80%,长江流域则为60%,四川和广东自耕农的比例较少,约为50%左右,各户土地拥有数平均为3.1亩。据此他认为中国是由小自耕农构成的社会,土地分配并没有特别不均,佃农率与剥削和农业发展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1924年卜凯回到康乃尔,获得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再次来华。他从投资、管理和收成等角度分析中国的农村经济,认为中国近代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技术落后,解决的办法就是改善农业经营方式,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为此他曾向国民政府提出了108条改进农业经济的建议,包括建立农村金融机构、使用良种和化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他觉得自己作为一名中国农业经济学家,责任仅仅是揭示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的观点被学术界称为美国研究中国农业经济问题学者中的"技术学派"。20世纪30年代他出版了《中国农场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和《中国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7)等专著,被视为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早期美国权威学者之一。

冷战期间，美国政府根据战略需要鼓励学者和汉学家研究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问题。1959 年根据美国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1915—1976）的建议，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America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与美国学术团体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下设中国经济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Economy of China），由福特基金会拨专款资助，哥伦比亚大学俄裔经济学教授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1901—1985）出任主席。① 1961 年该委员会成立，主要成员有加林森、伯格森（Abram Bergson，1914—　）、艾克斯坦、刘大中（Ta-Chung Liu）和蒋硕杰，美籍华人学者叶孔嘉（Kung-Chia Yeh）、郑竹园（Chu-yuan Cheng，1927—　）、陈遵润（Nal-ruenn Chen）、赵冈（Kang Chao）和吴元黎（Yuan-li Wu）等也参与了研究工作。

中美正式建交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美国学者可以直接来华进行田野调查，与中国同道交换研究成果或者开展合作研究，吸收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大学学习或者参与研究所的研究，通过个人网络交换信息。中国定期和不定期发表的各类经济信息和数据，特别是有关人口统计（demography）、家庭收支、企业、研究所和外贸的收益，有助于美国经济学家对中国收入分配、工业改革、贸易发展的预测和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美国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经济和经济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帕金斯（Dwight H. Perkins）的《1936—1968 年中国的农业发展》（Agriculture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

帕金斯与赛义德·约瑟夫合写的《中国的农村发展》（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pub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University Press，1984）、《中国是下一个亚洲经济大国吗?》（China，Asia's Next Economic Giant?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6 年）；

罗斯基（Thomas G.Rawski）的《中国向工业化的过渡：20 世纪的制造商与经济发展》（China's Transition to Industrialism：Producer Goo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Dawson Publishing，Folkestone，1980）、《中国战前的经济发展》（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① Thomas G. Rawski：*North American Studies of China's Economy*，University of Pittsburgh，version of 14 June. 2009.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中国经济历史前景》(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罗斯基与洛伦·勃兰特(Loren Brandt)合编的《中国的伟大经济变革》(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年)。

随着中国市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进一步密切,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越来越多的非汉学和非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美国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成立于1920年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03年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该局的官方网站已经成为研讨中国经济的学术平台,刊登文章的作者除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研究者外,也有世界各类经济机构的专家和其他国家大学的教授。他们主要关注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人民币升值、汇率制度、企业税收、外国投资和农村经济等问题。多数学者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模式进行实证性研究,通过理论假设、模式构建、数据验证和定性定量分析手段对中国的经济现状进行探讨和分析。

中国经济的可观增长和丰富的学术资源对于美国中国通以外的不少经济学家有极大的吸引力。例如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教授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 1916—2001)和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列昂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 1917—2008)都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研究有浓厚兴趣。

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巨大变化也是美国经济研究者关注的内容。从土地改革、集体化、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农产品市场竞争、产量、产值和结构性的变化,都是许多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学者经常思考的问题。在帕金斯等人编撰的论文集中涉及中国人民公社的作用、1959年的经济困难、分田到户、中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等问题。

美国研究中国当代经济状况的主要部门有:美国中国经济委员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arch)、国防大学下属的国家战略研究所(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ategic Studies)、贸易与制造价格研究所(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 Research)。美国的许多大学先后开设了中国经济课程,密执安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加利

福尼亚大学等50多所高等学府相继设立了亚洲研究中心或中国研究中心，这些研究基地加速了美国的中国经济研究。学者们常常组织课堂讨论或不同规模的专题研讨会，搜集并整理1949年以前分散零碎的中国经济资料，以及1981年《中国统计年鉴》出版以前为数不多出版物中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统计数字，重构中国的经济平面图，为美国的中国经济学家提供研究数据，也为美国政府提供制定对华政策的理论依据。

学术界认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美国学者可分为质疑、乐观和实证三大派别。

质疑派则认为中国早期的经济发展实际上低于官方公布的数字，1949年以后的产值几乎没有提高。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低效率和浪费的情况严重。目前中国的经济改革超前于政治改革，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突破了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引来了国外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冲击了传统观念，造成了价值体系混乱和多元化。美国贸易与制造政策研究所所长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E.Scott)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1年的8400万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2.78亿美元，使得美国279多万就业岗位丧失或者被替换，相当于这一时期2%的就业人数。"

乐观派充分肯定中国改革之前的经济成绩，认为中国共产党实施的集体化政策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经济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说："我研究中国经济已有三十几年了，可以说我一直都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预计中国经济会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保持30年，但是事实上中国实际的表现比这更好，所以中国崛起的速度比我们想象得更快。"①

实证派(Positivists)拒绝先验和形而上学的思辨，坚信对中国科学考察和对事实探求的必要性。他们充分肯定中国的经济发展，认为新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等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在解决通货膨胀、就业和收入不平等问题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认为，中国的成功符合

① 贾立芳：《美国学者看中国经济》，载《河北青年报》2010年8月30日。

美国利益，成功的中国将拥有一个相对开放的经济体和相对开放的社会，成为国际舞台上富有活力和建设性的成员。①

八、美国汉学与社会学的美满联姻

早期美国汉学研究采用的基本上是欧洲模式，除了欧洲移民学者的学术影响外，更直接的因素可以追溯到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夏德、劳费尔、卡鲁斯（Paul Carus，1852—1919）、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和戴闻达（Jan J.L.Duyvendak，1889—1954）等欧洲学者在美国大学执教时的理论导向。他们从历史学和语言学角度切入包括宗教、哲学、文学和民俗在内的中国文化，虽然带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但是主体还是微观个案的人文学科研究，对于中国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触及甚少。

随着汉学研究的深入，许多美国学者认识到以孤立或静态的目光来考察中华文化，特别是历史、儒学和道教等方面的中国学问是不够的。从非专业角度看似乎已经固化的中华文化就像博物馆的文物，但是以现代学术的眼光来考察，中国文化却充满活力，还在继续发展，并且跟现实生活和国际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思维和方法而言，宏观与微观并举，单科与多科兼顾，理论与史实结合，动态与静态互补，是现代科学研究的潮流。跨文化、跨学科、跨领域的运作可以进入多层次和多视角的评价与审美。汉学研究中的“科际整合”主要体现在社会科学化的文本处理和解读中的多科思维。

1936 年费正清执教于哈佛大学时提出了扩大汉学研究范围的主张，强调把重点由中国古代史转向近现代史，由历史、宗教、哲学和语言等学科扩大到更多的人文和社会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由重考据、重训诂、重辨伪、重校勘转变到多元化的综合分析和论证。

伦敦大学历史教授巴雷特（Timothy Hugh Barrett）在《不思进取，不可思议：汉学书籍和英国学者往事综述》一文中说：

---

① Robert E.Scott：*Growing U.S.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cost 2.8 million jobs between 2001 and 2010.*

> 费正清认为，汉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以先孕后婚的方式（shotgun wedding）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不过，不管这种延误多么不应该，结合多么勉强，它在美国出现的时间却比任何地方都更早一些。以巴黎为基地的汉学过去美国人想拼命超越，结果，与社会学家理论上更为大胆的方法相比较却显得非常浅薄。费正清本人曾用这些话对巴黎汉学的渊源关系进行了描述："建筑学术大厦的资料砖块的积累（至少也是知识的堆砌）形成了微观汉学传统（tradition of micro-sinology），它汲取的只是考证学传统（为文本事实而事实）的营养。"①

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并对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则进行分析和概括的一门科学。社会学的理念和逻辑萌发于学科基础形成之前，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孕育于19世纪中叶。1789—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8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加速了西方社会的转型，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了迅猛发展，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和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不断暴露出人际之间的矛盾和观念上混乱的过程中，社会学提供了一个解释工业化、城市化和世俗化等现代性问题的全新理论框架，给力于对社会理性化的理解和反思。

19世纪的美国社会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875年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1840—1910）率先在耶鲁大学开设了社会学课程，1887年弗兰克·威尔逊·布莱克默（Frank Wilson Blackmar，1854—1931）被堪萨斯大学聘任为历史学和社会学教授，10年后被聘任为该校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教授，1907年出版了专著《社会学要素》（Elements of Sociology），提出了"扩散、社会习俗和民族中心"（diffusion, folkways and ethnocentrism）的理论。1892年阿尔比恩·伍德伯里·斯莫尔（Albion Woodbury Small，1854—1926）在芝加哥大学创建了社会学系，三年后创办了《美国社会学学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致力于理论建设和开创性工作，接受人类学、统计学、经济学、教育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专业学者的投稿，旨在为社会学领域的发展铺路搭桥。1905年以莱斯特·弗兰克·沃德（Lester Frank Ward，1841—1913）为主席的美国社会学

① T.H.Barrett：*Singgular Listlessness*，London：Wellsweep. 1989.

社（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后改名为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正式成立，成为当时北美规模最大的社会学研究者学会。

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30 年代社会学在欧洲大陆学术界风靡一时，逐渐确立了学科研究的范围和方法。原来倾向于专门化的学者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社会学科的研究，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不同的学术背景导致了他们在认识论、方法论和研究架构方面的分歧。

社会学研究广及各类微观社会行为和宏观社会系统，与其他相关学科结合后便形成了诸如社会地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军事学、社会生物学、历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民族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等新型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实践导向更为明确。在汉学与社会学联姻的历史语境中，汉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心逐渐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出版的《中国乡村生活：一项社会学研究》（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1899 年）记录了他在山东长时间社会考察的所见所闻。他认为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组成部分值得社会学家特别的关注，只有通过乡村研究才能了解“真实的中国”。该书共 27 章，内容包括：中国乡村的结构、名称、道路、渡口、水井、商店、戏班、学堂、寺庙、集市、各类人物、乡村生活、宗教仪式、庄稼看护、婚礼和葬礼、狩猎和集会以及村民家庭等，并附有关风景名胜和民俗民风照片 30 张。农家院子里的纺纱机、农具、篮子和家具，看似平常，却是作者用心良苦所拍摄。一张泰山的远景照片，告诉读者当年朝圣拜佛香客行山会和坐山会的故事。虽然这些文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考证，但是作者综合使用了田野调查、访谈、历史分析、人口统计和人类学理论，赋予了该书重要的史料价值，使之成为汉学领域中的一部不可多得的社会学研究专著。

美国浸礼会传教士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1888—?）1913 年来华，是较早进入中国村落进行社会学和人类学调查的美国学者之一。1918—1919 年他带领上海沪江大学的学生在广东凤凰村进行社会学家庭调查，1925 年出版了英文著作《华南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Vol.I.Phenix Village，Kwangtung，China，1925）。他坚信要真正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不能依靠抽象的资料，而要深入群体、村落或地区，以“有机的方式”（organic way）对其进行描述，揭示事实之间的关系及其功能、过程和发展趋势。他的研究方

法明显受到英国社会学家斯潘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和俄国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1887—1939)的影响。该书详细记录并分析了凤凰村的经济、婚姻、家庭、宗教、人口和社区组织的情况,他的描述和分析建立在科学的规范之上,学术价值高于当时的一般新闻报道和传教士的著述。他的研究对汉学人类学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许多汉学人类学家从中吸取了营养,他的个案研究方法也曾被许多学者所借鉴。

1949—1950年美国汉学家施坚雅(George William Skinner,1925—2008)在成都进行了人类学调查。1964年他出版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4, No. 1, pp. 3—43, 1964年)收录了他在《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的相关调查报告。全书共分三部分八节,通过对1949—1964年中国农村传统市场的分析,归纳出三种集市形式和安排规则,对作为经济、文化和社会体系的市场进行了结构分析和理论概括。

施坚雅认为,早先学者研究中国乡村社会时几乎都聚焦于自然村落,其实中国农民生活的自给自足社区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根据西方地理中心理论,农民在基层市场社区的共同体中过日子,恋爱结婚,组织互助会,种地收割。他们自由进入既是商品和劳务来源又是农产品交换和消费的市场。商贩们集买卖人和信息传递者于一身,层次毗连的居民点由基层集镇、中间集镇和中心集镇所连接,乡绅则通过多种渠道对集镇实施社会控制。

作者认为:在集市的排列上,农民的消费需求决定了农村集市的周期。黄河流域农村早先每旬一集,西南部则每12天一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市场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每旬或者每12天的集日增至两次。一个基层市场以基层集镇为中心,涵盖的村庄数目均值为18(内环6个,外环12个)。一个基层市场从属于两三个中间市场,一个中间市场又连接两三个中心市场,如此形成了六边形的结构。作者从史籍中了解到19世纪90年代广东省的村庄与市场的数量比例为19∶6,与四川和浙江等地的自然村落与市场比例非常接近。根据六边形理论推算,地处有利位置的基层市场随时可能升格为中间市场,中间市场不仅覆盖了原有基层市场的地盘,还可以覆盖相邻的六个基层市场的部分地盘。作者揭示了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并据此制作出模型,用于解释中国村落增长与市场变化之间的

各种复杂关系，这就是所谓的“施坚雅模式”（Skinerian Model）。

其他美国学者的同类研究还有1966年韩丁（William Hoard Hinton，1919—2004）出版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Fanshen*：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Monthly Review Press，1966）。作者曾在晋冀鲁豫北方大学任英语教员，从1948年3月6日至8月22日以观察员身份到山西长治潞城县张庄对当时轰轰烈烈开展的土地改革进行了考察。他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吃苞谷喝面疙瘩汤，参加群众大会，很快成了他们的朋友。村民们愿意把家中和村里的秘密、严肃、荒唐和高兴的事情都告诉他。他亲眼看到土地改革给人们的思想和精神带来的巨大变化，感受到世代受经济剥削和文化压迫的农民如何获得翻身解放。作者在书中的《序言》中说：“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兼用了小说家、新闻记者、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的笔法。”与其说作者撰写的是一部调查报告，不如说更像是一部历史纪实。

1984年10月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来华进修委员会主席迈克·奥克森伯格根据中美双方“互派留学生和学者”的协议，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协助在中国的农村选一个长期调查点，接待美国学者来华进行连续性的社会调查研究，目的是通过多学科综合性微观考察研究，了解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发展，预测中国发展的未来，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研究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向18个省市征询了选点意见，经过多次考察，最后选定山东省邹平县以冯家村为基地的9个村镇作为美国学者的调查研究基地。该县位于山东省的中部，历史悠久，曾发掘出“丁公村龙山文化陶书”，从宋代以后的1000多年来社会秩序稳定，自然条件优越。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看，该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既不属于中国经济的发达地区，也不属于落后地区。

在美国梅隆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的赞助下，1987—1991年美国学者先后有87人次在邹平县进行了1487天次的跟踪式考察研究。他们的考察范围涉及到邹平县的9个乡镇、16个村和69个县直部门，接触各级各类调查对象17500多人次，其中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6岁。在此期间专家学者还在当地查阅了大量档案文献，并开展了问卷调查工作。

美国考察项目专家组的成员中有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

学家、环境学家、农业学家等，大多数人都是“中国通”。尽管他们的专业不同，经历迥异，与当地人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也不相同，但是在邹平的调查研究都非常顺利，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

美国学者在邹平的主要研究课题有：

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教授的《中国农业改革对农村体制的影响》。

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史泰丽（Terry Sicular）的《中国农村商业计划和市场》。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的《邹平 1911—1996：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和《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

北卡罗来纳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冯姝娣（Judith Farquhar）的《中医与家庭卫生保健》。

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戴慕珍（Jean Oi）的《改革中的农村经济：中国农村的计划与市场》、《财政体制、地方官员在发展乡镇企业中的作用以及乡镇企业在地方经济中的地位》和《现代中国的国家和农民》。

密歇根大学大湖研究中心教授章以本（William Chang）的《农业发展对农村环境的影响》、《工业、农业的发展对土壤和水质的影响》和《中国的环境政策》。

依阿华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黄树民（Huang Shumin）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医疗》和《传统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健康与医疗》。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莱斯特·罗斯（Lester Ross）的《司法行政、公共设施需求和环境保护》与《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公共商品》和《从山东邹平县案例看改变中的中国农村纠纷排解工作》。

密执安州立大学教授彭恩霖（Lynn Paine）的《教育的分配及社会化过程》。

北卡罗来纳大学医药学院助理教授亨德森（Gail Henderson）的《流行病学、医疗卫生服务组织和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的利用情况》与《邹平县居民的健康状况和健康设施的利用》和《中国人变得越发健康——中国保健制度是第三世界的典范》。

1988 年奥克森伯格在《走向世界》杂志撰写了《美国学者在邹平的社会研究》一文，1991 年 4 月还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在外交上干得很漂亮》的文章。

回国后他们利用听证会、演讲会、发表文章和演讲等形式，介绍考察研究的成果，先后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20多篇，出版专著4部，发表演讲20多次。

1991年研究项目即将结束时，奥克森伯格提出希望美国学者在邹平县的考察研究能继续延长5—15年。史泰丽、戴慕珍、亨德森、冯姝娣、傅静等美国学者也先后提出继续他们在邹平的考察研究的请求。邹平县同意了他们的请求。①

九、作为美国汉学家感知中国桥梁的汉语语言学

19世纪上半叶第一批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海员和观光客，通过临时学会的简单汉语口语与中国港口城市的民众接触，观察所到之处的生活、习俗、建筑和市容，进而了解中华文化、历史、宗教、地理和社会，用书信、笔记、报告和图片告诉国内亲友和派遣部门自己的所见所闻。这其中有他们的观感、印象、评论和记录，就是后来形成汉学研究的原始形态。

随着美国新教传教士在华传教规模和范围的扩大，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和国情等领域的研究逐渐广泛和深入。中国的语言文字（包括文言文、白话文、口语、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是早期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和学者感知中国的桥梁和工具。闭国锁关的清政府一度不允许洋人学习汉语，在书肆买不到可供他们使用的专业辞典和课本，也没有能为他们提供服务的职业通译，为了深入传教社区或者调查对象，那些西洋人只能向中国居民一个词一个词地请教，一句话一句话地记录，日积月累后才能编写出自己所需的双语辞典和或者对话手册。语言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艰苦过程，但是也是传教士广交朋友和了解中国社会的方式。

1830年到广州的裨治文是第一位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通晓汉语和中国文化，长期从事办报、译经和外交工作。1832年他创办了《中国丛报》，自任主笔。1847年他奉调上海，与克陛存等人合作翻译圣经。他编写的《广州方言撮要》（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1841在澳门印刷，大32开本，绪论36页，正文698页。词汇按照类型分为：人体、人物、家庭、商务、机械、建筑、农业、数学、地理、矿物、植物、动物、医药

① 王兆成：《乡土中国的变迁》，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和政事等。书中有英文、中文和粤语拼音对照，每页附脚注。该书的出版旨在帮助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快速学习汉语，并向他们提供日常交际用的单词和短语。

卫三畏也是一位在汉语研究和翻译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传教士。1833年10月25日他抵达广州，先后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的秘书和通译，还九次代理美国驻华公使，长期致力于译介中国传统文化，他的代表作《中国总论》奠定了他在美国汉学界的地位。他刚到广州时裨治文曾经辅导他学习汉语，后来卫三畏请来了一位当地家庭教师。1835年中英鸦片贸易发生了摩擦，他的家教悄然离职。那年圣诞节后卫三畏随美部会的印刷所从广州迁往澳门，利用东印度公司的汉字铅字印刷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编写的《福建方言字典》（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一直到1837年才完成。工作虽然艰难，却使他的汉语水平很快得到了提高。为了帮助来华西方人学习汉语，卫三畏在华期间编著了《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1842年澳门出版）、《英华韵府历阶》（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1844年澳门香山书院出版）、《英华分韵撮要》（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1849年出版）和《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Wu-Fang Yuen Yin，with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aracters as heard in Peking，Canton，Amoy，and Shanghai，1874年）等教材、字典和词汇分类手册，成为神职人员学习汉语的必备工具。

美以美会传教士怀特（Moses Clark White，1819—1900）出生在美国纽约州奥奈达，1842—1845年就读于韦斯利安学校，毕业后在耶鲁大学学习医学和神学两年，1847年9月他和妻子到福州传教。到传教站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请两位当地教师，每天花数小时轮流向他们学习汉字和福州话。传教之余他还经常深入城乡，通过与信徒交谈学习口语，了解当地风俗人情。当时教会已有文言文版圣经，但是普通市民看不懂。1851年怀特用汉字的福州话读音来标注浅文白的《马太福音》，取得了意外的效果。这是最早一部福州话圣经读本，也是美国传教士早期同类研究中的典范。在福州他开办了一所教会学校，教学也成了他学习汉语的一种方式。1856年7月他还为懂英语的传教士出版了福州方言教材《福州的中国话》（The Chinese Language Spoken at Fuh Chau），内容包括语音、语法和

常用词语。书中的语音部分参照《戚林八音》①对相关声母和韵母作出了说明。最可贵之处是他对单字的发音、声调、变调以及不同人群的口音差异都做出了深入浅出的解释,其开创性的贡献为学界所公认。

摩嘉立(Caleb Cook Baldwin,又译"摩怜",1820—1911)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布鲁姆菲尔德,读完中学后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研修神学课程。1848 年被按立为牧师后他携妻子到福州美以美教会担任神职工作。1870 年他与麦利和(Robert Samuel Maclay,1824—1907)联手编著了《福州方言拼音字典》(The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Foochow Dialect,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Press),在参照《戚林八音》和怀特创制的福州话拉丁字母拼写系统基础上编排各条目的汉字,下注发音。用英文释义后列出相关常用词语,辅以英文翻译。方言词语只给音标,但凡能写出汉字的都加脚注。该字典共收录 928 个福州话音节,可写出汉字的条目 8311 条,写不出汉字的有 1242 条,附在各条目下的词语共三万余条。该字典经 1897 年和 1929 年两次修订再版后更呈完善,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福州话的一部必备工具书。1871 年他们又出版了《榕腔初学撮要》(The Manual of the Foochow Dialect,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Press),后来摩嘉立还与妻子合作翻译了福州方言版的圣经,并且编撰了传教手册《圣学问答》(Catechism of Christian Doctrine)。

对于汉语和汉语方言研究作出了贡献的美国传教士还有晏玛太(Mathew Tyson Yates,1819—1999)。1846 年他携妻子到达上海南市区传教,慢慢地打开了局面。1853 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晏玛太曾经帮助被俘的苏松太道兼江海关监督吴健彰(约 1815—1870)出逃,使他得以在上海租界重振旗鼓。小刀会失败后吴健彰帮助晏玛太修复教堂,作为回报。有了地方当局的靠山,教会发展迅速。1868—1869 年晏玛太被委任为上海工部局董事,还一度担任美国驻沪领事馆副领事,同时经营房地产。他编写的教材《中西译语妙法》(First Lessons in Chinese)1871 年由上海华美书馆(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主要用于帮助来华传教士学习上海话。该书采用了联合罗马字标音系统(The Union System of

① 《戚林八音》是著名的福州地方韵书,由明代嘉靖的《戚参将八音字义便览》与清代康熙的《太史林碧山先生珠玉同声》二部韵书合订而成。福州人晋安在乾隆十四年(1749 年)编辑该书过程中设计了一套拼读福州话的拉丁字母方案。

Romanization)拼读上海话,并参照英语语法将上海话的词汇分成9类:名词(包括时间词)、动词、数词、代词(包括人称代词、疑问代词、指示代词和不定代词)、形容词、量词、副词、介词和连词。对于每一类词的介绍都提供了代表性的例词、语段或者句子。在动词部分他还介绍了时态(tenses)和语气(moods),例如:我吃(现在时)、我吃哉(完成时)、我要吃(将来时)、我是吃个(表强调)。他认为上海话有五种语气:陈述(indicative)、可能(potential)、虚拟(subjunctive)、祈使(imperative)和不定(infinitive)。这样的介绍对于初学上海话的英美读者很有针对性,更具实用性。晏玛太长期生活在上海老城区,他在书中提供的语料是研究上海土白的珍贵历史资料。

美部会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0)1850年来华。他主张神职人员应该尽快掌握传教对象国的语言,因此他到福州第二天便开始学习汉语,不到半年时间就能用福州话主持宗教仪式。他先后创办了格致中学和文山女中,出版了第一部系统介绍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著作《中国人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1872年他根据自己20多年研究成果写出的《英华萃林韵府》(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正式出版。与当时同类专著不同之处是,他高瞻远瞩地以在华侨居的外国人、学习英语的中国人和世界各国学习中文的学生为读者对象,并且按照北方官话语音系统标音,因此使该书的适用范围得以扩大,读者人数也随之增加。根据南方方言区读者的需要,书中还附录了南方方言注音表。出于人性化考虑,他在长达521页的附录中还收录了中国各地商业贸易资讯、规章制度;有关医学、化学、法学、农学、物理学、机械学、矿业学、地质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和航海学等方面的词汇、方言与谚语;中国历史年表;以及有关儒教、佛教和道教常识,为该书增加了浓厚的百科全书色彩。

1891年出版的《英华福州方言辞典》(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作者亚当(T.B.Adam),全书320页。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列英文检索单词9000个,不分词性、音节和语用差别都用拼音列出相应的福州话翻译,然后提供相关的搭配结构或者短语。这属于一种便捷速查双语词汇手册,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是一位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63年来华,在山东登州传教时设立了文会馆开展启蒙教育。他曾编

撰《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和《心算数学》等教科书，并参与《圣经》官话版的修订工作。1901 年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了他编写的《官话简明教程》(A Short Course of Primary Lessons in Mandarin)一书，作为他后来出版的《官话课本》(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又译《官话类编》)的说明手册，共 79 页，介绍了汉语的发音、声调、英语拼写与汉字书写的差异、北京官话与南方官话的对比等内容。全书 36 课，每课都有生字、20~30 句会话和注释，按照英文—中文—翻译的顺序编排。1906 年他编写的《官话课本》是以北京口语为主的官话教材，由词素、词汇、词法、例句和英文注释等部分组成。例句中涉及北京话、山东话和南方官话的不同表达时分别用小字标出，需要释疑处则用英文说明。例如：

> 人家韩青山的内人 老婆 夫人多么会说！(第 226 页)
>
> 内人：It is not used in Shantung，though known as a book term.
>
> 夫人 is properly applied only to the wife of a person of rank，but has come intouse in some places，of any genteel woman. It is rarely used in Shantung.

富善 1836 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一个基督教家庭，祖籍英格兰，18 世纪中叶移民新大陆。父亲以务农为生。富善 12 岁时就决心做传教士，1865 年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身份来华，在北京通州传教。1875 年以后他从事教学和翻译工作，曾任华北协和大学教授及神学教授 25 年。他用了 29 年时间把《圣经》翻译成蒙文，于 1919 年出版，还参与官话和合版圣经的翻译。1891 年他完成的《富善字典》(A Pocket Dictionary and Pekingese Syllabary) 1907 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共 237 页，收录汉字 10587 个，按照英文字母排序。此外他还编著了《官话特性研究》(A Character Study of the Mandarin Colloquial，1916)一书。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 1872 年来华，在天津和山东庞庄传教办学时经常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他曾任《字林西报》通讯员，1905 年以后放弃神职人员生活，在通州闭门写作。在华北近半个世纪的生活使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用文字和图片记录了 19 世纪末中国农村的方方面面，得到了鲁迅和潘光旦的好评。他的《汉语谚语俗语集》(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1902)就是他利用从平民中收集到的

语料编撰而成的，具有与众不同的实用价值。他曾经对自己的考察和写作做过这样的归纳：

> 据说，在现阶段我们与中国人的交往中，有三个途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这三个途径分别是小说、民谣和戏剧。不过，笔者认为，同时还存在第四种来源，其价值甚至比以上三种的总和的价值量还要大，但它并不为每一个研究中国及中国人的人所熟知，这就是深入中国人的家庭研究他们的家庭生活。就像在农村比在城市更容易了解一个地区的地形一样，了解中国人的特性最好也在农村。①

1910年英国传教士瑞思义在北京建立了一所华北协和语言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为来华的英美传教士提供听说读写等项目的短期语言培训，后来该校由12家机构共同管理，其中包括美部会、美以美会、美国长老会、美国公使馆和华北美国协会。1914年以后美国人裴德士（William Bacon Pettus，1886—1959）担任该校校长，负责全面管理工作，招生范围扩大至西方外交和商务人员。据1921年的一份调查报告称，当时学员人数已经达到226人，分别来自26个传教团体、12家商贸机构和五家公使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许多大学都先后设立了东亚系或者汉学系，开设了中国历史、文化、哲学和宗教专业课程，语言研究和翻译培训逐渐进入了建制化、专业化和系统化阶段。

20世纪美国汉学家对汉语的研究，除了涉及语音、词法、句法、方言、辞典和教材的编撰外，还逐渐深入到汉语发展史、汉字的性质、语言与思维关系以及构拟原始方言和原始汉语等问题的研究。

1936年顾立雅在一本专著中提出了“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的观点。研究中国古代语言史和汉字的演变史的卜弼德在《哈佛学刊》亚洲研究专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却提出了异议，认为汉字从不用来表示意义或者概念，只是用作词语或者词素，其中多半只具有表音价值，因此可以说汉字仅仅是一个符号体系。这一探讨引发了西方语言学界就汉字性质的长期争论，1944年卜弼德在一份工作报告中还再次重申了自己的看法。

---

① 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匡雁鹏译），第6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

1974年汉学家卜德应李约瑟邀请到英国剑桥大学参与《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相关课题研究。他的选题涉及汉语和汉字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围绕着"李约瑟问题"对"中国古代的辉煌科技成就为什么没能催生科技革命和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讨论。在《中国思想、社会和科学:前现代中国科学技术的思想和社会背景》(Chinese Thought, Society and Science: 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remodern China)一书的《汉语书面语的原动力》(The Dynamics of Written Chinese)中,卜德明确提出"汉语本身具有独一无二的美感和魅力,赋予了中国诗歌、散文和戏剧等文学形式表达力量,有助于科学知识的积累"的观点,不同意"表意文字缺乏表现力,阻碍科学思想产生"的说法。但是他也发现汉语书面语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被知识阶层作为专利工具使用,影响了中国的思想记录和知识传播,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了封建官僚的统治。古典汉籍中有许多同音词和多音字,却没有词类区分标志和标点符号,因而影响了外国人和现代中国青年对它的阅读和理解。

美国学者有关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是一项旷日持久的重大学术工程。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nnes,1889—1978)曾经提出汉语从上古、中古到现代方言直线发展的理论,为此他以汉语中古音构拟为前提再现由周秦至现代汉语方言语音演变的脉络。20世纪6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语言学计划"的一些学者曾对他的理论提出了批评,并主张直接以现代方言研究为基础构拟原始粤语、原始吴语、原始闽语、原始湘语和原始客家话,然后再构拟原始汉语。这一学派学的研究成果很多,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例如;乔治亚州立大学贝乐得(William L.Ballard)的《原始汉语:塞擦音初探》(1968)和《原始湘语及其他》(1970)、耶鲁大学司徒修(Hugh McBirney Stimson,1932—2011)的《汉语原始北方话的研究:北京话的阴平调》(1969)、华盛顿大学余霭芹(Anne O. Yue Hashimoto)的《原始粤语的辅音和复辅音》(1970)、华盛顿大学罗杰瑞(Jerry L.Norman,1936—2012)根据自创的方言逆推法(或称"普林斯顿假说"Princeton Hypothesis)撰写的《原始闽语的声母》(1974)、乔治敦大学杨福绵(Paul Fu-mien Yang)的《原始汉语的前缀*S—》(1975)和欧柯诺(Kevin A.O.Connor)的《原始客家话》(1976)等。

美国汉学家对原始汉语语音的构拟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张琨和夫人张谢蓓蒂的《原始汉语的韵母系统与

〈切韵〉》(1972)以及康奈尔大学包拟古(Nicholas C.Bodman)的《原始汉语与汉藏语》(1977)。

除此之外,研究汉魏六朝和隋唐中古阶段的汉语古音的学者也非常活跃,先后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文章。

第三章
新教传教士为美国汉学问鼎天下创造契机

19世纪下半叶美国涌现许多教会组织，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地位的提高，美国各教派传道会纷纷向亚洲各国派出传教士。基督教文化扩张与本国利益紧密结合，成为那个历史阶段美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福音论(Social Gospel)是当时西方知识界提出如何看待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一种理论，认为传教士的任务是使整个社会认识基督教的力量，并通过社会进步来体现它，而不是仅仅使人成为教徒或者对上帝形式主义的崇拜。这种新教主义主张借助工业化的力量来推进社会改革，唤醒弱势群体在战胜邪恶中实现社会正义。在他们看来，就业不仅是为了生存，更是自身价值和社会地位的标识；职业与从业者的生活方式、亲情关系、休闲娱乐和内心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福音论重视劳动阶层，号召直接参与社会变革，构成了美国进步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76年俄亥俄州牧师华盛顿·格拉登(Washington Gladden，1836—1918)在《工人与雇主》(Working People and Their Employers)一书中分析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时指出："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不是生存竞争法则，而是同情、友谊、互助和关怀的法则"。

宗教进化论(Religious Evolution)也是针对新教发展方向提出来的一种理论。包括智库理论家在内的一些人把主张"适者生存"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定义为一种理论而非事实，认为宗教发展观不应该反对人们对基督教中不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过时认识进行批判，科学对信仰的怀疑恰恰反映了人们知识上的进步。许多自然现象是无法用进化论来解释的，相对论、量子理论和板块构造理论都存在相似缺陷。1988年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美国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把宗教内容与自然科学混为一谈是违

宪行为。这一裁定被认为是对延续至今的基督新教尴尬地位的一种法律解释和支持。

对于传教和教会教育中无法回避的宗教与科学如何相互印证的问题，西方知识界和宗教界始终没有停止过探讨，为的是厘清自由与民主的价值、两性平等的目标、贫困和弱者救助的意义等长期困扰人们的认识问题。许多人朝这个目标努力，为的是实践自己的宗教承诺，但是客观上也对社会伦理道德起到了约束作用。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宗教活动承担了宣传教义和教化信徒的任务，在方式多样化和活动深入社会基层等方面独具特色。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大学生和教师志愿者，具有自己所熟悉学科的专业素养，能以敏锐的目光观察中国的社会现象，通过与广大教众的接触了解情况，进行各种形式的田野调查，积累资料，思考并研究与所选课题相关的现象及其本质，并提出自己的解读。早期美国汉学研究出现的精品，正是他们辛勤研究的成果。

19 世纪末中国城市的教会学校课程以圣经和英语为主，学生毕业后的就业也部分与神职服务挂钩。民国政府建立后通过法律手段对外国人创办的学校进行了限制，教会学校的世俗化成为大势所趋，普通学校更以中国文化和基础学科为主打课程。美国教会大学把西方学校的现代管理模式和课程设置引进中国，使这些学校成为首批具有现代特色的教育机构，为后来的民国政府开办的公立学校提供了参照范本。

不少美国传教士来华前接受过医学培训。他们在中国城乡开办医院或者诊所，把西医西药介绍到中国，为缺医少药的平民开展义诊，赢得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信任。西医西学向中医中药的挑战引发了中国医学发展方向的大讨论，加速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一、美国汉学萌发于 19 世纪末的海外传教运动

15 世纪下半叶，貌似固若金汤的罗马帝国和教廷开始分崩离析，经院主义神学江河日下，文艺复兴焕发起来的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在知识分子和市民中迅速传播，新教（Protestantism）在宗教改革中得到了发展，一些西欧国家的封建制度逐渐为中央集权的王侯统治所取代。

多数英国人原本信奉天主教（Catholic Church），1529 年教皇不允许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与王后离婚，导致了英国教会与罗马教廷的决裂，确立

了安立甘宗(Anglican Communion,又称"圣公会"Anglican Churches)为国教。改革后的英国国教既保留了罗马天主教传统,又吸收了新教的部分思想。但是因为英国国教内部对天主教的看法一直存在分歧,众多新教教派的涌现使英国的宗教生活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对于欧洲和北美都产生了影响。

新教是与东正教(Orthodox Eastern Church)和天主教并立的一个教派,所表现的叛逆思想和抗议精神可追溯到14世纪下半叶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1329—1393)、罗拉德(Lollards,威克里夫的追随者)和波希米亚的胡斯(Jan Hus,1731—1415)与意大利萨伏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为代表的教派主张。16世纪20年代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席卷了德国全境;瑞士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和茨温利(Ulrich Zwingli,1484—1531)的改革活动壮大了新教的声威;英国的国教最终也摆脱了教皇的控制。到16世纪中叶,马丁·路德创立的路德宗(Lutheran Churches,又译"信义会")、加尔文创立的归正宗(Reformed Churches,亦称"长老会")和作为英格兰的安立甘宗成为西欧的主流教派。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新教内部又出现了一些不同宗派(denomination)。17世纪英格兰的清教徒运动(Puritanism)提出以加尔文主义改造安立甘教会的主张,导致了长老会和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 Churches)等支派的分立。德国也出现了以斯彭内尔(Philip Jakob Spener,1635—1705)为代表的虔敬运动(Pietism),与英格兰清教徒运动相互呼应。

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很多欧洲殖民者先后登陆美洲。1607年5月第一批西欧清教徒为逃避宗教迫害从荷兰移居弗吉利亚。1620年11月,又有100余名被称为"朝圣者"的英格兰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May Flour)在美国的普利茅斯登陆。此后,马萨诸塞湾和新英格兰等地又先后迎来了欧洲各国的新教移民,来自英格兰的贵格派(The Quakers)、德国和瑞典的路德派、法国的胡格诺派(The Huguenots)和北欧的归正派等教派移民相继在北美建立起自己的定居点,不断壮大发展成为当地社会的中流砥柱和后来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先锋团队。

18世纪西方的传统宗教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工业革命引起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宗教多元化的趋势变得更加明朗化。商业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导致了物质主义的蔓延,自然神论与唯理主义淡化了宗教生

活，使北美的教会几乎处于休眠状态。18 世纪 30—40 年代，来自欧洲的“虔敬运动”和“清教徒主义”的“复兴运动”（在英国称为“福音复兴”或“循道复兴”）在北美展开。大觉醒运动促进了教会事业机构的建立，如：1792 年成立的浸信传道会（The Baptist Mission）、1795 年成立的伦敦传道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和 1799 年创建的教会传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也为新教的教育事业增添了新内容，主日学校受到教民的欢迎，并为废除奴隶制度的政治运动创建了一个平台。

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1703—1791）领导的循道派（Methodist Church）复兴工作，启发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通过福音传播关注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以及在工业革命和社会变革中的弱势群体。知名人物乔治·怀腓特（George Whitefiled，1714—1770）对 18 世纪殖民地时代的美国大觉醒运动影响极大，后来开展的“圣洁运动”（Holiness Movement）、“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 Movement）和“灵恩运动”（Charismatic Movement）都是循道派组织的系列宗教活动。

19 世纪末随着对西部的全面开发和垄断经济的加强，美国作为一个年轻资产阶级共和国开始登上国际政治霸权大舞台，政客们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太平洋以远的土地。新教传教士首先瞄准了夏威夷、缅甸和印度，然后又把触角伸向中东、非洲以及远东的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这与当时美国政界提出向海外扩张的合众国目标不谋而合。1830—1847 年西方来华传教士共约 98 人，其中美国传教士约 73 人，1858 年美国新教来华传教士增至 513 人。①

海外传教运动在全美大专院校悄然掀起，1886 年在马萨诸塞举办的一期传道夏令营中 100 多名大学生联合发表了《普林斯顿宣言》（Princeton Declaration），提出了“世界福音化”（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的目标。那年年底纽约成立了到海外传教的“学生志愿团”（Student Volunteer Band For Foreign Missions），在短时间内北美 352 个院校就有 6200 多名学生报名加入，其中有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赖德烈和卜凯（John Lossing Buck，1890—1975）等一大批著名传教士。“世界末日降临”、“基督再世”和“中华归主”的信念驱使他们纷纷走出国门，1886 年至 1918 年，派往世界各地的美国传教士共有 8000 多名，其中 2500 多名被派

①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 65 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年。

到中国，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一运动为美国原有的海外传教神职人员队伍增加了大批具有高等学历的大学师生，扩大了在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的吸引力，使其影响超过了同时期的西欧在华的神职人员。他们通过治病、扫盲、办学、办刊、译经和救灾开展各项宗教活动，规模由小到大，区域从条约港口发展到内地城乡，教众既有普通市民也有村夫野老。这一切客观上使美国汉学发展名正言顺地得到了国内政府的认同和教会的支持，由传教士、外交官、海关洋员和儒商所构成的美国早期汉学阵容由此开始显现雏形。

美国圣公会成立于 1820 年。1835 年该会决定派遣亨利·洛克伍德（Henry Lockwood）和弗朗西斯·汉森（Francis R.Hanson）来华，因为历史上的“礼仪之争”清廷对基督教来华开始进行各种限制，1724 年后更严令禁教和禁海，他们无法留在广州便转移到爪哇。另一位代表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于 1841 年到达澳门，可能因为同样原因于 1842 年迁至厦门，三年后又移居上海。该教派主要在华中地区活动，把传教范围划分为湘鄂教区（汉口、武昌、宜昌、沙市、长沙）、皖赣教区（芜湖、安庆、九江、南昌）和江苏教区（上海、苏州、无锡、常熟、扬州、南京），还分别设立了关系学校和医院，1912 年各教区联合成立了中华圣公会。

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是继英国伦敦会之后的第二个来华的新教传教会。1830 年 2 月 19 日裨治文和雅裨理（David Abeel，1804—1846）受美部会派遣乘船抵达澳门。1834 年美国公理会又派遣医生伯驾到广州开办眼科医局（即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两人均以此医局广交当地社会人士，开展传播福音工作。

路德宗信徒主要分布在德国北部和北欧诸国，在美国属于基督教第四大教派。19 世纪末德国、丹麦和挪威的三个路德宗教会派遣神职人员在广东、东北、河南和湖北等地传教。1900 年以后有 8 个美国路德宗传道会在华中地区传教，到 1922 年路德宗在华共建了 18 个传道会。

17—18 世纪欧美各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归正宗获得了法律承认，对本国宗教、政治、习俗和伦理产生了重大影响。1842 年该教派传入中国，在沿海地区按不同传教系统成立了 36 个组织，1916 年联合成立了中华长老联合会，后改称为中华基督教大会。

18 世纪以前西方传教士大多都怀着一种西方文化优越感来华，视中国为落后、保守和闭塞的国家。他们的传道口号是为了拯救受苦受难的非

基督教民族，这一以“上帝使者”自诩的居高临下态度，倾向于妖魔化中国社会和民情，恩赐和救助态度使教众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和希望，传教活动因此受到怀疑和抵制。

1877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在华传教士大会上，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宣读论文时称：“我们作传教士的，深信到中国来，乃顺服主的命令，我们传教的目的就是使这个广大的中国民族成为基督的门徒。无论别人干什么其他的工作……我们在这里……却是与黑暗的权势争战，救人离开罪恶，务求为了基督，征服中国。”他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中国已经死了——可怕地死了！”“福音有足够的大能来战胜儒家的无神论的和唯物主义的权力，正如它能战胜佛教和道教的迷信和虚妄信仰一样。”①

1897年，美国神学家詹姆斯·丹尼斯（James S.Dennis）提出了传教的目标是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通过改变现状使教区民众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人。神职人员无论布道、治病、办学或者译经都不过是传播福音的一种手段，提高非基督教国家人们的社会地位才是他们工作的根本。这一传教理念和方式的改变拓宽了传教的路子，使大批有专业技术的人才得以加入传教团队。1900年9月2日《纽约时报》刊发的《在华传教士》一文中引用了詹姆斯·丹尼斯的一段谈话：“来华传教士始终如一地尊重并敬重中国人的人格和自由，不像使馆领事官员和其他人所做的那样吹胡子瞪眼、恐吓、欺诈或者使人堕落一类的事情；只求深入人们的思想和内心的道德品质。他们不依靠强加于人的条约入侵中华帝国，即便中国政府为保护他们受到威胁时也不这样做。‘宽容条款’是当代中国各类条约中多少可能引起不愉快的一个问题，要保护的就是舍此即有失明智的事情。基督教是，并且始终是，得到了官方承认并且可以宽容的一种宗教，因为传教士都是美国或者欧洲公民，就在此处，任何体面和体谅下属的政府都有合法权利保护他们。这些条款已经列入与亚洲每一贤能政府所签订的条约之中。”②虽然詹姆斯·丹尼斯的谈话明显包含对传教士的溢美之辞，但是也反映出当年他们在各地传教工作中所受质疑的问题。

---

① 沈以藩：《试论基督教传华的不同传教路线》，载《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二卷1993—2006年，2010年。又载中华宗教文化交流网，2010年4月12日。

② *The Missionaries in China* from *The Churchman*,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1900.

二、美国前汉学时期的历史见证人裨治文和雅裨理

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传教士裨治文和美国海员之友(American Seamen's Friend Society)传教士雅裨理(后转入美部会)是第一批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中的代表人物,也是早期美国汉学的领军人物。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贝尔彻敦的一个基督教家庭。1826 年在阿穆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安道沃神学院深造。1829 年 10 月他作为美国公理会第一位来华传教士,搭乘"罗曼"号(Roman)从纽约出发,翌年 2 月 25 日到达广州。

来华前裨治文曾阅读过大量有关中国历史、文学和宗教方面的典籍,对于中华文化有较深入的了解。经过多年刻苦学习和传教的磨砺,他的汉语水平高于同时期的一般西方传教士,1839 年曾被聘为林则徐的英文通译。1842 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加尼(Commodore Lawrence Kearny,1789—1868)来华以及 1844 年顾盛(Caleb Cushing,1800—1879)使团来华,裨治文都先后担任过他们的通译。顾盛正式担任美国驻华全权代表后,裨治文被任命为他的秘书兼通译,后来在中美《望厦条约》和《天津条约》谈判中也由他负责全程的翻译工作。

裨治文和中国牧师梁发曾在广州乡试场外向当地生员散发劝世文和福音书,因此结识了洪秀全等学子和社会名流弟子,彼此过往甚笃。

1832 年裨治文在广州与马礼逊和卫三畏合办英文《中国丛报》。该刊最初为月刊,后改为季刊,宗旨是向西方读者提供有关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新闻。从 1832 年 5 月至 1851 年 12 月共出版 20 卷,刊登了许多介绍中国的语言、历史、地理、宗教、科技、商业、社会、艺术和道德方面的文章,以及有关中国古代文献、历史专著、神话传说和风俗人情的短文。西方在华传教士对于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西方人在华活动动态、以及中外关系的发展也是他们报道的重点。该刊每期都有固定栏目,如:书评、专论和文学动态等,先后介绍了 256 部有关中国的中外文书籍和 86 种世界各地发行的中外文报刊。除了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的专著外,也评析一些重要的汉籍和文学作品,如:《四库全书》、《朱熹全集》和《红楼梦》等。该刊第 18 卷 8 月号用了 40 多页的篇幅,刊登了 1560—1848 年 403 种

西方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著述以及部分中国刊物，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刊发的汉学研究书目。《中国丛报》每卷篇幅为500—600页，第一、二卷各印400册，第三卷印800册，第五卷之后印数均为1000册以上。1851年12月终刊号附总索引。除向在华外侨读者发行外，还远销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英国和美国。《中国丛报》是近代第一种世界性的汉学期刊，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和宗教以及中外关系史和欧美汉学研究都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裨治文除了最后一卷外，每卷都亲自撰文，少则一篇，多则二十余篇。他的选题广泛，资料翔实，覆盖范围包括：中国行政区划和18省省志；皇权现状和王朝大事年表；中国历史、征战和人物评略；中国地理、气候、人口和航运；大清律典、秘密结社和走私犯罪问题；中外关系、国际贸易和国际条约；中国哲学、儒家学说和忠孝观念；中国瓷器、丝绸和印刷术；汉语、汉字、语法、文体、教科书和辞典的研究以及文献述评；中国教育、四书五经、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中国军队、战略和鸦片战争；来华西方传教士的法律地位、宗教活动和机构；外国人对中国时局、外交政策和社会的介绍和评论等，可谓包罗万象，内容丰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36—1840年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共发表了48篇对英美鸦片贩子在华的疯狂鸦片贸易进行公开谴责的文章，其中15篇是裨治文自己撰写的，如《中国鸦片贸易考略》（第5卷）、《毒品鸦片十害》（第7卷）、《鸦片贸易危机述评》（第8卷）和《林则徐与禁烟运动》（第9卷）等。他认为通过鸦片贸易赚取黑心钱是他们道德低下的表现，跟英国这样一个基督教国家的责任和荣誉极不相称，把鸦片泛滥简单归结为中国官吏的腐败是说不通的，所谓中国人“闭关排外”其实是鸦片走私所造成的。在当时鸦片狂人叫嚣以战争征服中国的年代敢于向西方政治力量公开挑战，反映了有良知的美国传教士的正义感和同情心。

1836年裨治文参与了对马礼逊《旧约全书》汉译本的修订工作。1847年裨治文移居上海，曾参加著名的《新约》翻译代表会议，与宁波的北美长老会传教士克陛存（Michael Simpson Culbertson，1819—1862）合译《圣经》，1857—1859年任上海亚洲文会会长。1838年他在新加坡出版《美理哥国志略》一书，对美国的地理位置、政治制度和风俗人情做了详尽的介绍，深受知识界欢迎，王韬和梁启超对该书都有极高评价。1844年该书修订后又以《亚美利格合省国志略》在香港出版；1861年又以《联邦志略》在上海

印刷发行。除此之外，他的著作还有《广州市及其行业介绍》(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 and Notice of the Trade at It，1834 年出版)和《粤语汉集》(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1841 年出版)。后者是他为来华的西方人学习汉语编写的教材，全书长达 728 页，内容丰富，包括文章选读、英汉翻译、汉语拼音和注释。

裨治文在华期间先后发起、组织或者参与的新教团体有：广州基督教联合会(The Christian Union at Canton)和中华医务传教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裨治文曾创办一所男童学校，帮助一些平民孩子学习本领，自谋生路。1864 年他的妻子裨爱利莎(Elizah Bridgman)在北京创办贝满女塾(Bridgman Academy)。

雅裨理是与裨治文同一时期来华的美国传教士。1804 年 6 月他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新布伦瑞克，祖籍荷兰，父亲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在军队服役。1823 年雅裨理毕业于皇后学院后进入新布伦瑞克神学院学习，三年后被正式按立为牧师，在雅典和纽约从事神职工作。

1829 年雅裨理到广州后跟美国学者亨德和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学习汉语，并利用机会在当地展开宣教活动。一年后他因病移居巴达维亚(雅加达)，在华人、印度尼西亚人和马来人中继续传教。在此期间他还向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学习汉语和闽南话，以便能向当地教民讲经布道。1831 年夏天雅裨理移居新加坡，曾多次与英国牧师汤雅各乘船到曼谷、暹罗和马六甲等地，在居民中派发教义读物和药品，常有机会接近当地亲王、官员、僧侣和华人。

1833 年雅裨理因病返美，途中顺访了英国、法国、瑞士和荷兰等国教堂，参加了一次教务会议，并帮助筹建东方妇女教育会。翌年他抵达纽约，经常应邀到各处礼拜堂、神学院和妇女团体演说，介绍在亚洲华人地区的所见所闻。

1838 年他应澳门马礼逊教育会学校校长勃朗牧师的邀请再次访华，常与其他美国传教士到厦门、同安和漳州等地宣讲福音。1844 年 1 月，在厦门办理通商事务的福建巡抚徐继畬接见英国驻厦门领事记里布(Henry Gribble)时，任通译的雅裨理得以与他相识。此后，徐继畬曾多次向他了解西欧各国的历史、地理和社会情况，并相约长谈，话题常涉及西方民主

思潮。

雅裨理的著述有《1830 年至 1833 年旅居中国及其周边国家记述》(Journal of Residence in China and the Neighouring Countries from 1830—1833,1835)等。1844 年 5 月号的《中国丛报》选登了他从厦门鼓浪屿寄出的 1843 年 11 月至 1844 年 3 月的日记,对于研究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外关系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裨治文和雅裨理是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见证人和开拓者,他们在中美早期文化交流中的经历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

三、开发心智与传教并举的文惠廉、狄考文和明恩溥

早期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深知要使普通中国人皈依上帝,首先必须让他们接触并了解西方基督教文化,使在孔孟文化熏陶中长大的当地平民相信"上帝对世俗社会救助"的真实性。他们每到一处首先做的一件事是兴学办校,通过开发平民心智增加自身的亲和力,为传教打下基础。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狄考文和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就是这样的传教士。

文惠廉出生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18 岁时毕业于南卡罗来纳州学院(College of South Carolina),1833 年获得律师从业资格。但是这一年他受洗后决心到海外传教,便进入了弗吉尼亚神学院(Virginia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

1834 年 5 月美国圣公会决定到华人中传教,文惠廉接受任命后开始进修医学,1836 年被按立为牧师,第二年奉派到印度尼西亚爪哇。1837 年 7 月,文惠廉携妻子赴新加坡学习汉语,熟悉华人风土人情,并开始向当地华人传教。1840 年文惠廉夫妇移居澳门,1842 年又以厦门为基地开展传教活动。

1844 年 10 月年底他与妻子到上海,先在老城区学习上海方言并主持洗礼和布道仪式。1848 年他向上海道吴健彰提出在虹口建立美国人定居点的要求,得到了允诺。1853 年圣公会第一所救主堂在百老汇路、蓬路(今塘沽路)口落成,成为上海吴淞江北最早建立的教堂。此后他定期派出神职人员前往嘉定、苏州和青浦等地传教。1852—1854 年和 1857—1859 年他因病两次返美休假。1859 年他率领 18 名传教士重返上海,在新

闸和新加浜等地建布道所。

文惠廉重视教育。到上海不久他就创建一所寄宿男童书院,1856 年又建文化学校,与裨文女中和圣玛丽亚女中一起成为上海第一批教会学校,为早期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1847 年和 1850 年文惠廉两次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文圣经翻译代表会议,参与上海方言《新约圣经》的翻译。此外他还有《圣公会史纪》、《信经阐义》、《圣会祷》、《祷文牖启》和《祷文总志》等译作,并著有《进教要理问答》、《马太传福音书》和《圣教幼学》等书。

1864 年 7 月 16 日文惠廉在上海去世。1871 年圣公会在湖北省武昌创办了文华学堂(Boone University)以示对他的纪念。

文惠廉的长子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1839—1925)是医生传教士。1880 年创办了上海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次子小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Jr. 1846—1891)1884 年接任美国圣公会江苏教区主教,1891 年在上海去世。

1836 年狄考文出生于一个宾西法尼亚基督教徒家庭,1862 年毕业于匹兹堡西部神学院,被按立为牧师。1863 年他受北美长老会派遣,携妻子乘船从纽约经好望角和澳洲,五个多月后到达上海,然后到山东登州传教。

此前美国传教士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1829—1893)和夫人曾在当地一座破旧的观音堂(今蓬莱城石岛福乐堂)内建起蒙养学堂,招收了 2 名平民家庭女孩。后来倪维思夫人因健康原因回国,学堂便转交给狄考文夫妇续办。当地多数居民生活贫困,送子女上学的社会风气未开,对于外国传教士办学也缺乏信任感,所以 8 年中该学堂仅招收学生 85 名,而坚持修完 6 年课程的只有其中 4 人。

1872 年以后蒙养学堂扩建校舍,增加了课目,实行包括"备斋"3 年、"正斋"6 年的"三步教育"计划,前往就读的孩子逐渐多了起来。狄考文虽然知道文言文是重要的书面语,但是教学还应该以白话为主。蒙养学堂采用《千字文》、《论语》、《孟子》、《诗经》、《尚书》为课本,教义内容也占一定比例,除个别情况外,一般不授英语课,但是要求学生毕业后至少做三年宣教工作。为了适应教学对象和教学环境,狄考文夫妇在编写教材时经常参照西方英文教科书的构思,尽量结合中国实际,以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狄考文和该校数学教师邹立文曾合作把国外数学教材译成中文出版。阿

拉伯数字就是通过他们编写的数学教材最早引进到我国课堂的。学堂先后从当地举人、廪生和生员中聘任了20余名，其中5人还兼任狄考文夫妇的中文老师。1877年该校更名为“登州文会馆”，并举行了首届毕业典礼。

1879年狄考文夫妇回美国休假期间向长老会本部提交筹办大学的报告，利用各种机会在美国社会广泛筹款并募集物资。3年后报告获得批准，中文校名仍为“登州文会馆”，但是英文译名却改为“Teng-chow College”（登州学院）。校内增设了大学预科，狄考文讲授算术、数学和理化课程，儒学则由当地儒生授课。除历史和地理课教学外，狄夫人邦就烈（Julia Brown Mateer）还给学生上音乐课，向他们传授乐理知识，为他们编写专用教材，创作歌曲部分以山东民间曲调填词，深受欢迎。

狄考文在登州文会馆的实验室有蒸汽机、柴油机、电动机、发电机、抛光机、旋床和锅炉，还有木工和鍛工工具、物理和化学仪器，以及各种显微镜、望远镜，为的是训练学生学习铁工、焊工、电镀等谋生技术。1876年胶东连续发生旱灾，1889—1890年黄河和小清河下游决口，狄考文都曾主动联合其他传教士前往救灾数月。

狄考文本人精通数学，曾编著多种教材和工具书，如：《心算初学》、《笔算初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测绘全书》、《微积分习题》、《理化实验》、《电学全书》、《电气镀金》、《振兴实学》、《要理问答》、《分子略解》、《官话类编 》和《华语大辞典》等共20余册。

文会馆在平民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功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北美长老会也因此加大了物资投入，增派人员来华。狄考文的弟弟狄乐播（Robert M. Mateer，1853—1921）和夫人于1881年到达登州，加盟狄考文的事业，两年后以登州文会馆模式在潍县虞河东岸开办乐道院、文化馆和医院。1889年又创办了以西医教学为主的医护学校（今潍坊卫生学校前身）。另一名北美长老会传教士赫士（Watson McMillen Hayes，1857—1944）于1882年到登州，也在文会馆任教，后任山东省立高等学堂总教习和齐鲁大学神学院教授等职。柏尔根（Paul D.Bergen，1860—1915）也是一位北美长老会传教士，1883年赴登州任教并传教，1905年任潍县广文学堂（Shantung Union College）校长。路思义（Henry Winters Luce，1866—1941）于1897年到登州任教，1919年任燕京大学副校长。

1882年狄考文打算将登州文会馆与其弟狄乐播在潍县创办的文化馆和乐道院合并。但是1900年义和团起义失败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中国向

英、法、美等八国赔款4.5亿两银子之事遭到美国教会联合会抗议，美国政府被迫将所得3293.9万两银子的部分用于在华兴办教育，潍县乐道院分得其中1477.3两。长老会在美国募集的数万银子以及山东政府的拨款，也用作登州文会馆的发展资金。此时胶济铁路已经建成，潍县位于交通枢纽，对于招生、联络外界和输送人才都具备优越条件。1904年北美长老会所属的登州文会馆与英国浸礼会所属的青州广德书院决定迁至潍县，合并成为广文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柏尔根被任命为校长。大学在乐道院原址建校，另购土地160余亩，增建馆舍，添购图书和体育设备，始成规模。

1917年，广文大学在济南千佛山下购地600多亩，把潍县的文理学院、青州的神学院(乐道堂)和济南的医学院(共和医道堂)合并为齐鲁大学，方伟廉(William P.Chalfant，1860—1917)任校长，赫士为神学院院长。

狄考文在中国传教办学40多年，是19世纪末一位享有盛名的传教士教育家。在艰苦创业、师资培训、学生教育、教材编写、教学管理以及传播近代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非凡建树。他以西方教学理念推动了中国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到20世纪初我国16个省市100多所学校都有齐鲁大学的毕业生执教。1880年狄考文获汉诺威大学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888年获伍士德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02年又获华盛顿大学和杰斐逊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890年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第二次上海代表大会推选他为中华教育会会长。

狄考文培养出来的学生除了少数在神职部门任职外，多半都从事教育工作，从当地中小学到知名大学都有，其中一些还被聘任为京师大学堂、山东高等学堂、上海圣约翰大学、湖南雅礼学院的讲师和教授。此外也有担任保定陆军学堂和云南讲武堂教官的，任教科目广及数、理、化、工、天文等科学。

狄考文经常为美国长老总会和长老会上海分会的刊物撰写文章。1890年他被推选为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委员会主席，主持部分中文译经工作。

狄考文在中国工作40余年，其间为募款、采购、宣讲返国4次。1908年在青岛病逝。

1845年7月18日明恩溥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弗农的一个牧师家

庭。南北战争期间他曾在军队服役，战后进入伯洛伊特学院学习，1870 年毕业于纽约联合神学院。翌年他与埃玛·简·迪金森小姐（Emma Jane Dickinson）结婚成家，婚后被按立为公理会牧师。为了完成海外传道会派遣他来华传教的任务，他还在纽约医学院接受过医疗专业的特别培训。他认为无论何时何地传教都应该从社会底层开始，要接触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了解中国，才能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因此他到天津后首先扎根于贫苦市民之中，一边传教一边学习汉语。

1877 年明恩溥到鲁西北赈灾，1878 年到恩县（今武城县）庞庄创建教堂和学校。山东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民风淳厚，在长期闭关自守的时代，对于美国传教士不了解的当地民众心存疑虑，使传教工作一度难以开展。1880 年冬，明恩溥和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博恒理（Henry D. Porter 1845—1916）计划在当地教徒吴夏氏地皮上建礼拜堂。德州知州陈嗣良拒绝为其文约盖印，美国驻京公使馆参赞何天爵为此特地照会清政府，导致了数百名民众对前往衙门交涉传教士的包围。

1885 年明恩溥在庞庄建立了一所医院。1916 年该医院迁至德县，扩建成拥有 10 余栋楼房、包括内、外、妇、儿等科的韦氏波济医院。

明恩溥在传教的同时还从事新闻报道和写作。他博览群书，勤于钻研，文思敏捷，经常在《教务杂志》、《华洋通闻》（Celestial Empire）、《德臣报》（China Mail）、《国际宣教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传教先驱报》（Missionary Herald）、《展望》（Outlook）和《字林西报》（North China News and Herald）等报刊上发表文章。

1905 年他辞去了宣教职务，定居通州，从事研究和写作。他的主要著作有：

《中华文明》（Chinese Civilization，1885 年）。

《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4 年）。

《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研究》（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1899 年）。

《动乱的中国》（China in Convulsion，两卷，1901 年）。

《汉语谚语俗语集》（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together with much related and unrelated matter，interspersed with observations on Chinese things-in-general，1902 年）。

《基督之王：中国研究大纲》（Rex Christus：An Outline Study of China，

1903 年)。

《中国的进步》(The Uplift of China,1906 年出版)和《今日的中国与美国》(China and America Today: A Study of Conditions and Relations, 1907 年)等。

他的一些作品多次再版。《中国的进步》曾被先后译成德文、丹麦文、挪威文和瑞典文出版。

《中国人的素质》是明恩溥的代表作,有中文、日文、法文和德文等不同版本,在西方汉学界颇有影响。他在书中首先对中国人的优良品质给予了肯定,然后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弊病进行了分析和抨击。他列出中国人的优点有:孝顺仁爱、重责守法、处处节俭、勤劳刻苦、礼貌待人、忍耐包容、善于吸收、知足长乐、生命力强;缺点有:墨守成规、死爱面子、相互猜疑、思维混乱、好兜圈子、麻木不仁、有私无公、因循守旧、缺少信用、安于寄生、重裙带关系、蔑视外国人、缺乏利他主义、多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他对中国的国民性提出了概括和批评,认为中国政体和教育阻碍了现代化的发展,并对中国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研究》也是明恩溥一部有文献价值的著作。他用文字和照片记述了 19 世纪末中国山东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文一图,每章一个主题,内容丰富。那些珍贵的照片都是明恩溥深入乡间农舍拍摄的,见证了中国农村的历史性存在和变化。他的摄影风格严谨科学,善于以敏锐的目光捕捉瞬间即逝的画面,以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友善的手法处理人物和色调。

1906 年他回美国协助海外传道会筹款时,曾向罗斯福总统进言将部分中国庚子赔款用于在华创办美式大学或资助中国学生到美留学。1908 年美国政府正式宣布退还相当于 1160 余万美元的款项,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的建立分别使用了其中部分款项。后来他以无任所传教士身份返华后侨居通州,曾任 1907 年召开的中国世纪大会的美方主席和《教务杂志》编委,还参加了 1910 年在爱丁堡召开的世界传教士大会。1926 年他在加州克莱尔蒙特退休。

明恩溥是一位基督教政治家,也是中国问题专家。他在华生活了 54 年,目睹了中国的动乱和变化。他熟悉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民众当时的生存状况,曾针对中国的社会弊病提出过不少改革建议,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产生过一定影响。他的著作是早期美国汉学研究的重要文献,曾得

到广泛的引用、讨论和认同。

四、期待以基督精神培养变革人才的施约瑟和丁家立

中国近代史上鸦片战争的失败、八国联军的入侵以及甲午战争后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废除科举制度、引介西法西学和推广现代科学技术的政纲表示认同。除少数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外，一言九鼎的朝廷官员、日进斗金的富商、忧国忧民的乡绅和追逐潮流的青年学子，也无不对西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欧美传教士对此感到振奋，曾不失时机地通过办学兴教介入中国教育，期待造就一批可以基督教精神领导中国变革的人材。

这一阶段正是美国新教传教士在华创办教会大学的鼎盛时期，他们创办的大学数目超过了其他外国人在华创办大学的总数。当时知名的教会大学有：广州岭南大学（1904）、福州协和大学（1918）、福州华南女大（1914）、成都华西协和大学（1910）、长沙湘雅医学院（1914）、武昌华中大学（1910）、武昌文华大学（1903）、杭州之江大学（1910）、上海圣约翰大学（1905）、上海沪江大学（1906）、南京金陵大学（1909）、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15）、苏州东吴大学（1901）、北平燕京大学（1919）、协和医学院（1920）、华北协和女大（1905）等。后来这些大学组合联建了“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协会”（1919）。

此外，有些中国大学还先后与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乃尔大学等著名院校建立了联系，通过各种方式引进他们的师资培训、教学管理、院系设置、课程安排、教学方法、测试手段、教学工具和参考图书等项目和管理系统。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联合创办的哈佛燕京学社，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最具特色。美国部分高校还把一些西方的新科学直接介绍到中国。

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1831—1906）就是一位对于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

施约瑟1831年出生于立陶宛一个犹太人家庭，父母早亡，由同父异母的木材商兄长抚养成人。1848—1852年，施约瑟就读于日托米尔（Zhitomir）的犹太教教士学校（Rabbinical School），因为他父亲在世时希望他长大后成为一名犹太教教士。就在这个学校他平生第一次看到伦敦犹

太人基督教促进会(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ity amongst the Jews)印发的一本希伯来文新约。他15岁时离开了哥哥家,靠自己做家教和玻璃工的收入独立生活。19岁时他到德国法兰克福学习了一年,后来又在布雷斯劳大学学习了两年。他的刻苦努力和求知若渴的精神使他年青时就能说一口流利的依地语(犹太人的国际语)、波兰语、俄语和德语。

19世纪启蒙思想运动曾席卷欧洲,犹太人社会也经历了一场思想变革。德国犹太神学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倡导的革新运动强调圣经研究中的理性主义,认为应该重新评估犹太人所处非犹太社会的文化,以促进犹太教更加世俗化。犹太基督徒认为犹太人信仰耶稣,除了犹太法典外不必放弃任何犹太戒命,也不用加入教会。叛逆犹太教者可以融入世俗社会,或者皈依基督教。但是,自称"弥赛亚犹太人"(Messianic Jews)的犹太基督徒因长期生活在两个社群的边缘,变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1854年施约瑟移居纽约时正是面临这样无奈的现实。他身边的好友差不多都是有理想的犹太基督徒,在他们的影响之下,第二年4月2日施约瑟与他们一起欢度逾越节(犹太新年)时毅然决定皈依基督教,接受了浸礼会的洗礼。

1856年他就读于宾西法尼亚匹兹堡西部的神学院,成为一名长老会信徒。翌年他满怀热情和理想向长老会提出参加海外传教工作的申请,不料他的请求未获批准,但他没有因此气馁,决定转学到纽约圣公会神学院。1859年他终于被接纳为美国圣公会海外传教士,同年夏天被按立为牧师,年底他乘"金律号"抵达上海吴淞。

1859—1862年施约瑟居住在上海,在讲经布道之余努力学习中文和上海话,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他心志高远,希望不久之后自己可以阅读中国古籍,可以把圣经翻译为中文。1861年他曾经把几首赞美诗译成上海话。当时中国北方尚未对外国人开放,传教士只能在香港、澳门和五个通商口岸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使领馆获得常驻北京的许可,1862年施约瑟便移居到了北京。

1864年,施约瑟与美国传教士白汉理(Henry Blodget,1825—1903)、英国传教士包尔滕(John Shaw Burdon,1826—1907)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组成了北京翻译委员会(The Peking Translation Committee),商议如何把新约和旧约译成汉语。为了充分发挥施约瑟的希伯来文知识专长,翻译委员会建议他首先着手翻译旧约。新约和旧约北京官话全新译

本终于分别在 1872 年和 1874 年出版。

1868 年施约瑟与英国修女韦琳(Susan Mary Waring,1837—1909)结婚成家,后来他们有了一双儿女。1875 年施约瑟一家返回美国,除了重访亲朋故旧外,也千方百计地为筹建上海学院的雄心勃勃计划募集资金。他一直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儒家学说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国家直接传播新教教义困难重重,必须建立一所教会大学才能培养出中国的教会人才。他的想法得到了美国圣公会高层的认可。1877 年 10 月底,施约瑟在纽约被晋升为上海布道区主教。1878 年 7 月返沪途中,他以主教身份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会议。

1879 年 4 月 14 日,上海梵皇渡路举行了圣约翰书院的奠基仪式。该院由 1865 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开办的培雅书院与 1866 年开办的度恩书院合并而成。9 月初开学时有华籍和西籍教员 10 人,学生 39 名,他们的校服、伙食、书籍和文具均由书院提供。课程共设文理、神学和医学等学科,1896 年增设格致室(后称"科学馆"),各科均用汉语讲授。该校曾以"光与真理"为校训,《论语》中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也是学子们的座右铭。书院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美国圣公会,到 20 世纪初以奖学金方式每年拨款额度大约为 6000 美元。以后学生人数逐年增加,校舍扩建,设备不断完善。随着岁月的推移,学生的学费和食宿费不断增加,平民子弟几乎无法迈入书院的门槛,导致贵族化倾向的发展。我国历史上的海关、邮政、外交、教育和工商界都曾接纳过来自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林语堂(Lin Yutang, 1895—1976)、宋子文(1894—1971)、荣毅仁(1916—2005)、贝聿铭(1917—　)、邹韬奋(1895—1944)等都是该校校友。施约瑟主持了书院前 4 年的工作,得到华人牧师颜永京(1839—1898)的倾力襄助。1886 年美国圣公会牧师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1864—1947)接任校长职务后,进一步强化了英语和科学学科的教学。1905 年该校校名改为圣约翰大学,1913 年增设大学院(研究生部),1920 年又设商业经济部,1923 年设立土木工程学院,全用英语教学。至此,这一美式学府以名牌教会大学载入了中国近代教育史册,成为民国后各类国立大学之先导和典范。

1881 年炎暑施约瑟去武汉考察教务,由于中暑导致高烧和昏厥,病卧在床数日,病情稍好后他乘船回到上海休养。长期过度劳累使他的帕金森氏病情加重,终日只能以轮椅代步。1882 年春他辞去了主教职务,携全家

经法国前往瑞士，四年后回到美国，先后在费城、纽约、新罕布什尔州和马萨诸塞州等地居住。1887 年他忍受疾病的折磨以惊人的毅力开始修订以前自己翻译的官话旧约，一年后终于完稿。

1890 年第一届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召开，决定集体重译圣经，目标是出版一部各教派都可接受的包括官话、浅文理和深文理三个版本的和合本（Union Version）圣经。施约瑟自信在希伯来文和中文方面的修养优越于他人，完全可以把圣经译出最佳文字，然而大会却没有正式对他委派任何职务，使他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

由于他不能握笔写字，只能用罗马字母拼读汉字的办法在打字机上修改自己的圣经译稿。1894 年施约瑟完成了 2000 多页新约浅文理译本的修订。1895 年他和夫人及子女离开美国，带着一部用罗马字拼写出来的浅文理和官话新译本圣经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中国神职人员根据他的打印稿把罗马字母转写为汉字。1897 美国圣经公会传教士海格思（John Reside Hykes，1852—1921）为他选择了一家出版经费和印刷条件都较好的日本出版社，并帮助他移居东京。1899 年和 1902 年他的官话旧约和浅文理新旧约全译本终于先后在东京问世。

几十年的实践和磨练使他的译技炉火纯青。1903 年他又打算编写官话和浅文理圣经译本的注释版，同时统一两个译本中的用词和译法，之后再进一步修订官话新约译本。1906 年 10 月他在东京去世前修订和注释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施约瑟用大半生的精力，钻研中国语言和文化，培养了一批精通西法西学的中国人才。他除了创办上海圣约翰书院（St.John's College）之外，还创建了圣玛丽亚女校（St.Mary's Hall）。他一生学习并掌握了大约 20 种语言，先后翻译了官话和浅文理版的旧约、新约和公祷文等多种教会经籍，是新教在华传教史上一位杰出的圣经翻译家。他的遗著《蒙英字典》（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工具书。1876 年他获得了凯尼恩学院神学博士学位，1877 年还荣获了哥伦比亚大学神学博士学位。

在华创办大学取得优异成绩的另一位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是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1857—1930）。

丁家立出生于波士顿一个 17 世纪移民新大陆的英国人家庭。从达特

茅斯学院毕业后他就进入奥柏林大学攻读神学。1882 年奉美国公理会派遣到山西太谷传教。当地生活艰苦,穷人孩子上不起学,为此他曾试图说服乡绅富豪出资办学,但是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1886 年他辞去了教会职务专程陪伴妻子去天津治病,其间被李鸿章(1823—1901)聘为家庭英语教师,便在天津留了下来,不久他创办了中西书院,自任院长。

1887 年英籍德国人德璀琳(Gustav von Derting,1842—1913)在天津德租界警察总部房后创办博文书院(Tenney College),招收中国高层知识分子入学。1892 年德璀琳聘任丁家立在书院内办预科班。1895 年博文书院改名为北洋西学学堂,招收了 125 名新生入学,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任督办,丁家立为总教习。1896 年盛宣怀调任上海铁路总公司督办,学堂由丁家立全面负责。1902 年北洋西学学堂奉直隶总督袁世凯令更名为北洋大学堂,从丁家立的中西书院和原水师学堂学生中招收了 10 人组班开课。

丁家立熟知西方大学教育,他的中西书院因不带宗教色彩在天津享有美誉。为了全身心投入教务,他毅然撤销了中西书院。根据中国国情和西方的办学理念,以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为蓝本,以培养高级人才为目标,他全面筹划了学堂的专业设置、学制定位和课程安排。他治学严谨,决心把北洋大学堂办成一所真正传授西学的学堂。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德军所占北洋西学学堂的设备、文档和馆舍受损严重,不得不停办。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对于如何解决复课问题束手无策。1902 年丁家立前往柏林向德方交涉校址并入德租界后的赔偿办法。最后,根据德租界《购地章程》规定,丁家立从德国政府获得 5 万两关银赔偿。

由于条件限制和体制不健全等原因,北洋大学堂一度面临生源不足的困难。为此,1902 年袁世凯委任丁家立为保定直隶高等学堂总教习,希望把该学堂建为北洋大学堂的预科部。随后丁家立又兼任直隶西学督导,创办了若干所四年制的普通学堂,这样就形成了由普通学堂、高等学堂到大学堂组合起来的连锁体制,化解了长期困扰他们的生源之危。

创建之初,北洋大学堂下设“头等学堂”(相当于大学本科)和“二等学堂”(相当于预科)。

头等学堂学制为四年,要求学生分阶段完成 20 门基础课程和包括电学、工程学、矿务学、机械学和律例学五个专业的 30 门专业课程。

二等堂招收13~15岁少年入学，修业四年，课程有英文、数学、格物、各国史鉴、地舆学和平面测量等。

学生主要从天津、上海和香港等地招收，任课教师多为中外硕学鸿儒，先后聘请过50多位美、英、法、德、俄、日等国学者，教材也多采用外文原版。此外，丁家立还亲自指导教材编写。《英文法程》、《亚洲地理》和任纳福著的《世界通史》，就是当年北洋丛书中流行最广的教材。北洋大学堂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教育教系统和管理体制。由于管理严格，校风朴实，毕业生的总体水平都较高，可免试进入美国知名大学究生院深造。

北洋大学堂是当年直隶的最高学府，它的成功创办是我国近代教育的良好开端，为全国新型大学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北洋大学堂培养了许多人才，1885—1911年共招生518名，其中出国留学者52人。他们毕业后投身于采矿、冶金、土木、水利、机械、铁路、财金、政法和外交等部门，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张太雷、马寅初、马千里、徐谟和徐志摩等知名人士都是该校的毕业生。

1906年丁家立辞去北洋大学总教习职务，被清廷聘任为驻美中国留学生监督，曾几次带领北洋大学堂学生赴美求学。

1903年，清政府授予丁家立二等三级双龙勋章，以表彰他在废科举、兴新学大潮中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1908年他获得达特茅斯大学法学名誉博士称号。两年后他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汉务参赞，1912年被任命为美国驻中国南京副领事，以后又被提升为美国驻北京公使馆代理公使。1920年丁家立退休返回美国，获中国政府授予的二等嘉禾勋章。1924年访华期间他特地到北洋大学堂参观，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亲眼看到北洋大学堂校园的空前盛况，心中感慨无限。

1930年丁家立在美国加州病逝，享年73岁。

五、丁韪良和林乐知在激流勇进中的追求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之后，无论世界形势还是中国政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福音论和宗教进化论的主张促使美国新教教会适时地改变其海外传教政策。

此后来华的美国教会精英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不再仅仅满足于为新教徒洗礼和每周一次的布道礼拜等例行宗教仪式。他们广泛参与中国社

会生活，几乎涉足于各个行业和领域，并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来传教。

美国神职人员的精明和才干赋予了美国汉学新的思维和追求，为西方基督教同道树立了仿效的榜样，以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顺理成章地确立了西方汉学中心的地位。

丁韪良和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就是这一时期转换了其牧师职能的两位美国新教来华传教士。

丁韪良，字冠西，号息三，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一个虔诚的传教士家庭。1846 年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849 年毕业于新奥尔巴尼神学院，被按立为牧师。

1847 年他参加了北美长老会的海外志愿传教团，带着燕尔新婚的妻子到浙江宁波传教。他很快就适应了当地生活，语言天分和勤奋使他在不长时间内学会了宁波话和官话，并读了许多中文典籍。他曾将部分圣经译成宁波方言，还在当地创办了两所私塾，先后招收学员数十名。这期间他曾在报刊上发表四篇文章，公开要求美国政府支持中国太平天国革命。他一度准备私访太平军防区，但因故未能成行。

1858 年他被聘任为美国公使列卫廉（William Bradford Reed，1806—1876）的通译。1860 年他返美期间获得拉斐特学院（Lafayette College）神学博士学位。1862 年他初访上海，结交了许多朋友，一年后移居北京。这其间，他得到英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赞助在北京创办了崇实馆（今北京第二十一中的前身），还首次乘京杭大运河驳船从北京到上海，因在《亚洲学会会刊》撰文回忆此次难忘的旅程而广为人知。

1866 年他曾去河南开封对中国犹太人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考察。1868 年 10 月丁韪良在波士顿的美国东方协会宣读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科举制》的论文，反响热烈，史学界认为对于当时美国文职人员任用制度的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869 年年底丁韪良辞去了长老会的教职，经赫德推荐在京师同文馆教英文和国际公法，后来出任总教习（授三品文官衔），年俸银子 5000 两。1870 年丁韪良获纽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878 年他与范约翰（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Farnham，1830—1917）在上海创立圣教书会，出版了《圣经全书注释》和《基督教的证据》等书以及布道手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该会与华北和华中圣教书会联合，改名中华圣教书会（The Chinese Tract Society）。

1894年丁韪良因病回国，四年后再次来华适逢京师大学堂成立，经李鸿章和孙家鼐的推荐他被光绪皇帝任命为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授予二品顶戴。12月31日开学那天，他在全体中外师生面前，毕恭毕敬地向孔子像脱帽三鞠躬，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认同，以及通过引介学科新知培养中国新型人才的认真态度。

1900年8月，八国联军肆虐北京，京师大学堂停办，丁韪良被困使馆区五十多天。在签订《中美天津条约》时丁韪良和卫三畏帮助拟定其中第二十九条的"宗教容忍"条款，还建议美国政府要求中国割让海南岛。1900年10月丁韪良返美，数年后他以名誉传教士身份再次来华，到处演讲并著书立说。1902年，清廷颁令重开停办两年的京师大学堂，但是管学大臣张百熙以学校银子短缺为由，辞退了丁韪良和其他所有洋教习，由于合同期未满，经多方交涉，最后赔付一年半薪俸了结。此后湖广总督张之洞特邀请丁韪良前往武汉两湖大学堂出任总教习。

1916年丁韪良因患肺炎在北京寓所去世，与已故妻子同葬于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

丁韪良毕生阅历丰富，知识渊博，勤于笔耕，汉学译著很多。1872年他和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创办的《中西闻见录》(Peking Magazine)是北京最早的近代科学杂志。1876年该刊编辑部迁至上海易名为《格致汇刊》，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笔。丁韪良在北京期间还兼任过《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特约记者。

丁韪良翻译的书有：

《万国公法》(International Law by Henry Wheaton，1864年)。

《格物入门》(Natural Philosophy，1868年)。

《格物测算》(Mathematical Physics)。

《同文津梁》(Chinese Students Manual)。

他的专著有：

《天道溯源》(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1872年)。

《中国人的教育、哲学和文学》(The Chinese: Their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Letters，1876年)。

《西学考略》(1883年)。

《翰林志》(Hanlin Papers，1894年)。

《花甲忆记》(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1896 年)。

《中国古世公法论略》(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China,汪凤藻译为中文,1897 年)。

《性学举隅》(1898 年)。

《围困于北京:中华抗击世界》(The Siege in Peking:China against the World,1900 年)。

《汉语快捷认读法》(The Analytical Reader:a Short Method for Learning to Read And Write Chinese)。

《中国知识》(The Lore of Cathay,or the Intellect of China,1901 年)。

《开封府犹太碑》(The Jewish Monument at Kaifengfu,1906 年)。

《中国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1907 年)。

《中国的传说和诗词》(Chinese legends and lyrics)。

《万国公法》是丁韪良译自西方的一部法学著作,译完后通过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上呈清廷,但被冷落。1864 年普鲁士军人在中国领海内扣押一艘丹麦商船,双方发生争执,无法了断。后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援引《万国公法》中有关法规提出了处理意见,普方才不得不把所扣船只移交中国。该书因此得到恭亲王奕䜣(1833—1898)等人的认可,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资助刊印,并颁发各省督抚作为断案参考。

《格物入门》是丁韪良编著的一部科技教材,全书共分七卷:第一卷为水学,第二卷为气学,第三卷为火学,第四卷为电学,第五卷和第六卷为力学,第七卷为格物测算。出版后受到知识界的普遍欢迎。

《西学考略》是丁韪良回美途中顺访英、法、德、意等国的考察报告。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介绍了西方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风俗文化、科技新知、经济发展和教育状况;下卷介绍了西学的哲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动植物学,以及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

《天道溯源》是丁韪良的一部布道文集,1854—1912 年先后印行中文、日文和韩文 30 余版,是 1907 年召开的百年传教大会上获得基督教最佳世纪奖的唯一图书。该书的特点表现在作者巧妙地借用儒家术语和理念介绍基督教教义,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精神结合起来,认为信奉上帝符合儒家伦理,虽然有别于佛教信条但不违背。尽管从孔孟思想角度讲述一个新宗教的传教方法以前来华传教的外国人也采用过,不算是欧美基督教传教士的首创,然而对于具有其他民族文化背景的人来说,若不熟悉经史子

集是很难做到的。他的汉语功底当在同时代的美国学者之上。

林乐知,字荣章,1836 年 1 月 3 日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伯克郡,父母早亡,由姨夫姨妈抚养长大成人,后来随他们迁到佐治亚州的梅里韦瑟。1854 年秋天林乐知进入埃默里学院(Emory College)学习,1858 年 7 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这年夏天他与玛丽·休斯敦(Mary Houston)结婚成家。

1859 年年底林乐知受美国南监理会的派遣,携夫人和幼女从纽约来华,于 1860 年 7 月 13 日抵达上海。1861 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林乐知与派遣教会失去了联系,因此也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养家他不得不从事世俗工作,先后做过煤米经纪人和棉花销售,同时苦学中文,在领事馆兼职通译。1863 年 3 月他在上海同文馆(后改名为广方言馆)谋得教习一职。每日上午在馆内教授英文,下午到江南制造总局译书,晚间编辑报刊,周日还得外出布道或者处理教会事务。他每天忙碌,觉得自己的世俗之路已经越走越远了,心中难免时时自责。半年后,他在同文馆的教习职位被归国留学生黄胜所取代,岂料四年后黄胜以孝养告退,林乐知才再次被聘为英文教习。

1868 年江南制造总局增设翻译馆,广方言馆彻销并入,他被聘为西书翻译。此外他还兼任《上海新报》(Shanghai Daily News)编辑。同年 7 月他自费出版《教会新报》(Review of the Times),意在重振衰落的教务。该报版面 7~8 页,内容除了讨论教义发布教会消息外,着重介绍的是科学新知、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社会和时政,每周六出版面市。因为收费合理,除上海读者外,北京、汉口、福州、广州等地的读者也争相订阅,发行量不断扩大。

1874 年 9 月由于得到广学会的资助,《教会新报》100 期后改名为《万国公报》(Chinese Globe Magazine,1868—1907)。林乐知担任总编辑,发行人除了他自己外还有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y,1862—1927)和陆佩。撰稿人有丁韪良、艾约瑟、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狄考文等近百名传教士。改版后该刊成为政治、经济、科学和宗教的综合性中文刊物,西学内容丰富,曾追踪报道过中日甲午战争,连载过林乐知对于中东事态的分析和评论,发表有关变法文章达数百篇之多,因此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读者的欢迎。1883 年《万

国公报》因故停刊。四年后林乐知加盟同文书会(The Chinese Book and Track Society)。1889 年 2 月《万国公报》复刊后改为月刊,成为广学会(Society for the Discus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的机关刊物,仍由他主编。广学会由同文书会改组而成,1894 年成立,宗旨是"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新学广中国之旧学",赫德任会长。《万国公报》1907 年终刊,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我国发行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的一份西人经营的刊物,对后来中国的维新运动起到了重要的启蒙和推动作用。当时许多政要如李鸿章和张之洞等都长期订阅该刊,革新派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也是其热心读者。

1879 年林乐知在苏州创办博习书院。1882 年他辞去了广方言馆教习和翻译馆的翻译职务,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桥筹建中西书院(Anglo-Chinese Methodist School),建校资金由监理会承担,图书费用向社会募捐。第一年就招生 400 余人,得到了许多政界人物的支持。第二年,他又在虹口吴淞路增建分校。经四五年西国劝捐,购得扩建分校附近土地 35 亩,另建新校舍。两部合并后正式命名为"中西书院",自任院监。学生按照初、中、高三级分班,教学上中西兼顾,科目包括数学、科学、地理和政治,宗教内容较少,学生也不必成为教徒,这在当时也算破例。1911 年苏州博习书院与中西书院合并后扩建为东吴大学,林乐知为董事长,东吴大学主楼被命名为"林堂"。

1890 年经监理会核准,林乐知又筹建上海中西女塾(McTyeire High School),第二年 3 月正式开学。该校学制 10 年,以西学和英文为主,格致、算学、地理、宗教都用英语授课。中西女塾开校时仅有学生 5 人,几年之后盛况空前,成为上海上流社会女子向往之校。

1877 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首届宣教会议(The First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林乐知和狄考文发起成立益智书会(即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写高级和初级两套教义、数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地质、天文、测量和体育等科教材,初级教材由傅兰雅负责,高级教材由林乐知负责。1890 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宣教会议,决定把益智书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1916 年改名为"中国基督教教育会"),先后出版了算术、几何、历史、地理、语言、动物、植物等各类教科书 98 种 20 余万册,供应全国大中小学。林乐知积极参与了教育会的各项活动。

林乐知的编著很多,其中主要有:

《中东战纪本末》(初编8卷,蔡尔康译,1896年)。

《文学兴国策》(An Strategy to Develop the Country Through Education,日本森有礼原编,任旭述,林乐知译)。

《五洲女俗通考》(Women in All Lands,21卷,1903年)。

《中国的国际地位》(China's Place Among the Nations)。

《中西关系略说》(1876年)。

林乐知在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和海关任职18年中,共译书47部和《万国地图》一册。1876年,清廷为表彰他办学和译书方面的贡献,特授予他五品顶戴,后又"钦加四品衔"。1878年他的母校埃默里学院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林乐知曾先后五次返美。1905年5月林乐知返美期间受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接见。1907年5月31日他病逝于上海。

林乐知在中国生活47年,以翻译家、教会教育家、报人、中国通和中西文化架桥人的多重身份在早期美国汉学史上留下了美名。1888年他回美前徐少范作《送林荣章先生暂回美国》七古相赠。诗中写道:"天生奇人在殊域,三万里来游中国。著书立说镛斯民,热肠耿耿忠且直。咸同之间鼙鼓竞,东南半壁豺狼横。先生出入自翩然,凭仗孤忠化枭獍。从此以后东南平,皋比坐拥沪滨城。满门桃李新阴盛,声名鹊起皆簪缨。更具大志兴中土,树人百年化雨时。宏开书院参中西,雅量高才谁为伍。"①

六、伯驾、嘉约翰和柏乐文的医药传教赢得称赞

"医药传教"(Medical Missions)是欧美教会在华实行的一种重要传教手段。其实从教义上看,早期基督徒一直把"关心弱者,救治病人"视为神职人员的职责,《新约全书》中的《使徒行传》就有多处记载了彼得和保罗等教徒医治病人的事迹。1835年美国长老会派遣伯驾在广州新豆栏设立眼科医局(博济医院的前身),1858年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在广州创建博济医院,1883年美国南监理会派遣柏乐文到苏州创建博习医院,1899年美国长老会派遣女医生富马利(Mary Hannah Fulton,1854—1927)在广州创办广东女医学校和医院,都是当时美国来华传教士

① 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汉口: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43页。

传道活动的一部分。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医药传教”深得民心,也是美国新教传教士赢得中国社会话语权的重要途径。

1831 年伯驾在耶鲁学院(Yale College)学习神学和医学课程,三年后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1834 年 10 月他受美部会的派遣前往广州。因为清廷禁教不能进入内地,便前往新加坡学习中文一年。

1835 年 11 月他再次返穗,以年租 500 美金租下新豆栏街丰泰行 3 号的一座三层楼房,开办了一家眼科医局(Ophthalmic Hospital)。他用西医杀菌、药物和手术治疗等办法为当地居民医治眼疾,同时也收治其他各种常见病。在物质匮乏的艰难年代他的义诊无疑是件好事,逐渐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欢迎。据说第一年他诊治病人的总数就高达 2152 人次,其中诊治眼疾 47 种,其他疾病 23 种,还接待来访者 6000~7000 人次。若干年后他的名声大振,病人不远千里而来,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西等地均有患者慕名前来求医问药。

伯驾平时忙于救治病人,但是也不忘他的传教使命,还请来中国基督徒梁阿发从中协助。每个星期一,梁阿发都在医局门口向病人宣讲福音,给医院里的每一个患者分发布道传单,周末还举行简单的礼拜仪式。

伯驾在诊病中接触到许多人,有平民百姓,也有社会名流。1839 年 7 月,钦差大臣林则徐曾通过高级行商将瑞士瓦特尔(Emeric de Vattel)所编《各国律例》(Law of Nations)中的部分段落送给伯驾请他代译中文,并就国际法中关于战争及其后果提出咨询,还请他开出治疗吸食鸦片者的药方。数月后林则徐还为治疗疝气通过海南知县向伯驾求药。伯驾转托来访者捎给林则徐一副疝气带和一些治气喘的药,还为他建立编号为 6565 的病历一份。钦差大臣耆英也曾派随从向伯驾求治皮肤病药,经精心调治好转后,托专人将亲笔题赠手书“妙手回春,寿世济人”送至伯驾医局。

伯驾通过“治病传教”把当时一些先进的西方医术介绍到中国,例如肿瘤和膀胱切除、乙醚麻醉以及截肢等。此外,他还把西方医院的管理制度引进到中国。例如患者诊断记录和治疗档案的建立与保管、对疾病的分类等等,为中国各类医院的业务管理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随着伯驾新豆栏医局的影响逐步扩大,传教士们开始思考如何进一步开展“治病传教”的问题。早在 1835 年 12 月,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1769—1879)就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了一篇

题为《关于聘请专业医生以传教士身份来华的建议》的文章，呼吁欧美各传道会增派传教医生来华，引起了各派教会的积极响应。

1836 年 10 月，伯驾、裨治文和郭雷枢联合发表了一份倡议书，建议成立中华医务传教会。1838 年 2 月 21 日，在广州外商总商会（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举行了一次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郭雷枢被推选为会长，伯驾、裨治文和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 —1845）为副会长。他们在各个场合发表的讲话、倡议和宣言都强调救死扶伤不但可以传递福音，而且还包含着更多的世俗意义。此举对于当时英美各教会在华的传教活动产生了颇大的影响，例如后来来华的英国传教医生雒魏林（Lockhart William，1811—1896）和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等人也都参照伯驾方式在中国悬壶济世。

伯驾也非常注重对中国青年医生培养。他先后招收过一些中国学生，有计划地对他们进行英语和医学方面的培训，还安排他们定期到医院实习。20 年中他在广东各地开设多家分局，培养了一批技术超凡的华人西医。

1843 年美国公理会因不满伯驾在传教方面的业绩，撤销了与他签订的协议，进而又中断了对他的经济支持。1844 年伯驾干脆辞去广州的行医职业，在顾盛来华使团任通译。1845 年他被委任为美国驻华使馆参赞，此后曾三次代理公使职务，1855—1857 年被正式授命为美国驻华公使。1857 年 8 月他卸任回国，1879 年任中华医务传教会驻美会长。

伯驾当年所开眼科医局交由美国来华传教士嘉约翰经营。他在广州行医 44 年，编译撰写过医科专著 34 种，从中可以看到伯驾济世救人的楷模作用。

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美国长老会教徒，1847 年毕业于费城杰斐逊医学院。1853 年他携新婚妻子金斯伯里（Abby Kingsbury）来华，1854 年 5 月 15 日抵达广州，在眼科医局协助伯驾工作。1855 年伯驾出任美国驻华外交官后，眼科医局由嘉约翰全面负责。1856 年该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遭焚毁，嘉约翰返美后到费城杰斐逊医学院进修。期间他曾四处奔走呼号为重建广州眼科医局筹款，购置了一批医疗器械。1858 年年底他回到广州，在原来眼科医局的遗址上创建了博济医院。1862 年该院开始招收学生，为当地培养了急需医学人才。1865 年他

又购置一块地产扩建医院，使之成为一家多功能医院。

博济医院专治眼科，也做其他外科手术。资料显示：嘉约翰一生中共接待患者74万人次，做过近5万台手术，仅1874年博济医院便成功地完成368例结石手术，1875年完成首例卵巢囊肿切除术之后，逐渐增加肿瘤切除业务，为无数患者解除了病痛。他还培养了150名西医，编译医学书籍34种。1868年嘉约翰编辑出版了中文版的《广州新报》，向广大市民宣传医疗卫生知识。1880年嘉约翰又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份西医杂志《西医新报》，对于在中国推广西医知识做出了有益贡献。1871年他译介了有关西药种类、制法、功效及用途的医书《西药略释》，正式出版发行，受到医界同行欢迎。

博济医院的发展扩大，主要靠传教士医生的奉献精神，对于穷苦患者关怀备至，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另外也得益于留美回国的中国学者的帮助，他的学生关韬、苏道明和梁晓初后来加盟博济医院，壮大了医护人员的阵容。创办于1838年的广州医学传道会曾在美国为博济医院募集了一笔可观的款项。英国教会和商人以及两广总督等官员也曾慷慨为博济医院捐款，使之成为广州影响最大的西医医院之一。

1866年嘉约翰在博济医院内设立了博济医校，还在广东其他地区设立了分院。1898年他在广州建立了第一家精神病医院（即“花地医院”），培养了一批批西医人材。他下乡传道时常常沿途施医送药。1879年博济医院更名为南华医学校，并开始招收医科女生，1886年孙中山先生也曾在该校攻读医科专业。

1901年8月10日嘉约翰在广州逝世。他在中国传播西医西学近半个世纪，闻名遐迩，无愧于“中国西医西药奠基人”的称号。

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1858—1927）出生于美国乔治亚州加图萨，在家中11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由于家境清贫，父亲在南北战争中失去了左手，年幼的柏乐文8岁时就下地帮助父母种玉米、播麦子、除草，11岁时还学会了耕地，做各种农活。

1867年美国南监理会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回国的传教士带回的消息深深地打动了幼年的柏乐文，对中国的向往激励他发愤学习。1877年他穿着母亲用土布做成的衣服就读于艾默里大学，常常食不裹腹，有时只能吃番茄充饥。1879年秋天南监理会决定选派他来华，进修医学是他

必须做的准备工作之一，三年后他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

1882年5月20日他与兰华德(Walter Russell Lambuth)等人乘船从纽约出发，在爱丁堡和伦敦短暂停留进一步充实业务后便取道苏伊士运河来到中国。1882年12月17日他们到达苏州，立即设法筹措资金创办医院。

早在1877年兰华德就已在天赐庄租赁民房试办过诊所。此次与柏乐文来苏州，很快就熟悉了环境，跃跃欲试准备干一番事业。不久他们获得教会和几位苏州士绅的捐款1万美元，便在天赐庄购买了7亩土地。1883年4月8日医院破土动工，半年后一切就绪。

这家被命名为苏州博习医院(Soochow Hospital)的医疗机构，共有平房8栋，其中1栋为诊室，1栋为手术室，3栋为内外科病房，设病床30张，另外3栋分别为宿舍、洗衣房和厨房。1883年11月8日医院正式开张，院务由柏乐文和兰华德主持，第一年门诊量就高达7600人次，住院125人次。

1884年柏乐文回美国进修，两年后重返苏州担任院长职务。在1927年退休之前的45年的时间内，他对博习医院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柏乐文来华前曾专门到纽约、爱丁堡和伦敦各大医院考察，引进了西方不少新技术和新设备。他每次返美都不忘学习先进医疗技术，当时苏州博习医院使用的消毒法、麻醉法和X光透视设备，都是他从美国引进的。1886年春他还从美国带回可卡因眼角膜麻醉法的技术。

柏乐文还十分重视育才兴学。1887年苏州妇孺医院成立，他与该院斐医生合作开办了一个学制为期5年的学士医学班，培养了大批人才。1903年他在担任东吴大学教务长时还帮助筹建东吴大学医学院，1904年将学士医学班并入了该校，1888—1909年共培养6届学生28人，分别输送到上海、常熟、无锡、北京、天津、武昌等地医院，有的还留学美国。柏乐文的医疗技术和人才培养对苏州、苏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影响深远。

1919年博习医院用教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地方募捐的20万银元在原址建设新医院，1920年开始动工，1922年春落成，占地7.6亩。先后建成住院大楼和门诊大楼各一栋，设床位100张，在当时这一规模堪称一流。

柏乐文十分关心苏州社会的各阶层民众。他呼吁对妇女缠足的陋习进行改革，与他的夫人为妇女放足四处奔走呼号。立德夫人到苏州就放足问题发表演说得到了柏乐文的帮助，他的夫人积极参与组织工作，动员名

媛贵妇前来听演讲,会后还隆重举行了苏州第一个放足会,柏乐文为参会妇女进行了具体指导。

柏乐文还重视当地的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工作。当时疟疾、霍乱和鼠疫之类的传染病十分猖獗,柏乐文一家都曾染上疟疾。为了改善医院周围环境,他组织医护人员在医院周围地上铺石灰和沙子,博习医院的医生还去东吴大学讲解蚊虫的危害与防御方法,并号召每晚开展灭蚊活动。1919年苏州瘟疫流行,博习医院除尽力救治病人外,还提出了清洁街道、疏通沟渠、消灭蝇虫等预防措施。1916年柏乐文到监狱为犯人看病,针对犯人普遍患有严重脚气病的情况提出改进管理、调整伙食等防治办法。

1927年年初柏乐文退休回美,同年12月14日去世。他一生中将近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苏州度过的,以高超医术和爱心服务中国百姓,为苏州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后来他的骨灰被运到苏州安葬于葑门外安乐园。

七、美国传教士对西方来华鸦片商的谴责

18世纪上半叶向中国走私鸦片的西方商人多半来自英国、美国、葡萄牙和荷兰,毒品贩运以澳门为据点,然后转销中国内地。1830年以后沙俄商人也从中亚向中国走私鸦片。1727年英商向中国走私鸦片约200箱,1767年他们从孟加拉运到中国的鸦片数量增加到1000箱,1800年达到2000箱,1820年增加到5147箱,1824年高达12639箱。此后毒贩更得寸进尺,1837年价值2500万美元的39000箱鸦片被偷运进了中国。①

1773年印度殖民政府把鸦片贸易垄断权交给了英属东印度公司,1797年该公司又获得了鸦片加工的特权,用垫款方式引诱当地农民扩大鸦片种植,还在加尔各答等地设立了鸦片加工厂,并通过官商在市场公开拍卖后走私到中国,造成烟毒泛滥。1813年印度上等鸦片公班土(Bengal opium)每箱成本约237卢比,但是每箱拍卖价格竟高达2428卢比,利润超过成本9倍。印度殖民政府按鸦片成本300%以上的税率征税。从1800年起,英属东印度公司在拍卖鸦片后表面上不再过问对中国的鸦片运输和

①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13—7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销售问题,因为清廷已经在此前4年就严禁鸦片进口,不过问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鸦片战争之前,包括旗昌洋行在内的在华美国洋行,多数都以不同方式走私鸦片。由于印度鸦片基本上都被英属东印度公司所控制,美商便把目光瞄准了地中海和波斯湾。经过20多年的搜罗美国人终于在土耳其发现了大宗烟土,1805年三艘满载鸦片的美国商船驶向了广州。1806—1834年美国烟贩从土耳其运到广州的鸦片共8901箱,此外还从波斯和伦敦收购了大量鸦片。美商塞缪尔·罗素和约翰·雅各布·阿斯托从波斯鸦片买卖中获利比土耳其鸦片高出25%。美国鸦片走私船"风精号"、"西风号"和"瞪羚号"都配备武装押运,还负责把烟贩在广州包销的鸦片运送到沿海其他口岸,气焰十分嚣张。

土耳其鸦片俗名"金花土"(Turkish opium),质量不如"公班土",但是因为价格便宜畅销亚洲。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数量很快就超过了荷兰和葡萄牙,对英国构成了威胁,因此不时受到英国对手的打压。1821年印度鸦片丰收,英国破例允许美商贩运部分鸦片,使美国对华鸦片贸易规模迅速扩大。

此前,除了花旗参、皮毛和檀香木外,美国能与中国交换的商品并不多,不得不运来白银换取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家具和棉布。从19世纪20年代起美国可出手的现银已不敷使用,经营鸦片走私以后,美商便设法用中国商品直接向孟加拉和土耳其换购鸦片,然后运到中国套取白银。走私已成为美商对华贸易中利润最丰厚的一宗买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国输往中国白银的不足,使中国的对外贸易从出超降为入超。

裨治文是较早关注西方商人在中国走私鸦片的美国传教士。1837—1840年他和卫三畏在《中国丛报》上刊登了10余篇文章,揭露鸦片贸易对中国商业、政治和道德所产生的拙劣影响。裨治文有关鸦片种植和贸易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文章和评论,笔锋犀利,受到了广泛关注,对早期美国反对鸦片贸易的公正舆论起到了正面导向作用。他的《对华鸦片贸易史》和《论当前鸦片贸易危机》等文章对丧心病狂的鸦片贩子展开了檄文式的声讨,敦促美国在华传教士对林则徐禁烟运动予以支持。1839年9月美国传教士在向美部会提交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的意义和效果,为美国公众舆论提供了正面信息。

柏乐文等传教士眼看鸦片在中国的流毒坚决主张禁烟。苏州博习医

院在创办之初就设有戒烟室，1900 年又专设戒烟医局。据统计，1908—1909 年度该院就收治吸毒者 1210 人，并治愈其中 1058 人。英国皇家委员会曾在一份报告中宣称：对东方人来说鸦片是一种好东西，因为它能治愈一些疾病。柏乐文对此非常愤怒，专门收集了医生们有关鸦片流毒如何对中国人造成身心伤害的资料汇编成书，向世界公布真相，作为对英国皇家委员会报告的驳斥。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伯驾在反对鸦片贸易的纽约商人奥立芬（David Washington Cincinnatus Olyphant，1789—1851）的资助下一度返美，分别向美部会和公众报告了有关中国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情况。伯驾在多次布道演讲中谈到中国的鸦片祸害和传教士的态度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公众的关注。1843 年年底顾盛奉派来华，美部会在华传教士为美国代表团提供了咨询和翻译服务，裨治文和伯驾都参与了中美条约谈判。他们提出的《望厦条约》草案得到了部分采纳。1844 年中美两国签订的《望夏条约》共 34 款，其中附件《海关税则》明确指出鸦片为违禁品。条约第 33 款规定：任何美国公民“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这一条文反映了美国来华传教士和公众反对鸦片贸易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但是中美《望厦条约》扩大了美国在华的领事裁判权范围，最终使有关禁止鸦片走私并惩罚违法美商的条款成为一纸空文。后来许多美国传教士也改变了对华鸦片贸易的态度，客观上默认了西方列强为在中国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所作所为。

美商经常通过《中国丛报》了解清廷的禁烟动向，希望守法商人可以得到保护。美国官员曾在不同场合向中国政府表示不支持鸦片贸易。但是在英国“远征军”即将到达中国海岸时，《中国丛报》作为美国传教士所办刊物，却开始对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提出批评。1840 年 1 月裨治文在为《中国丛报》所写的社评中说，鸦片的确在摧毁中国人的健康和道德，但是迄今为止为此进行的努力几乎摧毁了所有外国与该国的贸易，而且可能使它卷入战争的灾难。①

南卡罗来纳州传教士杜步西（Hampden Gait Du Bose，1845—1910）

① E.C.Bridgman：*The New Year* 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 8，No. 9，p. 444. 1840.

1872 年从哥伦比亚神学院毕业后，奉美南长老会派遣和妻子保利娜(Pauline)一起到苏州传教。他目睹鸦片贸易给中国人民和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毅然与柏乐文等传教士联合基督教医疗工作者成立了中国禁烟会，并担任首任会长。1899 年禁烟会出版了《逾百名医生坦陈在华使用烟土之见解》(Opinions of Over 100 Physicians on the Use of Opium in China)，直截了当地提出禁烟会的宗旨，公开谴责鸦片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号召公众舆论支持禁烟。禁烟会获得了罗斯福总统、主持正义的部分议员和万国禁烟协会的支持。杜步西征集了 1000 多名在华传教士在请愿书上签名，呈送光绪皇帝。在一封写给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克劳林(John MacLaurin)的信中，他呼吁美国负起对鸦片贸易的责任，因为美国和英国通过损害中国人的精神和健康获取不义之财。

美国布法罗州立学院的迈克尔·拉齐克在《19 世纪美国传教士与对华鸦片贸易》一文中写道：

> 美国必须直面早期中美外交关系中备受争议道德上备受质疑的鸦片贸易问题。鸦片贸易对于 19 世纪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是中西关系史上长期存在争议的话题，该受道德谴责的民族和政治大问题更当如此。审查胆大妄为的走私贩子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中国官员、传教士和英美两国政府的相互勾结，是一件需要对动机和事实进行全面考察的敏感工作。好在可供研究其目的和观点的鸦片贸易参与者和竞争对手的材料都很充分。传教士的文件、条约港市的报纸、中西官员的外交函件以及其他许多当代文档，都可提供大量有关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信息。①

八、芮思娄、高鲁甫和卜凯的农业传教新思维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稼穑为历代百姓关心的大事，田赋为国库主要岁收。1851 年(咸丰元年)全国人口总数已达 4.319 亿，小农经济和农业人口构成了基本社会层面。在两次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① Michael C.Lazich: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the Opium Trade in Nineteen-Century China*, i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ume 17, Number 2, June 2006, p. 197,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之后，社会经济日趋恶化，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虽然少数农业人口开始转化为近代工商业人口，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大多在广州开展教务，《中美望厦条约》签订之后他们的活动区域延伸到沿海各通商口岸。为了扩大传教范围，他们先后进入了南北方广大农村，农业传教（Agricultural Missions）逐渐成为与医药传教和教育传教（Educational Missions）并列的传教方式之一。

历史上美国传教士对于中国农村发展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一是通过办学、赈灾、治病、布道，宣传社会平等的观念和改变贫苦现状的思想，鼓励灾民垦荒自救，反对妇女裹足的陋习，引导人们对社会改良的关注；二是把欧美的农业技术引进中国，推广作物改良、科学种地和园艺技术，购进优良水稻、果木和蔬菜种子，开展嫁接和移栽试验；三是创办金陵大学农科（agriculture faculty）和岭南学堂农科，把美国农业院校培养新型人才的教学、科研和管理体制介绍到中国，建立示范奶牛场、柑橘引种站和良种交换站。有些地方教会还先后建立了农业教育委员会，召开农业传教会议，或者在教会大学开设土壤学、农业概论、乡村经济学和乡村社会学等课程。

早先美国来华传教士主要关注城镇的传教工作，教会把80%的人力和物力放在人口仅占20%的城镇，期待通过城镇把福音传播到周边乡村。少数被派往乡村的传教士对于农民和农事知之甚少，所实行的计划和使用的传教小册子多半都根据城镇情况编写，因此收效甚微。他们的主要着眼点是传教手段的多样化，并不关心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实际需要，更不了解教会教育世俗化和职业化已为大势所趋，担心把农业教育引入课堂会使传教工作过于职业化和物质化。但是美国传教士中也出现了一批先知先觉的农业传教先行者，为教会乡村化（Ruralization of Christian Churches）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倪维思是一位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出生于一个农场主家庭，从小就受到基督教文化熏陶。1853年他被按立为牧师，1854年来华，在上海、宁波和杭州等地传教。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山东登州（今蓬莱）作为商埠对西方传教士开放。1861年倪维思和妻子到了登州，在一所破旧的观音庙开展工作。1862年他们在登州开办第一所女子学校，虽然只有两名女童入学，但是在当地却产生了很大反响。

1871 年他们移师烟台，把注意力集中到农村地区。他们在毓璜顶东南山坡买下 10 余亩土地辟为示范农场，传教之余栽种从纽约州带来的苹果、葡萄、梨和梅等十几样种子，精心加以管理。倪维思年轻时就学习过果树栽培技术，发现山东的气候和土壤与美国水果产地有相似之处，但是水果的质量却不如美国。他把美国苹果与当地果苗进行了嫁接，结出具有特别香味的香蕉苹果，很快就驰名全国。

1877 年山东省发生了旱灾，倪维思到临朐县赈灾，捐助救济银 7600 两，使更多灾民得到了救助。

倪维思在中国传教的 40 余年中有一半时间在烟台度过，期间曾经多次返美休假。

1890 年欧美传教士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圣经》翻译委员会，倪维思参与了官话版《圣经》的翻译与校对工作。他连续几个月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专心致志地工作，任务完成后他才启程回美国探望病中的母亲。1892 年 9 月初，他告别了亲人从纽约州北上休伦湖和苏必利尔湖辗转到达温哥华，等待班轮前往中国。9 月 18 日倪维思登上了“中国皇后“号，开始了他们的最后一次中国之行。

1893 年倪维思在烟台去世。他一生著述颇丰，除了经常在《教务杂志》上发表文章外，还出版了英文著述《中国和中国人》（China and Chinese：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and its Inhabitants）、《传教会工作方法》和《神学总论》等，这些书刊对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极具参考价值。

倪维思夫人（Helen S.C.Nevius）1861 年随丈夫一起到登州，1893 年丈夫去世后她继续在烟台和登州等地传教，1910 年辞世。她除传教和教学工作之外，业余时间也写了不少文章，包括中文小传和长老会来华传教史等。

美国传教士梅理士（Charles Rogers Mills，1829—1895）出生于纽约州吉尔福德。1856 年 10 月受美北长老会派遣来华，翌年 2 月抵达上海。1862 年他转往山东登州，传教 34 年。1887 年他与第二任妻子梅耐德（Annetta Thompson Mills，1853—1929）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聋哑人学校——登州启喑学馆。

梅耐德来华前曾在纽约一所聋哑学校任教。她成功地把标音法和手

语用于启喑学馆的教学，还从美国课本中翻译了分级识字手册作为教育聋哑儿童的教材，为中国的聋哑儿童教育开创了新路。她设计的手语字母表后来为中国许多聋哑儿童学校所采用。

梅理士将美国大花生种子运到登州，鼓励农民在海边沙地大面积种植，获得了丰收。后来该省花生和花生油成了重要的出口商品，对社会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与他的贡献分不开。

岭南学堂农科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成立是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全面实行农业传教的开端。高鲁甫和芮思娄通过对以往教会工作的反思，提出了教会乡村化的目标，把传教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赢得了广大农民的信任。无论从西方的基督教化战略还是传教士世俗化方向来看都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高鲁甫（George Weidmen Groff，1884—1954）1907 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园艺系。学生时代他就受到传教士穆德（John Raleigh Mott，1865—1955）的影响，1908 年 1 月作为志愿者到达广州，任教于岭南学堂（岭南大学的前身），成为较早来华的美国农业传教士。

他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按照校方的要求对校园环境进行园林式规划。他组织种植了榕树、樟树、龙眼、荔枝、橄榄和芭蕉，又从国外引进了棕榈、桉树、白千层、木麻黄、南洋杉、大王椰子和长叶刺葵，几年后校园便掩映在郁郁葱葱的南国林海之中。

高鲁甫在岭南学堂最初几年主要教授英文、地理和数学等课程。授课之余他组织一些对农艺有兴趣的学生到农场劳动，给每人分配一小块地种植蔬菜，还让他们对美国的化肥进行试验，检测何种产品最适合中国的作物和土壤。1912 年他开始教授三年级学生初级农业课程。

高鲁甫为学校教师集资合办的奶牛场从国外引进了一批优质奶牛。初期只有 30 头，所产牛奶除了职工自己消费外还对外出售，第一年就盈利 180 美元。后来奶牛场还增添了印度和中国水牛 140 头，山羊 25 头。

高鲁甫进入岭南学堂的第一年就从美国夏威夷引进一株木瓜苗，栽种于校园内，后来繁殖了数十株。1912 年他又从夏威夷引进了 400 株木瓜，在校办农场进行选育改良，使原来仅用作蔬菜和药材的木瓜大放异彩，用途更加广泛。

脐橙也是他从美国引进的优质水果之一。据考证，1516 年葡萄牙人

把中国甜橙带回里斯本,后又传播到西班牙和巴西。1870 年美籍华人雷敬刚在加州成功嫁接了脐橙,便成为美国大众喜爱的一种水果。1922 年 2 月,通过高鲁甫的努力,岭南大学农学院与美国农业部合作建成了柑橘引种站,先后从美国向中国引进了加州脐橙、小河葡萄柚和宽皮蜜橘等水果。

美国农业部外国种子引进局还在高鲁甫的提议下向岭南大学提供了杏、梅、桃和梨等优质种子,以及石榴、肉桂、鳄梨、甘笋、树菠萝、灯笼果、澳洲坚果、甜糯米粟和秘鲁绵豆等种苗。

1915 年高鲁甫在菲律宾科学局成员梅丽尔的帮助下,在学校创办了一个植物标本室,将搜集到的植物制成标本,几年后成为中国收藏南方植物最全面的标本室。

1916 年,岭南学堂开办文理科大学,9 月 3 日召开了农学部首次教务会议,高鲁甫出任主任。农学每周课时为 2.5 小时,正式成为该校与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列的课程之一。

1918 年高鲁甫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园艺学硕士学位。从现代植物学分析研究荔枝形态结构和机理,高鲁甫当属第一人。他对荔枝的兴趣一直保持了 20 多年,还把荔枝种植技术推广到美国。1918 年冬他回国休假,特意带回糯米糍、桂味和黑叶荔枝等种苗。1935 年,夏威夷州政府为了感谢他引种荔枝的贡献,特地从这年长成的黑叶荔枝中选出一株优良植株,经嫁接成活后命名为“高鲁甫荔枝”。

1921 年,在当时广东政府和粤港富商李煜堂、马应彪和陈廉伯等人参与下,兴资 30 万元创办了岭南农科大学,高鲁甫任校长。1927 年该校并入了岭南大学,他先后担任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园艺系主任和经济植物引入站站长等职。农学院在他的领导下发展迅速,学院农场开辟了菠萝园、木瓜园、柑橘场和蔬菜园。其中秧苗场的品种三百余种,每年向社会销售数量达数万株。农场还引进了美制的割草机、播种机和除草机,盖起了温室。

1937 年,他带领一个地理考察团到广西考察,在桂北永福县山村发现了罗汉果,便与植物学家史怀夫对罗汉果进行了研究,揭示了许多前人未知的奥秘。

1941 年高鲁甫病休返美时在佛罗里达找到了一个气候与广州相似的农村,建成了一个植物交流站,计划与岭南大学进行种子和种苗交换,但是因为当时日本侵华战争的烽烟四起,未能如愿。

1945 年高鲁甫回到广州，对办校的历史进行了全面回顾和总结，撰写了《岭南大学农学院在过去 35 年的成就》一文，准备战后大显身手。第二年他任职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负责农业作物引种工作。

高鲁甫到达广州后就开始奔走于岭南各地，做了大量的植物资源调查，编成《广东柑橘属植物调查报告》，并在《岭南农学会年报》上发表了《制止橘类虫害病症法》等文章。1919 年他撰写的《岭南荔枝》论文荣获民国政府农林部甲等奖。1921 年他的《龙眼与荔枝》一书在纽约出版，是西方农学界最早研究荔枝和龙眼的著作之一，先后再版了 10 余次。20 世纪 20 年代他主持出版了《岭南农学杂志》和《农事双月刊》等刊物，为广东农业科学研究创建了交流平台。1937 年他与同事合作完成的《广西的罗汉果》一书，填补了该项研究的长期空白。1943 年他还在《佛罗里达州园艺公报》上发表了《荔枝成功种植的生态因素》和《福建陈紫荔枝历史的再阐释》等文章。他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的成就，为向社会普及农学、林学、园艺以及食品知识的工作和中美学术交流做出了有益贡献。

他热爱中国文化，来华三年就学会了粤语。他与中国同事友好相处，家中常常高朋满座，其中不乏中国政界学界名流。他的一些学生后来都成为著名农学专家。1940 年民国政府教育部授予这位在岭南大学任教 20 年的美国学人服务一等奖。1953 年，因他在中国的杰出贡献和卓越表现，荣获了宾州大学的“杰出校友”称号。

1947 年高鲁甫退休回到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劳雷尔。1954 年 12 月 4 日他因病去世，留下了 50 篇（部）的研究著述和手稿，但是原来计划撰写的《植物手册》一书未能脱稿。

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创建得益于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裴义理（Joseph Bailie，1860—1935）。他的祖籍加拿大，出生于爱尔兰。1890 年他奉美国北长老会派遣到苏州传教，在阊门外上津桥租房布道，闲暇之余还在郡庙教英语，1899 年被京师大学堂聘任为教习。1911 年淮河流域发生水灾，他前往救灾，发起成立中国义农会，引导灾民垦荒自救。1912 年他改任金陵大学教授，联合当地乡绅购买荒山 4000 亩，指导灾民用新法造林种地。1914 年他向美国金陵大学董事会申请创办农科获得批准，开始招收以“培养农事指导员”为宗旨的四年制本科生，学生多半是由当时的农商部所属的农业学校解散后转学而来的。第二年该校又增设林科，农商部的森林传

习所与农科合并为农林科，裴义理被聘任为首任科长。1916 年德国在青岛创建的林业学校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而解体，部分学生转学到农林科就读，规模得以进一步扩大。

有一年清明节裴义理从南京乘火车去上海，沿途看见各地村民都在自家的祖坟上栽种树木，经询问得知这是中国的传统习俗。回南京后他给民国政府农商总长张謇写信建议把清明节设为植树节。不久他得到北洋政府复函，告知已通令全国有关植树节的决定。

1917 年裴义理辞职返美，由康奈尔大学毕业的育种专家芮思娄（John Henry Reisner，1888—1965）任农林科主任。这位新来的美国农业传教士十分注重对中国农业现状的调研，把推广农业科技为该校教研目标，在任期内把美国农业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管理模式引进到金陵大学。1918 年农林科与万国蚕桑合众改良会合作成立蚕桑学系，翌年成立蚕桑特科，由美国学者吴伟士（Charles W. Woodworth，1865—1940）主持。根据 1920 年制定的发展规划，他们的教学与研究重点被定位为品种改良、自然灾害防治和植树造林等领域。1921 年该校设立了农业经济学系，由卜凯主管行政和教学工作。因为该校管理思想先进，教学设备完善，学生成绩优秀，获得了中国教育部单独注册，成为当时中国私立农科大学在教育部注册备案之佼佼者。1923 年该校获得美国对华救灾基金 70 万元，农林科利用此项专款在河南、安徽和南京等地置地开展有关农业改良的科学研究。芮思娄带领一个团队，经过十余年的刻苦努力，成功地培育出小麦 26 号，在农民中推广受到欢迎。1925 年由国际教育基金会资助，金陵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联合进行多科研究，培育出高产小麦、大麦、水稻、玉米、小米、大豆、棉花和高粱，形成了一套标准化和科学化的作物育种方法，训练了大批育种专家和农业人才。

芮思娄很早就提倡把农业教育导入教会中小学，主张在小学阶段开设自然课和园艺课，在中学阶段开设有关土壤、作物和灭虫等常识课，各地区还可因地制宜，设置养蚕和种植棉花等实用农业课程。他建议各地教会聘请农事专家任教，或者把教员送到金陵大学农科去培训。他认为乡村教会的任务不仅是传道，还应该为村民服务；教会应该与乡村学校联办，使之成为联络农民的场所。他在巡回演讲和撰写文章中呼吁教会重视乡村教育问题。

金陵大学农林科的成功创办印证了教会乡村化方向的光明前景，一些

美国传教会先后增派农业传教士来华，或者加盟金陵大学农林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其中有：1917 年美国长老会派往安徽南宿州的农业经济专家卜凯，以及美部会派往福建邵武的农业专家林查理（C.H.Riggs）。其他地方的传道会和传教士也积极响应，或者把农业改良定位为传教工作的一部分，或者开办小型试验园地，向学生传授栽培和种植常识。

金陵大学是中国最早成立农科的教会大学，四年制的正规农科教育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农业科技人才，在农村社会改良、农业科技发展和科研成果推广等方面，为中国的农业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16 年美国农业经济学博士卜凯到安徽淮北传教，第二年与美国传教士的女儿赛珍珠相识相恋，结婚成家。闲暇时间他在当地进行了土地、种子、耕种和产量等等方面的调查和分折，用当地的小麦与美国、日本和外省引进的 63 个品种进行比较试验，为的是筛选出能经受洪涝的品种，同时还试种了大麦、棉花、玉米和豆类等优良品种。

他常常告诉妻子自己因为不能教会中国人用科学方法种地而感到懊恼。妻子理解他的难处，劝他在了解中国农民耕作传统之前不要将自己的方法灌输给他们，最好的办法是在当地开展调查研究。他的岳父对他的工作很支持，表示愿意帮助他起草调查报告的部分章节，他的内弟支援他 5000 美元作为活动经费。

1920 年卜凯面临试验经费不足一筹莫展之时，他的校友芮思娄邀请他出任新成立的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系主任。全系师生在他的带领下对安徽芜湖 102 个农户进行了经济收入调查，之后又把调查范围扩大到 7 省 17 个地区的 2866 家农户。

1924 年卜凯回到康乃尔，第二年获得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国。1929 年他得到洛克菲勒基金资助，4 年中对 22 个省 168 个地区 16786 户农家进行了调查，撰写出了《安徽芜湖周边 120 个农家的社会经济调查》、《直隶盐山县 150 个农家的社会经济调查》和《中国农村的所有权和租佃关系》等报告。这些被学界视为中国历史上以应用科学方法进行的第一次农业调查，对研究并解决中国农村和农业问题十分有价值。

卜凯认为中国农村是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在租佃关系上英格兰的佃农比例高于中国却没有导致剥削和农业生产的停滞。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技术上的落后，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办法首先必须改

善农业经营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为此他特地向国民政府提出了108条改进农业经济的建议,其中包括建立农村金融机制、使用良种与化肥以及改善交通运输条件。

卜凯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实证性研究在学术界掀起了不小的风暴。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使用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的一些地区做了调查,结论是中国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解决的办法是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这一结论与卜凯的观点针锋相对。

当时一些美国学者对于卜凯提出的中国农业问题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卜凯对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缺乏全面了解,因此没能正确认识中国农业的经济问题。争论和论证因为所提出问题的学术含量和科学价值而不断延伸,在抗日战争和中国国内革命中农村面临巨大的社会冲击。即便今天,中国"三农"问题仍然是学界所关注的头等大事。

九、传教士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期待和影响

影响早期中美关系的因素林林总总,宗教、贸易和文化都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虽然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历来以所代表的集团利益为其最高准则,但是在不同时期侧重点却有所不同。因为历史条件的差异,宗教、贸易和文化都曾经从不同角度干预过美国的对华政策。

从现代国际关系学角度来看,宗教既是异质文明和文化的表现、跨国观念的载体,也是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信仰方式。它可以在国家与国家、群体与群体或者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调节中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可以在经济交流、文化互通和矛盾化解中发挥旷日持久的作用。宗教的普世性和排他性就如同通关文书,走遍天下都可以化陌路为相知。19世纪上半叶美国传教士来华,教籍便成为标榜他们的美国特性和国民身份的证件,以及处理对华事务的必备资格。

宗教属于广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大众阶层还是在精英群体中,宗教信仰就是信徒民族价值观的体现,必定从整体上影响到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美国来华传教士的理想就是在对被认为需要救助的中国人表示同情和声援的过程中传播福音,宣传美国的理想主义和生活方式。

宗教是早期中美关系史上左右美国对华政策的第一要素。福音传播

的社会意义曾是美国来华传教士思考最多的问题。他们被告知海外传教既包括平日宗教公关的功课修炼，也包括不同层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交往和沟通。他们提醒教众不仅要关心个人赎罪得救的可能，更要关心拯救整个社会和民族于水火的大计。基于神学观念转变的圣经解读为美国早期汉学的发展获得了教义上的认同和支持，同时也从中国教民所熟悉的儒家经典和传统道德规范中找到了相对应的理论依据。

19 世纪 30—40 年代，美国来华传教士开启了早期的中美关系。他们多数人熟悉汉语、中国文化和传统，有机会广泛接触清廷官员和各阶层民众，其中一部分人还先后从商、从政或者从教（育），具有多重社会身份。裨治文、卫三畏和伯驾等人曾利用自己掌握的汉语知识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帮助后来来华的传教士和美国政府官员开展工作，疏通各种关系。

深入基层的美国传教士通过弥撒、布道、读经和善举接近劳苦大众，为边远山区的孩子办学，教农家女童认字作画唱赞美诗，为患病村民送医送药，给孤独无助的老人提供生活救济，向那些弱势群体宣讲男女平等、自由追求和科技振兴的外部世界新闻，赢得了他们打心眼里对来自西方世界的这些“上帝代表”的感激。在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时代，不管这些传教士的动机是否在忠实履行教徒的职责还是为了赢得站稳脚跟所需的社会信任，客观上都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理念，自然而然在这一历史阶段为他们争得了基本话语权。

鸦片战争之前，美国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来华传教士通过《中国丛报》等刊物以及他们回国述职和报告所施加的影响。

饱读汉籍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曾经被聘任为林则徐的通译和美国驻华全权代表顾盛的秘书，参与《中美望厦条约》和《天津条约》的谈判，可谓神通广大。与裨治文同期来华的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在任英国驻厦门领事馆通译时曾与福建巡抚徐继畬相识，多次应约与他长谈西方各国的历史、地理和社会情况。1858 年曾任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William Bradford Reed，1806—1876）通译的丁韪良在华期间广交政界和学界朋友，也是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1898 年经李鸿章和孙家鼎推荐被光绪皇帝任命为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他曾与卫三畏在签订《天津条约》时帮助拟定其中的“宗教容忍”条款。1835 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创办眼科医局，曾通过高级行商与林则徐多次接触，提供了医治吸食鸦片者的药方和西方

法治信息。美国浸礼会真神堂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b Roberts, 1802—1871)曾用两个月时间向洪秀全传授教义,并于1860年担任洪仁玕的外事秘书。1908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曾向罗斯福总统进言将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在中国创办美式大学或者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1908年美国政府正式宣布退还相当于1160余万美元的款项,用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建设,就是对他进言承诺的兑现。1886年丁家立曾经被李鸿章聘为家庭英语教师。上述美国传教士在华的背景和阅历都非一般人可以相比,他们的故事已经成为美国大众和精英有关中国问题的主要信息资源,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的中国观。

1887年大约有100多名美国中国内地传道会的新教传教士来华,其中包括首批女性传教士。她们在宣传新教教义的同时,动员会众改变妇女裹脚的陋习,通过介绍西方现代思潮启发他们寻找缓解各类社会矛盾的办法。

从新教在华传播、美国文化和科技在中国的推介,到当时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定位和条约的签订,美国传教士既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又是参与者。他们在华创办学校、翻译出版书刊、宣传西学,客观上有助于促进双方全方位的交流。他们把自己在中国社会的所见所闻写成文章,拍成照片,通过报纸、杂志、广播和广告向国内外宗教界、新闻界和出版界提供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第一手材料,帮助政治家和决策部门跟踪中国的时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中美外交关系的走向。林则徐创办的《译报》和魏源编译的《海国图志》大多取材于欧美报刊和传教士的著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中国民族运动的蓬勃发展,美国在华传教士在教会学校的影响逐渐减弱。国民教育世俗化呼声高涨,宗教课程基本被取代,校长职务基本上改由中国人担任。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开始向商贸方面倾斜。

商业是充满金钱和物质诱惑的行业,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大事,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美两国的物流规模。从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来华,雷雅德用皮毛、人参和鸦片换取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到广州的美资普金斯洋行、旗昌洋行、同孚洋行、琼记洋行和魏特摩洋行的创建,美国商人逐渐肩负起促进中美相互了解和贸易往来的利益集团的责任。

美国传教士、商人和政治家来自不同的利益集团,都曾不遗余力地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随着时局的变化,哪个时期哪个集团势力占上风,

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反映哪个集团的利益。但是也应该看到,那些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在宗教的旗帜下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美国的经济、文化、外交和伦理道德都建立在处于优势地位的新教教义的基础之上。美国政治家鼓吹的全球一体化其实早已从宗教全球化开始,现代理论家们又推而广之,把这一概念扩展到人权、能源、生态、政治、教育和科技范围之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几乎无所不包的议题已经超越人们想象覆盖了一切意识形态。美国传教士之所以能在整个19世纪的中美关系中施加实质性的影响,原因就在这里。

美国传教士给早期中美关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在整个19世纪中美关系史的构建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只有对于美国传教士在1830—1900历史语境中所扮演的通译、协调和教育者的综合角色有所了解,才能对这一历史时期的中美关系有一个全面和准确的把握。

十、美国传教士后代的中国情结和多维世界

1848年美国新教传教士有据可考的在华人数约73人,①1869年在京美国传教士约12人,1877年增至52人。② 1914—1918年美国在华传教人数首次超过了英国在华传教人数,比例从50%跃升为60%。据统计,1868—1949年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出生子女共约3700~3800人,其中美国传教士子女约占一半以上。③

美国传教士后裔是一个有特殊经历的群体,多数都在华出生,其中也有少数人在襁褓之中就随父母来华。他们在中国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与家中的当地佣人或厨师和宗教界的会众密切接触,受到中国生活方式的影响,耳濡目染的是中国文化和乡土风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中国完成高小学业后返美接受高等教育,毕业后不少人再次来华或从事与中国有关的教学、研究和外交工作。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感受,对中美关系的理解和期待显然不同于一般美国人。在价值观和文化取向方面的认同使他们比较容易融入中国社会,能较好地解读中国政治经济信息,在风云变幻

①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65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

②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2 No. 3 p. 57; Vol. 8 No. 3 pp. 209—215.

③ 史静寰、熊志勇:《文化边缘人物的困惑与思考——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子女与20世纪前半期的中美关系》,载《美国研究》1994年第4期。

的近代中国社会能以比较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对待所发生的一切,因而有可能在处理与中国有关事情时获得较多的话语权,甚至在他们进入美国政府部门或者学术机构时可能发挥特别的作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 世纪美国的中国通有一多半是传教士出身的学者、外交官或政治家及其子女。对于 20 世纪美国的中国通团队来说,虽然这个比率不可能这么高,但是仍然与来华传教士的群体和家庭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下面介绍的是他们中的几位代表人物。

司徒雷登 1876 年出生于杭州,父母都是美南长老会传教士。1868 年他的父亲司徒尔到杭州传教,在中国生活了 46 年。

司徒雷登会讲一口地道的杭州话,11 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接受启蒙教育。在哈姆普顿—悉尼学院深造时,因为受到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转学到纽约协和神学院。1904 年他携妻子艾琳·罗德(Aline Rodd)回到杭州。1908 年金陵神学院成立,他应邀前往南京出任该院希腊文教授,1910 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后他还兼任美联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年 4 月 1 日孙中山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为让位于袁世凯辞去大总统职务,司徒雷登是在场的唯一的外国记者。1915 年他返美时,威尔逊总统(Thomas Woodrow Wilson,1913—1921)在白宫专门接见了他,关切地向他了解中国情况。

1919 年 1 月,司徒雷登被聘任为燕京大学校长,为该校在北京西郊建造新校园四处募捐,并聘任了许地山、郭紹虞、顾颉刚、钱穆和吴文藻等知名学者任教。1925 年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合办哈佛—燕京学社,他也为之奔走呼号。

虽然燕京大学具有美国教会大学背景,但是管理基本上是世俗化的。他努力倡导一种自由和开放的教学氛围。20 世纪 30 年代初,燕京大学在学术品格和教学安排上已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并肩而立,蜚声中外。

北大和清华等许多北方大学在“七·七”事变后陆续南迁,但司徒雷登却主张燕京大学继续留在北京。为使学校免遭日军刁难,他的对外职务由教务长改为校长,还有意在校园升起了美国国旗。“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正式对日宣战成为日本宪兵包围校园的口实。1941 年 12 月 9 日司徒雷登在天津公干正准备回校时,两名日本宪兵在他下榻的宾馆将他逮捕,押

送回京，与一些记者、传教士和大约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一起被关押在美国领事馆。一个月后被拘押的人基本都重获自由，只有司徒雷登等少数人仍被关押，竟长达4年之久。

后来燕京大学被迫迁往成都，暂借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展开业务。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京大学校长，直到离开中国。1945年秋天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宴请他并畅谈天下大事。司徒雷登在重庆还会见了负责调停国共两党纠纷的美国总统私人代表马歇尔。1946年7月11日经马歇尔推荐，美国政府决定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接替已于1945年11月离职的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1883—1963）。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时仍担任燕京大学校务长之职，他的任期恰好是中国内战时期，因此得以见证并参与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

此时司徒雷登已年近古稀，在与中国各政党之间都保持着良好人际关系的人文环境中享有一定威望。美国政府希望能利用他对中国的了解对国共之间冲突的调停获得成功。中共代表周恩来、邓颖超和叶剑英也多次发表讲话，欢迎美国政府对司徒雷登的任命。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南京，外国使馆（包括苏联使馆）纷纷撤离，李宗仁曾派人催促司徒雷登到广州暂避一时，但是他仍坐镇美国使馆留在南京。

司徒雷登曾希望到北平与周恩来直接会谈，中共同意他以燕京大学校长身份北上会面。但是1949年7月2日艾奇逊发专电要求司徒雷登7月25日以前赶回华盛顿。经多次电文磋商无果，8月2日司徒雷登乘坐一架小飞机离开南京。返回华盛顿后不久便退出了政界。

从20世纪20年代起，司徒雷登就奔走于中美两国，先是周旋于权势富豪之间，然后是中日军界政界之间，最后又调解于国共两党之间。他10次返美筹款，受托劝说张学良、韩复榘和宋哲元归顺，成为报刊头版消息的风云人物。他风风火火穿梭于燕京大学与日占领军司令部之间，屈尊与日本占领军的头面人物直接接触，与华北伪政权首领王克敏保持沟通，竭尽一个美国中国通之能事。他与蒋介石夫妇有私交，在毛泽东为他举办的宴席上谈笑风生，希望通过自己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以新教基督徒的理想主义去扭转乾坤。他是一位美国政府的外交代表，又是一位与中国利益和感情相连的美国人，但是当个人努力无法改变历史潮流时，他不能不正视现实。

回到美国后，美国国务院一度对他下达了禁言令，后来的麦卡锡主义也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对于这位有热切事业追求的基督徒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久他患了脑血栓，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失语症使他无法与人交流，终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辞世。

在追思弥撒中教堂的管风琴深沉地奏起了《阳关三叠》，这支根据唐代诗人王维的七言绝句《送元二使安西》谱写的古琴曲，表达了"自古富贵有定分，莫遣仪容瘦损"的哀婉惜别情绪，令人思远慎终。2008年11月18日，在他去世46年后，他的骨灰被安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

他的著作有：《新约希汉英辞典》(Greek-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1918年)和《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

赛珍珠1892年出生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刚满三个月就随着父母来到中国。父亲赛兆祥来华前在华盛顿与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以及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攻读过学位课程。1909年又获母校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他饱读儒家典籍，对于佛教颇有研究，曾参与《圣经》的中文翻译工作。母亲凯丽对文学、艺术和音乐都学养有素，是赛珍珠童年时代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赛珍珠一家来华后初先居住在苏北清江，四岁时全家搬到镇江。40岁以前，她除了回美国上大学和读硕士学位的那几年，其他时间都生活在中国。

1910年9月赛珍珠回到美国，进入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攻读心理学。1914年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后，有过留校教授心理学的短暂经历。这一年圣诞节前她匆匆返回了镇江，接替母亲在教会的工作，后来还在润州中学和崇实女中兼职英文教师。

1917年她与美国农业经济传教士(agricultural economic missionary)卜凯结婚后定居安徽宿县(今宿州)，并在教会学校任教。1919年卜凯到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赛珍珠随他迁居南京并在国立东南大学和金陵大学教英文，教余时间开始创作小说。第二年这对年轻夫妇的女儿卡罗尔(Carol)降生，给小家庭带来更多的笑声和欢乐，虽然孩子一度为尿毒症所折磨，但是病痛过后一家总是其乐融融。

1929年她创作的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以田园牧歌的风格描写了中国农民王龙从一无所有到发家致富的经历，对土地的眷恋是该作品的主题。丰收、婚庆、天伦之乐，与饥荒、疾病、纠纷形成现实生活的反

差，再现了旧中国农民的人生坎坷。王龙的第三个儿子当兵去了，老大和老二却私下里盘算着等父亲去世后便将来之不易的庄稼地卖掉，到城里去安家。赛珍珠的《大地》与1932年她创作的《儿子们》(Sons)和1935年的《分家》(A House Divided)在文学史上被视为《大地》三部曲。

赛珍珠创作的其他作品有：

《东风和西风》(East Wind, West Wind, 1930年)。

《母亲》(The Mother, 1933年)。

《中国天空》(China Sky, 1941年)。

《中国航程》(China Flight, 1942年)。

《龙种》(Dragon Seed, 1942年)。

《来吧，亲爱的》(Come, My Beloved, 1953年)。

《动静》(Voices in the House, 1953年)。

《嫔妃》(Imperial Woman, 1956年)。

《北京来函》(Letter from Peking, 1957年)。

《梁太太的三个女儿》(The Three Daughters of Madame Liang, 1969年)。

《普天之下》(All Under Heaven, 1973年)和《虹》(The Rainbow, 1974年)。

赛珍珠的小说集有：

《发妻及其他》(First Wife and Other Stories, 1933年)。

《今后永远》(Today and Forever, 1941年)。

《处处》(Far and Near, 1947年)。

《小说十四篇》(Fourteen Stories, 1961年)。

《善行及其他》(The Good Deed and Other Stories, 1969年)。

《圣诞故事集》(Once Upon a Christmas, 1972年)。

《东方和西方》(East and West, 1975年)。

《心中的秘密》(Secrets of the Heart, 1976年)等。

她的译著有：《水浒传》(All Men Are Brothers, 1933年)。

赛珍珠是一位活跃的人权主义者。由于对当时美国社会舆论所谓美亚混血孩子(Amerasian children)不宜领养的说法感到气愤，她专门创建了一个跨国跨种族的“宾至如归公司”(Welcome House, Inc.)，对5000多名儿童的安置予以帮助，她自己也领养了7个孩子。她的赛珍珠基金会

(Pearl S.Buck Foundation)资助了数千名亚洲儿童。1942 年她和丈夫还建立了东西方协会(The East And West Association),积极参与争取妇女和黑人的平等权利。

1932 年深秋的一个下午,2000 多名美国长老会女教徒在纽约的阿斯塔饭店听赛珍珠做题为《海外传教的必要性何在》(Is There a Case for Foreign Missions)的演讲。当时她的第二部小说《大地》刚刚获得普利策文学奖,正处于人生巅峰之际。演讲结束时观众中并没有人为她鼓掌,只是在她离开报告厅后才隐约听到雷鸣般的掌声。戴约翰公司(John Day Company)抢先出版了她演讲的单行本。1933 年中国的《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也全文刊登了赛珍珠的演讲稿。《基督教世纪报》(Christian Century)、《哈特福德报》(Hartford Courant)和《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对她质疑海外传教的观点都予以肯定。但是耶稣会期刊《美洲》(America)却认为赛珍珠"失去了对宗教的忠诚与热爱"。长老会海外传教董事会主席兼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教授查尔斯·埃德曼(Charles R.Erdman)抱怨她是造成"整个教会不安局面"的重要导因,希望她能够主动辞职并悄然离开。1933 年 4 月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授格雷沙姆·梅琴(J.Gresham Machen)郑重其事地要求传教董事会解雇赛珍珠并与她划清界线。4 月底赛珍珠主动递交了辞呈后乘船返回中国。①

1934 年对于赛珍珠来说是漫长的一年,教会的施压使她跌落到人生的低谷。为切除肿瘤她失去了子宫,女儿日渐与她疏远,久病不愈的母亲也离开了人世,这一切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1935 年她与卜凯正式离婚。离婚当天就与她的知音和出版商——戴约翰公司总经理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Walsh)重组新家,引起了众多非议。为了寻找一个清净的环境,同时也为了能经常见到在新泽西特教学院就读的弱智女儿卡罗尔,赛珍珠毅然决定在宾西法尼亚一个农场安顿下来。从此她只潜心于创作,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基督教教义不再是她所关心的话题。对于中国文化的审视再次燃起了她对侨居国(adopted land)的热情,认为那片辽阔古老的土地其实并不需要基督教,大部分普通的中国人也不十分看重自我价值,但是却生活得很体面。

---

① 葛兰·华克:《赛珍珠与美国的海外传教》(郭英剑、冯元元译),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3 期。

尽管赛珍珠出生在美国，但是却在中国生活、学习、工作了40余年，熟知中国人的生活，了解中国文化和习俗，能熟练使用中英两种语言。她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先后出版了70多部作品，不仅有小说和童话，还有话剧、传记、散文和诗歌。她追求的理想、慈善事业和创作素材都是在中国获得的，她与中国人之间有着他人无法理解的思想和感情上的密切联系。她在国立东南大学和金陵大学教英文时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其中包括浪漫诗人徐志摩。

她的小说《大地》1931年问世后成为畅销书，1932年获得普利策奖，1933年被改编成话剧在纽约上演，1937年被好莱坞拍成电影引起了轰动。1938年她的这部作品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推荐辞是："为她对中国农民的丰富多彩和具有时代真实感的描写以及她的自传式经典之作而颁发此奖。"她头上的耀眼光环，就是她1936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院院士和1951年当选为美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资格证明。

但是伴随鲜花和赞美声而来的却是冷眼和品头论足。一些批评者认为她的作品缺乏文体风格上的细腻和巧妙，过分强调道德说教，并不符合诺贝尔奖的标准。显然，赛珍珠在美国被普遍冷落了。20世纪70年代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在英国电视上观看《大地》时，也对影片中那些痴呆冷漠的中国人物形象、学究式的对白和缺乏高潮迭起的情节描写感到意外和不悦，甚至怀疑电视台的导播是否调错了片源。

赛珍珠觉得自己长期生活在一个令她感到尴尬的多维世界。她不是神学家，也不是语言学家，更不是政客，但是在她身边的中国人和美国人中却有不少神学家、语言学家和政客。她凭着自己的语言天才和对中国人的亲近感写作，但是她没有经过这样的专业训练，在美国读者看来她的英语是中国式的，而在中国读者看来她的汉语却是美国式的。她翻译的《水浒传》充斥着死译、硬译和误译，甚至还有许多专业上不允许出现的硬伤。她对基督教的虔诚主要是来自于父母亲的教诲，因此每当碰到一些无法接受的问题时她会不顾教义教规坦诚相告。美国联邦调查局视她为亲共份子和亲华派，对她的立案侦查卷宗竟达300页之多。而冷战时期的许多中国读者也被告知她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中国是她的第二故乡，她的父母、两个兄弟和两个姐妹都长眠于此，她的生命中不能没有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然而经过几十年的等待她却始终未能获得到南京、镇江和宿州等充满童真记忆的故地重游的机会。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社会已经在年轻一代的记忆中逐渐消失，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读者都把她的作品视为中国另类文化库藏书，怀着求知和求实的心情阅读她的小说。最近二十几年中国翻译和再版她的作品数量有所增加，有关她的生平和著作的评论可以很容易在图书馆的数据库中搜索到，撰写有关赛珍珠及其作品的博士论文，正如电视台制作有关她的记录片和节目一样，已经成为一项别有新意的选择。

1973 年 3 月 6 日赛珍珠逝世于美国佛蒙特州的丹比。生前她曾为自己设计了一块墓碑，碑上不要任何英文，只刻她的中文名字“赛珍珠”，是否曾经受到武则天无字碑的启发，不得而知。2002 年 2 月 21 日前布什总统访华，中国国家邮政总局特别发行了一套 4 枚中英文对照的《赛珍珠》邮资明信片，并在镇江市邮政局举行了首发式，以纪念这位为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使者和文学大家。

谢伟思 1909 年 8 月 3 日出生于成都。他父亲是美国浸礼会传教士，1905 年携妻子前往成都创办基督教青年会（Y.M.C.A.）。11 岁时他随父母迁往上海，在当地的美国学校接受启蒙教育。

谢伟思的母亲是一位有文化的家庭主妇，也是他的第一位恩师。他少年时天真活泼，经常一个人走街串巷，陕西街、杜甫草堂、老皇城，无不留下他的足迹。

1921 年他全家返美。谢伟思完成了中学学业后，继续在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攻读历史学和经济学学位课程。1933 年他通过了国务院的外交公务员资格考试（Foreign Service Examination），1936 年被正式任命为外交官，两年后被派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任副领事。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谢伟思被调往重庆任大使馆三等秘书。

1944 年夏，美国副总统亨利·阿加德·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1888—1965）访华，谢伟思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出美国应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合作并予以援助，同时帮助改革国民党政府。在华莱士、高斯（Clarence E.Gauss）和史迪威（Joseph Stilwell，1882—1946）的努力下，蒋介石同意美方派人去延安考察。这一年 7 月 22 日，美军派遣以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二等秘书戴维斯、三等秘书谢伟思等人组成的美国军事观察小组（U.S. Army Observation Group，又称 Dixie Mission to Yan'an）进驻延安。谢伟思被委任为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的政治顾问。

谢伟思在延安逗留近三个月。他多次会见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董必武和杨尚昆等中共领导人，与毛泽东的谈话多达50余次。他还见到了从各抗日根据地去延安的中共将领，如陈毅、林彪和聂荣臻等。毛泽东在和他的多次谈话中表达了中共对美国的友善和期待，并希望美方作出积极回应。

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 美军观察组人员及迫降的美空军人员几乎访问了华北和华中所有重要的中共控制区。他们的所见所闻证实了中共所声称的对敌占区广大农村地区的有效控制。……迄今，对我们证实这点帮助最大的是从这些地区被护送到安全地带的大批美国空军人员（现有70名）。……以下结论无疑是正确的：1、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关于他们控制了华北和华中地区广大农村的说法总体上是对的；2、我们过去一向将这些地区统称为“日占区”的提法要修正。……共产党人将在中国继续保持存在。中国的命运不属于蒋氏，而属于共产党人。①

然而他的报告却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室里被尘封了24年。

1945年中共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夕谢伟思再度向美国国务院请示继续在延安考察。3月30日谢伟思接到要他立即返回华盛顿的命令，4月12日他回到华盛顿。

这一天他邂逅了《美亚》（Amerasia）杂志主编菲利浦·贾飞（Philip Jaffe），向他展示自己撰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文件。被联邦调查局怀疑为苏联间谍的贾飞立即受到监控。6月6日，受此案牵连的另外5人同时被捕。谢伟思在拘留所呆了一夜，第二天取保候审。

贾夫案结束后，谢伟思先是被派往日本，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手下工作，后来又被派往新西兰。在国务院对他进行4次后续调查中均未发现任何不当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开始追究“失去中国”的责任。谢

---

① Senate Internal Security Committee: *The Amerasia Papers: A Clue to the Catastrophe of China*, January 26, 1970, pp. 112-113.

伟思从新西兰被调回后,新任命先后变动了三次。1950 年 10 月 19 日,美国安全委员会终于做出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的结论。但是第二年秋天,“美亚事件”(The Amerasia Case)再次进入审查程序,令人震惊的审查结果推翻了原先的结论,谢伟思对美国的忠诚受到怀疑,被开除了公职。

他在纽约 5 年多时间没有放弃为自己讨回公道的努力。1956 年美国最高法院同意重审他的案子。1957 年 6 月 17 日大陪审团 9 名法官中的 8 名一致认定谢伟思无罪。谢伟思的外交官身份得到了恢复,不久开始在国务院协助工作,后来在决定派往德国波恩时又受到国防部的非难,最后被派到英国利物浦当总领事。

此次为期 3 年的任命期满后谢伟思于 1962 年提前退休,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攻读了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再攻读博士学位,最后被聘任为该校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馆长。他一直关心着中美友好事业,曾担任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旧金山分会名誉会长,积极参加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活动。

此后他先后来华访问 4 次。1971 年周恩来总理亲切会见了谢伟思夫妇,回答了他们提出的许多国际和双边问题。谢伟思夫妇在这次长达两个月的访问中,参观了工厂、农村、学校。新中国建立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国之后谢伟思通过写文章和演讲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情况。1974 年 9 月他在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做证时批评美国政府履行上海公报缺乏诚意,敦促政府将美国驻北京联络处提升为大使馆。

1999 年 2 月 3 日,90 岁高龄的谢伟思在家中安然辞世。他的著述有《亚美论集:中美关系史上若干问题》等。

恒安石(Arthur Millbourne Hummel,1920—2001)1920 年 6 月 1 日出生于山西省汾阳,父亲恒慕义是德裔美国人,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母亲曾就读于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1910 年恒慕义奉派携妻子到山西汾阳传教,任教会学校汾阳铭义中学校长多年。

1923 年恒安石随父移居北京,曾任教于华北协和华语学校。1928 年返美后恒慕义应聘担任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东亚部主任 30 余年,任职期间大力扩充了中国古代典籍的馆藏。恒安石曾就读费城一中学,毕业后进入了俄亥俄州的安蒂奥克学院,一年半后辍学,先后当过推销员和医院看护等工作,过着居无定所但是自食其力的生活。

1940 年 9 月恒安石计划随父返华，不料他到达北京之后父亲却因故未能成行。恒安石开始在北京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学习中文，同时在辅仁男子中学兼职英文教员。

1941 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侵华日军将在华的美英等国侨民 1500 多人关押到山东潍县乐道院集中营。其中有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蒋介石的美国顾问雷振远牧师，以及年仅 21 岁的恒安石。在英国难友和地方抗日部队帮助下他于 1944 年 5 月成功越狱，加入了当地国民党的山东抗日挺进军第 15 纵队，在高密与昌邑和胶济铁路沿线从事抗日活动，直到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他与这些抗日战士生活在一起，与当地老百姓朝夕相处，关系融洽。尽管由于拘留营生活艰苦，游击战环境恶劣，他得了久治不愈的哮喘病，但是他在游击队中仍然设法与被拘留的难友取得联系，传递营救信息，行军之余常帮助战士学习英文。

日本投降后恒安石留在中国，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了一年多。1946 年他回到美国，加入了联合对华救灾会，不久进入在华盛顿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学院学习，之后又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班深造，取得了硕士学位。

1945 年抗战胜利后，恒安石作为盟国被解救人员代表曾被邀请参观淮北解放区，受到了新四军四师师长张爱萍的接见。

恒安石在获得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专业硕士学位之后，于 1950 年任职于美国国务院，担任了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以及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助手，直接参与了中美建立联络处的谈判，多次参加了和周恩来总理的会晤。后来他还出任过驻缅甸、埃塞俄比亚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大使。1981 年 5 月经国务卿黑格大力推荐，他担任了美国驻华大使。

1982 年他以美方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有关美国售台武器的谈判，并签署了《美国售台武器美中联合公报》。根据该公报美国表示愿意逐步减少对台军售数量，并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退休之后，恒安石一度就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他经常出席中美关系研讨会，积极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帮助培养精通英语熟悉中美两国国情的人才。他关心美中关系的发展，在一次谈话中曾经这样深情地描述过自己的心情：“直到今天我都对中国感到很亲近，有机会就去中国看看，一般每年都去一次。我很能理解中国人民面临的问题。”

第四章
洋务帮办合力推动美国汉学的发展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中国的政治、外交、科技、军事和教育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中西经济和文化交往日益频繁。

在 1861 年至 1894 年实施的“同光新政”时期，以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左宗棠（1812—1885）和张之洞（1837—1909）为首的洋务派主张购买洋枪洋炮，按照西方模式组建舰队，引进办学新理念，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利用多种方式开矿建厂发展新型工业，以期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但是以大学士倭仁（1804—1871）为首的顽固派却空谈什么“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洋务派与顽固派就造船铸炮建设海防、铺设铁路发展交通运输、创办现代报刊、西式邮政和同文馆等问题互相攻击，争论不休。

除了顽固派外，对洋务运动持不同观点的还有其他两类人物：一是以王韬（1828—1897）、薛福成（1838—1894）、郑观应（1842—1921）和马建忠（1845—1900）等为代表的改良派，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介西方政治体制，竭力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另一类人物是以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1873—1929）为代表的维新派，认为洋务派的举措不过是“补漏缝缺之谋”，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救中国。甲午战争的惨败证实了洋务派的无能，康有为等人在民愤四起的谴责声中发动公车上书，掀起了变法的高潮，促成了维新派的崛起。

虽然清廷重臣恭亲王奕䜣和总理大臣文祥（1818—1876）等人掌控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是实力主要掌握在地方总督和巡抚手中。19 世纪 60 年代华南先后建起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和安庆军械所（金陵机械制造局前身）等近代军事工业。1884 年洋务派在组建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之后又修建了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除旧布新氛围中相继建起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各类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南北电报局和开平矿务局先后建成运营。1889 年初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后来因为调任湖广总督，就下令拟议之中的炼铁厂选址汉阳，三年后快速发展的汉阳铁厂便形成了具有六大分厂、四小分厂和两座炼铁炉规模的企业。从此中国开始向机械化和工业化的轨道迈进。

清朝海军、海关、轮船、电报、铁路、制造、矿务、纺织和出版等方面在创办初期需要大批掌握现代科技和管理知识的人才。1862 年 8 月在同治皇帝批准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建制内陆续开办了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馆，不但培养了一批通事和外事人才，还推动了同文馆印书房、海关造册处和广学会出版机构的建立。因为国内熟悉近代科技管理业务的人才奇缺，便向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丹麦和日本等 20 多个国家延聘顾问、教练、教习和工程师来华工作。外聘人才的选择根据相关国家是否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在中国是否已建公使馆，可曾对华贷款，已派来华洋员是否尽心尽责等方面情况进行考察。招聘的渠道包括对方驻华公使馆的主动推荐，中国代表团的实地考查和驻外机构的直接介绍等。

各类洋员被文武官署所聘用，部分在民用和军用企业中充当技术顾问，更多的则充当工程师、教练、监工或者工匠，除了技术指导外，还直接参与技术人员的培训。当时创办的各级新式学堂多半也都聘请了外籍教习，他们在参与教学计划制定的同时，还承担了新式课程的教学工作。

洋员来华之初大都不同程度地怀有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不能很好理解、适应并接受中华文化、清代官僚思维和政治生态，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因此无从以其技术和所代表的理念及信仰导化中国员工。然而也有不少洋员勇敢直面天朝体制，明智地选择了自己的身份认同策略，积极地参与中国社会发展，最终成就大业。

洋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外国雇员群体，其对外身份属于中国编制官吏，但是法律上却享有治外法权。由于自身和工作环境的需要，他们肩负着中西文化沟通的重任，从处理日常事务到参与中国驻外使节的遴选和中外条约和协议的谈判，几乎都有洋员的身影，因此被视为早期中外文化和经济交往的中介。

多数美国雇员素养较好，受过高等教育，有些人还学习过汉语、中华文

化和汉学专业。来华后保持与中国社会的零距离接触,关心媒体的新闻动态和地方出版物的信息,深入了解社会民俗民情,很快就进入了角色。他们作为中国政府部门或机构的外聘雇员,政治和社会地位特殊,受到中国和自己国家法律的双重保护,平时公干、出差、应酬、旅行都可获得额外补助,条件比一般雇员优越。不少美国传教士曾对"海关洋员"的金字招牌趋之若鹜,或摇身一变成为海关出身的同文馆教习,或以医学传教士身份兼职海关医生。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分别在中国学校、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兼职,充当幕僚或顾问,总税务司也鼓励他们加入各类协会。由于广学会和同文馆印书房与海关造册处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出版个人著述和订阅刊物都比较方便,为传播中西文化创建了良好的沟通平台。中美职员共处的环境以及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联系,特别是与政府官员的密切交往,为他们增加了解中国文化和传播西方文化的机会,也为他们参与各类文化活动敞开了大门。

美籍雇员传播的中西文化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他们引介了诸如会计管理、文书档案、保税业务、人事安排和邮政传递等西方管理制度;通过同文馆和新式学堂传播西方科技、社会学和国际法知识,为武器制造、航海设施、西式建筑和生活配套等提供咨询和资料;通过海关和医疗立项向中国社会传播现代公共卫生制度和日常生活科学知识;通过著书立说推动汉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的研究,介绍西方的音乐、节庆和风俗礼仪;帮助安排中国政要出洋考察,协助中国公司参与国际展览,鼓励中国学人参加各类国际学术会议。与此同时他们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和夏威夷大学开设汉语、汉学和中华文化课程,倡导翻译中国经典名著,撰写有关中国历史和社会现状的专著,编纂英汉辞典和汉语学习书籍,接待中国留学生。他们还通过几届世博会向西方社会展示中国产品和中华文明史,通过发行海关贸易报告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情况,为准备来华的外国人提供咨询业务。这一切对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一定影响。

早期来华的美国专业和技术人员将中国视为其职业选择的一站。虽然他们的日常工作是履行行政职责,维护条约所赋予西方的特权,但是他们在加强中美文化对话和交流、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使当时的中国通商口岸成为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催生了新科

学和新思想，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为中国近代工业化和文化的发展铺设了轨道。他们的经历在近现代中西交往史上极具其时代和民族代表性，所发挥的桥梁作用影响深远，其中一些人后来还成为中国通或者汉学家，他们的学术成就本身就是汉学研究中的重要选题。

1965 年，美国塔弗兹大学弗莱舍法律和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格利恩（Edmund Asbury Gullion，1913—1998）在一份报告中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定义为：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包括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一国与另一国私人利益集团的互动，其形式是信息、语言和媒体手段。①

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包含着职业和非职业涉外人员的参与和贡献。各国非政府组织和公众通过不同形式的信息交流和对话所开展的公关，有助于促进国与国之间的了解，包括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经济状况、政治体制等等。公共外交可以体现在世博会或园博会上，可以体现在学术研讨会或产品推介会上，甚至体现在课堂教学、行政管理和日常交谈之中。政府通过公共外交对民意产生影响，民意也对政府决策作出回应。公共外交是一项系统工程，由民间组织、学术机构、智库和媒体共同运作。早期美国汉学史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范例。

一、李鸿章幕府中的美籍幕僚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淮军创始人和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在晚清政坛上曾经纵横捭阖 40 余年。

1846 年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投靠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1858 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2 年他招募淮扬水师五营人马，自成一军，掌握地方实权后大量购进西式枪炮，在短短时间内军伍由 6000 多人增至 6 万~7 万人。1870 年他因调解天津教案有功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又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和军事等重大抉择，长期督办洋务，仕途如日中天，被视为同治和光绪两朝

① 据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J. Cull）在《格利恩之前的“公共外交”：一个术语语义的演变》（Public Oiplomacy Before Edmund Gullion-the Significant Evolufion of a Phrase）中考证，英语术语“公共外交”最早见于 1856 年 1 月 15 日英国《泰晤士报》第 6 页的一篇社论中，原义相当于“礼仪”的同义词，但是一个世纪后格利恩赋予了该术语新的含义。

之重臣。随着地位的迁升和权力的扩大,以他为领袖的淮系势力逐渐成为实力强大的洋务派系,推动着“求富自强”运动的开展。

李鸿章长期关注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国内的经济发展,深感广开财路为当务之急,到上海后便利用当地富绅的雄厚财源进口大量西方机器设备。1865 年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他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并把它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迁南京。他调任直隶总督后还接管了天津机器局,掌控了当时全国近代化的军工企业中四分之三的优势地位。1872 年李鸿章获准创办轮船招商局,既为与外轮公司进行商业竞争,亦为实践富国强兵的政治抱负。从此洋务派在“官办”的管理模式基础上又组建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华盛纺织总厂、上海电报总局、唐胥铁路、津沽铁路、河北磁州煤铁矿、开平矿务局、热河四道沟铜矿、山东峄县煤矿、江西兴国煤矿和湖北广济煤矿,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李鸿章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海军,1874 年他在一份奏折中提出了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洋和南洋舰队的主张。1885 年海军衙门成立,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自己为会办。北洋水师成军后拥有舰艇 25 艘,官兵 4000 余人。此后,他又加紧旅顺、大沽和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

李鸿章曾聘用许多外国人为顾问、教习、舰长、帮办和外交谈判代表,待遇优越。在他的幕府中,美国人毕德格(William N.Pethick,? —1902)和英籍德国人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1842—1913)地位特殊。

毕德格曾在纽约一个骑兵团服役。同治十三年(1874)来华,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和翻译。1879 年以前他担任李鸿章的家庭英文教师。其子李经迈和李经方以及刘体智(李经方内弟)在他的调教下,学会了英语,阅读了大量外国报刊和书籍,为李家父子“睁眼看世界”助一臂之力。由于毕德格通晓汉语、法语和德语,后来正式离开美驻天津领事馆,加入了李鸿章幕府,成了李鸿章的私人秘书、翻译和顾问,为李鸿章口译英文、法文和德文书籍 800 余部。

在李鸿章幕府供职的外国人通常都把信寄给毕德格或者德璀琳。毕德格具体分管在北洋海军任职的外国人。德璀琳是那些在李鸿章的工商企业中供职的外国人的联络官,也是为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的外国人的联络官。从地域和语言上的分工是:毕德格分管李鸿章手下的美国人,德璀琳分管欧洲人。

毕德格常帮助李鸿章出谋划策，如辅助筹划修建关内外铁路，帮助物色洋员来华供职。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来华后，他有时也陪同他们深入山区探矿。

1881 年 10 月，毕德格与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1850—1888）就培养北洋海军医官办医学馆之事上书李鸿章，在聪颖少年子弟中遴选学员，以期赴军营和战舰充当军医。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李鸿章的允准，为北洋海军培养出了一批医务人才。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邀请列强从中斡旋中日关系。日本曾拒绝英国主持的联合调停，先后从鸭绿江和花园口两路进攻辽东半岛。1894 年 10 月 6 日，回国休假期满后重返天津的毕德格奉派前往横滨，日本外务省派遣其顾问德尼逊（Denison Henry W.）邀请毕德格前往东京商谈。日本外务省官员在会见中提出了在得到旅顺口后才议和，以及有关割地、赔款、朝鲜独立等“五条”作为清政府直接谈判的前提条件。10 月 22 日毕德格返回天津，向李鸿章禀陈了与日本外务省官员的谈话要点。1895 年 2 月 17 日日军占领刘公岛后，毕德格随同李鸿章自天津登轮，赴日和谈。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被解除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奉命赴京入阁办事，暂住贤良寺，偶有事要去外国驻华使馆，毕德格总以得力助手身份陪同。1896 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毕德格奉命会晤俄国驻华公使巴布罗斯，吁请俄国从中干涉，虽因种种原因而未能成功，也算尽了犬马之劳。

毕德格凭借自己的外交历练、语言修养和顾问身份，经常参与李鸿章主理的外交活动。

他在李鸿章幕府供职 20 余年，熟悉中国国情和帝国体制，善于把握时机处理政务，沟通谈判累建奇功，深得信任与器重。作为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李鸿章幕府中的心腹，他的在华经历具有与众不同的学术透视和研究价值。他是中国近代史中重要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为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堪称美国汉学史上一位可圈可点的人物。

二、晚清美籍关员与中美经济文化交流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海关从自主经营改为由五个通商口岸的外国领事馆对本国船只实行税项担保制度，以此干预中国海关对到岸商船进行验

货、缉私和管理,达到包庇违法走私活动的目的。

1853 年 9 月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率众起义,抗击受英、法、美等国纵容的清军,苏松太道兼江海关(1685 年设立的上海海关旧称)监督吴健彰(1815—1870?)逃入租界,外滩江海关的行政全部处于瘫痪状态。在此期间,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Rutheford Alcock,1809—1897)和美国驻沪副领事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1823—1889)私下草拟《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暂行条例》,妄图实行领事代征制度,税款支付以"见票即付"的保单代替现款。吴健彰一度奉命在白鹤清和閔行镇设置两个临时关卡,但是遭到了欧美领馆阻挠。1854 年夏初,英国副领事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在向清政府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由上海当局募用洋员协助中国税务的主张,得到了美国和法国领事官员赞同。同年 6 月 29 日两江总督怡良(1791—1867)派吴健彰在沪郊昆山会晤外国驻沪领馆官员,决定把江海关置于与有约国领事的共同管辖之下,由三国领事提名并获道台核准的洋员组建税务管理委员会,派遣由外籍船长指挥的海关武装缉私船各处巡查,从此江海关的大权旁落西方国家驻沪领馆手中。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1832—1898)在江海关帮办多年,经江苏巡抚薛焕(1815—1880)和上海道台吴煦(1809—1873)推荐,1859 年被任命为中国海关第一任外籍总税务司。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属的海关总税务司署(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成立于 1861 年,下设总理文案税务司(Chief Secretary,I.G.)、稽核帐目文案税务司(Audit Secretary,I.G.)、管理汉文文案税务司(Chinese Secretary,I.G.)和造册处(Statistical Department)。1866 年海关总税务司署从上海迁到北京,但是总署造册处仍设在上海。

1863 年李泰国因越权私自与英国水师总兵签订合约被罢免。1864 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颁布了由新任总税务司赫德草拟的《通商口岸募用洋员帮办税务章程》,正式确认了洋员的聘任、薪酬、评估和辞退皆由总税务司裁夺之规定。1859—1949 年中国海关共招聘洋员 400 多人,外籍税务司除李泰国和赫德外,还有安格联(Francis Atthur Aglen,1869—1932)、梅乐和(Frederick William Maze,1871—1959)与李度(Lester Knox Little,1892—　)。

1865—1905 年中国海关外籍关员统计表 ①

年份	美籍	英籍	法籍	德籍	其他国籍
1865	9 人	46 人	9 人	5 人	2 人
1875	14 人	71 人	18 人	9 人	9 人
1885	14 人	121 人	17 人	13 人	315 人
1895	15 人	145 人	21 人	17 人	552 人
1905	23 人	188 人	43 人	37 人	1048 人

1864 年赫德致函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请求帮助延揽来华任职海关人才。他在信中写道：

> 如果你能为我在美国物色三名有教养的青年，年龄在 18 岁以上，22 岁以下，受过大学教育，我将极为感谢。我想要能力至少相当于一般水平，社会名声好，有勤劳习惯的人。每人抵达中国，将付给 200 镑，以偿付旅途费用支出。他们最初两年将住在北京学习中文，那里将提供住房，一年薪俸按 400 镑（约 1800 元），第二年期满，每人薪俸将增至 600 镑（约 2700 元）。此后如果有空额，或有提升机会，将逐渐增至 800 镑、1000 镑和 1200 镑。他们总有一天可能希望成为税务司，年薪至少 1200 镑、1400 镑和 2000 镑。一个勤奋努力而且有能力的人有希望在 8 年或 10 年内成为税务司。②

蒲安臣应约在美国联邦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中招募了廷得尔（Edward Coe Taintor，1842—1878）、杜德维（Edward Bangs Drew，1843—1924）和吴得禄（F.E.Woodruff）三人。他们于 1865 年抵达北京，办理相干手续并经培训后加入了中国海关。

---

①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General Instectorate of Customs in 1940. Vol. 7, p. 82.

② 费正清等：《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陈绛译），第 149—150 页，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 年。

当年中国海关在美国招募关员是在不断升温的文化和经济交流背景下展开的。

1862年波士顿商人和外交官弗朗西斯·鼐德(Francis P.Knight)与其兄弟阿尔伯特·鼐德(Albert M.Knight)曾经在营口(牛庄)创办一家旗昌洋行(Knight & Co.),经营进出口贸易兼佣金代理业务。鼐德还兼任美国、荷兰、法国、德国、瑞典、挪威和日本驻营口领事或副领事。从个人在华15年的所见所闻中他感悟到开展并扩大中美文化经济交流的必要和可能,意欲筹措一笔基金在哈佛大学设立中文讲座,以期增加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培养一批能在中国担任高级职位的美国年轻人,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商务和外交往来。1877年2月22日他在一封致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的信中写道:

> 过去15年在中国商场和官场的经历使我相信,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犯了大错,即他们在抵达中华帝国时没有掌握该国的语言,而是一直依靠所谓的"洋泾浜英语",与这个伟大帝国的臣民交往。近几年,美国在华商务和外交利益日益增大,而且我相信它们还会继续增长,直到变得比在东方其他国家的同类利益更为重要。
>
> 在中国,上海至吴淞已开通一条11英里的短小铁路,这被普遍认为是修建横跨整个中华帝国的庞大铁路体系——相当于横跨美国中西部的铁路——的开端。
>
> 未来的律师有希望跨出律师业已非常拥挤的美国,到竞争还很小的中国谋求有利发展。
>
> 对于旅行家、科学家及其他许多人来说,中国还是一个几乎没有开拓的领域,这将会吸引很多人。除薪水的考虑外,他们在这里会发现发现未曾涉足的一个国度和未曾涉猎的一种文学,两

者内涵极为丰富。①

从鼐德的上述观点中可以看出当时美国政界和商界对于发展中美文化和经济关系的迫切期待程度。

廷得尔1865年从美国来华，入选了中国海关，先后任职于淡水、上海、北京和营口海关。1873—1878年受聘于上海海关造册处。作为第一位造册处税务司，他主要负责征税表格的设计和印制，汇总、编印和发行海关贸易报告和统计报告，以及出版海关文献和书籍等工作。在缺乏参照文本和经验的情况下，他凭自己的开创性不断进行探索，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为继任者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有时文案工作不得不请他人代劳，1878年在上海自杀身亡。他勤于思考，善于积累资料，公务之遐笔耕不辍，在短暂学术生涯中的主要著述有：《海南岛地理概况》(Geographcal Sketch of the Island of Hainan，1868)和《台湾北部的土著》(The Aborigines of Northern Formosa，1874)。

毕士璧(Aelius Marcellus Bisbee，1841—1901)原是一位持证上岗的美国船长，1868年在中美商务和人员交流的热烈氛围中加入了中国海关海政局。该局由海事税务司(marine commissioner)管辖，下设烟台、上海和福州三个巡工司(divisional inspector)。毕士璧任南区巡工司兼福州理船厅，1875年调往上海，仍兼双职，一度返回美国学习灯塔技术和行政管理。1880年海政局改组为理船处和营造处，前者由上海和福州海岸巡工司(coast inspector)负责，后者由总营造司(engineer-in-chief)负责，专管航海设备的制造和购置。1881年年初毕士璧被提升为巡工司兼上海理船厅，任期长达20年，与以天文学家弗洛克(Louis Froc)为台长的徐家汇天文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毕士璧定时向天文台发送从相关区域收集到的气象数据，经综合处理后由天文台转发沿海过往船舶，为他们的安全航行提供信息。毕士璧在任期内尽心尽责做好航道测量和疏浚工作，口碑甚好，为此曾荣获清廷授予的三品以及三等双龙宝星勋章。②

杜德维1863年毕业于哈佛学院，1867年被安排在总税务司署管理汉

---

① 樊书华：《鼐德方案与哈佛大学汉学的起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青年学术论坛》，第371—377页，1999年卷。

② 李爱丽：《晚清美籍税务司研究：以粤海为中心》，第40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文档案，后来分别在九江、烟台、镇江、宁波、广州和福州海关任职。在任宁波税务司期间曾经跟后来成为哈佛大学首位中国教师安徽秀才戈鲲化学习过汉语。1872 年杜德维返美在剑桥休假时接到赫德信函，委托他物色三名身体健康、受过开放式教育、英语表达能力好的年轻人加盟中国海关。他便到哈佛大学、布朗学院（Brown College）和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在 20 名应征者中录取了马士、司必立（William Franklin Spinney）和客纳格（Charles Cecil Clarke）。1882 年杜德维任总税务司署造册处税务司。期间恩师戈鲲化不幸病逝于哈佛，杜德维便专程陪伴居丧家属护送遗体，从波士顿乘车到旧金山，然后搭“海洋”号取道日本横滨经上海回乡安葬。1896 年李鸿章访俄，他作为首席陪同官员随同前往，鞍前马后一路劳顿，颇受赏识。1908 年杜德维退休，后病逝于美国。

马士祖籍英国，家族于 1635 年移居马萨诸塞州，父亲从事制革和农业生产。11 岁时他就读于波士顿拉丁语学校，1870 年进入哈佛大学，1874 年与墨贤理（Henry Ferdinand Merrill，1853—1935）、客纳格和司必立一起来华。最初两年他在上海每天跟一位当地家教学习汉语。1874 年他被江海关录用为四等二级帮办（4th Class Clerkship B），年薪 900 海关两（1500 美元）。1878 年马士被派往北京总税务司署任巡查员，同时担任同文馆英文教习兼通译，主要负责翻译英文教材和国际法，有时还要帮助收发公文。因为原先他学习的汉语口语上海口音太重，与北京同事交流多有不便，便忙里偷空补习北方官话。1879 年他在天津海关德璀琳手下任帮办，1879—1882 年任伦敦办事处金登干（J. D. Campbell，1833—1907）助理。1883 年随德璀琳参与中法谈判。多年来辗转各地，行踪不定，倒也自得其乐。

1885 年中法战争结束后，马士奉派上海海关并担任上海轮船招商局顾问，负责从美国公司收回招商局船只和库房等事务。1885—1887 年马士经常就轮船设计、成本核算、黄河治理、台湾开发、财产处理、纠纷调解、煤炭生产、铁路运输、人事安排、毒品惩处、船舶修理等问题通过德璀琳与李鸿章保持联系。

1889—1890 年马士供职于北海海关，休假两年后奉派到台湾淡水海关，1892—1895 年升任为副税务司兼台湾巡抚邵友濂（1841—1901）的省政顾问，致力于行政改革并遏制非法贸易。1896—1900 年他先后调任龙州和岳州海关，1903 年晋升为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统计局秘书长。

马士在中国海关服务35年，公务之暇潜心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对外经济贸易史。1909年以健康原因退休后移居英国。他的重要著述有：

《中国钱币考》(The Currency in China，1906年)。

《中华帝国的贸易与管理》(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1908年)。

《广州公行考》(The Gilds of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Gild Merchant, or Co-Hong of Canton，1909年)。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ree vols.，1910—1918年)。

《1635—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five vols., 1926—1929年)。

《太平天国岁月》(In the Days of the Taipings，1927年)。

《远东国际关系史》(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authored with Harley Farnsworht MacNair，1928年)。

他的上述著作后来成为西方汉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经典。

马士长期供职于晚清海关，有许多机会零距离接触李鸿章、赫德、杜德维和崔德琳等高官，参与研究和制定中国海关规章政策。此外，他平日还可查阅有关中国海关档案和第一手资料，注意搜集信息，保存了大批来往函件。工作地点频繁调动也使他对中国商业制度、官僚机构和各地民俗有广泛深入的了解，1903—1909年担任江海关统计局职务的经历为他熟悉中国贸易和财政收支统计数字提供了方便。这一切为他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详实的资料，为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对外经贸关系史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从而开拓了美国汉学研究的新领域。他本人一直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人民、中国历史和社会制度，费正清等美国汉学家曾直接受益于马士的指导。

司必立生于美国麻塞诸塞州，1874年来华。1884年被中国政府指派为出席美国奥尔良博览会(Exposition in New Orleans)代表。1896年云南蒙自设立了海关寄信局，第二年改为“邮政总局”，由海关税务司司必立兼任。1887年他出任广东海关关长，1893年调任台湾海关，与马士分管南台和北台两关。《马关条约》签订后，他出任苏州关长，1905年10月离任。

因为业绩突出，他曾被清政府授予双龙宝星勋章及三品衔，位及“大人级”领事。① 1906 年因健康原因离开中国。

墨贤理父母长期在华经商，1874 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来华，自 1887 年起历任宁波、芜湖、天津、广州和上海税务司。1896 年入总税务司署管理汉文案税务司，1897 年获中国政府颁授二品衔及双龙宝星勋章，代表中国出席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国际邮政会议（International Postal Congress）。1908 至 1909 年被聘任为中国留美学生监督。1909 年 11 月出任上海关关长。1913 年退休，1916 年返美。

另一位中国海关洋员客纳格生于美国麻萨诸塞州，1874 年哈佛大学毕业后来华，在上海学习汉语三年。1878 年任芜湖海关帮办，1875 年被调迁至汉口，1886 年任琼海海关帮办，1891 年任龙州代理税务司，1899—1903 年任职于苏洲海关，1903 年至 1908 年服务于营口，1909 年退休，1911 年定居英国。

三、美籍雇员与晚清军事近代化

1874 年日本企图实现策划已久的占据台湾阴谋，被清兵战船成功驱逐，此事引起了朝野人士深思。1875 年 5 月 30 日清廷下令由沈葆祯（1820—1879）和李鸿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建设水师，并拟每年从海关和厘金收入中划拨 400 万两白银做军费使用，待北洋水师（辖域山东及以北之黄海）建成后扩建南洋水师（辖域山东以南及长江以外之东海）和广东水师（辖域福建和南海）。1888 年 12 月 17 日北洋水师在山东威海卫的刘公岛正式组建，数年后共拥有大小舰船 56 艘，总吨位 4 万余吨。从德国订造的“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战列舰，排水量达 7300 多吨，但是稍后组建的南洋水师却只有“镜清”和“南琛”等中小型舰船八艘，吨位与北洋水师相差悬殊。

在晚清海防近代化的进程中，100 多名来自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军事技术人员先后应聘来华，在战舰采购、军港建设、水兵征募、装备配置和训练安排方面出谋划策。仅教习一职就有操练、枪炮、鱼雷、管驾和管轮等分工，训练科学严谨，非一般人员可以胜任。在捍卫疆防的战斗中多数洋员

① 坊间称人有七层境界：高人级，能人级，大人级，强人级，伟人级，圣人级，神人级。

信守合约与中国军人并肩战斗，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有个别外籍雇员滥竽充数，不守承诺，或者直接参与了清政府对反抗暴政义军的镇压，因此在历史学家的笔下只留下了负面评价。

1860 年 12 月 13 日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1860—1897）生于美国的一个苏格兰移民军人家庭，家族成员曾参加过独立战争。马吉芬读完高中后进入杰弗森学院学习，曾给当地州议员写信请求推荐自己去那波利斯海军学院深造，1877 年他终于成为一名海军学院学员，在校期间对于船舶驾驶、枪炮操练、船舶导航和蒸汽轮机维护等科目有特殊的兴趣。四年学业结束后他又在海上服务了两年，最终却被告知加入海军尚待时日，不得不领 1000 元安置费离开学校。

1884 年法国舰艇进攻台湾，他决心加入中国水师参战。在旧金山寄给母亲和姐姐的一封信中他说正在求职，并用从中国领事馆官员处学会的汉字在落款中签了名。1885 年 4 月的一个星期天夜晚他乘坐的船到了大沽口，第二天上午 10 点进入天津港，心中暗自为即将开始的新生活高兴。他在熙熙攘攘的陌生街市中找到了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恳切地请副领事佩西克（Pethick）帮他把一封求职信转交李鸿章。当他返回船舱听说李鸿章已安排接见船长时，就欣然随同前往。在总督府受到李鸿章接见后的第二天，他按规定参加了天津军械局水师学堂的多学科考试，内容涉及船舶驾驶、枪炮操作、导航要领、航海天文学、几何学、球面三角、二次曲线以及积分运算等科目。他的答卷得到了考官的肯定，并被告知总督可能安排他在军校教授船舶驾驶、枪炮操作、领航和航海天文学等课程，也可能负责训练陆军和炮兵学员，讲授防卫工事构筑要略，年薪相当于 1800 美元，合同期为三年。几个月后，他被指派去指挥一艘有装甲防护的训练舰。

马吉芬先后担任了天津和威海水师学堂教习，专业理论讲解详尽精到，得到了李鸿章和丁汝昌等高官的首肯，职业生涯一帆风顺。有一年感恩节他特意安排了一个盛宴，款待曾经在美国受训的中国同事和友人。光阴荏苒，转眼间他在中国度过了 10 个年头，正考虑回国休假时中日海战即将爆发的消息突然传来，他毫不犹豫地主动推迟了休假，当即被任命为“镇远”号战列舰帮带。

1894 年 9 月 17 日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决战。“镇远”舰遭到 3 艘日本战舰的合围，前甲板中弹，马吉芬在紧急关头接替了负伤管带林泰曾（1851—1894）指挥战斗。他当机立断命令“镇远”号把日军旗舰

“吉野”号吸引到近旁，4门克虏伯主炮齐发使敌舰炮台爆炸丧失了战斗力，仓皇率舰队逃遁。此时“镇远”号也不幸中弹，多处负伤几近双目失明的马吉芬在昏迷中被抬进了船舱，但他还是沉着指挥舰只返回旅顺。战事结束后清廷表彰了七位英勇作战的外籍军人，马吉芬荣获顶带花翎和三等一级宝星勋章。

为了不惊扰他人，马吉芬悄悄藏身一艘货轮返回美国治疗，在纽约生活了两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成了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他有关中日海战的陈述开始时是广为传播的新闻，后来却被当作令人难以置信的“疯话”。他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忍受着身心创痛给任《世纪》杂志编辑的当年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同窗撰写了一份有关黄海海战的回忆录。作为亲历中日甲午海战的美国军人逐渐引起了自己同胞的关注和敬佩。他四处演讲，希望把东方海战的真实故事告诉每一个人。

1897年2月12日马吉芬在眼球摘除手术前一天自杀身亡。按照遗嘱他身穿一套崭新的北洋海军军服入葬，棺椁上覆盖着他曾经为之效力的北洋海军的黄龙旗。

另一位美国青年阿灵顿20岁来华后进入中国水师，曾参加1884年中法海战，一度被聘任为邮政局邮政司。1920年退休后定居北京，潜心于中国文化研究。他的著作有：

《中国戏剧史》(The Chinese Dram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until Today, 1930)。

《龙眼所见》(The Dragon's Eyes, 1931)。

《寻找古北京》(In Search of Old Peking, 1935)。

《中国著名戏曲》(Famous Chinese Plays, 1937)等专著。

薛斐尔(Commandone Schufeldt)，1866年曾以美国水师总兵身份访问朝鲜。1879年四月以美国前任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 1822—1885)随员身份来华。当时因日本并吞琉球引起国际争端，清政府拟请格兰特出面调停，授命李鸿章在天津款待薛斐尔。但薛斐尔对于调停一事并不热心，却大谈特谈愿为中国训练海军。返美后他曾投书《旧金山日报》对李鸿章横加指责，引起了舆论界沸沸扬扬的一番议论。美国驻华使馆代办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 1844—1912)为息事宁人，将他的在华言行向美国政府禀报纠纷才得以平息。1880年薛斐尔奉命再次来华，与李鸿章商讨美朝签约事宜，两年后达成了协议。

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1831—1862)出生于马萨诸塞州萨勒姆城。16岁就读于佛蒙特州的挪利友大学(原名美国文理军事学院),中途辍学。因为接受过基础军事训练,曾先后入墨西哥和法国军中服役。1859年来华,一度在长江汽轮上打工,后来当上了清军水师炮船"孔夫子"号大副。后受苏松太道吴煦聘任招募洋人组建洋枪队,并任队长一职。同年7月在对松江和青浦太平军进攻中遭痛击,受重伤赴法国医治。

1861年8月,他获准在松江成立教练局,以欧美军人为指挥招募中国团勇组建中外混合军,规模扩至5000余人,总部设在松江城内,华尔被升任为"常胜军"副将。此前他与当地官绅过从甚密,娶富商杨坊之女为妻,并申请加入了中国籍。

华尔在松江与忠王李秀成率领的3万义军战斗中,将城外一带民房烧毁,后又以"缺饷"为借口抢劫米铺,搜抄官署,掠夺银洋金器无数。1862年9月华尔率领"常胜军"在宁波与太平军决战,受重伤身亡。

四、洋务文化教育中的美籍教习

历史学家把19世纪下半叶洋务派根据对外交往需要所开展的专门化人才培训称为"洋务文化教育"。这一运动的开展是中国文化、外交、政治、经济、科技和教育在近代化浪潮冲击下相互作用的结果,涉及面包括语言、翻译、法律、电报、矿务、冶炼、管理、机械、造船和军工等方面。随着造就新型人才重要性和迫切性的日趋明朗,其范围和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

洋务运动发端于中国近代史上大规模企业私有化的兴起,独具重要象征意义的洋务学堂以"西文"和"西艺"为其主要教学内容。1866—1898年,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南京、南昌、杭州、福州、武昌、西安、旅顺、烟台、贵阳和台北等城市就创办了包括西语学堂、技术学堂和武备学堂等30余所。

1859年翰林院编修郭嵩焘(1818—1891)奏请咸丰皇帝设立京师同文馆获准,1862年6月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正式开课,第二年又增设俄文馆和法文馆。最初阶段学员主要从八旗子弟中遴选,后来全国各地开始争相向京师同文馆推荐优秀学童。几年后加设德文馆和东方馆,并正式规定:学员除研修英、法、俄、德等语种中的一种外,还要兼学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政治、笔译、航海测算、万国公法、世界历史和世

界地理等课程。到1877年该馆招生人数已达101名,来华执教的外籍教师54名,声名日渐远播。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人力物力资源更为雄厚。

担任京师同文馆第一任总教习的丁韪良是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在自然科学和国际公法等方面有独到研究。1863年他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律例》,第二年美国公使蒲安臣便推荐他到同文馆讲授国际公法课程。1869年11月26日他辞去了长老会的教职,受聘于清廷总理事务衙门,任三品衔同文馆总教习。1898年光绪皇帝授予他二品顶带衔,表彰他对洋务文化教育所做的贡献。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京师同文馆被迫停办,1901年年底该馆编制并入了京师大学堂。

京师同文馆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官办的新式学校,无论培养目标、课型设置、教授方式和管理制度比起传统私塾和书院来都独具特色,很快各地就纷纷仿效。1863年李鸿章奏请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原名"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并具体拟定出办学章程12条,目的是为了兴办洋务培养译员,学制三年。第一期招生40人,开设经学、史学、算学和英文等课程,聘任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和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1839—1914)为西文教习。

金楷理出生于德国萨克森州,幼年时全家移居美国。1863年他以优秀成绩毕业于罗切斯特大学,1866年5月奉美国浸信会派遣到宁波传教,后在杭州设立了浸礼会工作站。1870年他在广方言馆教授德文。上海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局后,他同时兼任广方言馆教习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通译。1875年他辞去了江南制造局职务,调任福州船政局,其间还兼任上海道台通事。他曾随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1845—1900)赴俄,后任驻俄公使馆参赞。1901年醇亲王载沣(1883—1951)率团访问德国,金楷理作为随员陪团前往。1880年3月11日他被聘任为中国驻德使馆二等通事,直到1903年退休,共24年。1897—1902年他曾在柏林大学进修,专攻政治经济学和财政学。1908—1910年他被聘任为中国驻罗马使馆顾问。1914年9月29日病逝于法兰克福。在翻译馆任职期间,他曾先后与赵元益(1840—1902)、华衡芳(1833—1902)、王德钧、李凤苞(1834—1887)和朱恩锡等人合译15种西书,还参与翻译《西国近事汇编》。

当年在江南制造局任职的还有卫理(Edward Thomas Williams,1854—1944)。他原是美以美教会传教士,于1887年到南京传教,1896年任美国

驻上海领事馆通事兼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1898—1901 被聘任为上海市政府译员，1918—1927 年被聘任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汉文教授。他曾与范熙庸和王振声等合译七种西书，个人专著有《中国的昨天和今天》(Chinese Yesterday and Today，1923 年)和《中国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a，1928 年)等书。

1864 年广东也创办了广州同文馆(原名“广东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从当地驻防旗军和其他家庭背景的品学兼优子弟中选录生员，以研修满文、汉文和外文为主打课程，并辅以经史文艺。第一期招收学童 20 名，其中广州满汉旗人 16 人，非旗汉人子弟 4 人，学制为 3 年，毕业后派往各衙门任通译，并准予日后参加乡试。1879 年因遣使各国驻粤领馆和商号办理公事急需，又增设了法文馆和德文馆。除直接招生外，学校还将英文馆中十名优秀生分拨至法文和德文馆，作为双语生培养。1867 年从全校尖子生中遴选十名进入京师同文馆代培，此后又于 1871 年、1890 年、1896 年和 1899 年选派赴京学子 37 名。1905 年广州同文馆改为五年制的译学馆。

美国人谭顺(Theos Sampsom)因精熟西文被聘为第一任英文教习。该校每天上午 9 点至下午 3 点由西教训课，早晚则由汉文教习监课，督促学子将中外语言文字融会贯通，不使学业荒废。

1865 年哈巴德安(Andrew Patton Happer，1818—1894)被聘任为广州同文馆英文教习。1818 年他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长老会教徒家庭，父母都是基督新教传教士，从小受到教会家庭熏陶。1844 年他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受美北长老会差遣前往澳门传教。1845 年他在当地开办了一所男生寄宿学校，共招收学生 30 名。1847 年 3 月他与花莲治(John Booth French)将该校迁往广州，成为当地最早的新式学校。

他除了行医治病外，也兼任讲道和教学工作，先后创办了柔济女医院、端拿护士学校、夏葛女医学校、精神病院、明心书院、真光书院和培英学校。1884 年他回美国募集了 10 万美元办学经费，1887 年创办了广州格致书院(The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并任监督，使该校得以在 1907 年发展成岭南学堂(岭南大学前身)。

哈巴安德曾协助裨治文和克陛存修订圣经，把新约译成粤语，还编译了《儿童赞美诗集》。1849 年他出版了《天文问答》一书，是最早向中国读者介绍近代天文学的科普读物之一。1879 年哈巴安德出版了《北京访问记》(A Visit to Peking, with Some Notices of the Imperial Workship at the

Altars of Heaven, Earth, Sun, Moon and the Gods of the Grain and the Land, 1879 年), 1880—1884 年间还主编《教务杂志》。1891 年他因病返回美国, 1894 年辞世。

哈巴安德是美北长老会在广州传教活动的开创者,也是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中颇有影响人物之一。他对于中国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不断地把西方的现代教育、医学、天文和宗教介绍到中国,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在中美近代文化交流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

第五章
美国汉学家团队及其建树

美国前汉学时期，许多对于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文人、商人和外交官都是通过从拉丁文、法文和德文的中国经典文献的转译来了解中华文化和历史的，他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也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学术课题研究。20世纪初不少汉学家都是从翻译中华文献开始走上汉学研究之路，或者从一个中华文化的热爱者成长为一位专业汉学家的。美国高校正式开设汉学课程之后一些学子在东亚系或者历史系系统地学习了那些不带明显的意识形态课程。他们对于中国国情和文化的了解越多，学术兴趣就越浓，其中一些人就撰写起译介文章来。他们就是美国汉学筚路蓝缕的开拓者。

有人说卫三畏是“早期美国汉学之父”，费正清是“现代美国汉学之父”，其实在美国汉学各个历史阶段中发挥领军作用的主要是不同流派的汉学家团队，个人作用无需刻意加以强调也已包含其中。在美国汉学家中，有许多全国性机构的组织者、地区性学会的法人代表和专业性工程项目的设计师，但是在主流学术思想上能对多数汉学家产生影响的统帅级人物人数卻不多，更确切地说，不是不能，而是没有必要。卫三畏的主要贡献是他构思早期美国汉学研究蓝图的《中国总论》，而费正清在现代美国汉学发展方面的功绩是对于汉学与社会学科相结合的倡导，显然，这两位举足轻重人物的学术思想并非行政指令，如何抉择均由全体参研者定夺。美国汉学家之间的分工不同，贡献有别，但是离开了其中任何一个人，美国汉学史也许就不是完整的历史。彼此的学术研究不能替代，也不存在学科意识重叠之虞。只要论证能自圆其说，言之有据，只要有人提供讲台或者版面，就有用武之地。如果说“汉学之父”只是“开山祖师”的同义词，倒不如说“汉学家团队”的建树作用比历史开创更为重要。

虽然美国的汉学研究历史不如西欧汉学大国的历史悠久，但是其建制

化和常态化阶段之后的资源开发力度、科际整合范围、资金和人力投入规模以及专家研究成果数量,都堪称为“后来者居上”,无论从知识体系还是方法论看对国际学术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历史存在于流淌的时光长河中,汉学家赋予了汉学史生命和智慧。充满探索、挫折、挑战和机遇的美国汉学史的发展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前汉学酝酿时期,建制化与常态化的汉学研究形成时期,多科与多元化汉学研究时期和具有现代性特色的当代汉学研究时期。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研究课题,都有自己的主攻方向、对策和特色。各个阶段承前启后:前者为后者做好铺垫,解决难题,清除障碍;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扩展延伸,发扬光大。这就是历史,多彩多姿的美国汉学史。

一、美国前汉学酝酿时期(18 世纪下半叶至 1876)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民间往来可以上溯到 18 世纪下半叶,中华文明的历史随着两国经贸和文化交往的增加逐渐为美国知识阶层所了解。虽然早年来华的美商只能用“洋泾浜”英语与中国居民沟通,因此影响了对中国的了解,但是却为后来美国传教士、外交官和学者对中华文化和国情的研究做好了铺垫。

早期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如裨治文、雅裨理、卫三畏和伯驾等人一度侨居广州或澳门,鸦片战争之后大批美国人从通商口岸涌入中国内地,到 1877 年美国新教来华人数已多达 210 人。他们的多数人专业素养好,肩负着叩启中国大门的任务,来华后努力学习汉语和华夏文化,因此能较快地融入中国社会。1784 年第一艘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达广州标志着中美直接贸易的开端,推动了“中国热”的升温。

一些早期的美国政治家和思想家对于中国文化采取了开放和尊重的态度。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都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推崇者,曾经试图将中华文明的积极元素引介到美洲的政治生活中,用于解决他们在建国过程中所遇到问题的参照依据。据载 1723 年美国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居住费城期间曾经常阅读儒家哲学、中国历史和农业方面的书籍。

美国前汉学时期的研究被认为是欧洲模式的延伸,欧洲移民学者和留欧返国的美国学者功不可没。英国学者傅兰雅、德国学者劳费尔、佛尔克

(Alfred Forke,1867—1944)、夏德、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1909—　)、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梅谷(Franz Henry Michael,1907—　)等人,相继赴美讲学或者侨居,将欧洲汉学的学术传统带到美国,为美国汉学研究注入了活力。他们从历史学和语言学角度切入,带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的早期研究对于中国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却很少涉及。

美国前汉学时期的中华文化和中国国情研究得益于来华传教士、诸多学术团体、高校东亚专业以及基金会。这一时期的研究以自发、分散、微观和个案为特点。其中许多人虽然不懂中文也没有来过中国,但是他们的论述后来却成了美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资源。

(一)美国中华文化研究的先驱卫三畏

卫三畏生于纽约州尤提卡,父母都是虔诚的新教教徒。1832 年他毕业于特罗伊伦塞勒学院,第二年以美国海外布道会传教士身份到达广州。他在广州创建了一家美国公理会印刷所,工作之余刻苦学习汉语、日语和葡萄牙语。1835 他移居澳门,1837 年利用护送几名流落国外的日本海员回国的机会,与日本工商部门建立了贸易关系。1845 年卫三畏返美后与萨拉·沃尔沃思(Sarah Walworth)结婚成家。

在帮助裨治文编辑《中国丛报》的过程中,卫三畏潜心研究中华文化。1843 年他在《中国丛报》第 2 卷第 10 期上发表了《论中国的度量衡》和《论广州的进出口贸易》两篇文章,为他日后的中华文化研究打下了基础。1847 年裨治文离开广州前往上海,由卫三畏接替他所主持的《中国丛报》编辑工作。

1853 年卫三畏被指派为美国舰队司令裴来(Methew Calbraith Perry)的日语通译前往日本,三年后担任美驻华公使馆参赞兼通译。1858—1859 年他参与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等重要外交谈判,曾主张把传教宽容条款写进文件。1860 年他升任为美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后 7 次代理公使馆馆务,1874 年曾陪同美国驻华公使艾忭敏(Benjamin Parke Avery,1828—1875)向同治皇帝呈递国书。

《中国总论》是卫廉士的外交思想和对中国国情研究的总结。该书修订时他的健康已经每况愈下,对于往事感慨无限。“中华归主”的思想在

他的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

> 我在华43年的经历正是中国逐步发生变化并终于走向开放的年代。值得提及的最重要事件有：1834年东印度公司停止活动，1841—1842年对英开战，洋行垄断取消后开辟了五个通商口岸，由三角船箭头引发对广州城的苦攻，在北京城外采取的行动，京城外国租界的建立，最后是1873年叩头问题的和平解决，使外国使节得以晋见中国皇上。那些寻觅把握历史的上帝之手的人们将从帝国的剧变中预感到主的目标的实现。在那些政治事件取得进展的同时圣经正在散发，传教士在群众中布道和教化的努力正悄悄地几乎毫无阻力地取得了成效。……真正基督教的先进性是拯救处于毁灭性冲突的人们的唯一充分手段。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已经度过了挨打阶段。过去她就像天上的星星以过分自负的目光看待他国，对于它们漠不关心，如今不能再享受倦怠和与世隔绝的清净了……圣灵的许诺将实现伊萨早在孔夫子时代之前就发出的预言，来自中华之邦的上帝儿女将与普天之下的各族人们一起唱起赞歌。①

《中国总论》是卫三畏1845—1846年返美述职期间所作有关中国历史、政治、文化、地理、文学和艺术报告的汇编，1848年初版。退休回国后他注意到中国国情的变化，花了几年时间又对该书进行了修订，在前4章中增加了许多新编译的材料，重写了第6章，篇幅比原来增加了近三分之一。1882年3月脱稿准备付梓，他不幸中风偏瘫，由其子卫裴列完成了后续工作，根据中国政治现实对最后3章以及有关中国地理和文献的章节进行了改写，编辑了全书的索引。1882年由纽约的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公司(Charles Scribner's Sons)制版，1907年重新修订。1913年两卷本的《中国总论》终于出版。

《中国总论》上册14章，正文836页，前言7页，目录8页，插图41幅；下册12章，正文和附录775页，目录8页，索引33页，插图31幅，地图2幅。

---

① *Preface to The Middle Kingdom* by S.Wells William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3.

该书覆盖面广，资料翔实，上至中华民族的史前传说，中国国土面积、疆域气候、人口分布、自然资源、朝代更迭、中外交往，下至作者来华前后发生的圆明园浩劫、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浦安臣出访、中国学童留美等方方面面。各章纲目清楚，重点突出，既有当时报章报道和时评的摘引，也有作者本人的独到分析和评论。例如书中摘引了《中国丛报》有关"府"、"厅"、"州"、"县"的资料（上册第 58 页）、六种传统教科书和"秀才"、"举人"、"进士"的介绍（上册第 531—577 页），转述了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有关南京琉璃塔的印象（上册第 102 页）、美国传教士斯蒂芬斯（Stevens）有关威海卫的见闻（上册第 93 页），以及中国农村生活和风物（土地、住房、水牛、人力车、农作物）的素描（下册 1-15），叙述了银号、当铺、兵器（下册第 86—89 页），还引用了德庇时爵士有关中国阴阳理论与埃及宇宙起源说中的雌雄原则的比较（下册 200 页）。书中百科全书式的编排和论证，为当时的欧美外交人员、汉学家、商人、传教士、探险家和观光客的专业研究和知识扩展提供了大量史实和个人体验，堪称为美国早期中华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部权威著作。

卫三畏主编《中国丛报》期间，曾经编写了数十篇介绍中国文化、历史、经济、政治、文学和社会的文章，印刷所经营者、报人、普通编辑和总编的经历使他有机会广泛接触中国社会，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了解。涉足外交事务后，更提高了他对西方列强对华政策和风雨飘摇的晚清社会的解读水平。作者的详尽介绍和精辟阐述，在同时代的同类著作中并不多见。从学术上来说，尽管他也有过与许多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一样的多重身份：传教士—外交官—学者，也有自己的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但是却没有人对他的个人品格和学术信誉提出过任何质疑。

卫三畏对中华文明的评介总体上是客观、公正和全面的。他在《中国总论》的第一章中写道：

> 中国的文明是在自身的制度中发展起来的；它的政府是在并不了解任何他国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它的文学没有借鉴外国精神，也没有研究过外国学人；它的语言符号和结构独一无二，历史悠久；它的人口众多，习俗独特，以勤劳和文静著称于世。对于生活在国土这么辽阔的中华民族的研究，必定极富教育意义和乐趣。如果方法得体，必然会使人坚信圣经中有关世界各民族在个

人、社会和政治关系方面充分发展所需的告诫和鼓励。(上册第1页)

勤劳使中国人置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之上。他们不仅在天道酬勤之地改变了当地的植被,而且几乎把耕地和梯田开到了山顶,还在那儿建立了城镇,沿着山颠筑起了城墙。他们以勤俭为本,目标是使人有吃,有穿,受到教育,得到美化,使众多人口在一个体制下团结起来。一千年以前他们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五百年以前马可·波罗在描述他们的情况时欧洲人感到难以置信,就像中国人现在听到西方国家强大和繁华时的心情一般。由于自然边界把他们与其他国家分隔,他们的文明是在独特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与欧洲文明相媲美,而不应该让欧洲人来对它进行评判。现代欧洲的一些最了不起的发明其实都源于这个民族(例如指南针、瓷器、火药和印刷术),而且早在多少个世纪前他们就对这些技术有了了解并加以应用了;约有三亿人通过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政体和一种文字的使用团聚在一起;他们的城市和首府,在数量上与任何时代的最大国家不相上下;他们的城镇街道不但遍布于陆地,而且还遍布于水域;这样一个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应该占有显著的地位,对他们特点和状况的研究一定会给每一位心怀善意者留下美好的印象。(上册第46—47页)

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上册第九章中对于中国的教育和考试制度作了详细的介绍和积极的评价。他引用了《中国丛报》刊登的文章,认为"秀才"相当于西方大学的"学士"学位,"举人"相当于"硕士","进士"相当于"博士"。他写道:

……以上是中国考试制度的基本情况。中国政府的文武百官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得到补充的。这是他们制度中与过去和现在君主大国各个方面的惟一不同之处,只有古埃及曾有过相同的做法。有人说"这也许是他们的创举中惟一值得保留的办法,别的国家没有实行并使之更加完善以达到可以跟他们相媲美的制度。(上册第562页)

这些典籍证明了，中国青年和基督教国家青年一样都接受他们所遵循的较高行为准则的教育。但是前者接受的是语言所能表达的最佳德育书籍的教育。要是我们学校学习《所罗门格言》和《新约》就像中国学校学习“四书”那样透彻，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就会以有出息的称职公民身份发挥其作用了。（上册第563—564页）

他认为这样的考试制度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取消奴隶、农奴和像印度种姓那样的界限，不过它只适合于中国，不能移植到别国。他也注意到中国科举制度的弊端，认为有些可能是教材的问题，有些可能是中举不能进入官场的问题，但是最严重的是考试官员纵容行贿举子作弊的问题。

卫三畏有时把儒学视为中国的一种宗教，与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并列，这是他对于孔孟学说缺乏充分了解的表现。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正统的地位，构成了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也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至高无上的信条。但是与耶稣和释迦牟尼不同的是孔子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中国城乡各地所建的孔庙和文庙是后世中国人对于这位伟大教育家的祭奠和纪念场所。千百年来孔子确实被神化了，但是孔庙和文庙并不具有令人盲从和迷信的宗教性质。西方汉学家对于“儒教”的说法长期存在着争论。

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中有关儒教的解释是前后矛盾的。例如他曾经说过：“中国有三教，即通常所说的儒教、佛教和道教（唯理教）。第一个教名是外国人起的，隐含着包括国教在内的一般知识界的信仰。”（下册193页）“中国国教实际上与儒教——外国人通常称之为‘儒家学者信奉的教派’——有关，因为所有教徒和牧师都是通经读典的知识分子。”（下册199页）但是他也说过：“对于研读孔子、朱熹及其弟子著作的人来说，把儒教视为一种宗教多少有点不恰当，通用名称以外的其他说法都不准确。‘儒’是指知识界的一员，是对于接受朱熹有关‘太极’推测的学者的称呼。……孔子有关宗教问题的言论极少。虽然他自称奉天命恢复古代国君制度和信条，但是从不对国君和家长讲授为人的职责。他承认对于上帝知之甚少，上帝远离并超越世人，人们应该对亲属和社会尽责，而不要去朝拜不甚了了的鬼神。他说：‘不知生，焉知死？’当他的弟子问他以前生病

时曾献祭于谁时,他说已经拜祭过了。"(下册 199—200 页)

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上册第十一章中对于孔子和孟子的生平以及儒家学说作了长篇介绍。他认为:"孔子哲学的要点是服从长者,和蔼并正直对待同辈;他没有提及人人都对其负有责任的一种隐形力量。他们只把目光对准这个世界以求支持,让国君个人对更高裁判负部分责任。对于孔子理想中的'君子'以及这一观念提出之后对其民族的积极影响和强大力量进行怎样的评价都是不会过分的。"(上册第 662 页)

他还说:"不可否认孔子有许多言论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在他的信条中也有一些可能被人反对的条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理雅各对于孔子在《春秋》以及他平生中不尊重事实方面持极度怀疑的态度。然而与希腊和罗马的圣贤相比较,孔子的著述总体上是好的,在适用于他所生活的社会和卓越的实践性方面,超越了西方哲学家。"(上册第 663 页)

但是,从深度和广度上看,卫三畏对儒家学说的介绍和评价明显受到理雅各观点的负面影响,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显得比较散乱,缺乏精彩论述,失诸肤浅。

卫三畏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分析是:

> 英中两国第一次交战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将来对于千百万人都不可能不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次战争的不同寻常之处是它的起因主要是商业误解,竟发生于强国与弱国之间、清醒的优越感和无知的骄傲之间。令人感伤的结果是强迫弱国赔付在自己境内违法出售的鸦片,摧垮了其软弱政府保护本国子民所能施加的微弱的道德力量。严重的后果是,基于承诺的责任向世界的一半引荐世界的另一半,没有战胜者的傲慢要求,也没有被征服者的屈辱让步。这是中华民族全民生活中的转折点,强迫为被销毁的鸦片支付 600 万银元的赔款给英国的名字留下了污点。(下册第 463—464 页)

> 把鸦片作为发动这次战争的托辞明显欠公允。虽然囚禁义律和其他事件才是借口,但是连英国官员和作家都设法掩饰他们如何抓住鸦片为诉诸武力的真正理由。人们凭自己的智力完全可以判断,这次战争完全是强加于一个傲慢地拒绝与其他国家平

等交往的政府，不对自己行为作出解释，禁止其子民与别人自由往来才发生的。（下册第572页）

卫三畏在揭开侵略者遮羞面纱的同时也似是而非地为他们打了圆场。他的一些理论有时听起来太矫情，但是在殖民主义者明火执仗攻城略地的19世纪这实在算不了什么。

卫三畏在《中国总论》第二十五章中用了64页的篇幅、两幅地图、英国政府蓝皮书、《泰晤士报》记者柯克（George Wingrove Cooke，1814—1865）的信件、额尔金的自传、费希尔中校（Lieutenant-Colonel Fisher）、吴士礼（Garnet Joseph Wolseley，1833—1913）与郇和（Robert Swinhoe，1836—1877）等人的著作，记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关系和英法联军抢劫北京圆明园的暴行。作者写道：

10月6日，额尔金勋爵和其他将军，在京西北的一座宽敞的喇嘛庙——黄寺安顿了下来，军人占领了寺院和京城之间的大片开阔地带。那天法军的警戒部队和英国骑兵到达了海淀的临时大营房（清军的京师卫戍部队驻地），圆明园就在附近。该园很快就遭到了大肆野蛮糟蹋式的抢掠，蒙托邦将军原本可以对此进行干预，以保全表现中国艺术、建筑和文学的数量巨大的珍贵藏品，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必将落得个永世骂名。额尔金勋爵日志用以下的文字谈到了他对此次行动的观点：

10月7日下午5点：我刚从颐和园返回。那确是处景物宜人所在，就像一处英国园林，有数不清的建筑和漂亮的宫室，收藏着许多中国古董，精致的钟表和青铜器。天哪，已是一处如此颓败的景象！法国将军在一片抗议声中走了过来。他曾对洗劫进行阻止，以便在两军中瓜分夺来的东西。在我看过的每一个宫室，多半的物件都已被搬走或者打碎了。我设法召来了一团我们的士兵把守那个地方，然后将物品进行拍卖。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很难按部就班去做事，因此有些军官就留在那儿。他们准备将珍宝装满两三车运出去变卖。抢掠并蹂躏这样一个地方实在太坏了，而那些被糟蹋和打碎的东西就更糟了。价值100多万镑的财产中，我敢说连五万镑都收不回来。法国士兵想方设法毁坏那些

美轮美奂的丝绸,砸烂那些乐器和瓷器。战争是可恨的差使,见得越多就越憎恶它。(下册682—683页)

接着,作者又引用了郇和的《华北战役》中有关洗劫圆明园的一段文字:

……大殿里挤满了外国士兵,金銮殿的地上堆满了天子珍藏的古董,将作为礼品进献两位更值得尊敬的君主。"瞧,"蒙托邦将军指着那些珍宝说,"我已经选了几件美妙绝伦的东西,准备分别送给英国女王和法国皇帝"。

两次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都是近代史上伤天害理的事件,《中国总论》中收集的那些不可多得的资料对于汉学研究来说都是十分有价值的。重事实,重证言,重第一手材料,重在第一手材料基础上作出的分析和结论,是所有有影响的汉学著作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那些著作可信度高的标致。该书的价值正是体现在这些方面。

《中国总论》中有关美国与中国往来的内容着墨不多,这大概与作者对该专著主体内容的定位和所设计的读者对象有关。从学术价值上看,这样的编排效果也许更好,影响面也更广些。

后传教时期,许多西方外交官、传教士、记者、学人和汉学家都喜欢在自己有关中国的著作中谈论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有些人谈到中国人性格的缺点时往往夸大其词,语气傲慢、轻蔑,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但是他们所接触到的中国人实在太少,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实在太肤浅,因此他们下结论时就无法遵守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逻辑学的起码原则。

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上册第十四章中也谈到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性格中的优点和缺点,但是与众不同的是他不居高临下,不盛气凌人,总是言之凿凿,是非分明。不完全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学术价值所赖以支撑的严肃性和可信度,同时也是他求实风格的一种体现。他写道:

……中国人的某些较优良品格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他们通过遵守和平与健全的秩序,使生活和财产更加安全。他们用本国

语言编写的大部分德育教材推广了教育，提倡对财产法律权利的普遍尊重，使社会各阶层能和谐相处。官场上的平等竞争可以消除为争夺权力和显贵职位所引发的暴力，勤俭换来的是衣着、饮食和住房，同等的待遇鼓励着人们去不断努力。如果有人问他们为何能达到这个境界，我们可以把原因主要归结为国君的功劳：为了自身的目的从古至今坚持一个民族的做法。他们社会的根基从来没有因为向外移民或者优等外族的不断入侵而被破坏，充分安居乐业，所关注的只是家庭的聚合和对父母以及长者的尊敬。教育加强并传播了他们已有的道德。（上册第833页）

关于中国人民族性格的缺陷，他认为：

因为没有法律，他们自己就是法律。他们总是知道得多，做得少。他们一般注意外表体面，实际上污秽不堪。谈话中满嘴脏话，生活上有不雅行为。家庭圈子中的篱栅使他们相互受到约束，因此较少诱奸和通奸之类的事。前者可以说罕见，但是妓院和同狱犯中的事却处处都有。（上册第834页）

作者在谈到中国人说谎、偷窃、贪婪、放荡、不讲客套等方面的弊端后写道：

总的来说，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完全综合的性格：如果他们有什么值得夸奖的，那就有更多需要批评的；如果他们有什么严重的缺点，那么就有超越多数非基督教国家的美德。虚假的善良与先天的猜疑，过分的客气与真实的粗鲁，部分的创新与十足的模仿，勤劳节俭与铺张浪费，趋炎附势与独立自主，以及其他好与坏的品格，都奇异地混合在一起了。在设法通过法律约束和教育推广修补他们性格中的缺点的过程中，无疑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式。（上册第836页）

卫三畏在《中国总论》的第二十六章中用简短的一段话表达了他撰写该书的初衷和对中国未来的期待：

有关我们对中华帝国所了解事实的简要陈述的篇章，用意不在于在最初撰写或后来修订中对他们的过高赞美。他们民族性格中的缺点、弊病、狭隘和偏执倾向，已经被非常坦率地指出，而他们的盲目和谬误在外国列强两次兵戎相见的教训中并没有被忽视。过去三十年的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说，将比历史上以往世纪的任何十年都更难忘。这些事情的发生不是没有痛苦，不是没有误解和失实报道的粗暴痕迹。即便对于不拘小节的读者来说，重要事实都已再清楚不过：中国人性格中存在着可在适当时候使他们从曾经陷入的困境中脱颖而出并使他们跻身于世界列强前列的因素。想想中国的各类学府以及他们早就关注如前所述的努力——培养自己国家科技人员的队伍，那就是令人振奋的依据！（下册第740页）

充满苦难、抗争、求索和创业艰辛的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证明了卫三畏预言的正确性。他的预言不是凭空作出的，需要历史学家的敏锐目光，学者的深厚学养和政治家的无畏精神。这正是他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西方学者之处。

美国汉学家马森在他的《西方的中华帝国观》一书中对《中国总论》作了这样的评价：

也许有关中国问题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它在西方广为传阅并受到好评。它的资料来源于个人的观察报告、对当地权威著作的研究以及《中国丛报》。……这部描写中国人生活方方面面的著作，是对这一时期普通作品所涉及的问题的范围和种类的最好说明，卫三畏用如此清晰、系统、博学的方式为读者呈现了他的资料，以至于他的著作在今天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美国文献中仍占有令人尊敬的地位。①

卫三畏在中国生活了40年，是中美关系史上的有影响的人物，也是美

① 马森：《西方的中华帝国观》（杨德山等译），第38—39页，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

国早期中华文化研究的先驱。1876 年 10 月 25 日，他因为健康等方面的原因辞去了公使馆的职务，翌年返美定居于康涅狄格州。1877 年他被耶鲁大学聘任为该校第一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兼东方学图书馆馆长，1884 年 2 月病逝于家中。

他有一个儿子叫卫裴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1857—1928），1879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后留校工作，曾先后担任过图书馆助理、远东史讲师、助理教授和教授等职。

卫三畏个人的主要著述有：

《简明汉语教程》（Easy Lessons in Chinese，1842 年）。

《论中国的度量衡》（1843 年）。

《论广州的进出口贸易》（1843 年）。

《官方方言中的英汉用语》（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rect，1844 年）。

《中国商务指南》（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1844 年）。

《中国地志》（A Topography of China，1844 年）。

《日本人传奇》（An Account of a Japanese Romance，1849 年）。

《裴来日本之行》（A Journal of the Perry Expedition to Japan）。

《英华分韵撮要》（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Canton Dialect，1856 年）。

《汉英拼音字典》（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Wu-Fang Yuan Yin*, with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aracters as heard in Peking,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1874 年）。

《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two vols.，1848 年）。

《粤语汉集》（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co-authored，1841 年）。

这些著述曾经成为外国来华传教士和商人的案头读物。在耶鲁大学执教期间，他曾经在不同场合向不同对象做过 100 多场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还著有《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Our Relations with Chinese Empire，1877）和《中国历史》（1897 年）等专著；自觉晚年生活因此而充实。

(二)以《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蜚声西方学界的何天爵

美国传教士何天爵在联合教会学院攻读学位时就被按立为长老会牧师,1869年奉派来华任北京公理会教会学校校长。1871年他辞去了教会职务进入了外交界,先后任美国驻华公使馆通事、首席参赞和署理公使等职。1880年他曾参与起草有关华人移民美国的条约,还参与了美国与朝鲜条约的签订。格兰特总统来华期间由他全程陪同访问,不仅仅是因为他通晓汉语,更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位中国通。

1876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莫约翰等人到济南传教,打算在该市繁华的西大街泺源书院附近置地建教堂和医院,引起了教会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冲突。1882年2月美国政府接到报告后命令署理公使何天爵与清政府总理事务衙门交涉,1884年年初他前往山东抚院面商,几经周折,最后以退还原房价并赔偿损失结案。"济南教案"的处理是何天爵外交生涯中的一件大事,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各阶层人士,增加了对中国文化和民俗民情的了解,积累了丰富的中国历史和社会知识。

1885年何天爵返美,1895年出版了《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一书(The Real Chinaman, New York, Dodd, Mead & Company, 1895年),①几年后又出版了《中国的现实问题》(The Real Chinese Question, New York: Young People's Missionary Movement, 1907年)等著述。

何天爵的《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由美国纽约多德·米德公司出版,全书共15章,分别为:第一章引论(第1—28页);第二章中国政府(第29—48页);第三章语言(第49—72页);第四章中国人的家庭生活(第73—92页);第五章中国人的社交(第93—115页);第六章中国的宗教(第116—143页);第七章迷信(第144—170页);第八章中国人的辫子(第171—191页);第九章中国法庭(第192—213页);第十章官绅与百姓(第214—236页);第十一章教育与文学(第237—260页);第十二章礼仪(第261—283页);第十三章商家与营销术(第284—309);第十四章中国的穷人(第310—329页);第十五章中国的金融体制(第330—350页)。

作者根据自己在华16年的生活经历和观察感受,对中国的历史、政

① 在19世纪前英美作者常用"Chinaman"称呼中国人,在现代英语中该词多含贬义。

府、宗教、商业、教育、文学、语言、家庭、社交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扫描，资料翔实，态度客观理性，分析细致入微。他对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特性进行了比较，认为在吃苦耐劳、忠诚可靠、安土重迁和赡养父母的传统方面中国人为世界树立了一个很值得效仿的榜样。中国丰富的文化典籍蕴含着金玉良言和培育后代高尚道德的经验，中国的教育体制显示出东方的智慧。不管中国商人在自己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排名第几，他们的精明机敏、事业心和进取精神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同行相比都毫不逊色，中国商界普遍存在一种合作精神。鸦片给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钦差大臣禁止鸦片贸易令人敬佩，中国人不喜欢西方人是可以理解的。

与此同时，作者也感叹中国贫困阶层为了养家糊口每天早出晚归，勤奋劳作，既无星期天也没有休闲娱乐。他认为家长制长期统治中国有两个原因：一是“孝道”的提倡；二是“学而优则仕”的人才选拔制度，不过其副作用是腐化堕落和贪赃枉法的蔓延。他还表达了这样一些见解：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观念是很难消除的一种错误信仰；中国法庭既没有律师也没有陪审团；泛道德主义和儒家文化的普世性是中国传统外交的主导理念；中华民族的思维结构和精神状态似乎浸润着迷信观念。不管他的观点是否完全得到了多数读者的认可，但是作者没有发表耸人听闻的高论以迷惑没有来过中国的本国读者，这在那个弱肉强食年代的西方知识界和外交界却是难能可贵的。

1895年新年伊始，何天爵在家中书房的案前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语重心长地写下了如下的《前言》：

> ……批评中国人比理解他们容易得多。中外交往实在太少，仅仅是近年来才开始的事。过去我们的信息主要建立在好奇而非事实基础之上，其结果必然而且难免对于中国人及其行事方式的错误判读，然而他们却无可争辩地属于值得人们认真研究的民族。实际生活比任何虚构作品都更具魅力。与只为普通人所熟悉的被丑化了的中国人形象相比，具有牢固透明特性的真正汉民族子孙使求真务实的研究者更感兴趣。
>
> 本书既非答辩、道歉或者批判，亦非颂词，只不过一种解读而已。作者曾经侨居中国多年，几乎与中华帝国各阶层各类人员有过密切接触，彼此无拘无束。这一经历为此书的写作提供了部分

素材。作者试图描述并说明中国生活中的一些引人关注的事情，向读者展示为什么在我们看来中国人奇特的行事方式，对于他们来说却再自然不过。这里只摆事实，而不妄加议论，为的是以粗线条的笔触去描绘作为人类大家庭成员的中华民族的概貌。

书中列举的许多事例是为了使画面贴近生活，增加情趣，明白易懂。每一事例都与实际发生的一致，既不涂脂抹粉，也不夸大其词。如果有必要，每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人名原本也是可以明示的。同样地，每页的插图也十分逼真，除了翻印过程中的技巧和保真度考虑外，都不对任何细节加以改变。

虽有弊端和怪癖，然而中国人身上却有许多宝贵的道德和令人肃然起敬的品格。岁月留痕，但青春依旧。任何人如果不相信这个民族有一个美好的前程，看不到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看来都不太可能真正了解他们。①

（三）毕生潜心研究中国历史和政治的卫理

1854 年卫理出生于俄亥俄州，1875 年毕业于西弗吉利亚贝瑟尼学院，1893 年读完硕士学位课程，1915 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887 年他以美以美教会传教士身份到南京传教，1896—1898 年任美国驻上海领事馆通事兼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1898—1901 年被聘任为上海市政府译员，1901—1908 年任美国驻华公使馆汉务参赞，1908—1909 年任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总领事。1909 年返美后一度担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副司长，1911—1913 年任美国驻华使馆代办。1919 年巴黎和会以及 1921—1922 年华盛顿会议期间曾任美国代表团远东事务顾问。1918 年和 1936 年他两次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勋章，表彰他对促进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所做的贡献。

卫理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期间，曾经口译 11 部有关外交、政论、科技、农务、航海和日本教育方面的书籍：《日本学校源流》（范熙庸笔录，1899 年）；《无线电报》（一卷，范熙庸笔录，1899 年）；《东方交涉记》（王汝聃笔录，1900 年）；《农务土质论》（三卷，范熙庸笔录，1902 年）；《农

① *Preface to The Real Chinaman* by Chester Holcombe, pp. VIII—IX, New York: Dodd, Mead & Company, 1895.

学津梁》(一卷,汪振声笔录,1902 年)、《照机镂版印图法》(王汝聃笔录,1902 年);《取滤火油法》(一卷,秀耀、卫理口译,汪振声笔录,1902 年);《工业与国政相关论》(两卷,王汝聃笔录,1909 年);《无线电报补编》(范熙庸笔录);《航海简法》(四卷,汪振声笔录);《埏纮外乘补遗》(汪振声笔录)。

卫理一生潜心研究中华文化、历史和政法,个人主要著述有:

《最近中国关于商业、铁路和矿山企业的立法》(Recent Chinese Legislation relating to commercial, Railway and Mining Enterprises, 1904 年)。

《清代中国国教》(The State Religion under the Manchus, 1913 年)。

《中国的昨天和今天》(Chinese Yesterday and Today, 1923 年)。

《中国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1928 年)。

《中国简史》由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出版,全书共 670 页 22 章:第一章引论;第二章奠基;第三章上古时期;第四章恢复时期;第五章艰难时期;第六章黄金岁月;第七章文明与野蛮;第八章明代(1368—1644):现代之曙光;第九章进步时期;第十章傲慢与侵略;第十一章清代(1850—1860):文明苦斗;第十二章清代(1860—1875)改变旧秩序;第十三章清代(1876—1896)衰败;第十四章侵略与反抗;第十五章邻邦与特殊利益;第十六章晚清和民初:迟悟;第十七章革命;第十八章民国(1913—1916):袁世凯执政;第十九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国;第二十章民国时期(1918—1920):巴黎和会之中国;第二十一章华盛顿会议及之后之中国;第二十二章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附录 1—2;索引。

主编盖伊·斯坦顿·福特(Guy Stanton Ford)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

> 此书的编撰任务既重要,又艰难复杂,但是令人欣慰的是编者卫理教授是一位历史学家兼通译。多年来他的著述一直显露出自己在中国历史和政治研究方面的学术造诣。读者之所以喜欢这部著作也是因为作者曾经侨居中国多年,先后在中国和美国政府部门担任过不同的职务,在 30 多年的岁月中直接与中国人民和事务打交道。如此宝贵的经历更为这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增添光彩。①

① *Editorial Preface to 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P.VII,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28.

卫理退休后返回美国，定居于柏克莱。1918 年他应聘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语言和文学阿加西斯教席，教学之余笔耕不辍，还参加了多个学术团体。在同事和学生心目中他是一位有学问有责任心的教授，是受人尊敬的东方学院院长，平时总表现出他所了解并热爱的中华民族代表人物的那种安详、谦逊、极富哲理修养的品格。他的著作发表后广受关注，曾被几所大学作为教科书使用和引述。作为一位远东事务专家他对于许多重大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表现出不同于他人的远见卓识。早在 1919 年参加巴黎和会时，他就对于漠视中国主权和战胜国地位，让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特权的非法决定表示不满。他在一次参议院会议上仗义执言地指出：该决定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很可能引发另一次世界冲突。他洞察到日本政府的扩张源于 1854 年错误计划的制订。

卫理夫妇共养育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卫理病逝前两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儿子特地回国与他短暂相聚，感受天伦之乐。卫理一生收藏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学方面的书籍，后来都捐赠给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的东方部，成为该校汉学研究的一笔宝贵财富。

（四）传教士圣经翻译专家克陛存

1819 年克陛存（Michael Simpson Culbertson，1819—1862）出生于钱伯斯堡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18 世纪中叶他的曾祖父从安特里姆移居美国宾夕法尼亚，他的父亲是一位银行家。他有五个同父异母兄长，其中一位名叫亚历山大（Alexander，1809—1879）的哥哥经营皮货，另一位名叫塞勒斯（Cyrus，1812—1869）南北战争时期曾任联军军官，在当地颇有名气。

1835 年克陛存进入西点陆军学校学习，1839 年毕业时获炮兵少尉军衔，阿鲁斯图克战争时期曾在劳西斯角服役，1840 年一度被聘任为军校助理教授。1841 年他转入普林斯顿神学院研修神学，四年后被按立为牧师。

1845 年他以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身份到宁波传教。1851 年他与怀德（Alexander Frederick Whyte，1883—1907）等人移居上海，在城内火神庙附近购地建立教堂。1853 年克陛存被聘任为美国公使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1812—1872）的中文秘书兼通事，同年 4 月他被告知要陪同公使赴天京考察，但因船搁浅未能成行。7 月 2 日他陪同公使赴昆山会晤两江

总督恰良(1791—1867)。翌年5月26日克陛存随同新任公使麦莲(Robert Milligan Mclane,1815—1898)乘色士奎哈那号前往太平天国治下的镇江和天京等地,会晤太平天国学王胡海隆(?—1864),参观城南报恩寺塔后溯江至芜湖折返上海。6月14日麦莲向国务卿麻西递交《访问太平天国的报告》称:太平军既不信仰也不了解基督教,他们不太可能与美国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建议美国政府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利用现有中国社会危机扩大与清政府的交往,以恰当的手段强制实行条约条款,造成既成事实,将来不论谁执政都将对美国有利。这一外交策略和思想倾向对于克陛存的传教活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1843年8月22日至9月4日几个西方差会在香港成立了圣经委办翻译委员会,成员有裨治文、文惠廉、施敦力(John Stronach,1810—1888)、克陛存、理雅各和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1815—1863)等12人。翻译过程中委员会成员就"God"的译名以及浸礼会和其他差会对"Baptism"如何汉译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论。克陛存、文惠廉和裨治文提出用简明易懂的语汇来获得意译或直译的效果,但是麦都思自觉汉语能力高于他人,公开否定了克陛存等人的意见。1852年9月《达主教书》评论的作者文惠廉对此作出了回应。《创世纪》评论的作者克陛存也就自己受到的批评进行了申辩,他在一封信中说:虽然福音是为劳苦大众宣讲的,因此圣经的汉译应该尽可能采用能为大众接受的方式,但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持异议者未能在汉语允许的范围内忠实地表达原文。译者在旧约的译文中做了大量删改,包括对词语、句子成分甚至整行内容。在《关于上海修订版汉译圣经评论文集》(Papers Relating to the Shanghai Revis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s)一书中,克陛存和文惠廉的批评多半都循既定套路,赞同他们意见的人并不多。

美国圣书公会资助了裨治文和克陛存等人完成以"神"和"圣灵"为译名的圣经翻译。1864年美国圣书公会出版的裨治文和克陛存《圣经合译本》(Bridgman and Culbertson Version),在忠实贴近原文方面超越了以前的同类译本。

1888年11月5日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1831—1906)在日内瓦向罗马枢机主教团寄送的一封信中说:

现有两个版本的汉译圣经,其中之一是35年前由英国非国

教信奉者翻译、英国海外圣经公会出版的书面语汉译圣经(即委办译本),另一个版本是28年前由美国圣书公会出版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和美北长老会传教士克陛存的合译本,主要为美国传教士使用,也是文理风格。有关"God"和"Spirit"的译词,前者分别选用"上帝"和"神",而后者则分别译为"神"和"灵"。前一版本文理通顺,但是不忠实原文,后一版本与原文意思贴近,但是多直译,风格和成语在冗长的译述中丧失殆尽……能读懂者寥寥无几。①

美国和其他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圣经汉译工程跨越了历史长河,吸引了一些中国翻译家和宗教学者的参与。他们的实践和经验是对中国翻译史上佛经和古兰经翻译理论和技巧探讨的延伸和发展,丰富了这一领域的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和宗教学的范围,是近现代翻译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一笔巨大精神和知识财富。

克陛存个人的著述有:

《论太平天国造反派汉译出版物中有关"上帝"和"神"等专有名词的歧义对译》(Essay on the Bearing of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Tai-ping Dynasty Insurgents on the Controversy Respecting the Proper Term for Translating the Words Elohim and Theos 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criptures,1853年)。

《花国的蒙昧——华北民众的宗教观与迷信》(Darkness in th Flowery Land; or Religious Notions and Popular Superstitions in North China, New York: Scribner, 1857年)。

《中国的宗教现状及其教堂:长老会差会的一次训示》(The Religious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and Their Claims on the Church: A Sermon Preached for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1857年)。

1862年克陛存病逝于上海。他养育了两个女儿,大女儿约瑟芬(Josephine,1852—1939)出生于中国,曾在纽约专修艺术。

---

① Samuel Isaac Joseph: *The Bible, Prayer Book, and Terms in Our China Missions* addressed to The House of Bishops, 1888.

（五）为汇文书院作出卓越贡献的教育家刘海澜

刘海澜（Hiram Harrison Lowry，1843—1924）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曾斯维尔，在韦斯利安学院先后读完硕士和神学博士课程并被授予了相应学位。1862—1863 年他在俄亥俄第九十七团志愿步兵团服役。

1867 年他被美以美教会按立为牧师，同年 10 月 10 日奉派携妻子到福州传教。1869 年 6 月他与麦利和从福州到北京开辟华北宣教区。1870 年他在崇文门内孝胡同购买了一处房产，创建了以该会首任美国会督亚斯立（Francis Asbury）名字命名的北京教堂。后来该会又进一步在北京南城建立了 8 所教堂，与此同时同仁医院、妇婴医院，汇文幼儿园、汇文小学、汇文中学、慕贞书院、护士学校、汇文书院（后并入燕京大学）、汇文神学院（后改名北京神学院）等机构也先后创建。

1873 年山东肥城人王瑞符在北京美以美教堂接受了洗礼，回乡后发展教友多人。1874 年刘海澜利用王瑞符的人脉关系到肥城县安驾庄传教，建立了当地第一所美以美会教堂。1875 年他又到遵化传教，在县城南关购地百亩建教堂。

1900 年 6 月义和团进入北京，亚斯立堂和教会产业毁于战乱。1903 年美以美会利用庚子赔款扩大地产，占用清宗室英宅府院、太山行宫、真武庙和关帝庙，强令 900 余户居民搬迁。1909 年亚斯立堂、汇文书院和慕贞书院得以全部重建。

刘海澜是汇文书院第四任校长，治校共 28 年。他热心教育事业，以新知识和先进的学科理念教授学生，使汇文书院能以其办学规模和教育质量享誉京城。他是 20 世纪初中国北方教会教育事业发展的见证人和参与者。

1924 年刘海澜在北京去世，享年 81 岁。

（六）中国与南洋交通史志和藏学研究专家柔克义

1854 年 5 月 1 日柔克义出生于费城，13 岁丧父，后全家随母亲移居法国。幼年时他曾读过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Regis Huc，1813—1860）1844—1846 年前往拉萨传教的故事，萌生了对于西藏的向

往。著名的东方学家莱昂·菲尔(Léon Feer)曾指导他阅读了许多有关远东的书。1870年他就读于法国圣居尔军校,因为那里可以学习藏语。毕业后他在阿尔及利亚法军中服役了三年。1876年他返回美国,结婚成家后在新墨西哥州购买了一处牧场,但是不久后他发现牧场生活并非自己的追求。1881年他把牧场转让了他人,与妻子移居瑞士。此后三年他辗转欧洲各地学习藏语、梵语和汉语。

1883年柔克义的妻子从她已故的表亲处获得了一笔7000美元的遗产,使丈夫得以在美国驻华公使馆中就任一个无薪职务。为了提高自己的资质柔克义曾向一位喇嘛学习藏语和汉语,不久他的工作如愿地转正为有薪待遇。1887年他辞去了汉城代办的职务,利用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每月为他提供50美元的津贴和有关器材设备,开始对西藏进行考察。

1888年年底他装扮成喇嘛,在一名中国向导的帮助下经保定、太原、五台山、潼关、西安和兰州,于1889年2月6日到达西宁。因为未曾办理通行证他的行程按照规定被终止了。1892年2月17日柔克义携带着一些必备的科学测量仪器从北京再次启程进藏,途经宣化、张家口、呼和浩特、鄂尔多斯、阿拉善、宁夏和塔尔寺,跨越青海东部前往拉萨。1892年7月在纳木卢接受边防哨卡检查时未能办理例行手续,经交涉后获准取道昌都返回内地。

柔克义的西藏行程共8000多英里,先后经过了6个海拔14500英尺以上的山口。他考察了许多有重要地理价值的地方,还用六分仪在100多处设点观测,拍摄了3000多张照片,采集了约400份人种学、地质学、动物学和植物学标本。

回国后柔克义将入藏的见闻撰写成文,先后发表在史密森学会主办的杂志《世纪》(The Century)上,引起了美国民众对西藏的浓厚兴趣,他也因此荣获皇家地理学会(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的金守护神勋章(Gold Patron's Medal)。他还根据广泛收集的资料进行藏学和蒙学研究,其中的《喇嘛之国》和《1891—1892年蒙藏旅行日记》两本书送到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出版,受到了广泛好评。

柔克义是一位美国早期藏学和蒙学研究的奠基者,他的考察为美国民众打开了一个认知西藏的窗口,促进了美国藏学研究的发展,使许多传教士、外交官和学者对西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赴藏旅游和考察的美国人数

逐年增加。20 世纪初始美国涌现了一批研究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学者，都与他所作的开创性努力分不开。他的著作代表了当时美国有关西藏的主流学术观点，对美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相对而言，他在蒙学方面的开拓却没有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

1903 年英国人荣赫鹏（Francis Edward Younghusband，1863—1942）在麦克唐纳旅的保护下进入了西藏，强迫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了拉萨。1905 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 ）任命柔克义为美国驻华公使馆公使。1907 年 11 月达赖喇嘛应清室邀请进京，第二年年初到达五台山。同年 6 月 21 日柔克义在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托马斯·哈斯金斯（ Thomas Haskins）的陪同下，步行五天到达了五台山。当达赖喇嘛了解到柔克义通晓藏语无比高兴，两人执手言欢，情同知己。他通过柔克义向美国总统赠送了一幅西藏唐卡和一卷《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6 月 30 日柔克义以信函形式将会见详情向罗斯福总统作了报告。三个月后达赖喇嘛到达北京，双方一直保持着联系。柔克义在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交往过程中多次代表美国政府重申“门户开放，利益均等”的主张，对于西藏是中华帝国整体的一部分的观点表示认同。

艾丽西亚·坎皮和德尼斯·沃登在《19 世纪 90 年代柔克义的蒙古旅游文学》一文中对这位美国藏学和蒙学研究先驱有这样一段述评：

> 柔克义生性腼腆，离群索居，严重的抑郁症时时发作。同事常戏称他为“大佬”（big chief），给人的印象是他有时行为冒失，脾气暴躁。但是他勤于思考，事必亲躬，思维敏捷。他是早期的“中国通”之一，也是一位职业外交家，对于中国和中华文明有一种亲近感。他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一直潜心东方学之研究。对于藏学的研究激励了他对亚洲和东方的关注，影响了美国十余年的对华政策——那是美国从传统的大陆孤立中崛起时期制定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十年。他从来不曾成为富翁或者知名人士，然而在他那个时代的一些美国政要，例如西奥多·罗斯福、亨利·亚

当斯和海约翰(John Hay,1838—1905)等人都是他的朋友。①

1894—1896年格罗夫·克利夫兰(Grove Cleveland,1837—1908)总统任职期间,柔克义被聘任为国务卿第三助理,1896提升为助理国务卿。1897年马京利(William Mckinley,1843—1901)总统提名他为美国驻希腊公使馆公使,1898—1899年他调任罗马尼亚公使。1909年塔夫脱总统任命柔克义为美国驻俄国公使馆公使,任期从1911年8月28日直至1913年11月8日。

义和团起义期间,对于远东了解甚少的国务卿海约翰曾向柔克义咨询。为此,他专门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详细阐明了对于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的美国立场,国务卿审阅后随即向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等国外交部门转发。1901年9月柔克义代表美国政府与清政府代表签署了《辛丑条约》。十一国在华使团原本要求清政府赔款6750万英镑,柔克义根据美国政府指示建议将赔款总数限制在1.5亿美元内,并拟以商业优势的补偿接受没有国际担保的中国债券。后来在京使团达成了协议,把赔款总额降至4.5亿海关银(相当于每一个中国人付出一两海关银)。柔克义回国后还建议美国政府把所得到的部分庚款用于中美两国互换留学人员,得到了核准。

柔克义对古代中国、南洋和西洋的交通史志也曾作过深入研究。1911年他和德国汉学家夏德合作英译宋代赵汝适所著《诸蕃志》(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1912年),1914年他又将元代航海家汪大渊著《岛夷志略》一书摘译成英文,对古代南洋和西洋地名曾作详尽考证释疑。

他的主要翻译和著述除上述几部外还有:

《法句经》(Udanavarga,法译,1880年)。

《楞严经》(Pratimoksha sūtra,与南爵·邦余和厄恩斯特·罗曼合译,1884年)。

《佛陀传》(The Life of Buddha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His Order,1884

① Alicia Campo and Denys Vodden: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s Mongolian Travel Literature of the 1890s*, in *The Image of Mongolia in European and Asian Travel Literature*, Ulaanbaatar, Mongolia July 7-9,2005.

年)。

《喇嘛之国》(The Land of Lamas,1891 年)。

《1891—1892 年蒙藏旅行日记》(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in 1891 and 1892,1894 年)。

《蒙古和西藏考察》(Explorations in Mongolia and Tibet,1893 年)。

《藏族人类学札记》(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Tibet: Based on the Collections in the U.S.National Museum,1895 年)。

《15 至 19 世纪末的中韩交往》(China's Intercourse with Korea from the XVth Century To 1895,1905 年)。

《卢布克东游记》(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1900 年)。

《拉萨和西藏中部之行》(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与萨拉特·钱德拉·达斯合著,1902 年)。

《觐见中国皇室》(Diplomatic Audiences at the Court of China,1905 年)。

1914 年柔克义受聘为袁世凯私人顾问,来华赴任途中病逝于檀香山。

二、美国建制化和常态化的汉学研究形成时期(1877—1945)

从严格意义上说,直至 19 世纪下半叶拥有自己平台、团队和喉舌的美国汉学才现雏形。

当时美国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政治家和学者们为突破并超越西方人文传统的格局,打造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一直努力探索新的表现方式,于是中国文化就成了他们研究与吸收营养的渠道和目标。美国在广州建立了领事馆,除了外交和商务需要外,也包括对于扩大两国文化交往的期待。

1877 年耶鲁大学率先设置了汉学教席,不久哈佛和哥伦比亚等大学亦步其后尘。1879 年第一位中国教师戈鲲化应聘赴美执教,1913 年耶鲁海外传教会(1975 年改名为"雅礼协会")成立,1928 年哈佛-燕京学社创建,1929 年 2 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专门成立了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从此美国专业研究和教学队伍阵容逐渐壮大,进入了建制化和常态化格局。

20世纪30年代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先后进入了美国各大学课堂，被视为美国汉学的起步阶段，或者“学院研究时代”。这一时期的美国汉学研究偏重于中国语言、哲学、宗教、文学、历史、人类学和考古学，带着浓郁的传统语文学和文献学色彩。1927—1941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馆的藏书从8万册扩充到了20万册，在编制中国古籍索引方面成绩尤为突出。

这一时期美国学者陆续来华，有些先补习汉语后进修，有些则直接进入不同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开展专题研究。例如：1924—1925年宾板桥以长沙雅礼学校教员身份来华任教、1930—1935年毕格、顾立雅、戴德华、毕乃德和卜德以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身份来华深造。同期来华进修的还有：西克曼研究中国艺术史，韦慕庭进修中国史，费正清研究中国海关史。

这一背景反映了美国汉学与欧洲汉学的同步发展：从早期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国情和文化的研究，发展到专业汉学家的集约加盟，进而发展到专业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参与和互动。费正清、顾立雅、史华慈、芮沃寿和狄百瑞等学者的治学之路就是这一阶段美国汉学研究状况的写照。

由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汉学研究范围逐渐得到扩大。学者们认识到：对于中国思想、人物和历史的研究应该与相关社会背景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等方面的学术生态联系起来。费正清强调的“思想史是历史事件的一部分”与芮沃寿所说的把中国思想史“当作社会历史现象”来考察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学者对于儒家学说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并非孤立的现象。他们还认为不能仅仅从西方角度研究中国，而应该从世界文明的世纪高度来考察并评价中国。

（一）矢志于中东和远东地区文化交流研究的劳费尔

劳费尔1874年出生于德国科隆一个犹太富商家庭。童年时他对戏剧非常感兴趣，常和兄弟姐妹一起排练话剧，对莎士比亚非常崇拜，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戏剧家。

1884—1893年他就读于弗里德里克·威廉高等学校。1893年他在柏林大学师从汉学家顾路柏（Wilhelm Grube，1855—1908），1894—1895年参加了柏林东方语言研修班。他在柏林和莱比锡求学期间曾先后跟福兰格

(Otto Franke,1862—1946)学习梵文,跟顾路柏学习汉语,跟语法学家贾柏莲(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学习马来语,跟胡斯博士(Dr.Huth)学习藏语,跟梁凯教授(Prof.George Lange)学习日语,此外他还学习了德拉威语、巴利语、满语和蒙古语。1895 年他在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博士课程,三年后以一篇《苯教十万龙经研究》的论文获得了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898 年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发表不久,德裔美籍教授弗朗茨·博斯(Franz Boas)就告诉他美国的一些学术机构正从欧洲引进东方学者,推荐他加盟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①

1898 年 7 月,劳费尔参加了杰瑟普北太平洋考察队(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到库页岛和西伯利亚一带考察,在吉利亚克人(Gilyak)、通古斯人(Tungus)和阿伊努人(Ainu)定居点进行调查研究。1899 年 3 月他又来到黑龙江和伯力寻访赫哲族,对当地的民间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那里一直待到 1899 年冬天,为博物馆收集了 1300 余件实物和古董。返美后他根据所获得的资料撰写了《杰瑟普北太平洋考察——关于库页岛的民族学研究》(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Ethnological Work on the Island of Saghalin)和《黑龙江流域部落考察初探》(Preliminary Notes on Exploration Among the Amur Tribes)等论文。

1901—1904 年,他参加了美国富商希夫(Jacob H.Schiff,1847—1920)资助的考察队(Jacob H.Schiff Expedition)来华。在这次田野调查中他收集了大量中国人日常生活、四季耕作、民间宗教和医疗卫生用品,以及青铜器、玉器、陶瓷、漆器、搪瓷、戏服和乐器等 7500 余件,对于研究华北历史和文化以及民俗都很有价值。1904—1906 年他被聘任为该馆人种学部助理,1905—1907 年应邀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和东亚语言讲师。

1908 年,劳费尔应聘担任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东亚学部助理主任、东亚民族学部副主任以及人类学部主任。此后他组织了两次远东考察。1908—1910 年,他率领美国布莱克斯通夫人资助的考查团(Blackstone Expedition)到甘肃和四川藏区调查,为芝加哥的纽百瑞图书馆(the Newberry Library)和约翰·克瑞尔图书馆(the John Crerar Library)购买了包括奈瑭版(Narthang edition)的藏传佛经《甘珠儿》(Kanjur)和《丹珠儿》

① K.S. Latourette: *Biographical Memoir of Berthold Laufer, 1874—1934*, Biographical Memoirs Volume XVIII, pp. 43-68.

(Tanjur)在内的数万册汉、日、满、蒙、藏文书籍。1923年他又率领马歇尔·菲尔德考察团(the Marshall Field Expedition)再次来华,搜集到许多有关中国玉器、瓷器、象牙雕刻和牌搂的历史资料。这两次考察,对他的汉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劳费尔是中国顾问委员会(the Advisory Board of China Institute of America)、中国文化与经济研究会(the American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Economic Institute)和波斯艺术与考古学会(the Board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ersian Art and Archaeology)的活跃会员;美国东方学会(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会长;美国考古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eology)副总编以及北平国家图书馆特别通讯员。

1908年来到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时,劳费尔是美国学界仅有几个能说能写汉语的学者之一。他的语言天赋为他研究汉籍和碑铭提供了便利。他毕生研究中华文化和汉语,与中国保持近距离的接触,感情深厚。在《永恒的印象: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中国拓片》(Lasting Impressions:Chinese Rubbings from Field Museum)一文中他这样写道:

> 我已经爱上了那个国家和那里的人民,变得很中国化了……深感做一个中国人比做一个欧洲人更好,也更健康。如果有什么使我觉得遗憾的事,那就是我没能出生在中国。

劳费尔所著《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是一部饮誉欧美学界的东方学代表作。作者在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植物学和矿物学等领域的著述内涵博大精深,征引资料广泛。他首先从中国与古代西域物种的交换切入,然后进一步涉及中亚纺织品、矿物和汉籍中记载的伊朗萨珊王朝的官制,广泛探讨了东方文化、名物、语言和制度等问题。在《中国伊朗编》中他介绍了苜蓿、葡萄树、阿月浑子、胡桃、安石榴、胡麻、亚麻、胡荽、胡瓜、胡蒜、胡葱、浑提葱、豌豆、蚕豆、红花、姜黄、胭脂、茉莉、指甲花、胡桐泪、甘露蜜、阿魏、白松香、五倍子、靛青、大米、胡椒、诃黎勒、附子、莳萝、枣椰树、菠菜、糖萝卜、莴苣、蓖麻、巴旦杏、无花果、齐墩果、阿勒勃、水仙、阿勃参等传入中国的物种。然后作者又转入与中国关系密切的马来亚和波斯产物、纺织品,伊朗的矿物、金属和宝石,萨珊王朝的官衔等主题。在《伊朗中国

编》书后的附录中还对蒙古语中的伊朗语成分、突厥语中的汉语成分、波斯药物学中的印度语成分和西藏语中的外来词进行了探讨。虽然囿于当时的历史学、生物学和语言学水平，该书主要聚焦于资料和事实的归纳和概述，没有从中提取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但是从作者对于历史与发展的把握和对于辨认判断的独特视角来看，他已经进入了前人未曾涉足的广泛领域，给中华民族文化的读者留下了无限思考的空间和后续课题。

他笔耕不辍，求知若渴，著作等身，毕生矢志不移地致力于研究中东和远东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他熟悉考古学和人类学专业，同辈学者中几乎无人能超越他。但生性敏感和长期超负荷工作使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得不到同事和亲人的关怀，1934 年 9 月 13 日他在芝加哥自杀身亡。

劳费尔是美国人类学家、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一生共发表了 200 余部/篇著述，内容涵盖了中亚和东亚的民族、文化、语言、宗教、习俗和物种，以及部分考察和收藏报告。其中主要的有：

《中国和欧洲的鸟战车》(The Bird Chariot in China and Europe，1906 年)。

《落花生传入中国考》(Note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round Nut into China，1907 年)。

《玉蜀黍传入东亚考》(The Introduction of Maize into Eastern Asia，1907 年)。

《中菲关系》(The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to the Philippine Islands，1907 年)。

《中国汉代陶器》(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dynasty，1909 年)。

《中国的耶教艺术》(Christian Art in China，1910 年)。

《汉代墓刻》(Chinese Grave Sculptures of the Han Period，1911 年)。

《玉器：中国考古与宗教研究》(Jade：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1912 年)。

《中国圣母像》(A Chinese Madonna，1912 年)。

《五件新发现的汉代浅浮雕》(Five Newly Discovered Bas-reliefs of the Han Period，1912 年)。

《孔子及其塑像》(Confucius and His Portraits，1912 年)。

《王维山水画——辋川图》(The Wang Ch'uan t'u，A Landscape of Wang Wei，1912 年)。

《阿拉伯与中国海象牙和一角鲸鱼齿贸易》(Arabic and Chinese Trade in Walrus and Narwhal Ivory,1913 年)。

《中国祖先偶像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Ancestral Images in China,1913 年)。

《西藏花甲理论的适用范围》(The Application of the Tibetan Sexagenary Cycle,1913 年)。

《中国陶俑》(Chinese Clay Figures,1914 年)。

《鄂多立克到过西藏吗?》(Was Odoric of Pordenone ever in Tibet,1914 年)。

《吐蕃的鸟卜》(Bird Divination among the Tibetans: Notes on Document Pelliot no. 3530,1914 年)。

《中华文化要义》(Some Fundamental Ideas of Chinese Culture,1914 年)。

《金刚石—中国和希腊民间传说》(The Diamond: A Study in Chinese and Hellenistic Folklore,1915 年)。

《西夏语—印中语文学研究》(The Si-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ese Philology,*T'oung Pao* 17,1-126 页,1916 年)。

《中国瓷器起源》(The Beginnings of Porcelain in China,1917 年)。

《关于指纹史》(Concerning the History of FingerPrints,1917 年)。

《藏语中的借词》(Loanwords in Tibetan. *T'oung Pao* 17,404—552 页,1918 年)。

《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伊朗文明史的贡献》(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1919 年)。

《中国门》(The Chinese Gateway,1922 年)。

《西藏头盖骨和骨制品的使用》(Use of Human Skulls and Bones in Tibet,1923 年)。

《不同国画收藏家的唐、宋和元绘画》(T'ang,Sung and Yüan Paintings Belonging to Various Chinese Collectors,1924 年)。

《烟草及其在亚洲的用途》(Tobacco and Its Use in Asia,1924 年)。

《中国篮》(Chinese Baskets,Chicago,1925 年)。

《中国象牙》(Ivory in China,1925 年)。

《中国的鸣虫与斗蟋蟀》(Insect-Musicians and Cricket Champions of China,1927 年)。

《中国古玉》(Archaic Chinese Jades,1927 年)。

《英属洪都拉斯中南部的玛雅人种学》(Ethnology of the Mayas of Southern and Central British Honduras,1930 年)。

《食土癖》(Geophagy,Chicago 1930.S. 99—198. 8.)。

《哥伦布与华夏以及美洲在东方人民心目中的含义》(Columbus and Cathay,and the Meaning of America to the Orientalist,1931 年)。

《鸬鹚在中国和日本的驯化》(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Cormorant in China and Japan,1931 年)。

《中国乾隆时期的黄金财富》(The Gold Treasure of the Emperor Chien Lung of China,1934 年)。

《美国蔬菜移栽:土豆》(The American Plant Migration—The Potato, Chicago,1938 年)。

(二)对中国古代历史和宗教有独到研究的德效骞

德效骞(Homer Hasenpflug Dubs,1892—1969)号闵卿,又名德和美,出生于伊利诺伊州迪尔菲尔德。他的父亲德慕登(Charles Newton Dubs, 1862—1936)1885 年毕业于欧柏林学院,后去德国学习并传教一年。来华前德慕登夫妇曾在迪尔菲尔德和芝加哥等地传教,兼任尊道会(United Evangelical Church Mission)期刊《基督教使者》(Christliche Botschafter)编辑。1900 年美国尊道会决定派他们去湖南建立教区,因为义和团运动引起局势动荡,年底才带着儿子德效骞抵达中国上海。德效骞的生活和思想深受父母亲的影响,在湖南省曾就读于当地小学,1902 年随父母返回美国完成中学学业。

1910—1911 年德效骞在父亲的母校欧柏林学院学习,191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16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17 年他进入纽约的联合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攻读神学。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他被吸纳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与科学研究学会会员。

1918 年 10 月 2 日德效骞携夫人作为圣道会(Evangel Mission)传教士来华。在南京语言学校学习汉语期间,他拜访了在金陵神学院任教的司徒

雷登,谈话中涉及儒学研究,司徒雷登鼓励他学习并研究荀子著作。当年为探讨中国的宗教生活他曾在《教务杂志》上先后发表了《中国的宗教教育》(Chinese Religious Education)、《儒家与迷信》(Confucianism and Superstion)和《儒家学者的敬祖态度》(Confucian Attitude to the Worship of Ancestors)等文章。

1924年5月21日德效骞从上海返回美国,1925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是《荀子研究》。1927—1928年他在伦敦以《荀子:古典儒学新论》(Hsuntze, the Moulder of Ancient Confucianism)为题出版了在自己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展成两卷本的专著,由司徒雷登作序。

1925年他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受聘担任明尼苏达大学讲师,1927—1934年升任为马歇尔学院哲学教授。1934—1937年被聘任为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研究委员会中国断代史翻译主任。

1934—1947年德效骞受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之托,与中国学者任泰(Jen T'ai)、崔先生(C.H.Ts'ui)和潘乐知(P'an Lo-zhi)合作翻译并注释班固所著《汉书》。1934—1937年他们译出了带详尽注释的三卷本《汉书》本纪(1~12章),并计划撰写"序言"和"词表"。1938年在卡内基基金会资助下出版了《〈汉书〉译注》第一卷(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A 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此后又于1944年和1955年先后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第一卷题为《帝王本纪:〈汉书〉卷1至5》(The Imperial Annals, Chapter 1~5, Vol. 1),含《汉书》1~5卷译文、原文和地图;第二卷题为《帝王本纪:〈汉书〉卷6~10》(The Imperial Annals, Chapter 6~10, Vol. 2),含《汉书》6~10卷译文;第三卷题为《帝王本纪:〈汉书〉卷11~12及〈王莽传〉》(Imperial Annals, Chapter 11~12 and the Memoir of Wang Mang, Vol. 3),含《汉书》11~12卷和99卷以及8个附录。1947年他的《前汉书》(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前两卷获法兰西研究院儒莲奖。虽然华兹生等学者曾批评德效骞的译文晦涩难懂,有损原文风格,但是作为早年美国汉学界的一项重大人文工程,其开创性的贡献仍不可低估。

1937—1943年德效骞在杜克大学及所属的神学院任教,1943—1944年负责太平洋学会的中国历史项目,1944—1945年受聘于哥伦比亚大学。1945—1947年他担任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Hartford Seminary Foundation)的肯尼迪差会学院的汉学教授,1947年接替戴闻达出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在此期间,牛津大学为表彰德效骞在汉学方面的业绩,特

别授予他荣誉文学硕士学位，此后又于1958年授予他荣誉哲学博士学位。

德效骞的汉学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历史、哲学和宗教，但是他学养有素，兴趣广泛，曾经开拓了中国天文学、日蚀观测、炼丹术、古代弓弩、步兵鱼鳞阵、汉代博山炉和王莽的经济改革等研究课题。他还研制了一套特殊的汉字拼音书写系统，以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来标注汉语发音、声调和汉字组件，并用于《汉书》翻译。

德效骞的另一个重要研究选题是有关汉朝与罗马帝国的关系。20世纪40年代初他对公元前53年克拉苏率领的罗马军团在卡尔莱战役中惨败，部分突围的罗马军人下落不明的史实，联系《汉书·陈汤传》中有关公元前36年汉将陈汤发兵西域诸国擒杀郅支单于的描述，在汉学刊物《通报》上发表了《公元前36年中国与罗马的一次军事冲突》一文，1957年以后他又陆续发表了《中国古代的一个罗马城》等论文。作者提出了这样一种大胆解读：陈汤攻破郅支城时遭遇到布"鱼鳞阵"和"重木栅栏"（double wooden palisade）的部队就是罗马军团残部，此后汉朝廷特设骊靬城安置了罗马降将及其部属。他认为"鱼鳞阵"大概就是罗马军人进攻堡垒时惯用的"龟甲阵"（testudo），而重木栅栏则是罗马军人用于加固护城河的结构，这些都是罗马军团在郅支都城存在的证明。据此他断定公元前54年被帕提亚俘虏并外迁的克拉苏罗马军团残部曾驻扎在康居，公元前36年汉军进攻郅支都城时他们充当了雇佣军。此前郅支单于帮助康居王驱逐乌孙后彼此因故结仇并加害于公主，被触怒的康居人需要借助外军平定战乱，在郅支单于宣布对抗帕提亚的前提下罗马兵团才同意被雇佣。

这是西方学者首次提出骊靬是"罗马城"的观点，很快就成为国际汉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他们接踵来华寻找骊靬城，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骊靬文化热。但是与此同时，持不同见解者也争相表明态度，气氛空前热烈。在骊靬罗马人的身份被确认之前，那个位於塔克拉马干沙漠之外被称为"骊靬城"的甘肃省者来寨见证了历史魅力如何吸引着许多谜团求解者的狂热追求。寨中的部分居民对照媒体报道，也在一夜之间忽然发现自己的体型、脸孔、肤色和风俗习惯有别于当地汉人和回民，期待着中外学术界在他们的汉学研究中就这个千古之谜进行破解。

德效骞于1959年从牛津大学教席上退休。1962—1963年他曾任夏威夷大学访问教授，回国途中在澳大利亚短暂逗留讲学。1969年8月16日

他病逝于英国,享年77岁。他的主要著作有:

《荀子:古典儒学新论》(Hsüntze:The Moulder of Ancient Confucianism. Probsthain's Oriental Series 15.London,1927年)。

《荀子》(The Works of Hsüntze. Probsthain's Oriental Series 16. Translation,London,1927年)。

《推理归纳法:哲学科学法分析》(Rational Induction:An Analysis of the Method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年)。

《前汉书选译》(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3 vols, Baltimore:Waverly,1938-1955年)。

《孔子是否读过〈易经〉》(Did Confucius Study the Book of Changes? T'oung Pao 25:82-90. 1928年)。

《中国没有形成哲学体系》(The Failure of the Chinese to Produce Philosophic Systems.T'oung Pao 26:96-109. 1929年)。

《儒家学说的"本质"》("Nature" in the Teaching of Confuciu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50:233-237. 1930年)。

《希腊和中国哲学比较》(A Comparison of Greek and Chinese Philosophy.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7. 2:307-327. 1933年)。

《西汉的日蚀》(Solar Eclipses During the Former Han Period.Osiris 5: 499-532. 1938年)。

《汉代儒学之胜利》(The Victory of Han Confucianism.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58:435-439. 1938年)。

《王莽与经济改革》(Wang Mang and His Economic Reforms.T'oung Pao 35:219-265. 1940年)。

《罗马与汉朝的军事冲突》(An Ancient Military Contact Between Romans and Chinese.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42:322-330. 1941年)。

《中国古代的神秘崇拜》(An Ancient Chinese Mystery Cult.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35:221-240. 1942年)。

《公元前36年中国与罗马的一次军事冲突》(A Military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Romans in 36 B.C.T'oung Pao 36:64-80. 1942年)。

《孔子的政治生涯》(The Political Career of Confuciu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66:273-282. 1946 年)。

《中国史学的可信度》(The Reliability of Chinese Histories. Far Eastern Quarterly 6. 1:23-43. 1946 年)。

《道教》(Taoism. In H. F. MacNair, ed. China. United Nations Se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66-289. 1946 年)。

《炼丹术溯源》(The Beginnings of Alchemy. Isis 38:62-86. 1947 年);

《孔子的出生日期》(The Date of Confucius'Birth. Asia Major (new series) 1. 2:139-46. 1949 年)。

《商朝年代考》(The Date of the Shang Period. T'oung Pao 40. 4-5:323-335, 1951 年)。

《孟子和孙子论人性》(Mencius and Sun - dz on Human Natur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6:213-222, 1956 年)。

《中国古代的罗马城》(A Roman City in Ancient China. China Society Sinological Series 5. London, 1957 年)。

《中国天文学溯源》(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Astronom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78:295-300. 1958 年)。

《周代王室的宗教信仰》(The Archaic Royal Jou Religion. T'oung Pao 46:217-259. 1958 年)。

《汉代"博山炉"》(Han "Hill Censers." In Søren Egerod, and Else Glahn. 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Sinological Studies Dedicated to Bernhard Karlgren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October Fifth, 1959 年)。

(三)中美历史关系发展过程的见证人拉铁摩尔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出生于华盛顿。他的父亲戴维·拉铁摩尔(David Lattimore)1902 年曾在上海南洋公学教英文,后来受聘担任保定高等师范和天津北洋大学英文教习。拉铁摩尔襁褓之中随父母来到中国,12 岁时由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到瑞士和英国求学。19 岁时因为未能获得去牛津深造的奖学金,便再次来华。1920 年他任职于上海安利洋行(Arnhold Brothers & Co.Ld.),后来又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了一年。1921 年他父亲辞去了在北洋大学近 20 年的教席,携家人返回美国到达特茅斯学院执教,但拉铁摩尔却仍留在中国为自己的前途打拼。他通

过担任《京津泰晤士报》总主笔的父亲旧友伍德海(Henry George Wandesforde Woodhead,1883—1959)的关系,谋得了该报《星期周刊》副刊编辑一职,平时除校对新闻和社论外也翻译一些文章。闲暇之余他努力学习中文。当年天津英租界俱乐部有一个为外国人服务的图书馆,他常常去那儿翻阅书报,广泛涉猎有关旅行和文化方面的各类著作。

1922年他沿着丝绸之路进入疆旅行。1928年获得一份奖学金到哈佛大学人类学学院进修了一年,1929年出版了《通往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一书,同年他得到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资助前往东北旅行,研究满洲移民问题。后来他继续到中国东北和内蒙等地调研,完成了《满洲:冲突的发源地》(Manchuria,Cradle of Conflict)一文,受到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的关注。

1933—1935年他担任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季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 Quarterly)的编辑。该刊曾经报道了长期被封锁的有关中国共产党、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消息,拉铁摩尔因此成为一位国际知名的中国政治问题专家。

1937年他受美国《美亚》(Amerasia)杂志记者菲力普·杰夫(Philip J. Jaffe)和毕恩来(Thoms Arthur Bisson,1900—?)等人邀请作为向导和翻译陪同一个美国访问团前往延安。接受邀请后拉铁摩尔首先向美国资深记者斯诺(Edgar Parks Snow,1905—1972)咨询,希望获得必要的帮助。斯诺当即致函延安的中共中央,不久便获得肯定答复,促成了杰夫等人的延安之行。他们从北平出发,通过瑞典车行老板埃菲的巧妙安排,借口游览古陵辗转到达了延安,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热情友好接待。访问期间,拉铁摩尔发表了一次露天演讲,由于他对中国少数民族有着浓厚的兴趣,接待人员特地安排他与参加长征的少数民族干部和战士座谈。拉铁摩尔通过自己熟悉的渠道传递了中共领导人欢迎更多的外国人士访问延安的信息。不久以后延安又接待了英国记者贝特兰(James Bertram,1910—1993)等客人。

1941年春白宫的经济顾问居里(Lauchlin Bernard Currie,1902—1993)访华期间会见了蒋介石,把"自由主义的亚洲问题学者"拉铁摩尔推荐给蒋介石当私人顾问。1941年7月15日拉铁摩尔飞抵重庆,蒋介石接见了他,并派立法院编译处处长谢保樵担任他的秘书,为他配备了仆人和小汽车。双方约定:蒋介石夫妇需要向他咨询时就派人约见,如要向罗斯福总

统传递信息，则由他起草电报拍发给白宫的居里转呈。这期间，蒋介石只向拉铁摩尔咨询过一些宏观和战后的重建问题，从未让他参与重要决策，还告诉他有关中国国内事务可与孔祥熙、王宠惠和王世杰商谈。

1942 年拉铁摩尔决定辞去私人顾问一职，因为有碍蒋介石的面子，他就策划了让自己收到一份要求他回国主持战时新闻局旧金山办事处的官方文书。这一年 11 月 17 日，拉铁摩尔与访美的宋美龄同乘一架专机飞往美国，抵美后彼此就不再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铁摩尔被聘为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台湾政策。1951 年 7 月 25 日至 1952 年 6 月 20 日举行的太平洋关系学会听证会（IPR hearing），调查该会曾否受到共产主义的宣传，对美国政府远东政策制定部门施加影响，进而误导了美国舆论。卡特（Edward C.Carter）等人士受到传讯，拉铁摩尔和一些外交官也被牵连其中。经过近一年的调查，以麦卡伦（Pat McCarran）为主席的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认定：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大多数成员在追求学术目的以外的东西，但是控制该会的成员是共产主义者或者亲共派；拉铁摩尔和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1900—1972）在 1945 年美国对华政策转至有利于中共的方向上起到了促进作用。① 虽然建立在伪证（perjury）基础上的指控被否定了，但是他仍然背上了“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的某些时候是苏联阴谋的清醒工具”的黑锅。他再也不可能以顾问身份在美国国务院工作，在美国的学术生涯（American academic life）从此终结。1963 年拉铁摩尔决定移居英国，受聘担任英国利兹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教学和研究。

1971 年周恩来总理曾邀请四位中国问题专家来华访问，其中一人就是拉铁摩尔。1972 年 9 月 21 日他携夫人和孙子来到内蒙古农牧学院，参观了畜牧系和兽医系的饲料分析室、草料、病理和寄生虫学标本室、家畜解剖学实验室以及兽医院。亲眼看到他所熟悉的那片土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他心情激动，感慨良多。

拉铁摩尔是美国汉学家和蒙古学家，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和蒙语。他在华北和蒙古地区的经历和考察，为他的中蒙历史和社会研究提供了丰富的

① 山极晃：《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展开（1941—1979）》（鹿锡俊译），第 31—32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第一手资料。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判断,对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也有沉重的记忆。他是中美曲折关系发展过程的见证人,也曾对中美两国事务做出过贡献。

拉铁摩尔于1970年退休,1989年5月30日逝世于罗德岛普罗维登斯,享年89岁。他遗嘱将个人所有藏书都捐赠给剑桥大学的蒙古和中亚研究所,把希望寄托在年青一代学者的身上。

他的主要著述有:

《通往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London: Methuen, 1928. Reprinted, Boston: Little Brown, 1929年)。

《高地鞑靼》(High Tarta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30年)。

《满洲:冲突之发源地》(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rev.ed. 1935年)。

《满洲的蒙古人》(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Their Tribal Division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istorical Relations with Manchus and Chinese, and Present Political Problems. New York: John Day, 1934年)。

《中国与蛮夷》(China and the Barbarians, in Joseph Barnes, ed. Empire In The East. New York: Doubleday, 1934年)。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Reprinted, Boston: Beacon, 1967年)。

《蒙古游记》(Mongol Journeys.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1941年)。

《中国开放其荒漠西部》(China Opens Her WIld West.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Vol 82: 3, September, 1942年)。

《现代中国的形成》(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944年)。

《亚洲的出路》(Solution in Asia. Boston: Little Brown, 1945年)。

《通往中国历史地理的亚洲腹地渠道》(An Inner Asian Approach to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 1947年)。

《亚洲局势》(The Situation in Asia. Boston: Little Brown, 1949年)。

《亚洲的枢纽:新疆和中俄亚洲腹地边界》(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Boston: Little Brown, 1950年)。

《毁谤的折磨》(Ordeal by Slander. Boston: Little Brown, 1950年)。

《中国的亚洲腹地边境》(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1951年)。

《亚洲腹地的新政治地理学》(The New Political Geography of Inner

Asia. Great Britai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CXIX Part 1, March 1953 年)。

《牧民与政委：蒙古重游记》(Nomads and Commissars: Mongolia Revisit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年)。

《1928—1958 年边疆史研究文集》(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ris: Mouton, 1962 年)。

《从中国展望世界：就职演讲》(From China Looking Outward: An Inaugural Lecture. [Leeds]: Leeds University Press, 1964 年)。

《中国的历史与革命》(History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Lund: Studentlitteratur, 1970 年)。

(四)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中国历史 50 年的宾板桥

宾板桥 1901 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他的父亲海勒姆·宾厄姆(Hiram Bingham, 1875—1956)曾任康涅狄克州州长和美国参议员，一度担任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

1924 年宾板桥进入耶鲁大学学习中国历史专业，1928 年他结识厄休拉·沃尔科特·格里斯沃尔德小姐(Ursula Wolcott Griswold)。两情相恋，两性相依，不久结婚成家。1929 年他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4 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历史学博士学位。

宾板桥曾于 1924—1925 年、1926—1927 年和 1934—1937 年三次执教于长沙雅礼学校(Yali Union school，取“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论语·述而》)之意)。该校是 1906 年美国耶鲁大学学生来华传教组织中国传教会(Yale Mission in China)在长沙创办的学校。1914 年该校改名为雅礼大学堂(College of Yale-In-China)，后又增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雅礼会曾派 10 名教师前往授课。宾板桥来华执教、进修和旅行，在乡间旅行、登华山、参拜道观，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有许多直接感受，对于他的汉学研究和教学工作都有很大帮助。他后来的研究方向和教学定位都得益于从来华经历中所获得的第一手感性资料。

1935—1937 年宾板桥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历史专业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后任母校东亚史讲师，1940—1946 年他被提升为助理教授。

1943—1945 年他在美国海军情报和战略服务处获后备役上尉军衔，教授汉语和中国历史。1949 年他创建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研究所（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并担任所长达八年之久。1947—1949 年任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远东研究委员会委员，1967 年起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

宾板桥主要研究领域为唐太宗的生平和时代以及唐代的亚洲。1941 年他出版了专著《唐朝的建立——隋亡唐兴初探》（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Fall of Sui and Rise of T'ang: A Preliminary Survey, Waverly Press, 1941）。隋末唐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黄金时代的起始阶段。李唐王朝建立后，兴修水利，扩大农田，发展手工业和交通运输，出现了许多繁华的商业城市，文化、教育和艺术大发展，开元盛世时期达到了繁荣高峰。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大，佛教和伊斯兰教先后传入，中国的音乐、舞蹈和绘画通过广泛吸收西域和中亚的营养得到了迅速发展。作者的这一研究选题对于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历史有其特别意义。该书共 183 页，除序言、附录、索引和参考文献外，正文共十二章，包括：引论：隋杨皇帝；605—608 年长城和大运河的修建；隋朝对外关系；隋朝与突厥关系；611—615 年隋朝的对外关系与叛乱；隋朝内政崩溃；隋末政治分裂；陕西：李朝要都；太原之乱；“义军”起事；617—618 年李渊执政；结语。该书是美国史学界研究隋唐历史的权威著作，长期用作高校教材，受到广泛好评。

1956 年他还与两位高徒希拉里·康罗伊（Hilary Conroy）和弗兰克·英克尔（frank Inkle）合作编写了一部《东南亚简史》（Southeast Asia: A Brief History）。1964—1965 年他们再度联手编写了一部两卷本的《亚洲史》（History of Asia）。宾板桥晚年的大部分著述都是与亚洲研究和教学的内容有关。

他长期致力于组建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亚洲研究团队，在教学方面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多于专题研究。他是 1941 年成立的远东协会创建者之一，曾担任《远东研究季刊》（现名为《亚洲研究》）的第一届编委，1947—1949 年他主要为季刊的专栏编辑学术活动要闻和注释。经过八年的艰辛努力亚洲研究学院终于 1949 年建成。据当时他的一位同事回忆，他始终以建立学院为奋斗目标，把东亚系看作一个大家庭，想方设法把大家团结在一起。近年来美国高校专业分工和分裂之事时有发生，不同学派的亚洲研究中心纷纷成立，现代和传统研究的分道扬镳已成定局，但是宾板桥却

总是以一元化的统一眼光来看待学术研究。如此恪守职责，正是他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不同之处。

宾板桥的弟子常常怀着感恩心情回顾，在当时参考资料匮乏的情况下他如何一次次举办有关研究文献和方法的研讨会，帮助他们掌握方法和技巧。弗雷德里克·韦克曼（Frederick Wakeman）回忆说：

> 我作为他的一个入门弟子，曾深深地被他一丝不苟的学风所打动。我初到柏克莱做功课时对于一些在我看来无需计较的细节漫不经心。但是我慢慢地喜欢上他那种我所不具备的严谨治学态度。宾板桥教授告诫我们不要忽视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记得我呈交给他的第一篇有关中国历史的研讨会论文时，他审读得非常认真，然后指出应该如何提出自己的论点，就像一位律师教导他的职员如何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进行陈述一般。①

宾板桥在扩大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中文藏书方面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47 年他再次访华时带着一份购买 1400 册图书的采购单。几个月后在上海和北京他购买了 9000 册图书，还与代理商谈妥继续增购和发运的安排。他退休后把个人的藏书和拓片都捐赠给了东亚图书馆，还把个人和专业论文交给了班克罗夫特图书馆收藏。

晚年他集中精力撰写一部有关自己父亲的传记。他几乎每天都去办公室，在学院俱乐部的圆桌上用餐，一直坚持到把书写完。

他的学生对于他的正派和平等待人的作风敬佩有加。他们都知道老师是前辈学者，是“老派”人物，不过但凡与他共事过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他的善意和谦逊所感动。他的同事和学生至今仍然记得在他家宽敞典雅客厅受到他和夫人亲切接待的情形，聚会不仅让大家高兴，而且还增加了亚洲研究院成员之间的亲近感，这正是他的心愿。他们一家大力支持柏克莱新学院的建立，也令人难以忘怀。

宾板桥夫妇共养育四个女儿。他们家遵循着两个不同的传统：新英格兰中的老式家庭与儒家君子，两者都重视服务他人、克己复礼和诚实正直

---

① T. N. Blsson *et alii* : *Woodbridge Bingham, 1901-1986*, *in Memoriam 1986*, Universsity of Calidornia, p. 22.

(stressed service, decorum, integrity),宾板桥在这些方面堪称为典范。①

宾板桥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执教50年,是美国的早期汉学家和教育家,也是美国东方学会、亚洲研究协会和美国历史协会会员。1986年5月2日他在家中辞世,以君子风度悄悄地离开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校园和专业,给后辈学人留下了无限思考和发展的空间。

他的主要著述有:

《唐朝的建立:隋亡唐兴初探》(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Fall of Sui and Rise of T'ang: A Preliminary Survey, 1941年)。

《东南亚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co-authored, 1956年)。

《亚洲史》(History of Asia, 两卷, 1964—1965年)。

(五)卜弼德的研究领域:汉语、阿尔泰语系与中华文化

俄裔美籍汉学家卜弼德(Peter Alexis Boodberg, 1903—1972)出生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父亲曾为俄军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正在圣彼得堡军校受训。1915年因为俄国内时局动荡战祸蔓延,为避难他和弟弟被送到哈尔滨上学,后来转入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学习汉语。1920年夏天他离开俄国前往旧金山,后来全家都移民美国。

1924年他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东语系,几年后开始研修博士研究生课程。他跟卫理学习古汉语,跟久野(Y.S.Kuno)学习日文,跟亨利·卢茨(Henry F.Lutz)学习亚述-巴比伦文,跟威廉·波珀(William Popper)学习阿拉伯文,跟亚瑟·赖德(Arthur Ryder)学习梵文,跟克罗伯(A.L. Kroeber)学习人类学。1930年他获得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时已经能认读多国语言,包括:闪语、含语、阿尔泰语、汉语和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对许多国家的文化也有所了解。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兵法——〈史记·魏公子列传〉研究》(The Art of War in Ancient China: A Study Based upon the Dialogues of Li, Duke of Wei)。

1931年秋天他被临时聘任为讲师。两个月后他向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普林西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

① T.N. Blsson *et alii* : *Woodbridge Bingham, 1901-1986, in Memoriam 1986*, Universsity of Calidornia, p. 23.

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寄送了一封又一封求职信，但是复函却都是婉拒。虽然后来那几所大学都先后创建了远东研究系或者中文系，但是直到1932年7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才聘请他担任远东语言教师，年薪为1800美元。后来他出版了专著《〈盐铁论〉第二十至二十八章评析》(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 Chaps.XX-XXVIII)，知名度日渐飙升。1935年他被提升为助理教授，担任古汉语、汉语词汇学和文献学等课程，不久他的《中华文明讲稿》(英文版)问世，为东语系构建了中华文化的理论框架，提升了教学和研究的水平。

从此卜弼德的专业生涯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人文学科发展紧密联系了起来。1937年他被提升为副教授，1938—1939年因为他在古汉语的基础研究以及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研究方面的贡献被聘任为古根海姆研究奖(Guggenheim fellowship)。这两个领域后来就成为他的主要学术研究和发展空间。1940年他受聘担任东语系系主任，率领全系团队迈进建系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1948年他又被提升为教授。

但是在1950年宣誓效忠纷争(loyalty oath controversy)期间因为抗议行政当局所执行的政策，他愤然辞去了系主任职务。1951年他主要负责美国东方学会西部分会的筹建工作。1956年他第二次荣获古根海姆研究奖金。1960年他继任了原来由费迪南德·莱辛(Ferdinand Lessing)担任的东方语言和文学阿加西斯教席。1963—1964年他第三次获得古根海姆研究奖金，同年被推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主席。1964年4月8日他在纽约召开的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似曾相识》(The Stranger in Our Midst)的就职演说。1970年他已经退居为荣誉教授，但是因为不可替代的作用仍然积极参与研究工作。

卜弼德早期主要从事汉语-阿尔泰语系的研究。1932年3月至1936年3月他曾经把自己书写工整的讲稿，以《胡天汉月方诸》为书名限量出版了13卷，寄赠给挚友和同好。从书名和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对匈奴语中一些令人费解的史学问题的大胆解读，显示了他的博学多才。他根据《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乌孙传》中所载“小昆弥乌就屠死，子拊离代立，为弟日贰所杀”认为“拊离”即“böri”(狼)之音译，是文献中游牧民族首领以狼或豺命名的一个例证。他又依据曹丕《典论》中论汉武帝之文记载“刈单于之旗，剿阏氏之首，探符离之窟，扫五王之庭”，断定“符离”即乌孙之“拊离”，突厥之“附离”。作者把乌孙和突厥族起源传说中狼的元素与

首领名号联系起来，对于西方读者阅读汉籍提供的思路具有举一反三的启发意义。在卜弼德时代，可供外国读者查阅的语音学工具书很少。他阅读汉籍时碰到需要了解中古读音的汉字，主要求证于瑞典汉语言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1923 年编写的《汉语和汉日解析辞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其功底修炼并非一日之力，其艰难程度更可想而知。

一份标注为“1944 年 8 月”的打印文稿回顾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东语系的发展历程，一般认为是卜弼德所撰，其中法国汉学的影响脉络清晰可见。文稿中的一段写道：

> 东语系及其学者对于中国研究始终持有这样的观点：只有把中国看作欧亚大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才能对中华民族有正确的理解。这一“全球观念”具体表现在：研究应该把古代和近代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与其草原邻邦，并通过它们与欧亚“远西”边陲联系起来。

其实这就是卜弼德本人的研究方向，他坚信完美的哲学和史学分析所具备的学术价值。当年他曾不遗余力地对西亚各国翻译的汉籍进行译注，动力就源于这一指导思想，可惜译稿大部分都未曾付梓。

1936 年卜弼德在《哈佛学刊》阿尔泰语研究专集上发表了第一部有关汉语与阿尔泰语系的著作。其中精彩的篇章有：《蒙古的保加利亚人》（The Bulgars of Mongolia）、《希奥菲拉图斯·西莫卡塔论中国》（Theophylactus Simocatta on China）和《草原政治专名中的阿尔泰语“角”》（The Altaic Word for “Horn” in the Political Nomenclature of the Steppe）等。当时已经名噪一时的学者韦利（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曾经给他写信说：“拜读拓拔语高论，至为钦佩！”1946 年中国语言学家罗常培亦向他致函求证古代亚洲地名的汉译，例如“撒马尔罕”和“柬埔寨”等，信中写道：“我认为您是我在美国见到的唯一能在此领域为我解惑答疑的学问大家。”卜弼德的这一研究领域过去无人涉足，部分还受到非专业人员想当然的糟践，如今随着他的国际声誉攀升改变了现状。1939—1940 年他首次开设了“满文和蒙文文献导读”（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Manchu and Mongol Texts）课。1942 年他在研究生部作了一次题为《古代亚洲的突厥

语、雅利安语和汉语》(Turk, Aryan and Chinese in Ancient Asia)的学术报告,其学术广度和深度在柏克莱甚至美国都是前所未有的。①

在研究东方学的同时,卜弼德还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语言史和汉字的演变史。1936年顾立雅在一本专著中提出了"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的论断,卜弼德在《哈佛学刊》亚洲研究专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却认为汉字过去和现在都不用来表示意义或者概念,而是用作词或者词素,其中多半都具有表音价值,因此可以说汉字就是一个符号体系。他在1944年的一份工作报告中再次亮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与当代语言学界多数专家的研究结论是相吻合的。

1938—1939年卜弼德的研究重点是汉语四字格词汇(binomial expressions),不过只以打字稿形式记录了下来,并未送交出版商。虽然这一期间他还继续汉语史的研究,但是很少发表论文。他认为汉语大部分押韵的双音节词是正在消亡的双音声母辅音群(initial consonant clusters)的辞典学复位,与汉语辞典标音的传统反切法(fan-ch'ieh system)既有亲缘关系,又有所不同。据此他觉得将四字格定义导入词源学值得一试。实际上受益于他这一领域的开创性研究者只有他的少数弟子。他坚持不懈地研究汉字标音法直到去世,超过了对包括亚洲语文学在内的其他研究。但是他的许多汉学界同事对于他的研究新发现和成果却反应冷淡,甚至嗤之以鼻,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1954年夏天他开始发表一些具有丰富信息内涵的短小文章,通常只有一张打印稿纸的篇幅,总标题为"柏克莱亚洲语言学工作室文稿",以油印形式在同好中散发。第二批文稿题材范围有所扩大,涉及对一些中国文学作品的评析,例如《试论汉诗中的隐含排比》(On Crypto-Parallelism in Chinese Poetry)和《浅论汉诗中的隐含谓语》(On Latent Predicates in Chinese Poetry)。他的大师级但非主流的唐诗翻译在英语教授和作家中的风光程度超越了有传统情结的汉学家的反馈。其中大量妙趣横生的新词准确地塑造了一些新奇形像。虽然他很清楚在20世纪这种特权已经被社会学家和自然学家所摒弃,但是他坚信这样的创造正如几世纪前一样仍然是人文学家的专利。因为他对于文言文的式微和想象教育的衰退并不认

① Edward H.Schafer: *Peter A. Boodberg, 1903-1972*,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94, No. 1, p. 3, Jan.-Mar. 1974.

可,这些出版物表现出与他的品位不同的中国通分道扬镳的倾向。在他看来所有有教养的人都应该熟悉希腊谱系和拉丁词根,并乐于接受一些新创词语。

卜弼德的兴趣和才能还表现在对传记文学和哲学的研究。在一篇精辟的短文中他曾对中国传统哲学和伦理学的主要术语的含义进行了辨析,为的是清除许多受英语常规套路影响的译者对那些术语解读中的错误。传记文学研究一直被认为没有任何学术价值,但却是他毕生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他撰写的一篇孔子传记体现了严谨的评价方法与最现代的语文学知识的结合,早在1942年他就准确地把它称之为《圣人正传》。东语系接受卜弼德的积极提议,曾向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Robert Gordon Sproul)提出在1948—1949年为纪念孔子诞辰2500年举办庆祝活动的申请。虽然建议未被采纳,但是卜弼德却在1948年特别开设了"孔子生平及其时代"的专修课,并且持续了数年。1963年向古根海姆基金会提出费用申请时他把该项目描述为"《孔子生平和时代》专论修订"之所需。当时他还准备研究老子,从他发表的一篇引言中可以追溯到他的研究思路。

卜弼德还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设计一套可用于拼读30000个汉字的西式拼写系统。1956年他曾以《创建汉字语文学注音系统》(Towards a Philological System of Notation for Chinese Characters)为题发表了一个文告,用格雷柯-拉丁造词法(Graeco-Latin neologisms)对汉字符号和要素进行描写。他发现自己的编码不仅是把精确性引进尚欠精准(通常为非专业人员所为)领域的方法,而且还可以构成对中华文化和地中海国家文化的语义层面进行比较尝试的基础。尽管他设计并试用这些新术语时费尽了心机,可惜未被学生采用。过去大家熟悉的注音方法仍然继续沿用。

卜弼德常常在公开讲话中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1963年在发表就任美国东方学会及其西部分会主席的演说时,他曾散发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提要,其中就包括一些精辟的论点和论据。特别重要的是他的《柏克莱亚洲语文学工作室文件》(Cedules from a Berkeley Workshop in Asiatic Philology)后来很快就成为一种收藏品。但是因为那些雄心勃勃的研究项目涉及范围广泛,有些设想尚未细化,多少显得空泛。

卜弼德是一位好老师。为进一步充实专业论著的出版数量,他的许多用汉语撰写的文言文原创性文稿都通过学生保存了下来并广为流传,即便

有时因为曾经向他讨教过的学者的著述出版使他的理论受损或者被淡化，仍然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在基础阶段他也看不上源于中国学究用于对单纯学子进行古文权威解读的常用教学法。他的课程极具原创性价值，可以训练学生理解复杂书面语的能力（例如对古诗对偶结构的研究就是一例）并看懂古文注释，掌握正确解读所必需的其他技巧。因此他的学生成绩整体上优越于其他教师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成绩。

在课堂上卜弼德总是循循善诱，对问题的看法极具挑战性。他的“名著选讲”全校闻名；他的汉字和亚洲语言课突破了本科生专业视野，深受欢迎。他的课堂组织并非十分严谨，但是教学效果好，注意激发学子们的想象力，鞭策他们对学业的追求。他讲课幽默风趣，学生们觉得听他带着口音的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们发现在老师巨大的思维空间中不仅有他对于语文学研究的各种关切，也蕴藏着有关音乐和诗歌方面的知识。他对维多利亚时代诗人杰拉尔·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1844—1889）的诗歌技巧非常推崇，并且常借用它来对唐代诗人杜甫的作品进行极富美学价值的评析。他在几篇纪念文章中对陈世骧（Shih-hsiang Ch'en，1912—1971）的细腻和典雅文风高度赞美，他自己用英语和俄语创作的诗歌也也属于同类佳作。①

卜弼德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对于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贡献突出。他开设《中华文明》课程多年，对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是一大奉献。学习该课程不要求高深汉语功底，因此吸引了数百名学生，使他们的学科本领得到极大提高，充实了有关远东的思想和文明知识。他的博学多才对于清纯学子从不构成任何障碍、伤害或者压迫，他们都爱上这门课。可与这门课相提并论的另一门课是“名著选讲”，涵盖了中国、日本和印度的文学和哲学。他对于这些学科简直了如指掌。比如他对日本文学和佛教哲学内中的奥秘的了解就连该专业的名流学者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即便在学生对抗和批判职业教育时期这门课也深受欢迎。

卜弼德总是设法向非专业读者展示他的研究领域中的核心问题。他作为东语系系主任曾经组织过每月一次的东方学术论坛（The Colloquium Orientologicum），由各个相关亚洲学科的湾区学者（Bay Area Scholars）发布

① Yuen Ren Chao *et alii* : *Peter Alexis Boodberg, Oriental Languages: Berkeley, 1903—197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Memoriam, July 1975.

最新研究成果。除了卜弼德本人外,还有赵元任、哈斯(Haas)和奥尔茨基(Olschki)等事业有成者。论坛吸引了许多人,参加研讨会的师生至今难忘当时的盛况,在柏克莱校史上实属罕见。①

1960年他个人举办了题为"译事艰难"(The Moil of Translation)的系列讲座。他曾对其初衷作了如下描述:"那是有关翻译语义原则和语法的非正式讲座和座谈,是形诸传统汉字的经验文集,侧重于词与事分析和译文中的正确选词"。其中一个特别的标题是:"有关中国事物、问题和模式的基本法则。"他的世界文学知识和使命感充实了讲座的内容,极大提高了东语系的研究的水平。

在个人的学术生涯的后半段卜弼德似乎改变了自己的专业方向,清除了新机会主义的业余弊端。他对于美国各大学中文系的语文学人文主义的可悲现状深感失望,对于汉学家受到"团队"和"一体化"鼓吹者的有组织突然袭击的威胁愤愤不平,对于自己长期大胆倡导的准则是否能成功的前景越来越感到悲观。虽然平时待人热情,但是他似乎也很看重身份,甚至过分讲究繁文缛节。几乎没有人敢称呼他"彼得",可他坚信孔子有关"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诲是为师之道。

卜弼德对于学术研究中的数字化并不看好,有时他签发文件时故意以雇员编号代替签名。他不喜欢使用商用机器公司卡,对于问卷调查不屑一顾,认为那一切都是非人性化的做法。他反对研究人员对各类索引的依赖,认为他们应该记住有关文献,熟悉文学和历史的相干资源,这样就可以甩掉拐棍大胆迈步。在他看来一位学者应该有好脑子、好书刊和好的社交圈子。

1974年春爱德华·H·谢弗在《美国东方学社学刊》第94卷第一期上发表的《卜弼德1903—1972》一文中写道:

> 尽管他有悲观情绪,但是对于通过传统的人文主义与大胆创新相结合在汉语和中国文学研究中进行一场革命的动机正确性他始终深信不疑。使他唯一感到自豪的是"语文学家"这个头衔。实际上他是一位最佳荣誉意义上的哲学家,"博学多才"与

① Edward H.Schafer: *Peter A. Boodberg, 1903-1972*,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94, No. 1, p. 7, Jan.-Mar. 1974.

"想象力"互为表里。他一生的不幸在于只有少数人——主要是他的学生和其他领域中关心文学和历史的学者——对他在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上的观点有所了解。慢慢地他认识到这个世界并不接纳他的思想。也许事情不至于此。因为他缺乏自信,追求十全十美和艰苦付出,最终他心中广博和丰硕的资源大部分都在学术界枯萎了。如果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偏执狂或者怪人,就像一些同龄人对他的看法,那是天大的错误。他完全不是那样的人,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

但是卜弼德的品格超出了"伟大学者"的范围。他有气派,与人类历史和文学结缘深厚。虽然他恪守诚实做学问的严格戒律,但是他一贯反对待人接物中的粗暴、私心和居高临下的态度。他认为彬彬有礼通情达理才是君子风度。他遵循的个人荣誉和忠诚的准则几乎不为我们时代的人所理解,他也不希望别人照此行事。他凡事身体力行,仅此一点就值得怀念。

卜弼德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对于汉字、汉语语言学和音位学有独到研究,培养了几代汉学家。1972 年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这一年的 6 月 29 日因心脏病发作辞世。

他的主要著述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还有:

《汉语文言文演变之我见》(Some Proleptical Remarks on the Evolution of Archaic Chine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 pp. 329-372, 1937 年)。

《汉字是表意文字吗?》(Ideography or Iconolatry?, Toung Pao, 35, pp. 266-288, 1940 年)。

《试论汉字》(The Chinese Script: An Essay on Nomenclature (the First Hecato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39, pp. 113-120, 1957 年)。

《北魏拓拔语》(The Language of the T'o-Pa Wei)。

《中国边疆史注释两则》(Two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rontier)。

《北朝史旁注》(Marginalia to The Histori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中国生肖》(Chinese Zoographic Names as Chronograms)。

《早期的蒙文地名》(An Early Mongolian Topony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 pp. 407-408, 1956 年)。

《〈老子〉第一章注释》(Philological Notes on Chapter One of The Lao Tzu)。

《卜弼德文选》(Alvin P. Cohen (ed.),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年)。

(六)跨学科汉学研究的参与者兼组织者戴德华

1905 年 12 月 13 日戴德华出生于英国考文垂。从伯明翰大学获得历史和政治学位后靠英联邦研究生奖学金的资助,于 1928 年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大学深造。1930—1932 年他以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的资格来北京研究太平天国史。1933—1936 年他被聘任为南京中央政治学院国际关系教授,1937 年任燕京大学法学院导师。

1938 年夏天戴德华随八路军先后到河北和山西等地,为他们购买药品和器材,从北京运到河北后转送到地方游击队。这期间他还受聘每天为《曼彻斯特卫报》撰写有关华北局势的报道,把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为华北而战》一书出版。后来日军发现他为八路军私购药品之事就强令他离开了中国。

1939 年他被聘任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40 年任该校东方学院院长,1942 年任华盛顿特区战时新闻处副处长。他领导的外国人士气分析处(the Foreign Morale Analysis Division)聘请了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霍恩(Clyde Kluckhohn),组建成一个有 25 名成员的日本文化研究小组,拟通过背景资料的分析制定日军投降的条款和建立日本新政府的法律文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花与剑》就是其中成果之一。战后他被晋升为美国国务院新闻处处长,仕途一帆风顺。

1943 年戴德华加入了美国籍。他曾经谴责美国军人在日本空投原子弹的抉择缺乏法律依据,认为社会科学家的手段事关大局,应该有助于重大政策的制定。回顾自己当年的科研分析过程他领悟到,只有通过举贤任能的途径,联络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专家,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干。1946 年他创建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机构——远东研究所(The Far Eastern Institute),三年后改名

为远东和俄罗斯研究所(The 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成为魏特夫、梅谷、萧公权(Hsiao Kung-ch'uan,1897—1981)和瞿同祖(Chu T'ung-tsu,1910—2008)等学者经常聚会之地。虽然研究所的人才多半来自东海岸各个国家级文化中心,但是凭该所的最佳学科选题和有关亚洲与俄罗斯研究的一流刊物,很快就赢得了国内外的美誉。

戴德华喜欢文艺创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他就根据自己的在华经历在远离百老汇的西雅图创作了一部名为《凤凰与侏儒》的话剧。

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他曾参加各类全国性组织,获得过多项研究基金和亚洲研究奖金。1942—1943 年他在纽约市做研究时跟太平洋关系学会一直保持接触。1948 年他曾短期离开华盛顿大学到国家战备学院执教。合同期满后他还经常去那儿讲课,并且把范围进一步扩大到陆军学院、空军学院和海军学院。1955—1956 年他受聘为菲律宾大学亚洲研究所的顾问和客座教授。1959—1963 年他被推选为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和社会科学协会创办的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主席。

戴德华曾参与中国王朝史的项目研究。该研究是学者魏特夫于 20 世纪 30 年代所立项目,旨在把历朝的重要汉籍译为英文,加以点评后出版。20 世纪 40 年代项目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时,戴德华是其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与魏特夫的私交甚笃,一直全力支持该项历史研究。1950 年参议员麦卡锡指控汉学家拉铁摩尔是苏联间谍,魏特夫和戴德华都曾经在听证会上作过不利于拉铁摩尔的陈述,因此为许多亚洲学者所诟病。戴德华把魏特夫和中国历史项目引介到华盛顿大学,并且在整个 60 年代给予慷慨资助,既保全了朋友和自己的面子,又满足了欲干一番事业的学者们的心愿。

冷战时期戴德华属于沉沦偏见中的一族。他曾公开声称反对承认新中国,积极支持美国的对越政策,曾撰写一篇社论批驳由费正清所起草 12 名华盛顿大学教职人员签名谴责美国轰炸河内的声明。1955 年他辞去了美国国务院咨询处处长的职务,奉派前往亚洲重建菲律宾大学,九年后他出版了《菲律宾与美国:合作伙伴的问题》一书。

1963 年美国国务院文化事务助理国务卿分管的外国学术委员会在开展富布赖特项目并实施相关政策方面头绪复杂,困难重重,肯尼迪总统(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1963)专门指派他前往协助。1966 年约翰逊总统(Lyndon Baines Hohnson,1908—1973)延长了对他的聘任。1967—

1968 年戴德华加入了美国国务院中国和远东顾问委员会，1969—1970 他又受聘于美国企业研究所咨询研究委员会。

戴德华从早先的经验中体验到外贸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969 年退休后他首先致力于扩大华盛顿的国际贸易。1973 年他帮助组建了华盛顿国际贸易委员会，并于 1976—1987 年担任该会主席，这不但为贸易巨子、学者和官员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也使之成为他在太平洋西北大显身手的一个组织。他在发表于《西雅图邮报》(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的一篇文章写道："自由贸易并非道德准则，但却是提高我们和其他国家生活水准的最佳办法。"①

他的主要著述有：

《中国的复兴运动》(The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in China，1936 年)。

《为华北而战》(The Struggle for North China，New York：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0 年)。

《变化中的中国》(Changing China，Co-authored，St. Louis，Dallas，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merican Council，1942 年)。

《新太平洋之美洲》(America in the New Pacific，New York：Macmillan，1942 年)。

《凤凰与侏儒》(The Phoenix and the Dwarfs，1943 年)。

《现代世界中的远东》(The Far East in the Modern World，co-authored，1956 年)。

《菲律宾与美国：合作伙伴的问题》(The Philippines and United States：Problems of Partnership，1964 年)等书。

(七)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著称的顾立雅

顾立雅 1905 年 1 月 19 日出生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1926 年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27 年获得硕士学位，1929 年获中国哲学博士学位。1929—1930 年他在隆巴德学院任心理学助理教授，开始了自己博士后的学术生涯。在此后的学科深造和专业研究中他先后获得了多项资助：1930—1933 年获得美国学术团体协会颁发的研究奖金，1931—1935 年获

① 《西雅图邮报》1985 年 12 月 12 日。

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1936 年和 1945—1946 年还获洛克菲勒基金资助。

1936 年他被芝加哥大学聘任为中国历史和语言教师，1937 年晋升为中国古典文学助理教授，1941 年被提升为副教授，1949 年为正教授，可谓一帆风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 1943—1945 年间他像许多美国青年一样曾在陆军服役，以军情中校身份负责军事情报的译码和解码工作。1964—1974 年他担任马丁·赖尔森杰出服务中国历史教席，获得了许多令人羡慕的殊荣。

顾立雅时代的美国汉学研究刚刚进入了正规化和常态化阶段，环境和条件尚不理想，可供查阅文言文的工具书和专业理论参考书并不多。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体会到阅读古籍可以直接获得第一手资料，对于专业学生来说至为重要。为此他要求他们在接触现代汉语以前首先学好文言文。一开始就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时，他就在汉学地图（Sinological map）上重点标出了汉籍阅读课程的位置，直至他退休时该阅读一直为优先教学科目。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程序问题，更是一个教学理念的问题，在同事之中长期存在着争议。

在人们心目中顾立雅是一位中国古代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建制史专家，其实他的学术兴趣十分广泛，哲学、文学、艺术、文化、思想、人类学、铭文学、语文学、语言学、制度史以及经济考古学，都是他的研究范围。

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特别是在儒家学说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欧美学术界有很大影响。他的著作《孔子与中华之道》表达了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崇拜。他分析孔子的教育思想、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时，坚持通过历史语境还原人物和思想的真实，使结论令人信服。在评价 17—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与孔子思想的关系时，他经过研究和比较认定：当时的指导思想与其说与教会的观点一致，不如说与孔子主张更相吻合，这一事实后来得到了启蒙运动先行者的证实和说明。他还认为，儒学对美国民主思想的产生存在着一种间接的影响。杰斐逊与孔子都倡导人人平等，杰斐逊提出“治国之术包含真诚的做人之道”，与孔子的“政者正也”的思想是一致的。除了研究孔子外他也研究法家和道家的代表人物。

《中国的诞生》是顾立雅撰写的另一部有影响的中国文化史专著，跨度涵盖公元前 14 世纪到公元前 6 世纪，无论就其内容或者研究方法而言，对于关心亚洲历史的人类学家都有极大吸引力。作者综合利用了相关文学和历史资源，花了整整四年时间对商朝和周朝的史籍和文物进行研究和

解读。1928年商代都城安阳遗址由中国文史所进行挖掘,出土的部分甲骨、彩陶、青铜器和其他物件曾在伦敦展览过。作者通过文物和文献资料,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印证了《诗经》和《易经》不可估量的文献价值,加深了读者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了解。该书文笔精炼务实,学术内涵深厚但不张扬。

顾立雅的著作是西方儒学研究者的案头参考书,他深厚的汉学修养以及与中国知名学者的交往,使得他的孔子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和个人特色,也是他的著述成为儒学研究领域中的名著并长期受到海外学术界关注的原因。在半个多世纪中他出版了许多著作,其中大部分多次再版。他勤于思考,大胆探索,著述深入浅出,文笔流畅,逻辑严谨,为读者所追捧。经过他和同事几十年的努力芝加哥大学已经成为以东亚研究著称的美国名校之一。

顾立雅是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中国研究委员会和远东研究委员会委员,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同时还是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和美国哲学学会委员。他担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多年,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儒学权威和中华文明史专家。

据他的同事和学生回忆,读书是顾立雅的毕生嗜好之一。他做学问态度严谨,文风务实,用辞典雅。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有时甚至到咬文嚼字不讲情面的地步,但是他为人正直,不失学者风范。虽然这位孑然一身的老人晚年的学术热情不减当年,怎奈健康透支严重,无情岁月留给他的只是百病缠身,1994年6月1日他在家中悄然辞世,终年89岁。

他的主要著述有:

《中国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a, New York: John Day and Co.;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6年)。

《古代中华文化研究》(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 1937年)。

《用诱导法学习汉语书面语》(Literary Chinese by the Inductive Method, 1938—1952年)。

《用诱导法学习报刊汉语》(Newspaper Chinese by the Inductive Method, 1943年)。

《孔夫子——圣人与神话》(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 1949年)。

《孔子与中华之道》(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 1949年)。

《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Chinese Thought from Confucius to Mao Tse-tu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1953 年)。

《中国治国之术发端》(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Vol. 1: The Western Chou Empire, 1970 年)。

《中国文化史中的道教及其他研究》(What is Taoism? and Other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1970 年)。

《申不害——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国政治哲学家》(Shen Pu-hai: A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er of the Fourth Century B.C., 1974 年)。

(八)亚洲和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学者毕乃德

毕乃德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柏克莱。1927 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完学士学位课程后进入了哈佛大学研修汉学。他被告知应该成为具备直接阅读汉籍资质的第一代美国学人,因为当时哈佛大学尚未开设汉语课,学校就决定把他派到中国来留学。他父亲为他筹措了 1000 美元,1928 年他乘坐"杰弗逊"号东渡天津。登岸后换乘开往北京的一列火车,一路所见令他兴奋不已。后来他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只见一片片精耕细作的庄稼地,农夫在那儿忙碌着。密集的村庄,还有一座座坟地,对我来说处处都是陌生的世界。"①

那一年他在北京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学习汉语。后来他又从哈佛-燕京学社申请到两年的奖学金,一边学习汉语一边在燕京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他结识了 1922 年起就在燕京大学担任家政学系主任的卡米拉·米尔斯小姐(Camilla Mills)。1931 年他们结婚后返回美国,在剑桥安了家。毕乃德在继续读博士学位课程的同时,还在历史系兼职。1934—1936 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批准了他的两年博士后研究资助的申请,使他在研究领域如鱼得水,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收集到的大量历史资料、个人藏书和档案,写出了几部极有影响力的专著。1936 年他和邓嗣禹合作编撰了《中国参考著作叙录》,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

① Sherman Cochran and Charles A. Peterson: *Knight Biggerstaff, 1906—2001*,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 August 2001, pp. 933-935.

毕乃德在康奈尔大学先后被聘任为中国史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开设了中国文明史概论、清史和中国现代史等课程。1945—1946 年他在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任中文秘书。1946—1956 年他在康奈尔大学从事中国和东南亚项目研究，1956—1963 年被聘任为该校历史系主任。他是亚洲研究学会的创建人，1965—1966 年任该会会长。

他是汉学家，也是美国近代城市发展学术界的亚洲和中国现代化问题专家。他在探讨国家现代化的全球共性同时，也注重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丰富个性。1960 年在日本箱根举行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总结出国家现代化所具有的八个要素：在“城市化”的口号下人口高度集中于城市；非生命能源的使用率提高，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快速增加；市民广泛参与经济和政治活动；村社群体逐渐解体，人口流动范围扩大；文化知识普及导致社会生活科学化；政府、商业和工业机构中的官僚化倾向抬头；国家作用和国际关系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毕乃德用以上观点对 1919 年以前的中国社会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当时中国的一些地方和社会层次已经出现了相关变化。由于特征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差异，部分中国人主张抛弃传统观念并热衷于对新价值的追求——这是他对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倾向的一种新解。

1966 年毕乃德在就任美国亚洲研究会会长发表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演说中谈到：“19 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 19 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 1919 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了起来。”①

2001 年 3 月 13 日毕乃德在纽约去世。他的主要著作有：

《中国参考著作叙录》（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Works，co-authored，1936 年）。

《中国最早的现代官办学校》（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1961 年）。

---

① 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载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第 218 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年。

《中国:一个古代文明的革命性改变》(China:Revolutionary Change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九)倡导汉学研究客观性、学术性和多元价值观的费正清

1907年5月24日费正清生于美国南得克萨斯州的胡龙镇,父亲是律师,母亲是活跃的妇女协会会员,对于费正清的人生道路有较大影响。

1925年费正清中学毕业后上的第一所大学是威斯康星大学,1927年转入哈佛大学,主攻希腊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和艺术。1929—1931年他获得罗兹学者基金资助到英国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研究东亚问题。1931年获得硕士学位后他开始在华盛顿美国国会档案局、剑桥和巴黎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查阅资料。1932年他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和洛克菲勒奖学金来华进修,在北京华北协和语言学校补习了几个月的汉语。1933—1935年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税务学校教英文,同时在历史教授蒋廷黻指导下收集资料,撰写博士学位论文。1935年圣诞节前他带着自己的博士论文手稿从北京返美,第二年在哈佛大学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海关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1850—1858)从中国近代史、外交史和制度史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一反过去微观和个案的西方传统汉学研究路数,为美国现代汉学开辟了新方向。

1939年以后他与赖肖尔(Edwin Oidfather Reischauer,1910—1990)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1941年8月他奉调到华盛顿特区情报协调局远东组工作,第二年被派往重庆,第三年调陆军情报局远东部,1945年9月重返中国任重庆美国使馆新闻处主任。1946年秋他再次回哈佛大学任教。1952—1953年他以古根海姆基金会学者的身份访问日本,1958年被选为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1968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费正清主张研究历史要与现实相联系,充分利用中国档案和史料来研究中国问题。

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肆虐,几乎没有任何美国学者敢公开涉足汉学研究,费正清与韦慕庭、史华慈等人却清醒地注意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无法忽视的事实。通过研究他们发现中共不同于苏共,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因此对当时的美国官方政策提出了异议。

费正清曾从中国外交史、海关史和制度史方面展开了早期的汉学研究,但是他对于儒家学说也不可能不涉猎。不过他是从社会政治角度来研究儒学的,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儒学经典进行解析,把它作为认识近现代中国变革的资源。他认为,儒学不可能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原动力。现代化必须具备民族主义、工业化和商业化等方面的条件,而儒教社会结构却造成了国家制度僵化和国民心理迟钝,因此妨碍了中国的现代化步伐。

1938—1991 年,费正清以哈佛大学为基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汉学家和中国通,如果说 20 世纪末在美国名牌大学的历史教授中有一半是他的门生,也不算为过。据说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前夕,两国高层领导人案头都摆放着他的专著《美国与中国》。学术界把费正清和他的同事与弟子(如:列文森、史华慈、柯文和刘广京等)所形成的学派称为"哈佛学派"(The Harvard School),实际上就是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汉学研究团队。虽然他们的文化背景、社会阅历、学科选题、政治态度和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对于汉学研究的目标和热情相同,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演绎、对比、探索、推论的手段相同,敢于追求真知,也勇于修正错误,在所持的观点及其价值取向方面明显与他人有差异。

1955 年在哈佛大学、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东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正式成立了,费正清本人出任主任。1977 年费正清退休,中心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示同人对他的永久性纪念。虽然该中心的研究领域原来设计要涵盖东亚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但是因为学社的其他中心相继成立,分工有所不同,于是就把研究焦点定位于中国国情和文化,具体地说,包括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政治运动、经济现状、对外贸易、国民教育、港台关系和民族问题等方面。几年后中心不断开拓壮大,形成了自己的教学、研究团队和品牌研究项目,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费正清中心执行委员会成员都是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地区的权威汉学家以及东亚研究专家,也是中心的中流砥柱。例如伊维德(WIlt L.Idema)任中心主任时期,执行委员会就是由他本人以及安守廉(William Alford,哈佛法学院东亚法律研究所主任)、彼得·博尔(Peter Bol,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中国历史教授)、柯文(韦尔斯利学院历史学教授)四人组成。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固定编制,除了主任、主任助理和工作人员外,

研究员大约有3~4人，短期研究员大约100人，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生和访问研究助理（visiting associates in research）的人数则随着每年计划变化而变化。中心的资金来源于联邦政府、各基金会和社团。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活动主要是举办各类研讨会、学术讲座和年会。讲座有中心自己组织的，也有与其他研究机构联合举办的常态化安排，内容包括中国时政、汉语语法、港台讲座，范围广及中国历史、家庭生活、婚姻关系、小说、电影，对中心的师生和研究员都非常有吸引力。讲座总是充满着学术讨论的热烈气氛和自由思考空间。另外，每年圣诞节、春节、感恩节和新学年伊始，中心都要举行大大小小的庆祝联欢活动，以增进彼此情感沟通，营造东西方文化融洽的环境。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是在中心创建不久之后建立的，现有藏书20000多册，主要收藏中文和英文书籍。费正清去世后，他的全部书籍都捐赠给了中心图书馆，进一步充实了原有收藏，其中不乏珍本和绝版图书。作为汉学研究的重要文库，中心图书馆收藏的当代中国书籍和汉学著述数量大，年代久远，大陆和港澳台出版的都有。该馆还订阅了数百种中国和海外华人出版的汉学研究杂志、地方志和参考刊物，无论阅读、检索和下载都十分方便。此外，该馆还收藏了很多未正式出版发行的刊物、小报、图片和资料，为国外汉学研究人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背景线索。该馆的图书分类和编目都很规范，针对性强，上架及时，服务周到，为中心读者所称道。

在几十年的学术和教学生涯中，费正清暨重视学术研究又积极为美国的外交献计献策的双重功利观点，常常受到各方政客和学者的质疑。他是美国现代汉学的开拓者，强调汉学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语言学、历史学或社会学，而是要让相关学科联姻，用区域研究代替国别研究。他关心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他的论述影响了几代美国学人和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晚年的学术观点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体现了美国现代学人的务实性和功利性，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

费正清对于美国汉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以“区域研究”为指导思想，扩大学术视野，强化科学规范和研究运作；二、提倡汉学研究中的学科联姻，鼓励社会学科之间相互借用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告别早期厚古薄今、单科独进的微观自发模式；三、对研究人员实行专业化、团队化、产业化管理，不问参与者的出身门第，在注重汉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学术性的同时也不忌讳为官方出谋献策，强调以预测高度检验成果的真伪成败；

四、提倡或者包容汉学研究多元价值观的存在和发展，既符合国际化背景的团队成员的现状，也可以顺应时局和学科变化的实际。这是费正清几十年来领导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之成功奥秘，也是解读哈佛学派的汉学研究，乃至整个现代美国汉学的密码。

客观上讲，费正清并没有以“规则”来约束团队，但是20世纪西方政治、文化、产业以及美国的世界战略等因素所孕育的生态环境，实际上认同了独具务实性和功利性的费正清学术模式，他们每一年的可观物质成果又进一步提升了团队的进取精神。

1966年费正清联手欧亚学人开始了编写《剑桥中国史》丛书的雄心勃勃计划。100多位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日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资深史学研究人员参与编写，充分利用了第一手中国历史档案资料和最新考古发现，广泛运用了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民俗学、神话学、版本学、心理学、统计学以及田野调查、数量分析、问卷统计、年代测定等手段形成的结论，把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治史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剑桥晚清史》的理论框架，由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列文森的“传统与现代”模式，直到柯文等学者的“中国中心观”模式的变化，就足以看出参编专家的独运匠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剑桥中国史》的编写和出版过程，充分印证了哈佛学派的汉学观念和美国现代汉学的主流倾向。

费正清是美国有声望的汉学家。他的中国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对美国政治家和几代学者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华裔学者余英时在《开辟美国研究中国史的新领域》一文中回忆费正清对美国汉学的贡献时曾经有这样一段评价：“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美国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动力；哈佛大学历史系正式把中国近代史列入课程是从他开始的。他的逝世象征着这一学术领域的时代落幕。”

费正清一生笔耕不辍，独著、合著、编辑的书多达60余部，主要有：

《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48年)。

《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条约口岸的开埠》(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1953年)。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 与邓嗣禹等合编，1954年)。

《中国的思想与制度》(China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1957 年)。

《清代的行政:三种研究》(Ch'ing Administration: Three Studies, co-authored with Teng Ssu-yu,1960 年)。

《东亚:伟大的传统》(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 co-authored with Edwin Oilfather Reischauer,1960 年)。

《东亚:近代的变革》(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co-authored with Edwin Oilfather Reischauer and Albert M.Craig,1965 年)。

《中国,人民中国与美利坚合众国》(China, 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S.A.,1967 年)。

《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1968 年)。

《中国的传统和现代化新解》(New Views of China's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1968 年)。

《东亚:传统与改革》(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1973 年)。

《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China Perceived: 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74 年)。

《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1974 年)。

《中国的兵法》(Chinese Ways in Warfare,1974 年)。

《中美相互关系:历史评述》(Chinese-American Interactions: A Historical Summary,1975 年)。

《中美关系展望》(Our China Prospects,1977 年)。

《心系中国》(China bound: A Fifty-Year Memoir,1982 年)。

《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1986 年)。

《美国对华贸易的历史回顾:中美双方的状况》(America'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formance,1986 年)。

《观察中国》(China Watch,1987 年)。

《新中国史》(China: A New History,1991 年)。

(十)韦慕庭统筹口述史访谈对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贡献

1931年韦慕庭毕业于奥柏林学院,1933年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曾来北京协和华语学校进修。1941年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47年留母校执教,并兼任该校东亚研究所所长。他曾获富布赖特研究奖金,1961年又获福特基金会资助创建美国学术机构与台湾"中研院"近史所联络委员会。

《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是韦慕庭撰写的一部全面介绍和评价孙中山的英文传记,以客观的态度讲述了孙中山屡次受挫却勇往直前的人生历程,也表达了作者对他的敬仰之情。该书除"序"和"前言"外,正文共九章,分别为:熏陶铸炼的影响和事业的方向;为革命筹款;为了反对清政府而寻找外援;利用外国力量的努力;向苏维埃俄国探寻摸索;有活力的联俄背景;在俄国的帮助下进行工作;挫折和新的希望;最后的追求探索。1985年6月4日韦慕庭在该书"前言"中写道:

> 孙博士是一个属于全世界的人,他在海外寻求政治上和经济上援助的不懈努力,和他所遭遇到的挫折沮丧一样,人们都必须牢牢地予以记住。当他力图推翻清王朝或其后取代北洋军阀政府的时候,理解和意识到他在中国如何受到客观条件困厄制约的情况,也是一桩十分重要的事情。作者试图理解这个非凡的人物:他的视野气宇和性格禀赋,都是经由中国和外国这两者的影响而陶铸形成的。他的爱国目标以及他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时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也是受到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中国特殊环境所影响着的。①

韦慕庭长期研究中国历史,对于中国近代史和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研究有很多成果。1956年他曾和夏连荫(Julie Lien-ying How)合作编撰了《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8—1927年》一书,填补了西方国际共运史研究的空白。

---

① 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前言》(杨慎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1960年韦慕庭被告知，哥伦比亚图书馆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1924年1月陈公博（Chen Kung po，1892—1946）的硕士论文英文打印稿，题目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他惊奇地发现该论文的附录中收录了中外学术界寻找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

作者陈公博出身于仕宦之家，1907年在家乡与其父组建有反清倾向的“三点会”。1917年他从广州法政专校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毕业后他回广州创办宣传新思维和马克思主义的《群报》。1920年陈独秀（1879—1942）和陈公博与谭平山（1886—1956）等人组成共产党广州支部。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公博以广州代表身份出席了大会。1922年6月因支持陈炯明叛乱受到留党察看处分，陈公博宣布退党到美国读经济硕士学位课程。1925年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到广州，加入了国民党，受汪精卫和廖仲恺的重视，先后担任党部书记和国民政府广东省工农厅长。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勾结日本的“国民政府”，陈公博追随他一度担任南京汪伪政府的立法院长，后兼任上海市长。1944年汪精卫赴日治病，陈公博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

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写于中共“一大”之后的第三年，谈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过程。论文附录全文收入了六篇重要文献：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2年）；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附录一、二、四、五正是散失多年的重要历史文献。

韦慕庭从1944年10月上海申报社出版的《寒风集》甲篇中发现陈公博写的几篇回忆文章：《少年时代的回忆》（1935年）；《我的生平一角》（1933年）；《军中琐记》（1936年）；《我与共产党》（1943年）；《改组派史实》（1944年）；《补记丁未一件事》（1944年）。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详细记述了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还谈到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2月12日他乘“总统”号赴美之事。抵纽约之后他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院，由原来的哲学专业改修经济专业。

陈公博的复杂经历增加了失而复得的中共“一大”文件的历史价值。

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在该校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赞助下，出版了由韦慕庭撰写“序言”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收入了陈公博36年前的硕士论文和中共党史的相关文献。

韦慕庭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组织并参与的“中国口述史研究”是一项重大史学工程。

1947—1949年中国经历了三年内战之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一批国民党政要先后流落海外，其中部分旅居纽约。韦慕庭意识到这些民国要员的回忆可能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1956年12月他前往纽黑文，与东亚研究所何廉（1895—1975）商讨编撰专题口述史的可行性，双方很快达成了共识。他们当即开始筹划“中国口述史研究”的具体计划以及所需开支，初步确定受访者必须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知名人物，如果以“学术自传”的形式出版将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有所贡献。第二年韦慕庭被聘任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他给该校国际事务部主任斯凯勒·华莱士（Schuyler Wallace）提交了一个申请，建议学校从所获福特基金中拨出部分款项支持“中国口述史研究”。1958年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首笔福特基金会拨款1.5万美元，中国口述史的项目随之启动。采访对象人选确定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Grayson Kirk）同意以他的名义发出邀请，由何廉主要负责与受访者落实具体事宜。1958年2月第一批受邀请的是孔祥熙（1880—1967）和胡适，夏连荫和唐德刚（1820—2009）分别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一般的口述史采访可能聚焦于受访者的生平回忆，但是韦慕庭主持的口述史则侧重于对问题的探讨。1961—1962年他到台湾地区休假时采访了白崇禧（1893—1966）等民国时期的军政要员，复印了许多关于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的材料。这些资料帮助他对国共两党研究切入点的确定，以及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的探索，并由此推断后来国共政权交替的历史环节。

1962年韦慕庭采访了吴国桢（1903—1984），讨论了中国大陆国民党政权被共产党所取代的问题。吴国桢把国民党垮台的原因归结为四点：国民政府腐败，漠视政治改革；百姓和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缺乏了解；美国执行了错误的政策；俄国对于中共的援助促成时局的改变。韦慕庭长期思考而又找不到满意解答的这些问题，后来成了他口述史研究的理论依据。

1958—1980年韦慕庭统筹的中国近现代口述史研究项目先后访谈的

政要有:孔祥熙、胡适、李璜(1895—1991)、顾维钧(1888—1985)、陈立夫(1900—2001)、陈光甫(1881—1976)、李宗仁(1891—1969)、左舜生(1893—1969)、李书华(1890—1979)、沈亦云(1894—1971)、吴国桢、李汉魂(1895—1987)、蒋廷黻(1895—1965)、何廉、蔡增基(1892—?)和张发奎(1896—1980)等人。

韦慕庭的口述史研究,是在西方新史学思潮的背景下推动展开的,其研究成果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国共关系史留下了重要资料,也扩大了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研究的影响。

韦慕庭是研究中国史的著名美国学者。1989 年他把自己保存多年的读书手札和函稿都捐赠给了台湾"中研院"近史所。1997 年他在美国辞世。他的主要著述有:

《中国的乡村政府》(Village Government in China,1934 年)。

《前汉时代中国的奴隶制》(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1943 年)。

《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1976 年)。

《中国国民革命(1923—1928)》(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3—1928,1984 年)。

《我生命中的中国:一个历史学家自己的历史》(China in My Life: An Historian's Own History,1996 年)。

《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1927 年北京警察局查获的俄国使馆密件》(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Papers Seized in the 1927 Peking Raid,与夏连荫合编,1956 年)。

(十一)专攻中国制度、思想、文化和哲学史的专家卜德

1909 年 3 月 9 日卜德出生于上海。他的父亲西奥多·卜德(Theodore Bodde)是荷兰人,1919—1922 年任上海南洋公学(1921 年改名为"交通大学")物理教员,平时喜欢写些小文章。《圣尼古拉》杂志 1925 年 1 月号曾刊登他的《我在中国坐篷船观光》(My House-Boat Trip in China),1926 年又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了《游览中国长城和明陵》(My Trip to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and the Ming Tombs)。卜德的母亲是美国人,对于他的成长有重要影响。

1930年卜德在哈佛大学主修英语,毕业论文为《莎士比亚与爱尔兰伪作》(Shakspere and the Ireland Forgeries)。在经济萧条年代就业机会很少,大学本科毕业后他就和五位同学一起研读汉学研究生课程。1931年他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的资助来华深造,专攻中国古代思想制度史。第二年哈佛大学给他捎来口信:"要续奖学金就得发表论文。"于是他写了《谈孔子的尊位》(On the Paternity of Confucius)和《〈论语〉通解》(A Perplexing Passage in the Confucian Analects)两篇文章,1933年其中一篇在《亚洲研究学刊》(JOAS)上发表了。意外的成功使他高兴,接着他又尝试用汉语撰写了《〈左传〉和〈国语〉详解》(On the Dzwo Jwan and Gwo Yw Texts),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重要学术问题。

1935年他与俄国小姐加林娜·斯佩什涅夫(Galina Speshneff)结婚。婚后的小家庭幸福生活更加激发了他的上进心。1936年他翻译了清人富察敦崇礼臣氏编撰的《燕京岁时记》,1937年又翻译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这年年底他前往荷兰研修汉学,业师为戴闻达。1938年他在莱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中国的第一位统一者李斯》,他的研究才能在研读汉籍中得到了充分发挥。同年他被宾夕法尼亚大学聘任为中文讲师,为东方研究班和中国文化史讲习班开设了上古至10世纪的文化课程。他奇迹般地从一位青涩学子脱颖而出,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初试身手到进入汉学领域的浩瀚天空,在辛勤耕耘中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1942—1945年他在美国战略和战时情报处服役,为政策制定撰写了多个有关中国文化背景的报告。大战结束后,他以富布赖特奖学金第一研究生的身份来华。

自20世纪30年代起卜德就开始研究中国的历史、制度、思想、文学、法律和节日。1948—1949年他在北京翻译了冯友兰的第二部著作《中国哲学史》。新中国建立后他出版了《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Peking Diary: A Year of Revolution)一书。根据自己早年在北京对中国风俗习惯的了解,1961年他发表了《中国古代神话》。法制和管理问题在他的所有著述中都有所涉及,甚至早在1936年他给《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的投稿《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和科学方法的态度》中就已涉及这一主题,后来在莱顿大学又进一步得到了发挥。

1974—1977 年卜德应李约瑟邀请到英国剑桥大学参与《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相关课题研究。他充分利用了研究所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思考着就几个学术选题撰写专著。

有关汉语和汉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卜德汉学研究的重要选题，主要围绕“李约瑟问题”的讨论展开：中国古代的辉煌科技成就为什么没能催生类似近现代欧洲出现的科技革命和社会经济制度变革？在《中国思想、社会和科学：前现代中国科学技术的思想和社会背景》一书的《汉语书面语的原动力》中他提出了“汉语本身具有独一无二的美感和魅力，赋予了中国诗歌、散文和戏剧等文学形式表达力量，有助于科学知识的积累”的观点，反对“表意文字缺乏表现力，阻碍科学思想产生”的说法。但是他也认为汉语书面语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知识阶层的专利，影响思想的记录、传播和普及，客观上有利于官僚主义制度的形成；古籍中充斥同音词和多音字以及没有词类区分和标点符号，使汉籍难读难懂，增加了读者的负担。这是导致中国传统的学术论证缺乏综合、概括和假设的原因之一，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禁锢和阻碍作用，影响了哲学和思维的发展。

卜德与李约瑟等学者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存在着分歧。卜德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 过了很久之后，我的手稿付梓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李约瑟博士和我有关中华文明方方面面的分歧意见才开始明朗化。其中，首先但不是最后的一个问题是，汉语书面语作为揭示与科学有关话题的工具是否充分发挥其历史性作用？①

作为科学手段的汉语话题的总结后来由李约瑟交给了雅努什·赫梅莱夫斯基（Janusz Chmielewski）去完成，但是 1983 年赫梅莱夫斯基的健康已经每况愈下，无法视事。这样，有关语言问题的李约瑟研究所正式表态就交给了赫梅莱夫斯基的弟子克里斯托夫·哈伯斯米勒（Christoph Harbsmeler）发布。在系列丛书《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七卷的《作者的话》中编者写道：

---

① E.Bruce Brooks: *Derk Bodde, 1909-2004*, 2004.

> 我发现,诚然,许多语义和逻辑结构完全有可能但是却无法在文言文中把意思体现出来。结果,那些通常看来都是与科学思维陈述不相干的话,或者用李约瑟在"绪论篇"的话来说,读者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发现许多常见的先入为主的见解受到挑战的情况。除非为有才能的科学思想家所使用,否则汉语语体文就是一种概念含糊的诗歌语言,不适用于科技文章的撰写。①

经过了大约一年时间漫长而艰难的谈判,卜德专门为李约瑟系列丛书撰写的文稿正式与其脱钩,重新对读者对象进行定位修改后,1991 年以《中国思想、社会和科学:前现代中国科学技术的思想和社会背景》为书名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对于汉语是否不宜用于科技论文的撰写的问题进行了一番争辩,同时还探讨了中国社会结构是否也构成障碍的问题。其实这原本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问题,但是刨根问底却又是个无底洞,把它做成大学本科生的期中论文的水平更不可取。在该书的"附录"部分,卜德列出的核心文本依据是中国传统社会阶层的降序排列"士"(scholar-gentry)、"农"(farmers)、"工"(artisans)和"商"(merchants),并以此为该书第三章内容的理论框架。但是持异议者却认为中国传统社会阶层并不总是 4 个,有时可多达 10 个,有时却只有两个(如"主"和"仆"),而且顺序也常常变化。他们对卜德研究的总体评价是:通观全书作者采取了先入为主的方法,社会生态环境被整体忽视了,汉学研究方法论也从根本上被否定了,语料本身并不能推导出任何结论。虽然这样的无情了断见仁见智,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它基本上属于学科专家之间的正常争论,没有证据表明源于文人相轻或者帮派门户之见的负面影响问题。

1968—1969 年卜德曾任美国东方学会主席,1968—1971 年任亚洲研究协会理事和美国文理学院和哲学学会委员,1975 年任宾夕法尼亚大学中文荣誉教授,1978 年 10 月随余英时率领的美国汉代历史考察团来华。1981 年他在乔治敦大学任孙中山中国研究客座教授,1985 年曾获亚洲研究协会杰出学者奖。2003 年在美国逝世。

卜德先后发表了一百余篇有关中国文化与社会研究的著作和论文。这些论著探讨了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和贡献,他所做出的一切

---

① E.Bruce Brooks: *Derk Bodde, 1909-2004*, 2004.

努力为的是把真实的中国介绍给美国读者。他的主要著作和译述有：

《燕京岁时记》(Annual Customs and Festivals in Peking,英译清人富察敦崇礼臣氏编《燕京岁时记》,Henri Vetch Xxii,1936 年)。

《对待中国古代科学和科学方法的态度》(The Attitude Toward Science and Scientific Method in Ancient China,1936 年)。

《中国哲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译自冯友兰,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37 年)。

《中国第一位统一者:从李斯的生平研究秦朝》(China's First Unifier:A Study 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280—208B.C.Leiden:E.J.Brill,1938 年)。

《中国思想类型》(Types of Chinese Categorical Thinking,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39 年)。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爱国者和大将军:〈史记〉秦朝人物传记三篇》(Statesman,Patriot,and General in Ancient China:Three Shih-chi Biographies of Ch'in Dynasty,255—206 B.C.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40 年)。

《中国物品西传考》(China's Gifts to the West,1942 年)。

《中国思想西传考》(Chinese Ideas in the West,Washington D.C.,1948 年)。

《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编译,new York:The MacMillan Co.,1948 年)。

《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Peking Diary:A Year of Revolution,1950 年)。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什么和向何处去》(China's Cultural Tradition:What and Whither? 1957 年)。

《列子与畜群》(Lieh-Tzu and the Droves ; Asia Major,VII,1-2 1959 年)。

《中国古代神话》(Myths of Ancient China,1961 年)。

《托尔斯泰与中国》(Tolstoy and China,1950,与妻子加林娜合撰,1967 年)。

《中华帝国法律》(Law in Imperial China,与克拉伦斯·莫里斯合撰,1967 年)。

《古代中国的节日:公元前 206—公元后 220 年汉朝的新年和其他年

度节日》(Festivals in Classical China: New Year and Other Annual Observance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206 B C.-A.D. 220, 1975 年)。

《汉代的节日》(Han Festival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77 年)。

《中华文明论文集》(Essay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年)。

《中国思想、社会和科学:前现代中国科学技术的思想和社会背景》(Chinese Thought, Society and Science: 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remodern China,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 年)。

(十二)极富美国行动主义精神的历史和宗教学家芮沃寿

1929 年芮沃寿曾和父母亲来亚洲旅行,沿途所见所闻使他眼界大开,开始对佛教产生了兴趣。他长期保存着几张颐和园门廊和日本镰仓佛陀的照片。他还购得了一枚特大中国印章,在他收藏的拉斐尔·彼得鲁奇(Raphael Petrucci, 1872—1917)撰写的《中国画家》(Chinese Painters)一书上留下了印记,日期为 1933 年 5 月。

芮沃寿在斯坦福大学三四年级阶段曾师从阿尔贝·莱昂·盖拉尔教授(Albert Leon Guerard, 1880—1959),对他的《一种理想的存亡:古典时期的法国》(The life and Death of an Ideal: France in the Classical Age)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在教授的鼓励下芮沃寿曾就"个人意志与社会环境"的深奥命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一篇题为《巴尔扎克与历史精神》的论文中他研究了文学传统,对巴尔扎克"相信过去及其制度"的观点加以剖析和分解。他认为这位法国作家的思想具有客观性,是一种人性和才华的迸发。从 1934 年秋芮沃寿在一篇题为《梅列日科夫斯基与拿破仑,或神秘、历史、理论与荒谬》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他对一些有争议课题的研究力度和方式的变化。

1935 年芮沃寿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当时的《斯坦福著作年鉴》(A Year Book of Stanford Writing)中收录了一篇芮沃寿的论文《卡莱尔与现代气质》,文后有这样一条注释:"芮沃寿,英国俱乐部成员和东方宗教学者,曾在东方游历,爱好高尔夫球,明年即将就读于牛津大学。"在业师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 1883—1956)的指导下,他开始研修中国历史和

宗教。

1937 年芮沃寿返回美国进入哈佛大学，师从于叶理绥（Serge Elisséef，1889—1975）和魏鲁男主修汉语和日语，此外他还选修了美学、宗教社会学和印度宗教等课程。在哈佛他结识了瓦萨学院毕业后受业于费正清教授门下的玛丽·克莱博（Mary Clabaugh，1918—1970）。1940 年夏天芮沃寿获得了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同年 7 月 6 日他和玛丽在华盛顿大教堂举行了婚礼，两个月后夫妇二人从西雅图启程前往日本。

1940 年 9 月至 1941 年 5 月芮沃寿在京都学习期间曾师从嵯峨清凉寺住持塚本善隆教授，为自己后来的《传记文学与圣徒传记：回教著名僧侣生平》研究作前期准备。他们夫妇二人聘请了七位家教，辅导自己学习汉语、日语口语、佛教历史和《莲花经》。他们经常参观寺庙，在教科书和食品都匮乏的环境中遵守日本政府禁止跳舞和饮酒的规定，曾经为买一个炉子疲于奔命，若干年后此事仍记忆犹新。

1941 年年初他们的家教增至 9 人，平均每周跟每位教师学习两个小时，内容涵盖了佛教史、书法、读经、口语和时文。玛丽还另请了一位家教为自己讲授中国近代史，又请了一名学生辅导自己阅读有关中国的日语文献。

芮沃寿在研读由多位日本学者撰写的《河南龙门石窟佛教研究》（A Study of the Buddhist Cave Temples at Lung-men，Honan）后认为：虽然这部著作不能替代沙畹（Emmanuel 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华北考古纪实》（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对龙门石窟的研究，但对于从事中国艺术史、佛教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者来说该书也具有同等参考价值。

芮沃寿曾于 1941—1942 年和 1945—1948 年以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资格两度来北京进修。1941 年芮沃寿来华后三个月玛丽与他在北京相聚。他们在一位家教的帮助下每天学习三个小时的汉语。夫妻租住了一户旗人大院的厢房，有宽敞的起居室、卧室和缝纫室。他们还雇佣了打扫卫生的佣人和厨师。两个月后他们参观了山西的佛陀石窟和长城，被视为来华经历中的盛典长期保存在自己的记忆中。

然而后来日军侵华的枪炮声打乱了他们在北京的平静生活。1943 年 3 月 24 日芮沃寿和玛丽被日军拘留，与数百名外国人一起被押送到山东潍县集中营。芮沃寿先后被派遣去杀猪，看管水泵，或到厨房打下手。他

冒险把论文副本带进了集中营，闲来无事便偷偷翻阅，为他在战后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45—1947)第9期篇幅长达57页的论文《1941—1945年北平的汉学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预留了宝贵的时段。在他脑海中那将是一篇全面考察战时汉学研究成果的论文，旨在对整个战争期间德国汉学家、中国和西方学者的学术生态进行描写和归纳。这一期间，玛丽也悄悄向集中营里的难友学习满语和俄语。

1946年芮沃寿夫妇访问了延安，见到了朱德和毛泽东，考察了监狱、学校和医院。延安的经历进一步丰富了他们的汉学研究选题。

1947年芮沃寿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应聘任职于斯坦福大学。他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成为一名专门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1953—1954年他第二次访问京都。1959年他应邀在耶鲁大学哲学系任教，1961年起担任查尔斯·西摩历史学教席(Charles Seymour Professorship of History)。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他完成了多项佛教研究课题，最终以《中国历史上的佛教》结集出版。与此同时他还进行了其他相关选题的研究。

芮沃寿最初的研究领域为佛教史。他的著述主要围绕佛图腾和公元7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运动”，摆脱了传统佛教研究聚焦于语文学和神学的俗套。他的著述从历史学宽泛的框架内对佛教与政治学之间关系进行了探讨，通过对隋炀帝出于个人政治目的操纵佛教的史实研究，揭示隋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唐太宗推行的佛教政策的研究芮沃寿也基本沿袭同一思路。

芮沃寿勤于思考，刻苦钻研，喜欢以文会友，利用各种机会与同事和学者切磋学问，对大师名流虚怀若谷，积极组织并资助学术会议。除了母语英语外，他一生学习并掌握了法语、德语、汉语和日语四种语言，在早年的美国汉学家中实属罕见。在那个速均主义年代(age of galloping egalitarianism)他是一位直言不讳的精英，追求完美，谴责平庸，反对浮华。然而他又是热情、随和、豪爽的东道主，高尔夫球高手，集鉴赏家和美食家于一身，更是嗜酒如命的君子，这些品格使他对学术才干、财政和出版实用性具有敏锐的判断力。1950年他曾担任亚洲研究协会项目委员会主席，1951—1955年任《亚洲研究协会学刊》(Journal of Asia Studies)编辑，1955—1958年任该会董事，1963—1965年被推选为副主席和主席，1962—1965年领导国际学者联络委员会(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Liaison)，1967年挂帅27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财务委员会。此外，他

还通过会商福特基金会为1966—1971年度亚洲研究协会项目争得了12万美元的拨款。他担任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时所体现的典型的美国早期行动主义精神(American Activism),与他的学术才能的发挥达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①

1976年夏天,芮沃寿在康涅狄格家中筹划自己的论文集出版时心脏停止了跳动,留下许多遗憾和不可弥补的损失。他的主要学术成果有:

《布鲁诺的生活概述及其他》(Giordano Bruno, a Synopsis of his Life, etc.,手稿,斯坦福大学,1933)。

《佛图腾》(Fo T'u-teng: A Biograph,1947年)。

《中国思想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主编,1953年)。

《中国历史上的佛教》(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1959年)。

《行动中的儒教》(Confucianism in Action, co-authored with David Shepherd Nivison,1959年)。

《儒教》(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co-authored with Denis Crispin Twitchett,1960年)。

《儒家人格》(Confucian Personalities,1962年)。

《儒家与中华文明》(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1964年)。

《唐代透视》(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co-authored with Denis Crispin Twitchett,1973年)。

《隋朝——中国的统一》(The Sui Dynasty: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1978年)。

《中国佛教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Buddhism, ed. Robert M. Som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年)。

(十三)对唐诗和道教有开创性研究的历史文化专家薛爱华

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出生于西雅图,中学毕业后全家迁往洛杉矶,因为家道中落不得不去一家食品批发公司打工。平时一有时间他就去当地的一个公共图书馆,涉猎古典埃及文化书刊。七年后

① Fairbak *et alii*, *Arthur Frederick Wright, 1913—1976*,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6, No. 3, pp. 491-494, May 1977.

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主修物理学和哲学，渐渐地对人类文化学也产生了兴趣。后来他转学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在艾尔弗雷德·路易斯·克罗伯（Alfred Louis Kroeber，1876—1960）和罗伯特·哈里·劳里（Robert Harry Lowie，1883—1957）等大师的关怀下学习文学学士课程，1938 年获学士学位。

1940 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夏威夷分校获得了汉学硕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一直在海军情报处服务，战后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在卜弼德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学位学业。1947 年薛爱华开始任教于母校东语系。

这一年东语系的职务晋升评委会向上级提交的一份有关他的报告称：

> 虽然薛爱华的正规教学经验有限，但是学术上颇有前途。他出版的著作不多，不过他的博士论文却表现出极强的学术才能。他已经被提名晋级（助理教授），不只是因为目前的竞争需要，也是因为他的条件（学术、超学科和年龄）优越于一般人。他的学科素养广泛而且有价值，精通汉语和日语更增加其优势。

几年后臭名昭著的效忠宣誓（loyalty oath）风波在柏克莱校园引起了纷争，他和其他 17 位教师因为拒绝在效忠声明上签名被辞退。为了继续支持系里的工作他经受了艰难的考验，直到 1958 年才被恢复职务。

1969—1984 年他作为东方语言阿加西斯教授，在中华文明，特别是唐代文化和道教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贡献。他依据所掌握的中国史料深入研究了 8—10 世纪的唐代文学，设法再现唐人的思维、梦想和世界观。他的专著，特别是《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外来文明研究》、《朱雀：唐代南方的景象》、《珍珠海岸——古代海南岛》、《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婆雨女》和《步虚：唐代奔赴星辰之路》等，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与费正清的观点不同的是，他坚信语言技巧在汉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作用。

20 世纪 70 年代薛爱华开始关注柏克莱女学者的地位平等问题，成功地帮助了那些能力已经达到教授水准但因为委任授权障碍仍然不公平地被作为讲师对待的女学者晋升。此外，他还领导了一项打破性别藩篱改变男女不能一起用餐的状况。

薛爱华喜欢咬文嚼字。他的学生入学后就发现写论文不能说“大概

其”，必须弄清楚一位中国诗人描述的到底是杜鹃花还是牡丹花，因为对于唐代读者来说杜鹃花的含义与牡丹花的含义完全不同。他常常强调雪莱创作的《云雀颂》绝对不是《火鸡颂》。他在一次与同行的谈话中谴责了用英式符号代替人名和地名翻译的陋习，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汉学布丁中无法消化的面团”。在柏克莱教汉学课程的老师都承认学生——尤其是优秀生——的期中作业和论文中有薛爱华的影响存在。①

薛爱华的兴趣非常广泛。他喜欢收藏有亚瑟·拉克姆（Arthur Rackham）插图的图书。他爱听音乐，尤其爱听肖邦的曲子，对于中世纪的教堂建筑也很有研究。他的戏剧鉴赏力非一般人可比，曾多次参加圣诞节晚会的演出。他常和妻子菲利斯·布鲁克斯（Phyllis Brooks）到热带地区旅行，观赏异邦他乡的野生动物。他去世前一个月还去过安哥拉。

1984 年薛爱华退休时曾被授予了学院讲座教授的最高荣誉称号，②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校外职衔是 1975—1976 年被推选为美国东方学社社长一职。

1991 年 2 月 9 日薛爱华患肝癌去世。1940—1985 年他先后出版了 13 部专著，发表了 110 余篇论文、40 余篇译文和书评，其中主要的著述有：

《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外来文明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 年）。

《珍珠海岸——古代海南岛》（Shore of Pearls：Hainan Island in Early Times，1970 年）。

《女神：唐代文学中的龙婆雨女》（The Divine Women：Dragon Ladies and Rain Madames in T'ang Literature，1973 年）。

《步虚：唐代星辰之路》（Pacing the Void：T'ang Approaches to the Stars，1977 年）。

《唐代的茅山》（Mao Shan in T'ang Times，1980 年）。

《时间之海市蜃楼：曹唐的游仙诗》（Mirages on the Sea of Time：The Taoist Poetry of Ts'ao T'ang，Floating World Editions，1985 年）。

---

① James Cahill *et alii* ：*Edward H.Schafer* ，*Oriental Language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Memoriam 1991，pp. 184—185.

② 美国大学的“讲座教授”或“研究教授”（Research Lecturer）是由若干权威专家组成的评议会，对拥有崇高学术地位或有重大研究成果的教师所授予的教席名衔。虽然各大学的具体规定不同，但授予对象都是拥有较高学术地位的学者。

《朱雀：唐代南方的景象》(The Vermilion Bird：T'ang Images of the South，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年)。

《吴筠的步虚词》(Pacing the Void by Wu Yun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 Studies 41，1981 年)。

(十四)哈佛大学东亚和中国研究的领军人物史华慈

史华慈(Benjamin Isadore Schwartz，1916—1999)出生于一个美国犹太移民家庭，萧条时期结束后全家由东波士顿迁往多切斯特。他因为聪明好学获准就读于波士顿拉丁学校，1934 年进入了哈佛大学。虽然获得了奖学金资助，但是他仍付不起住校费用，只得每天走读，中午吃方便午餐充饥。1938 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哈佛大学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40 年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获得了硕士学位。在就业艰难的情况下，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替补教师的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史华慈奉派学习日语，1942—1946 年在华盛顿美国通讯兵情报部服役，负责对日军情报的接收和解码。美军据日时期，他被晋升为上尉，担任大阪日刊的检查工作。1946 年退役后他重返哈佛大学，专攻东亚研究。他一度试图学习佛教，但必须掌握多种亚洲语言，于是改选近现代中国研究。当时费正清正看好此项研究，竭力鼓励年轻人通过研读各类汉籍对中华文化进行探索。史华慈在哈佛大学获得了东亚研究硕士学位后，又继续研修中国历史和语言博士学位课程。1950 年他应聘留校任教于政府历史系。他从助理教授(1951 年)、副教授(1956 年)一直到迁升到教授(1960 年)，工作非常认真，生活也非常充实。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赋予了他许多优秀品质和预见能力。

史华慈是哈佛大学东亚和中国研究项目的领军人物。1964—1965 年他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远东语言、历史和哲学博士学位委员会主任，以及教育哲学博士学位委员会主任。1974—1975 年他被聘任为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系博士委员会主席，还应邀担任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1974—1977 年他兼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1978 年和 1981 年他两度来华，先后访问了北京、西安、吉林、长沙、上海和广州等省市。1998 年 1 月他被授予美国历史学会“学者荣誉奖”。

史华慈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他三个治学阶段的代表性思想史著作

中：一、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为主题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二、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为主题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三、以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为主题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史华慈是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是他1950年完成的一篇博士论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及革命战略和贡献的总结介绍，他分析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主流意识与毛泽东思想的密切关系，明确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独立于苏联控制之外，中国人以斗争赢得了自己政权的建立。他把思想史与中国革命史的两大脉络贯穿于分析和论证之中，以便于外国读者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20世纪50年代初史华慈还和费正清等学者联合编撰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其编辑指导思想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的主旨是一致的。

1964年史华慈撰写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另一部重要专著。作者通过分析严复（1853—1921）早年译介的几部欧洲哲学著作，探索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保持社会张力和政治活力的思路和方式。自由竞争赋予了新兴资产阶级改变百孔千疮社会弊端的勇气，与中国圣贤以教条和习俗规范平民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希望这样的比较探讨有助于分享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经验。

1968年史华慈出版的《共产主义与中国：变革中的意识形态》是他的一部中国研究论文集，涵盖了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国现代化和毛泽东思想等重大选题，其观点在西方汉学界有一定的代表性。

1980年3月22日，史华慈在就任亚洲研究学会主席的演说中，以《亚洲研究是一门重要的学科》（Asian Studies as a Critical Discipline）为题畅谈了学会的历史进程，专业宏愿和对未来的美好期待。1990年他的弟子为他编辑和出版了专辑《跨越文化的观念：献给史华慈先生的中国思想论文集》（Ideas Across Cultures：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r of Benjamin I. Schwartz），这其中也包括对史华慈有关人类文明和人类普遍关怀研究的肯定。

1985年出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是史华慈长期研究的学术观点在当代西方社会和学科中的运用总结。他在阐述中国古代思想的现代跨学科应用的同时，也表现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应用价值。他不否定中外文化中存在的共同趋向，在语言表达上十分严谨和准确，努力把新思维

新观点传达给读者。在面对思想和道德新挑战的同时,广大读者也以热烈反馈参与新一轮的争论和探索。

史华慈在近50年漫长的学术和教学生涯中,勤勤恳恳地做学问,慷慨无私地帮助学子们探索新思维。1987年从教师岗位退休后他仍然关注社会生活和人才的培养,充满责任感和学人良知。1997年他荣获美国历史学会的杰出学术贡献奖(Scholarly Distinction)。

史华慈的好友林同奇在一次接受《东方早报》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说:希望史华慈的思想宝库可以在中国得到更进一步地开发,因为他一直认为"史华慈不只是一位思想史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思想家……史华慈的思想资源包括轴心文明的各个大宗教思想传统,如中东的犹太教、基督教,中国的儒家、道家,印度的佛教、印度教,当然还有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传统等,视野十分开阔。史先生的记忆力特别强,又能够使用十几种文字,因此在各个文明的研究之间游刃有余。史华慈一生都在探讨一个问题:'人的全部带有悲剧性的复杂性',这是他人文寻求的主题。这种探讨赋予他的思想以深度。"①

史华慈的主要著述有:

《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兴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51年)。

《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edited, 1952年)。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n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年)。

《共产主义与中国:变革中的思想意识》(Communism and China: Ideology in Flux, edit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年)。

《五四运动的思考:一次研讨会》(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Symposium, edit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年)。

《中国古代思想研究》(Studies in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 edited, 1979年)。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① 《林同奇谈史华慈》(对《东方早报》记者的电话专访),载《东方早报》2006年12月15日。

Harvard Belknap Press,1985 年)。

《中国文化价值观》(China's Cultural Values, Tempe. Ariz.: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1985 年)。

《中国及其他》(China and Other Matt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年)。

《中国与当今千禧年——天下新事》(China and Contemporary Millenarism——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1999 年)。

(十五)关注儒家思想与西方价值理念对话的狄百瑞

1941 年狄百瑞毕业于哥伦比亚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前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在太平洋战区的美国军情处服役。1948 年他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后来他就读于哈佛大学,以《明夷待访录》为选题撰写博士论文,于 1953 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曾经在燕京大学和岭南大学做过研究,结识了陈荣捷等学者后开始倾心于儒学研究。

1971—1978 年狄百瑞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努力调整校内主干课程,其中包括非西方文明的名著选读课程,创建了东亚图书馆新馆、人文研究中心及其辖下的人权研究中心。他还担任过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及区域中心主任,梅森讲座教授(John Mitchell Mason Professor of the University)。1969—1970 年他被推选为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1978—1986 年担任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主席,1974—1999 年任美国文理和哲学协会院士。

狄百瑞是东亚语言和文化教授,人称"费正清第二"的美国汉学泰斗级人物。他的研究兴趣主要是以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儒学为核心的东亚宗教和思想传统。他把新儒学研究引入美国学术界,探讨在通识教育和主流学科中确立全新儒学的构想,编撰了许多东亚(主要是中国和日本)文学、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书籍,十分关注西方的价值理念和儒家思想之间的沟通。中国、日本和美国多位学者曾先后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开设新儒学思想专题研究课程,在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和各类基金会的赞助下举办过元代思想讨论会、17 世纪中国思想讨论会和明代思想讨论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数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东方学问,通过《荀子》和《孝经》等经典会读形式,把研究的问题与现代性挂钩。他在所编撰的 25 部著作中重点探

讨了中国民间结社和人权问题。

狄百瑞注重通过对比方法来研究东亚儒学。他认为把明清时代的中国与李朝时代的朝鲜和德川时代的日本放在一起对照才能发现新儒学中的共同元因素,对儒学的博大精深才能有一个深刻全面的了解。

《中国的自由传统》是1982年狄百瑞任香港中文大学"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时的演讲论文集,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书中以宋明两代儒者史料为主要引征依据,对中国儒家传统中的自由元素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以发掘中西文化之间的共性价值。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就指出朱熹治学的方式不仅通过师生之间的交谈,还借助于学子之间的问辩探讨,在知识传授中充分调动他们自由分析和判断的积极性。客观上讲,儒家的个人人格修养普遍倾向于自主和自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此从狄百瑞的论证中读者既可以感知到中国儒家传统精神世界的独特性,同时也可以感悟到这种传统精神的历史局限性。其实狄百瑞最为关切的是,儒家信奉的自由自任是否与传统价值一致的问题,以及如何以此指导个人独特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令人感动的是,这样的真诚期待竟发自一位西方汉学家的内心,至于他是否夸大了儒家自由传统与西方自由思想之间相似性的任何怀疑,就不那么重要了。

1988年出版的《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以上古至秦汉的古典时期、佛教传入时期、宋明新儒学时期、近代东西文化碰撞时期和后儒学时期为主线,探索各种思潮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中的基本动力。孟子以"人性善"表达了对人类社会前景的乐观估计,而荀子却以"人性恶"的假设表达了对于礼制式微的忧虑。在作者看来,荀子并没有因为对人性的消极评价而提出加强法制和道德建设的要求,而是期待克己复礼目标的实现。虽然孟子和荀子对于人性的界定绝然相反,但是在对礼教的法典化方面,他们的观点并不冲突。综观全书似乎是对于历史的回溯,其实作者的论述却极具前瞻性,描绘了他所向往的未来世界的文明模式。

1991年出版的《儒家的困境》是狄百瑞本人颇为看重的一部著述,正文共六章:圣王与先知;《论语》中的君子;帝国的圣人与君子;理学正统先知思想和中国专制;程朱理学的宣传者方东树(1772—1851);先知与民众。该书分析了在东亚经济腾飞背景下复兴儒学的可能性,探讨了儒家思想是否有利于东亚的崛起,儒家的人格是否有助于现代社会的发展等问题。作者以《旧约》中的先知与《论语》中的君子进行比较,把君子和帝王之间的

关系视为中国政治中重要的话题，提出了经济复兴不等于儒学复兴，儒学复兴不等于民主建立的观点。君子的力量源于替百姓和上天代言，君子没有得到百姓的托付也没有获得上天的支撑就是儒家历史上最大的困境。

繁忙的行政工作并没有影响狄百瑞对学问的追求。1969 年他荣获哥伦比亚大学优秀教师奖（Great Teacher Award），1987 年荣获马克·范·多伦优秀教学奖（Mark Van Doren Award for Great Teaching）。他一生著述等身，却也不忘忙中取乐。大概很少人知道，从 1953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以来狄百瑞就从来没有错过一次观看哥伦比亚雄师足球赛的机会。

狄百瑞的主要著述有：

《印度传统资源》（Sources of Indian Tradition，1957 年）。

《东方古典文献研究法：通识教育中的亚洲文学和思想》（Approaches to the Oriental Classics：Asian Literature and Thought in General Education，1959 年）。

《中国传统资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Volume 1，1960 年）。

《亚洲文明研究法》（Approaches to Asian Civilizations，1964 年）。

《东方古典文献指南》（Guide to Oriental Classics，1964 年）。

《日本传统资源》（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Volume 1，1964 年）。

《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佛学传统》（The Buddhist Tradition in India，China and Japan，1969 年）。

《明代思想的自我与社会》（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1970 年）。

《印度教传统：东方思想导读》（The Hindu Tradition：Readings in Oriental Thought，1972 年）。

《新儒家揭秘》（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1975 年）。

《原则性和实用性：新儒家及其应用研究文集》（Principle and Practicality：Essays in Neo-Confucianism and Practical Learning，1979 年）。

《新儒学正统观念与心脑研习法》（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1981 年）。

《元代思想：元蒙时期的中国思想与宗教》（Yüan thought：Chinese Thought and Religion under the Mongols，1982 年）。

《中国的自由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1983 年）。

《韩国新儒学的兴起》（The Rise of Neo-Confucianism in Korea，1985

年)。

《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East Asian Civilizations: a Dialogue in Five Stag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年)。

《新儒学的思想》(Message of the mind in Neo-Confucianism, 1989 年)。

《形成阶段的新儒家教育》(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 1989 年);

《亚洲古典文献研究法》(Approaches to the Asian Classics, 1990 年)。

《为己之学:新儒学思想中的个人论集》(Learning for One's Self: Essays on the Individual in Neo-Confucian Thought, 1991 年)。

《儒学的困境》(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年)。

《盼天明:王子的策划》(Waiting for the Dawn: a Plan for the Prince, translation, 1993 年)。

《韩国传统资源》(Sources of Korean Tradition: Volume 1, 1997 年)。

《儒学与人权》(Confucianism and Human Rights, 1998 年)。

《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 translation, 1998 年)。

《亚洲的价值取向与人权:一个儒家社群主义视角》(Asi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 A Confucian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年)。

《高贵与礼仪:亚洲领袖和公众人物之理想》Nobility and Civility: Asian Ideals of Leadership and the Common Goo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年)。

《哥伦比亚活遗产》(Living Legacies at Columbia, 2006 年)。

(十六)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开拓者与先行者列文森

列文森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就读于波士顿拉丁学校和哈佛学院(哈佛大学前身)。1939 年夏天他前往荷兰莱顿大学短期学习,1941 年 6 月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哈佛学院。1942 年他加入了美国海军预备役,在哈佛大学日语学院和科罗拉多大学学习了一年后赴美军太平洋战区以文书军士(yeoman)资格服役四年。1946 年他退役后返回哈佛大学继续学习,并分别于 1947 年获历史硕士学位,1949 年获历史博

士学位。

1951 年 9 月经费正清推荐，他开始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他的汉学研究成绩斐然，因此累获各基金会的资助。1954—1955 年他获得了富布赖特基金会研究奖金，1958—1959 年获得了行为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奖金，1962—1963 年获得古根海姆研究奖金，1966—1967 年又获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研究奖金。他曾荣任萨瑟历史讲座教授（Jane K. Sather Professor of History）。

列文森的亚洲经历对于他的学术发展影响深刻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同辈美国中国历史学家。与史华慈等人一样，东方的军旅生活所赋予他的不是职业选择而是一种机遇。他通过应征参战，在所罗门群岛和菲律宾亲历了前线的军事行动，完全不同于早先在东亚经商或者传教的外国人的阅历。尽管对于犹太教的虔诚信仰可能使他被误认为与那些东渡亚洲的新教传教士同属一类，但是他对于东亚思想史的浓厚兴趣和热情却是那些传教士所没有的。

应该说他初学日文和日本文化时态度是认真和投入的，不过当他发现日本的许多传统都是源于中华文明时，就把汉语和中华文化作为自己主攻的学术目标。后来有人问及最初是什么因素吸引他研究中国历史时，他回答说是中国历史的独一无二之处，其中有许多西方人尚未开拓的领域。

列文森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先行者。他才华横溢，观点见解深刻，他的文章典雅深沉的叙事风格曾经使众多读者倾倒。在西方把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提高到一个全新的理论高度，其中有他的一份贡献。

列文森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兴趣始于他对梁启超的研究。《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原是他的博士论文，1953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59 年再版，是国外有关梁启超研究最有影影响的专著，主要探讨了梁启超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列文森认为每个人都在情感上忠实于历史而在理念上则信守价值，二者尽可能完美的结合是他们的奋斗目标。然而在外患不止的 19 世纪，历史和价值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却被无情地撕裂了。他认为应该将个人的理智和情感加以区分，当梁启超看到他国的价值时有可能在理智上疏离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但是他在情感上却仍然倾向于中华文化。把梁启超的思想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放大来考察，就是具有国际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与自己民族文化之间的感情问

题,在近现代历史上其重要性和普适性一直为许多学者所关注。列文森是否属于与进步西方对抗的近代中国的同情者还需更多史证来支持,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和见解无疑以敏锐和深刻的特点震撼了读者,加深了他们对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和时代特征复杂性的认识。

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分析并揭示了中国作为儒家文明国度在现代历史上的命运。该书的问世改变了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中研究者的知名度排列,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什么近现代历史上的中国儒家传统受到了如此强烈的冲击,而佛教和伊斯兰教等其他文化传统在许多亚洲国家却保持了衔接和更新?为什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能够在"打倒孔家店"的运动中获得力量和启动?列文森以一位历史哲学家的犀利目光从政治制度、儒家文化、社会习俗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具体分析了明清以后的社会变革,以及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如何对儒家传统进行再认识,展示了现代中国文化和政治变革的艰辛历程。虽然他认为现代儒学已经降格到历史博物馆陈列的水平,儒学与君主专制几乎是同一概念,在列强横行的社会背景中已经逐渐消解,但是这实际上反映了部分美国学者对于汉学研究与现代性挂钩的关切。长期以来在一些知识阶层心目中"西方"似乎代表着科技进步、商业发达、功利主义和现代化,而主张"君子不器"的儒家学说却往往被理解为"传统"、"礼教"、"封闭"和"民族主义"的代名词,使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无时不感到纠结。

列文森的生命跨度没有为他提供撰写很多著述的机会,但是他在自己的专著中已经提出了诸如历史与价值、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个人与民族之类令人深思的问题,无论对于中国知识界还是国际汉学精英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梁启超及其时代知识分子所思考的问题,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他要求证的不仅仅是不同文化或者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也是时代和历史发展的方向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成员的使命定位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对传统和创新、中国与西洋、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等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中外历史学家为此进行长期的探讨和求索实属必然。

列文森不仅精通历史学,对于哲学、社会学、美学和艺术也有独到研究。虽然他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无论在世时还是去世后都能在学术界听到批评他的声音,但是对于他的敬重还是多于挑战。为纪念他的学术成就,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理事会还专门设立了"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为

所有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作者呐喊助阵。

1969 年 4 月 6 日列文森一家在盖尔恩维莱度假时山洪暴发，在乘船返回途中舟覆落水，他的孩子因为穿着救生衣获救，而他自己却不幸溺亡，年仅 49 岁。两年后他的遗著《现代中国：解读文集》出版，汉学家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Jr.，1937—2005）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对他的学术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

列文森主要著述和编辑的文集有：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1953 年）。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A Trilogy，1958-1965 年）。

《欧洲扩张与亚洲的反例证》（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ounter-Example of Asia. 1300-1600，ed.，1967 年）。

《中国：汉初至汉末的历史解读》（China：An Interpretive History，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Fall of Han，Franz Schurmann，1969 年）。

《现代中国：解读文集》（Modern China：An Interpretive Anthology，1971 年）。

《革命与世界主义：中西方舞台》（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1971 年）。

三、美国多科与多元化汉学综合研究时期（1946—197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界以“追究失去中国的责任”为口实掀起了麦卡锡主义反共狂潮，与中共有过接触和往来的一些美国部门、组织和学者先后受到了审查。例如 1944 年 7 月曾陪同以包瑞德（David Dave Barrett，1892—1977）为首的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考察的谢伟思、1948—1950 年任美国驻北京总领事的柯乐博（Oliver Edmund Clubb，1901—1989）和曾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的范宣德等外交官都遭到调查，拉铁摩尔和费正清等学者被多次传讯和审讯。许多美国汉学家和中国通都尽力回避研究中的敏感政治问题，其中一些人把自己的学术兴趣转向了中国传统文化研

究。1958年通过“国防教育法案”以后，美国的汉学研究更是雪上加霜，只有史华慈等少数学者在“俄罗斯研究”的掩盖下没有完全停止自己的中国研究。由于对中国缺乏直接的了解，研究人员除了依靠中国的官方报纸和公开出版物的资料进行汉学研究外，也通过秘密途径得到的官方文件或者从采访来华访问者得到的信息进行汉学研究。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深感开展中国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美国政府和各种基金会开始为各项汉学工程注入了大量资金，鼓励有才华的青年选择汉学专业，使美国的汉学研究和教学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1960—1972年福特基金会提供的资助多达一亿多美元。费正清以哈佛大学为基地，将“地区研究”模式推广到全美乃至整个西方汉学界。其特点是：关注近现代中国，服务于政治和商业化的需要；着眼于学科建设，注重学术提升，将涉科范围从人文科学扩大到社会科学领域，同时兼顾语言技能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换代。

一些美国大学增设了中国哲学和宗教课程。1955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建立是美国当代汉学体制化的标志，专业化、团队化、国际化与跨学科、跨文化和跨时代研究相结合是当代美国汉学的一大特色。

1960年之后美国的汉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变化。学者们对于中国人文学科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语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和文学研究中脱颖而出。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和宗教学家都在自己学科领域开展综合研究。具有真才实学的年青学者大批涌现。但是学者们普遍较多关注中国的特殊性（Chinese exceptionism），而淡化了汉学研究中的理论体系和对比分析。专职从事中国共产党和高层政治领域研究的部分美国学者，因为出身于传教士家庭或者个人在华经历仅限于新中国成立之前，著书立说时难免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所引用的部分资料和数据因为未得到证实而缺乏可信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社会科学中出现了三个相互交叉的学术倾向：甲、行为主义革命（Behaviorist Revolution）；乙、现代性理论（Modernity）；丙、非西方跨学科研究（Nonwester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这是具有标志性和典型性的美国学术发展，对于汉学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

很多美国大学的专家和学者都积极响应了1960—1962年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组织的多次汉学研讨会。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华盛顿大学

在中国研究方面都是最活跃的院校。1961 年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还成立了一个由 20 多名学者组成的社会人类学小组，专门讨论加强地区研究问题，倡议在中国研究中采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科际综合手段，并提出了硕士学位以地区研究为主、博士学位以学科为主的研究生培养方案。

1968 年费正清在就任第 83 届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呼吁学术研究应当联系现实并具有实际效用，认为学者的责任是教育公众并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1969 年他在另一次题为《70 年代的任务》的演讲中谈到了“忽视中国实际情况的危险”，表现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汉学家对于冷战思维影响汉学研究的忧虑。此后美国汉学界研究选题和风格的变化验证了中美国家关系的改善与汉学求真务实方向之间的密切关系。

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政府和各类基金会对于汉学研究的直接投资逐年减少，研究重心因而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更多地关注学科院系和商业化运作，以及美国汉学家所关注的其他问题。

（一）关注文化差异在第三世界政治现代化中作用的白鲁恂

白鲁恂出生于中国山西省汾州，父母亲都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他曾先后在汾州和北平上小学和中学，接受过中国初等国民教育。

1943 年他从美国卡尔顿学院毕业后参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海军陆战队少尉情报官身份再次来华。两年后他与卡尔顿学院的同学玛丽小姐（Mary Toombs Waddill）组建了家庭。1947 年他师从耶鲁大学政治文化专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1911—2002）学习比较政治学，研究国际事务中的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干预。他的另一位老师哈罗德·拉斯维尔（Herold Lasswell，1902—1978）是美国“行为主义革命”的领军人物，长期致力于将心理学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之中。白鲁恂以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军阀体系的史料撰写了博士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后留校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直至 1952 年。

1953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赞助下，他和其他政治学研究者前往马来亚进行了六个月的田野考察，了解当地华人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的心理状态，以及共产主义对欠发达地区的影响问题，最终以专著《马来亚游击队的共产主义及其社会政治意义》结项。该书展示了作者

通过心理学因素探索分析思想和政治问题,从而揭示了观察政治现象的行为和感情的深层价值取向。这种以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对国际关系的探讨,开拓了汉学研究的新思路。

在麦卡锡时代他态度鲜明地抵制强加于政治学的反共思潮。1956 年他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最初在该校国际研究中心,后来参与了政治学系和香港研究中心的创建,还先后执教于马来亚和缅甸,培养出许多美国政治学者和政治家。

冷战时期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面临两营对垒的世界形势和自身经济危机,需要动员国内政治精英、知识阶层和关心国家命运的大众,就民族利益目标和政治策略达成共识,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每日媒体的内容告诉读者,冷战既是政治家、军人和外交官的课题,也是学术精英和社会科学家无法回避的解读项目。

1956 年白鲁恂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从此他作为一位政治学教授和思想家的学术生涯,与这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理论中心和政治运动策源地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个由政府资助的政策导向和外交军事研究机构汇聚了美国各学科的代表人物,努力就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是否为战后国际政治的决定性因素的问题达成共识,这意味着冷战的成败与美国能否有效地干预第三世界现代化的方向和进程关系密切,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思考制定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和镇压叛乱的策略。白鲁恂以亚洲问题专家的身份,被推上了平叛策略的首席理论家宝座。1961 年普林斯顿大学曾召开一次讨论第三世界国家内战的研讨会,白鲁恂提交的论文是《造反的根源和叛乱的肇始》,后来竟成为美国“平叛内乱”的参考文献。此后他还常常为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开发署和兰德公司出谋划策,并曾在国防部组织的平叛研修班授课。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是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的思想库。1965 年白鲁恂联合多名学者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支持约翰逊政府对越宣战的公开信,客观上为美国的亚洲冒险摇旗呐喊。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在美国掀起的反战运动中,白鲁恂被国内外舆论界指责为犯有反人道罪,并非偶然。随着美国在越战中的败北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白鲁恂的现代化理论家的光环逐渐暗淡了下来。

中国革命是美国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选题,也是学者们认识中国的理论资源。虽然白鲁恂有时被视为一位“大胆的思想家”(bold thinker),例如

他曾经不恰当地用儿童心理学的思路来解读毛泽东年青时代的叛逆心理，但是他的汉学观点却为美国理论界许多人所追捧。1968 年他的专著《中国政治精神：对政治发展中的权威危机的心理文化分析》一投入书市就为读者所青睐。他认为中国政治的难题在于无法协调中国文明史上的丰功伟业与当代大众进步要求的关系，权威危机（Authority Crisis）是其关键。战乱频乃的社会引发经济停滞和连续的自然灾害，在出现一个好人政府来维持稳定之前，外族入侵和农民起义必然加剧动乱和分裂，这几乎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儒家思想熏陶中广大平民百姓最熟悉的教条是忠君和孝悌。由此看来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中国文化心理资源的不足。白鲁恂的分析好像建立在中国国情和儒家学说基础之上，似乎丝丝入扣，但是却被一些现代理论家讥讽为“简单化”，因为他没有正视中国的难题与西方列强对于中国军事、文化和经济入侵的因果关系。

在同时代的美国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中，白鲁恂的学术生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1966 年他出版了《政治发展面面观分析研究》一书，显示了他在比较政治学和国际事务中行为学研究的才能。他曾协助阿尔蒙德创建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比较政治学委员会，从 1963 年起他开始接替阿尔蒙德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他的丰富阅历、崇高声望和学术地位对美国几代政治学家都有较大影响。他曾担任包括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内的几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顾问。1988—1989 年他被推选为美国政治学会（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主席。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白鲁恂曾在自己主持的对外关系协会内设立了一个中国研究项目，探索与中国建立“更具建设性关系”的可能性。1966 年他参与创建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1972 年作为副主席的他参与了设计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乒乓外交”。1981 年他的《中国政治动力》一书出版，试图对中国共产党内的所谓“派系”问题做全面研究。晚年的白鲁恂仍旧是一个笔耕不辍的中国问题专家。

他的主要著作有：

《马来亚游击队的共产主义及其社会政治意义》（Guerrilla Communism in Malaya,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Meaning, co-authored with Frederick W. Mote, 1956 年）。

《政治、人格与民族建构：缅甸形像的寻找》（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Nation Building: Burma's Search for Ident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年)。

《政治发展面面观分析研究》(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 Analytic Study, 1966 年)。

《东南亚政治体系》(Southeast Asia's Political System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 1967 年)。

《中国政治精神:对政治发展中的权威危机的心理文化研究》(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M.I.T.Press, 1968 年)。

《政治学与区域研究》(Political Science and Area Studies: Rivals or Partners, 1975 年)。

《毛泽东:领路人》(Mao Tse-tung: The Man in the Lea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6 年)。

《印度尼西亚的政权与交流》(Political Power And Communications in Indoni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年)。

《中国商务谈判风格》(Chinese Commercial Negotiating Style, Cambridge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1982 年)。

《中国政治动力》(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Publishers, Inc., 1981 年)。

《亚洲的权力与政治:权威文化面面观》(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1985 年)。

《再评文化大革命》(Reassess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No. 108, Dec., 1986 年)。

《官员与干部:中国的政治文化》(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年)。

《中国谈判风格:商务手段与文化原则》(Chinese Negotiating Style: Commercial Approaches and Cultural Principles, 1992 年)。

《中国简介》(China: An Introduction, co-authored with Mary, 1998 年)。

(二)美国明清历史和文化研究的领军学者牟复礼

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出生于美国普莱恩维尤·内

布拉斯加城，家中有兄弟姐妹10人。

1943年他在美军空军部队服役，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就读军校，考虑到他曾学过一年汉语，空军部队就派遣他到哈佛大学学习。他曾参加赵元任主持的哈佛大学美国陆军特别训练班，师从杨联陞（Yang Lien-sheng，1914—1990）和周一良（1913—2001）等学者。1944年他以无衔军官（noncommissioned officer）身份进入战略服务署（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战时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服役，曾在成都、北平和天津担任军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曾分别在金陵大学与燕京大学学习历史学，师从向达（1900—1966）、启功（1912—2005）和顾颉刚（1893—1980）等中国学者，后在专家王崇武（1911—1957）门下研习明史。1948年他获中国历史学士学位，1949年在美国驻华使馆担任汉文秘书。

1950年牟复礼返美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继续学习，1954年以一篇研究陶宗仪《辍耕录》的论文获博士学位。同年在台湾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次年到荷兰莱顿大学任富布赖特交流基金会讲师。

1956年牟复礼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任东方语言文学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助教，1959年任副教授，1963年晋升为教授。最初几年他与几位同事在东语系设法改进了教学设施，开设了高强度的汉语课程，扩大了东亚图书馆的中国文献和要籍收藏。20世纪60—70年代他和日本历史学家马里于斯·詹森（Marius Berthus Jansen，1922—2000）并列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发展主将，1961年曾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获得资助，1963年获得卡内基公司财务支持，1965年又获美国教育署拨款，还两次获得古根海姆研究奖金。1968年他以极富远见的目光创办了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经过数十载耕耘，成为与哈佛大学费正清汉学研究所齐名的海外汉学研究机构。

牟复礼是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历史，特别是明清历史专家。他撰写、编辑和翻译了多部专著和论文，以及有关中国古代哲学和军事史方面的文章，涵盖了有助于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史的中国城市（如苏州和南京）、中国诗歌、绘画和其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

1980年应聘到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崔瑞德（Denis Crispin Twitchett，1925—，又译杜希德）决定与牟复礼和费正清联手编撰《剑桥中国史》丛书。原来他打算和牟复礼合作编撰另一部供大学生使用的中国通史教材

《中华帝国史:900—1800》,因为与《剑桥中国史》冲突,改由牟复礼完成全部史稿。该书对晚唐至清嘉庆错综复杂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于199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与此同时牟复礼还完成了《剑桥中国史》系列的第五、六、七、八和九卷的构思和编写。该书正文部分900多页,叙述了从晚唐五代到乾隆朝之间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作者以五代作为全书的开篇,体现了他对中国史变迁脉络的整体理解。对于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他具有特别敏锐的眼光,并以具象化的描写和独到分析,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解读。他通过宋代的欧阳修(1007—1073)和朱熹(1130—1200)、元代的许衡(1209—1281)、明代的方孝孺(1357—1402)和王阳明(1472—1529)等人展示了所谓"忠诚反对派"的政治文化,认为当时的制度不允许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性思考,到清代嘉庆朝几乎没有士大夫敢于充当独立思想者的角色。这一时期许多文学作品都反映了对懦弱无能官僚的蔑视,以及对贪污腐败的讥讽。可以说该书集作者一生研究之大成,可读性和学术性同时兼备。

牟复礼是东亚讲座教授,也是一位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领军学者,退休前还为《剑桥百科全书》撰写了23条有关明史条目。他在学术界非常活跃,是中美学者交流委员会的奠基人之一,1974—1978年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中国文明研究委员会主席,1963—1965年还兼任泰国教育部顾问。

他的学生朱鸿林(Hung-Lam Chu)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 牟复礼教授有关中国文献、历史、哲学、文学、语言和艺术的综合研究,对于通过深入中国传统文化来了解现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独一无二并且难以超越的。他利用诗歌和文学专辑来研究14—17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及其生活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达到了他的同辈梦寐以求的高超学术水平。他的遗著《中华帝国史:900—1800》将成为人们持久学习、完美学术规范和以远见卓识的目光进行评鉴的经典,鼓励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①

① *Obituary: Frederick Mote, Princeton Bulletin*, Vol. 94 No. 20, March 21, 2005.

他的同事和学生高度评价他慷慨地与他人分享中国知识的胸怀。“他所写的一切都有据可查，可以信手拈来，全装在脑子里，不必查阅笔记。”近东研究讲座教授诺曼·伊茨科维奇（Norman Itzkowitz，1931—　）回忆说。① 第一次见面时诺曼·伊茨科维奇曾以为他是一位晚辈同事，但是很快他们就平等友好相处。“牟复礼将永远活在有幸与他结交的人们心中，”他说。

1950 年牟复礼与陈晓兰结婚，婚后 55 年美满幸福。1987 年退休后牟复礼隐居科罗拉多的小羊山中颐养天年，但是每年春天仍以荣休教授身份回校参与学术活动。2005 年 2 月 10 日在长期遭受病痛折磨后去世，终年 73。

他的主要著述和编著有：

《中国政治思想史基础》（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translation，1971 年）。

《剑桥中国史》（明代卷上下册）（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7—8，The Ming Dynasty，1368—1644，edited by Mote and Twitchett，co-edited with Denis Crispin Twitchett，1988 年）。

《中华帝国史：900—1800》（Imperial China 900-1800，1999 年）。

（三）根据《今本竹书纪年》研究夏商周断代问题的倪德卫

1946 年倪德卫毕业于哈佛大学本科，曾受业于杨联陞和洪业，专修中国史学和中国哲学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华盛顿担任日文翻译，1953 年获哈佛大学中文博士学位。

1948—1988 年倪德卫在斯坦福大学教授哲学和古汉语，教龄长达 40 年，曾同时兼任哲学系、宗教研究系和东亚语言系教授。退休前他被聘任为沃尔特·Y·埃文斯-文茨东方哲学、宗教与伦理学讲座教授（Walter Y. Evans-Wentz Lecture Professoor），还担任美国东方学学会西部分会主席和美国哲学学会太平洋分会主席。

倪德卫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做过长期深入研究，文献学知识丰富，早期学术研究偏重于中国哲学的知行观（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and

① Obituary：*Frederick Mote*，*Princeton Bulletin*，Vol. 94 No. 20，March 21，2005.

"Action")。他的代表作《章学诚的生平与时代》出版于1966年,次年获巴黎高等学院的儒莲奖。他对王阳明、戴震(1724—1777)和章学诚(1738—1801)等明清哲人的研究论述精辟,观点独到,尤其是在戴震与章学诚之荀学渊源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令人耳目一新。他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将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应用于中国思想的研究之中。

1973—1974年倪德卫曾获古根海姆研究奖金的资助到英国牛津大学从事研究,写了一部题为《儒学之道:中国哲学探讨》的专著,收录了他的多篇论文和1976年在美国哲学学会太平洋分会的演说《〈孟子〉中的动力和道德行为》(Motivation and Moral Action in Mencius)以及1980年就任该会会长的演说《二本还是一本?》(Two Roots or One?)。该书共374页,十七章,分别为:第一章导言;第二章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德";第三章"德"的悖论;第四章"德"可以自学吗?第五章中国道德哲学中的金律之辩;第六章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意志无力(weakness of will);第七章《孟子》的动机和道德行动;第八章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哲学唯意志论;第九章"二本"还是"一本"?第十章《孟子·告子上》;第十一章《孟子·尽心上》;第十二章论《孟子》的翻译;第十三章荀子论人性;第十四章王阳明的哲学;第十五章王阳明的道德决定论:中国的"存在主义"问题;第十六章 章学诚的哲学;第十七章两类"自然主义":戴震与章学诚。[①] 作者通过研究甲骨文探讨"德"的原始含义,进而对中西道德哲学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他对《孟子》的唯意志论倾向的分析,《孟子》墨家思想影响的考辩和原文英译的评析,以及对孟荀关系的探讨都显示出了他的深厚学养。

自1971年起倪德卫开始致力于甲骨文、金文和古代天文学的研究和著述,利用有关资料和《今本竹书纪年》对夏商周的断代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999年出版的《竹书纪年之谜》是他研究《竹书纪年》(又称《汲冢纪年》)的一部专著。西晋太康二年(281)盗墓者不准发现大批竹简埋藏于魏安釐王的墓中,每简长度为2.4古尺,缀文40。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勖以及中书令和峤翻译出土竹简。整理后的文字共13篇,按编年体编排,内容记录了从传说的夏朝到魏襄王(一说魏哀王)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据载该书早在在五代战乱中就已散佚。清代学者朱右曾搜集西晋以后有

① 倪德卫:《儒家之道:中国哲学探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关书籍和注疏中引用的《竹书纪年》文字，汇辑为《古本竹书纪年》，但引书皆断自北宋，靖康之后多弃而不取。明代嘉靖以后曾出现两卷本的《竹书纪年》，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Modern Text Bamboo Annals)。由于来路不明和体例差异，长期被斥为元明文人之伪作。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1952—　)等中外学者却对《今本竹书纪年》的真实性加以肯定，认为今本和古本在体例和文字上的差异，只因两书分属西晋时代前后两次竹简整理的不同版本。

倪德卫的《竹书纪年之谜》收录了他1983—2002年撰写的多篇专题论文，展示了作者从1979年以来对夏商周断代考察的方法、过程和发现，说明如果以对驾崩前帝的葬礼结束为换朝年限，仅凭《今本竹书纪年》就可以对断代进行判定。该书除“序言”(第1—3页)、“引论”(第4—7页)和“附录”(第193—260页)外，正文共分三大部分九章，分别为：第一章周兴商灭年代(第15—34页)；第二章三朝年表(第35—58页)；第三章正误：夏商周断代工程(第63—74页)；第四章三朝断代工程可采用的两种办法(第75—80页)；第五章芝加哥大学教授顾立雅讲义(第81—100页)；第六章呼吁召开《竹书纪年》研讨会(第101—112页)；第七章竹书的修复(第115—122页)；第八章竹书：从黄帝到晋武帝(第123—176页)；第九章年表的演进与竹书(第177—192页)。该书第三部分根据复原303枚(约占总数七分之五)原始竹书的夏含夷发现，证明《竹书纪年》的全部年表是战国时期对原始年表修改的版本，因此任何复原的尝试都必须首先对《今本竹书纪年》进行分析，可惜这一环节被忽略了。

倪德卫在一篇回忆60年学术生涯的文章中说他一生追求的目标有三个：

一、把早先两种似乎互不兼容的汉学研究领域融合为一：聚焦于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研究与侧重于现代中国及其对西方的反应。他的具体做法是对18世纪中国历史哲学家章学诚进行全面研究，以达到举一反三之目的。这一想法得益于中国思想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Chinese Thought)志同道合学者的影响。

二、寻找一种可让职业伦理哲学家与中国历史专家开展有效讨论的共同语言。他的想法体现在《儒学之道：对中国哲学探讨》一书中，为此曾获古根海姆研究奖金的资助。

三、作为文言文和哲学教师，他深感正确解读商代甲骨文和西青铜器

上的铭文的重要性。1979 年他发现《竹书纪年》有助于解读这类史料中的语言问题。但是过去一些学者曾把这部历史斥为“伪书”。如何证明这部文献的真实性并从中发现确切的历史信息,花费了他 20 年的时间。①

倪德卫的主要著述有:

《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üeh-ch'eng.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 年)。

《儒家之道:中国哲学探讨》(The Ways of Confucianism:Investigations in Chinese Philosophy. Chrisht Almighty. Van Norden, ed. Chicago: Open Court Press,1997 年)。

《西周年代研究》(The Dates of Western Chou,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3,1983 年)。

《早期中国文本:文献指南》(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Loewe & Michael ed., Berkeley: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1993 年)。

《竹书纪年之谜》(The Riddle of the Bamboo Annals, Airiti Press, Amazon,1999 年)。

《三朝年表解读》(The Key to the Chronology of the Three Dynasties.The Modern Text Bamboo Annals, Philadelphia: Department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99 年)。

(四)将地域分析技术应用于中国农村社会和经济研究的施坚雅

1925 年 2 月 14 日施坚雅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父亲是药物学家,母亲为音乐教师。

1941 年他就读的幽泉学院是一所以自律和自信方式开发学生心智的学校。两年后他加入了海军,在科罗拉多大学海军东方语言学院学习了一年半汉语。1946 年他转入康奈尔大学研修学士学位课程。1949 年他应聘担任康奈尔大学社会学教师,1951—1955 年任该校东南亚项目负责人,后晋升为研究助理。1954 年他以优秀硕士学位成绩留校攻读人类学博士研究生专业,师从洛里斯通·夏普(Lauriston Sharp,1907—1993)。1958 年他

① *David Shepherd Nivison* ,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1973.

受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助理教授，两年后返回康奈尔大学，1962 年晋级为教授。1965 年他任职于斯坦福大学，1990 年受聘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他的妻子苏珊·曼是一位中国历史学家，也同时受聘。这一阶段他的知名度逐年提高，学术活动日程安排几乎到超负荷程度，曾兼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杜克大学、日本庆应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香港大学客座教授。

1968 年施坚雅入选《美国名人录》，1969 年被授予古根海姆学者，1980 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同年以副团长身份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经济史讨论会。1982 年的《世界名人录》他也榜上有名。1983—1984 年他被推选为美国亚洲学会会长，1987—1989 年任斯坦福大学巴巴拉·布朗宁人文科学教授，2001 年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

施坚雅是人类学家和地域社会科学理论家，曾在泰国、日本、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等地进行过田野调查，1949—1950 年到中国四川进行过考察。他是第一位将地域分析技术（spatial analysis techniqaues）应用于晚清中国、德川时代的日本和 19 世纪的法国农村社会研究的学者。在市场体系研究基础上，他参照了德国学者瓦尔特·克里特勒（Walter Christaller，1893—1969）的中心地理学说和等级市场理论，融合了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生态学、人口统计学和经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设计出一套研究社会和经济历史模式。

1964 年施坚雅在《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对于过去的社会学研究提出反思的意见。他说过去对中国乡村的研究都聚焦于自然村落，其实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单元并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每个农村集市所覆盖的区域构成了一个稳定的关系网络，基层市场就是他们的生活和文化空间。他计算了 19 世纪 90 年代广东村庄与市场数目比例大致为“十八村庄一个市场”（18∶1）。此后他又用这一模式来验证四川和浙江等地的市场，发现大部分地区一个市场的覆盖范围是 17～21 个自然村落。

施坚雅采用了六边形中心结构，结合中国实际创建了区域经济等级结构。该结构包括：基层市镇、中间市镇、中心市镇、地方城市、中等城市、区域城市和区域大都会。其中基层的三类市镇与集市贸易体系中的基层市场（standard market）、中间市场（intermediate market）和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是相互对应的。按照这个结构形式可以推导出 26 个城市贸易体

系。根据不同中心地区经济职能的差异进一步形成不同级别，中心地区的级别又可形成相应的地区系统。这就是他的“分离核心-边缘结构模式”(separate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施坚雅认为大多数城市都兴起于大区核心带，各个区域可以发展成为独立的城市群。城市中心功能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它所提供的服务与所消费或被利用的程度关系密切，城市服务的对象不仅是本市居民，也包括周围村落居民。城市职能不仅在经济上也在政治和文化上逐渐实现中心化与一体化。

1977 年施坚雅再次来华对市场体制进行了考察。根据河流运输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他把中国划分为九大地形学宏观区(nine physiographic macroregions)：长江上游区、长江中游区、长江下游区、东南沿海区、满洲区、华北区、西北区、云贵区和岭南区。1980 年他来北京参加中国经济史国际研讨会，在提交的论文《市场体系与区域经济学》中再次提出区域划分理论。

许多中西方学者认为施坚雅模式所假设的同质农村社会(市场背景和条件均等，资源分布均匀)是一种理想化观念。中国人多地广，国情复杂，施坚雅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农村实际，对社会和经济的解读也难以令人信服。但是他的模式提供了一种跨文化可比性的思路，从中可以发现一系列具有普世价值的规则，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村落增长与市场变化之间的某些复杂关系。

2008 年施坚雅去世时给加利福尼亚大学空间系统实验室留下了他和助手根据田野考察资料绘制的 700 多幅地图，以及 450 幅利用其他资源绘制的地图。施坚雅的地图是他对社会变量区域分布(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cial variables)的研究成果。他对社会结构连续统一体差异进行了理论化，形成了所谓的“层次地域空间”理论(Hierarchical Reginal Space，简称 HRS)。施坚雅绘制的地图类型很多，从层次地域空间的类别到人口统计和经济(如：性别比例、生育率到农业工资等)都有所覆盖。他个人的地图收藏也很广泛，包括 19 世纪日本农村地图和法国有关部门绘制的原图，以及日军侵华时使用的地形详图。

他的中国地形学宏观区视图(delineation of the physiographic macroregions of China)在汉学界广为人知，他的“中心区域扩展理论”(extension of central place theory)对于解释城市系统层次组织如何在人口

密集条件下运作也有重要价值。他在哈佛大学和复旦大学合作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工程(the China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project)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05年施坚雅退休,但是仍然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他曾撰写和编辑大量研究中国社会和经济结构以及有关人口、民族、海外华人的论文,还发表过研究泰国社会、印度尼西亚华人、日本江户时代家庭结构等方面的论文和书评。其中主要著述有:

《东南亚华人》(The Unity of the Social Report on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Southeast Asia Program,1951年)。

《共产党解放成都平原后的情况》(Aftermath of Communist liberation in the Chengtu Plain.Pacific Affairs 24,1,Mar. 1951年)。

《中国新社会学》(The New Sociology of China.Far Eastern Quarterly 14,4,Aug. 1951年)。

《中国农村的农民组织》(Peasant Organization in Rural China.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77,Sept. 1951年)。

《中国人口微型研究》(A Study in Miniature of Chinese Population. Population Studies 5,2,Nov. 1951年)。

《文化价值、社会结构与人口增长》(Cultural Values,Social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Growth.Population Bulletin of the United Nations 5,July 1956年)。

《社会科学与泰国》(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ailand.Bangkok:Cornell Research Center,General editor,1956年)。

《泰国华人社团》(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An Analytical History.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7年)。

《华人同化与泰国政治》(Chinese Assimilation and Thai Politic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6,2,Feb. 1957年)。

《爪洼华人》(The Chinese of Java.In Colloquium on Overseas Chinese, edited by Morton H.Fried.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58年)。

《泰国华人社团的领导与权力》(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8年)。

《印度尼西亚农村的地方、伦理和国家忠诚》(Local, Ethnic, and National Loyalties in Village Indonesia: A Symposiu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Editor, 1959 年)。

《东南亚华侨》(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21, Jan. 1959)。

《印尼农村的效忠实质》(The Nature of Loyalties in Rural Indonesia. In Local, Ethnic and National Loyalties in Village Indonesia: A Symposiu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59 年)。

《中华海外文化的变化与持续》(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Chinese Culture Overseas: A Comparison of Thailand and Java.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16, 1960 年)。

《爪洼华人少数族群:变与不变》(Java's Chinese Minority: Continuity and Chang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 3, May 1961 年)。

《印尼华人少数族群》(The Chinese Minority In Indonesia, edited by Ruth T. McVey. New Haven: HRAF Press, 1963 年)。

《中国研究与社会科学》(What the Study of China Can Do for 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 4, Aug. 1964 年)。

《泰国华人:在变化社会中的同化》(The Thailand Chinese: Assimilation in a Changing Society. Asia 2, Autumn 1964 年)。

《中国农村营销与社会结构》(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s I, II, and II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1 Nov. 1964—May 1965 年)。

《交通》(Communication (On Marketing Systems In Communist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5, 2, Feb., 1966 年)。

《海外华人领导》(Overseas Chinese Leadership: Paradigm for a paradox. In Leadership and Authority, edited by Gehan Wijeyewarden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年)。

《循环论:共产主义中国农村的服从继任》(Compliance succession in rural Communist China: A cyclical theory. Co-authored with Edwin A. Winckler. In A Sociological Reader on Complex Organization, 2nd ed., edited by Amitai Etzioni.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9 年)。

《中国农民与封闭社区:开放与封闭实例》(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 An Open And Shut Cas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3, 3, July, 1971 年)。

《现代中国社会》(卷一)(Modern Chinese Society: An Analytical Bibliography, Vol. 1, Publications in Western Languages, 1644—197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ditor, 1973 年)。

《现代中国社会》(卷二)(Modern Chinese Society: An Analytical Bibliography, Vol. 2, Publications in Chinese, 1644—196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ditor, with Winston Hsieh, 1973 年)。

《现代中国社会》(卷三)(Modern Chinese Society: An Analytical Bibliography, Vol. 3, Publications in Japanese, 1644—197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ditor, with Shigeaki Tomita, 1973 年)。

《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ditor, with Mark Elvin, 1974 年)。

《泰国社会的变化和持续》(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Thai Society: Essays in Honor of Lauriston Sharp.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Editor, with A. Thomas Kirsch, 1975 年)。

《莫里斯·弗里德曼:1920—1975》(Maurice Freedman, 1920—1975, and Bibliography of Maurice Freedm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8, 4, Dec., 1976 年)。

《明清的流动战略:区域系统分析》(Mobility Strateg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Regional-Systems Analysis. In Regional Analysis, Vol. 1. Economic Systems, edited by Carol A. Smi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年)。

《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一)》(Urban Development In Imperial China [Part One introduction].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年)。

《中国社会的城市和乡村(二)》(Urban And Rural In Chinese Society [Part Two introduction].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年)。

《清代城市社会结构》(Urban Social Structure In Ch'ing China [Part Three introduction].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年)。

《19 世纪中国区域城市化》(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年)。

《晚清的中国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ditor, 1977 年)。

《城市与地方体制的等级》(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75-364. (Reprinted in Studies in Chinese Society, edited by Arthur P. Wolf.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年)。

《中国城市的蔬菜供应与营销》(Vegetable Supply And Marketing in Chinese Cities. China Quarterly 76, Dec. 1978 年)。

《莫里斯·傅利曼论文集——引论:华人社会研究》(Introduction.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年)。

《中国社会研究》(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ditor, 1979 年)。

《中国城市的蔬菜供应与营销》(Vegetable Supply And Marketing In Chinese Cities. In Vegetable Farming Systems in China, edited by Donald L. Plucknett and Halsey L. Beemer, Jr.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1 年)。

《中国历史与社会科学》(Chinese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Song to 1900, edited by Albert Feuerwerk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2 年)。

《亚洲研究与相干学科》(Asian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Asian Studies Newsletter 19, 4, Apr. 1984 年)。

《中国农村市场:复苏再评》(Rural Marketing In China: Revival and Reappraisal. In Markets and Marketing: Proceedings of the 1984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Economic Anthropology, edited by Stuart Plattner.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年)。

《就职演说:中国历史结构》(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 2, Feb. 1985 年)。

《中国农村市场:抑制与复苏》(Rural Marketing in China: Repression And Revival. China Quarterly 102 (Sept. 1985 年)。

《19 世纪四川人口》(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a. Late Imperial China 8, 1, June 1987 年)。

《日本德川时期的家庭婚姻力量：生死大事》(Conjugal Power in Tokugawa Japanese families: A Matter of Life or Death. In Sex and Gender Hierarchies, edited by Barbara D. Mill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年)。

《岭南的不同发展》(Differential Development In Lingnan. In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China: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ost-Mao Era, edited by Thomas P. Lyons and Victor Nee. Ithaca: Cornell East Asia Program, 1994 年)。

《东南亚混血华人社会》(Creolized Chinese Socie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edited by Anthony Reid.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96 年)。

《家庭体制与人口统计过程》(Family Systems And Demographic Processes. In Anthropological Demography: Toward a New Synthesis, edited by David I. Kertzer and Thomas E. Frick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年)。

《引论与地图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种群》(Introduction And Maps. In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by Sow-Theng Leo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年)。

《中国城市在一个世纪中的变化》(Chinese Cities, Then And Now: The Difference a Century Makes. In Cosmopolitan Capitalists: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年)。

《中国人口的区域扩散》(China's Fertility Transition Through Regional Space: Using GIS And Census Data For A Spatial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emography, with Mark Henderson and Yuan Jianhua, Social Science History 24, 3, Fall 2000 年)。

(五)对中国古典文学、历史、哲学和佛学译介有贡献的华兹生

1925 年 6 月华兹生出生于纽约郊区新罗谢尔，在那儿的小学接受了启蒙教育。他常常帮父亲把要洗熨的衣服送到到华人洗衣店，慢慢地跟老板一家熟稔起来。每年圣诞节洗衣店都送给他家一盒荔枝干和一盒茉莉

花茶，有时还给他一本带插图的中文杂志。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汉字和中国文化。平时他去城里看望经商的父亲时常到唐人街买玩具，很想顺便吃顿中国饭，但是父亲出生在一个饮食习惯非常保守的得克萨斯家庭，总找借口搪塞，直到几年后他才如愿以偿。七年级那年他向洗衣店借了一本《汉英会话》小册子，居然从中学会了几个汉字。

1943 年华兹生 17 岁时志愿加入了美国海军。1945 年 9 月他们的军舰奉命开往日本，不是去冲绳打仗，而是为夺取日本主岛做准备。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在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就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他们的军舰停靠在东京湾的横须贺海军基地。当时他还不懂日语，只是在允许登岸自由活动时能学到几句马路语言。1946 年 2 月离开日本时他决心日后学习汉语和日语。

根据美国蒙哥马利法案（The Montgomery GI Bill）的规定华兹生退役时领到了一份奖学金，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汉语、日语和中国文学。入学时他填写了一份一年级汉语学习计划，但是他的责任导师是一位法国教授，当他了解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新生没有学过法语就拒绝在他的学习计划上签字。华兹生只好去找一年级新生主管。主管曾经在海军学校学习过日语，知道战后美国需要大批汉语和日语人才，就欣然批准了他的计划。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汉语日语系专职汉学教授傅路德正在中国度假，他的工作暂由原内地会英国传教士陆义全牧师（Dev. A. Luteley）代理。这位四川出生的牧师主要教认读和书写汉字，他的汉语发音是否带有四川口音无人知晓，但是学子们被告知如果成绩优秀日后可望被派往中国学习汉语普通话。华兹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二和第三学年由傅路德亲自授课。第四和第五学年则由王际真（Chichen Wang，1899—2001）教授中国文学。他是一位多产的著名华裔翻译家，出版过多部古典和现代中国文学作品译本。他要求学生的翻译习作不但意义转换要准确，而且英文译文要自然流畅，声称最看不起那些生硬的译文。在他的栽培下，华兹生学会了一丝不苟地对待翻译，从来不敢敷衍了事。

1951 年 6 月华兹生获得了汉学硕士学位后仍想继续深造，但是苦于学费难筹。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Yukawa Hideki）得悉此事后帮助他在日本京都找到了两份工作。1951 年 8 月他乘船前往日本，在同志社大学（Doshisha University）教授英语的同时，还在京都大学师从汉学大师吉川幸次郎（Yoshikawa Kojiro，1904—

1980)开始读博。吉川建议他在京都大学中文系读“旧制”课程(学生每年只需写一份研究报告,但是不被授予学位)。其实“旧制”学习非常艰苦,不过可以为自己打下良好的学术基础。跟随吉川使他学到很多东西,若干年后他把导师的论著《宋诗概论》译成了英文。

1956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曾在京都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教授中文和日文。20世纪60—70年代他翻译出版了一部寒山的诗歌和陆游的《入蜀记》。1983年在日本创价学会总裁池田大作的资助下他来华访问三周,把所见所闻写成了《终于来到中国》(China At Last)一书,先后出版了英文和日文两个版本。

1979年华兹生曾荣获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金奖,1981年又荣获诗人、剧作家、散文家、编辑和小说家翻译奖(PEN Translation Prize)。他是香港中文大学《译丛》顾问委员会(the Renditions Advisory Board)创建者之一,1989—1990年以顾问委员会学者身份服务于《译丛》。

华兹生是一位较早全面译介司马迁《史记》的美国学者,他个人辉煌腾达的学术生涯与这部中国经典有着密切关系。1951年他读研时以翻译并研究《史记》的《游侠列传》为主题撰写了自己的硕士论文。1956年他的博士论文是《中国史太公司马迁》(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两年后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61年该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翻译的有关汉朝的译文《史太公文稿:译自司马迁的〈史记〉》(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Translated from the Shih chi of Ssuma Ch'ien)。1969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再次出版了他的译文增补修订版《史记选译》(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Chapters from the Shih chi of Ssu_ma Ch'ien)。1993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他翻译的两卷本《史太公文稿:汉朝(卷一和卷二)》(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Han Dynasty, Ⅰ & Ⅱ)以及《史太公文稿:秦朝》(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Qin Dynasty)。他的译文流畅自然,形象生动,可读性强又不失其深厚的学术涵养。最突出的一点是他把翻译重点定位于《史记》的本纪、世家和列传,打乱了原著的编排顺序,只按照叙事史学手法展开人物和情节。在每一卷的开头都以太史公“自序”中的相关说明为联系各章节的纽带,与核心主题相呼应。华兹生的《史记》翻译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学术工程,也是饮誉西方汉学界的一项成功研究。其中原因有他个人的造诣和不懈努力,也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经典翻译课程的支持。他的译著既可

以作为历史著作来读,也可以作为文学著作来读,因此受到了院校内外读者的广泛青睐。他所选择的翻译策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符合国际宏观潮流,也顺应了中美建交前后的美国国情。

华兹生在英语世界汉学史和翻译史上的地位是韦利之后的第一人。除了《史记》外,他还先后翻译了《后汉书》、《左传》、《诗经》、《古诗十九首》、《论语》、《老子》、《庄子》、《汉赋》、《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以及陶渊明、杜甫、李白、白居易、王维、陆游、苏东坡和寒山的许多诗歌。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中国古典文学、历史、哲学和佛学等方面的研究与译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译著20余部,为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位久负盛名的翻译家笔下,无数读者通过他的自然流畅、简朴优雅、中规中矩译文得以进入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浩瀚领域,无不为之所感动。

《古诗十九首》是南朝萧统(501—531)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19首编入《昭明文选》而成。有学者考证推测枚乘(?—前140)、傅毅(?—约90)、曹植(192—232)和王粲(177—217)等人可能是其中部分诗歌的作者,但是学术界却普遍认为该诗集并非一时一人之作,创作年代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140—190)。诗集内容反映了汉末社会人们的忧虑、追求与感悟的心态和愿望。该诗集是《诗经》和《楚辞》之后最重要的中国古典诗歌,超越了早先流行的四言体和骚体模式,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逼真,成为"千古五言诗之鼻祖"。根据资料记载,华兹生翻译了其中17首,表现了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方面的一贯主张和风格,具有典型的学术意义。现将古诗中《行行重行行》的原文与华兹生的译文对照分析如下:

原文:《行行重行行》之一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译文：NO. 1　On and On，Going On and On

On and on，going on and on，
away from you to live apart，
ten thousand li[1] and more between us，
each at opposite ends of the sky.
The road I travel is steep and long；
who knows when we meet again?
The Hu horse leans into the north wind；
the Yueh bird[2] nests in southern branches：
day by day our parting grows more distant；
day by day robe and belt dangle looser.
Shifting clouds block the white sun；
the traveler does not look to return.
Thinking of you makes one old；
years and months suddenly go by.
Abandoned，I will say no more
but pluck up strength and eat my fill.

[1] Earlier poetry and prose had been content to express the idea of great distance by the phrase "one thousand li，" but with Chinese expansion into Korea and southeast China and increased knowledge of the states of Central Asia，this no doubt came to seem inadequate. For the Han people，with their penchant for hyperbole，nothing less than "ten thousand li or more" would do. A li is approximately one third of a mile.

[2] Hu and Yueh：Hu，a general term for the area north of China from Korea west to Tibet，is paralleled by Yueh，a designation for the area around the mouth of the Yangtze，a region which，in earlier centuries at least，was looked on

as the southernmost limit of civilization.①

华兹生的译文大体上以八行或四行为一组,朗朗上口,质朴无华,与原作的风格非常贴近,意思和技巧转换也相当准确,反复吟咏倍觉意蕴绵长,其中有几点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甲、汉诗英译的关键是文本理解(对作品版本与作者历史背景的把握和文本意义的准确解读)、读者定位(专业与业余、定论与泛论、研究与应酬)、表达选择(高雅华丽、自然质朴、时尚直白或怪异宣泄)和技巧运用(韵律、节奏、断句、重音、重复、排比、对称、用典、审美)等四个方面。华兹生选择了专业与非专业读者兼顾的定位,以自然简朴的稳健文风满足主流读者的需求,运用短语和明快节奏传情达意,摆脱了传统英诗格式(抑扬格、扬抑格、抑抑扬格、杨抑抑格)的束缚,以及与汉诗平仄互协的对应困境。华兹生翻译中国古典诗词通常不用押韵句式,但是把"行行重行行"译为"on and on,going on and on",把"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译为"day by day our parting grows more distant; day by day robe and belt dangle looser",无论意义还是结构都是最佳等值。为了诗句节奏的平衡(rhythm balance),他采用了重复(如:on and on)和扩展(如:以"years and months"代替"time")等技巧。还有一处是译词选择的微妙考量:把"弃捐勿复道"译为"Abandoned,I will say no more"极富书卷气,如果译为"Well,let's forget all about it"就失诸大雅。这是一位学养有素翻译家的炉火纯青译技。

乙、汉诗英译涉及传情达意的准确度和可信度。多数初学汉语或者翻译的读者只关心每一个字词的含义和结构的顺序,无暇顾及高深学问和修炼功夫;但是专业读者已经掌握了基本词汇、语法和文化要义,具备举一反三的本领,因此最希望从译文中学到从别处得不到的权威信息或者示范。满足前者的要求可能导致生硬的基本知识图解和入门技巧操练,添加过多注释和说明又会使译文尾大不掉,缺乏专业高度和气魄;而过分关注后者则可能使译文显得故作高深或者内容缺斤短两。华兹生的译作受到各类读者的普遍欢迎,是因为他尽可能兼顾不同读者的特殊需求。他采用了音

① *On and On, Going On and On* translation by Burton Watson, in *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 96.

义结合法翻译“胡马”(The Hu Horse)和“越鸟”(The Yue Bird),又不厌其烦地辅以脚注,这样臃肿的文字原是翻译之大忌,但是因为诗句后半部出现了意译的“北风”(north wind)和“南枝”(southern branches),不如此就可能出现语义重复。倒也使整个译文增添了原汁原味的比例,初学翻译的读者对于译者屈尊俯就的亲近与热心态度无不折服。

丙、应该说华兹生《行行重行行》的译文基本忠于原作,在当时中美学术交往中断参考资料匮乏的条件下,能有这样水平的翻译实属不易。但是从严格的历史和文学角度看,他对个别诗句的意义把握还不够准确。例如:“与君生别离”中的“君”是中国古代对有地位有身份者的一种尊称,还是指“夫君”或“郎君”?这方面他显然只是含糊其辞。这个关键译词的定位决定了思念者与游子之间关系的表述,也涉及其他有关诗句的选词(例如“Thinking of you makes one old”中的代词“one”)。又如“努力加餐饭”的译文“but pluck up strength and eat my fill”,是游子的“eat my fill”,还是来自思念中女子的叮嘱“eat your fill”?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所描绘的亲人相思图像的感染力却有高下之分。另外,“浮云蔽白日”非指一种自然现象,把它译为“Shifting clouds block the white sun”略嫌不足。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常用它比喻奸佞蒙蔽君主,坏人当道,致使战乱频仍,亲友天各一方。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中的“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便是此意。

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华兹生在2011年4月4日与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The American Literary Translators Association)主席约翰·巴尔科姆的一次访谈时曾经说过一段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译作的话。他说:

> 我第一次译诗是在1954年,那时唐纳金(Donald Keene,1922—)正着手编辑一册日本文学作品选,约我为他翻译几首汉诗。该文集于1955年由树丛出版社出版。虽然我尽了最大努力,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十分惭愧,因为翻译中的一些地方行文显得有些老套和生硬。几年后我把《玉台新咏》中的一些古诗译成了英文,向庞德请教。我一直跟他保持通信,因为我曾经翻译过一篇有关他与我的京都大学恩师吉川幸次郎1954年访美时对谈的日语文章。庞德没有对我的翻译提出任何意见,只是客气地说每一代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批评家,但是他告诉我可将诗稿

投给哪个出版社出版。我曾经带着自己的诗歌译文向锡德·科尔曼(Cid Corman,1924—2004)、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26—1997)和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1930—)等友人或诗人请教过,有时得到了他们很友好的建议,有时也得到毫不客气的批评。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从自己的错误中总结了许多教训。就诗歌翻译而言,我发现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多读当代美国诗歌,因为当代美国英语诗歌正是我的诗歌翻译需要的风格。我从不试图沿袭前现代英语诗歌的任何风格和形式。①

华兹生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徒家庭,但是旅居日本后他皈依了佛教。他一生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在日本生活了30多年。他能看懂文言文,但却是一位不会说汉语的汉学家。

他的主要译著有:

《史记》(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年)。

《中国古典文学》(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年)。

《宋代词人苏东坡作品选》(Su Tung-p'o: Selection from a Sung Dynasty Poe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5年)。

《墨子、荀子和韩非子》(Basic Writings of Mo Tzu, Hsün Tzu and Han Fei T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年)。

《宋词导读》(An Introduction to Sung Poet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年)。

《庄子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年)。

《寒山诗100首》(Cold Mountain 100 Poems. New York: Grove, 1962; Cape: London,1970年)。

《2至12世纪中国抒情诗》(Chinese Lyricism: Shih Poems from the 2nd to the 12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年)。

《汉魏六朝赋》(Chinese Rhyme Prose: *fu* of Han & the Six Dynasties

① John Balcom: *An Interview with Burton Watson*, 4 April, 2011.

Perio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 年)。

《陆游诗歌散文选》(The Old Man Who Does As He Pleases:Selected Poetry and Prose of Lu Yu.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 年)。

《日本汉字文学》(Japanese Literature in Chines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1976. Courtier & Commoner in Ancient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 年)。

《八岛:日本诗歌集》(From the Country of Eight Islands:an Anthology of Japanese Poetry.Garden City,New York:Anchor Books,1981 年)。

《哥伦比亚中国诗选:从古代至 13 世纪》(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from the Early Times to the 13th Centu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年)。

《司马迁:历史学家及其著作》Ssu-ma Ch'ien:the Historian & His Work. Ann Arbor,Mich.: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1985 年)。

《左传:中国最古老的叙事史》(The Tso Chuan:Selections from China's Oldest Narrative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 年)。

《史记:秦朝和汉朝(卷一卷二)》(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Han Dynasty I & II;　Qin Dynasty.Hong Kong; New York:Rendition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年)。

《妙法莲华经》(The Lotus Sutr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年)。

《苏东坡诗选》(Selected Poems of Su Tung-Po.Port Townsend,Wash.: Copper Canyon Press,1994 年)。

《日莲书》(Letters of Nichi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年)。

《正冈子规诗选》(Masaoka Shiki:Selected Poem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 年)。

《维摩诘经》(The Vimalakirti Sutr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 年)。

《白居易诗选》(Po Chu-i:Selected Poem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 年)。

(六)研究和译介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和现代文学的专家白之

1925年3月16日白之出生于英国兰开夏郡,在博尔顿学校接受了启蒙教育。1944—1947年他在英国驻加尔各答陆军情报部服役,军衔为中尉。退役后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汉语,1948年获现代汉语学士学位,1954年获中国文学博士学位。

1948—1960年白之担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讲师,1964—1966年担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副教授和东语系主任,1966—1969年任柏克莱分校人文学院副院长,1982—1986年再次担任柏克莱分校东语系主任。

1958—1959年他曾获洛克菲勒基金奖学金,1963—1964年获古根海姆基金奖学金,1991—1992年荣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译丛》学者。此外他还先后兼任斯坦福大学、夏威夷大学、中国台湾大学、墨尔本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积极参与了东西方日益频繁的学术交流。

白之通晓英文、中文和日文,主要研究宋明话本小说和戏曲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曾发表了许多评介和译介文章。1955年《亚非学院通讯》第17卷第二期发表了他的论文《话本小说形式的几个特点》,1958年他翻译出版了《明代小说集》,收入了冯梦龙(1574—1646)编订的《喻世明言》(《古今小说》)中的六篇:《金玉奴棒打薄情郎》(The Lady Who Was a Beggar)、《蒋兴哥重会珍珠衫》(The Pearl-sewn Shirt)、《穷马周遭际卖缒媪》(Wine and Dumplings)、《吴保安弃家赎友》(The Journey of the Corpse)、《沈小官一鸟害七命》(The Canary Murders)和《张古老种瓜娶文女》(The Fairy's Rescue)。在译本的"导言"中他引用了原作"序言",详细介绍了冯梦龙的生平和话本小说的形式与影响。在每一个故事的开头还对故事情节和人物描写进行了简要介绍。同年他还在《通报》第18卷第一期上发表了《冯梦龙和〈古今小说〉》一文,对冯梦龙《喻世明言》中的部分作品进行考证和探讨。20世纪80—90年代广为人知的英译《牡丹亭》、《燕子笺》和《浣纱记》是他研究并翻译传统中国戏剧的巅峰之作。他对原著研究和理解深刻,翻译技巧应用到位,译文流畅生动,广受欢迎。特别是他翻译的55折《牡丹亭》,在西方学术界常被视为可与《罗密欧和朱丽叶》

媲美的中国古典戏曲代表作，1980 年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做为典范译本流传。

美国先锋派导演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ars）毕业于哈佛大学，曾经执导 100 余部舞台戏剧，在西方享有盛名。他长期潜心研究中国、日本和印度的传统文化。1998 年他读到了白芝的《牡丹亭》英文译本后，开始思考如何将其搬上舞台。他大胆地将昆曲、西方现代舞、话剧和歌剧的语汇融入了《牡丹亭》的表演中，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三组主角，运用表现方式和舞台手段的差异，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牡丹亭》首演于英国伦敦巴比肯中心，引起了轰动。1998 年以来，北美汉学界结合现代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戏曲作品的创作、改编、表演和接受流程，让中国传统艺术进入海外的传播通道，掀起了北美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热潮，推动了世界性的学术与文化交流。这其中有白之的一份贡献。

1946 年白之与多萝西·纳托尔（Dorothy Nuttall）结婚成家，育有二子。1991 年他以讲座教授身份退休。

白之的著述涵盖了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和现代文学，曾经编著许多中国文学的诗文选集，发表过大约 80 余篇译介和评论文章。他的主要著述有：

《明代小说集》（Stories from a Ming Collection：Translations of Chinese Short Stories Publishe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58；New York：Grove Press，1958；London：Bodley Head，1958 年）。

《中国神话和传说》（Chinese Myths and Fantasies.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年）。

《中共文学》（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 New York：Praeger，1963 年）。

《中国文学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Grove Press，1965—1972 年）。

《中国文学选集：从古代至 14 世纪》（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Harmondsworth：Penguin，1967 年）。

《中国文学流派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年）。

《桃花扇》[The Peach Blossom Fan（with Chen Shih-hsiang and Harold

Acton), Berkeley: UC Press, 1974 年]。

《牡丹亭》(The Peony Pavil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年)。

《明代传奇选读》(Scenes for Mandarins: the Elite Theater of the M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年)。

《小姐与丫环》(Mistress and Maid: Jiaohongj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年)。

(七)把叙事学和喜剧理论运用于中国小说研究的韩南

1927 年 1 月 4 日韩南出生于新西兰。1948 年他毕业于新西兰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第二年他获得了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后来他到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中国白话小说,深感自己对中华文化了解得还不充分,决心重学基础汉学课程。1950—1953 年他在该校读完了另一个学士学位课程,毕业后被聘任留校执教的同时开始准备博士论文。最初他打算以翻译和研究《史记》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但是导师西蒙(Ernest Julius Walter Simon, 1893—1981)告诉他很多学子都研究《史记》,这样的论文可能写不出新意,不如改选《金瓶梅》。当时翻译家亚瑟·韦利也鼓励他改变选题。

1957 年按照学校的教学安排他到北京见习一年。原来希望就读于北京大学,但未能如愿。在北京对外文化联络局的帮助下他在东单船板胡同的一家民房中安顿了下来。根据友人建议他上了一所补习学校,大部分课余时间都到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阅览图书,并有幸认识了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1898—1958)、戏曲研究家傅惜华(1907—1970)和学者吴晓铃(1914—1995)。郑振铎很欣赏他的向学精神,就介绍他到北京东城区的一个专家服务部,因为那儿可结识北京知识界的一些专家,也可涉猎在一般图书馆不对外开放的善本图书。那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内部发行一套据明版影印的《金瓶梅词话》,郑振铎破例批准通过他售给伦敦大学图书馆一套,为他撰写博士论文提供了方便。

1954—1963 年韩南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讲师,1960 年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了中国古典文学博士学位,1963—1968 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先后被聘任为副教授和教授。自 1968 年起他受聘担任哈佛—大学东

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1987—1996 年他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如日中天般的事业给他带来的是鲜花和知名度。

《金瓶梅》是韩南最早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切入点，除了博士论文外他还撰写了另外两篇有影响的论文。1962 年他在《哈佛亚洲学刊》上发表的《关于〈金瓶梅〉的文本》(The Text of the *Chin Ping Mei*)一文，探讨了该小说的各种版本形成的状况，并对原作和增补版本的关系进行了追溯和分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第二年他又发表了《〈金瓶梅〉探源》，对由该小说衍生的话本、戏曲和史书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做出令人信服的评价。

韩南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曾深入到白话小说及其时代、作者与创作手法等方方面面。1973 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专著《中国短篇小说断代、作者和创作之研究》，奠定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学术地位。1981 年 12 月他的《中国白话小说》以充足的史料和科学的分析，重构了话本小说的发展历程。白话小说的断代(dating)问题曾经在学术界引发过长期争论。韩南提出了从作品语言风格寻找断代蛛丝马迹的主张，认为用考察人物对话风格的方法来对作者进行判断，比对所处时代的判断更具可信度。

李渔(1611—1680)是明末秀才，入清后放弃仕途，改以著述和导戏为生，曾在金陵芥子园开设书肆，编刻图书，广交达官名流。他的著述丰翰，小说、曲本、诗词、书画、文艺理论和园林设计几乎无一不精，还编写过专著《古今史略》和《资治新书》。他创作的戏曲有《凰求凤》和《玉搔头》，小说有《肉蒲团》、《觉世明言十二楼》和《连城璧》(三者合集书名为《无声戏》)。韩南是最早英译李渔作品的当代美国汉学家之一，先后推出了《禽海石》(Stones in the Sea)、《恨海》和《黄金崇》三个译本。1990 年 8 月仁迪腾出版社以《无声戏》(Silent Operas)为书名出版了韩南所译的李渔小说。同一年他的《肉蒲团》的英译本也在纽约的一家公司出版。译本文字生动流畅，颇受青年读者的欢迎。1995 年 5 月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以《恨海：世纪之交的两部中国言情小说》为书名出版了韩南翻译的两部李渔白话小说《禽海石》和《恨海》。1996 年韩南翻译的《肉蒲团》被美国《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评为 1995 年最佳图书。1999 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黄金崇》一书。

2004 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韩南的专著《19—20 世纪初中国小说评论集》，收录了他在各个时期撰写的有关中国小说的论文。全书 285 页，正文十一章，分别为：第一章“小说革命”前的叙事语气(9—32)；第

二章名妓小说中的风流描写(33—57);第三章传教士小说中描写的19世纪中国(58—84);第四章译成中文的第一部小说(85—109);第五章早期《申报》刊登的翻译小说(110—123);第六章新小说之前的新小说——傅兰雅举办的小说竞赛(124—143);第七章白话小说的第二阶段(144—161);第八章吴趼人与叙事者(162—182);第九章《恨海》的独特文学关系(183—198);第十章陈蝶仙的自传体小说(199—216);第十一章鲁迅的小说创作技巧(217—250)。韩南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

> 虽然本书收录的11篇论文各自独立成章,但是都有一个共同主题,即:19—20世纪初的中国小说,特别是中国小说与中西方文学传统的关系(这一时期西方传统已经逐渐为中国作家所了解)。其中包括彼此影响、文本互涉、模仿和创造性以及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我想赋予"文学关系"(literary relation)这个陈旧术语新的内涵,并用它来表达一组概念。我打算尽可能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小说运动,特别是对其创造性进行描述。
>
> ……
>
> 本书的第二大主题涉及这一世纪中国小说发展过程中来自西方的主要影响。我曾经就这一问题写过一些长短不一的文章,主要因为学者们一直极少对它关注。首先,一位侨居中国的外国人有意于小说研究令人觉得奇怪,但是许多西方人对于自己国家小说的说教作用(及其教育和娱乐价值)印象都很深刻。中国小说看来具有超越阶级和区域界线的特征,为此他们力求通过用中文创作和翻译小说来推动各种目标的实现。①

韩南在白话小说和李渔创作道路研究以及言情小说的翻译方面都做出了成绩。他重视从第一手资料进行考证,然后上升为理论并总结出规则。在对通俗小说与说唱文艺之间的关系以及通俗文学的转型问题的研究中他参照了西方文艺理论有关人物形象、叙事单位和情节结构的方法,建立起自己的叙事学体系,以此论证小说从创作到激发其他文学式样产生

---

① Patrick Han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pp. 1—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的逻辑关系，令人信服地解读了作品的流传和接受过程，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是一个创举。他从版本到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全方位考察，把西方的叙事学和喜剧理论运用于中国小说的研究中，展示了一种新思路。他还在明代戏曲中发现一些珍贵的孤本，使那些被束之高阁的文本重见天日，对明代戏曲史的研究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早先韩南重点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在美国大学执教时因为工作需要开始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晚年又转入中国近代文学，如此构筑了对中国文学发展体系的完整研究。他曾经在《哈佛亚洲学报》发表过两篇关于鲁迅小说技巧的论文。1974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鲁迅小说的技巧》。除了鲁迅，他对老舍等其他现代中国作家也有所涉及。

韩南的主要著作和译著有：

《中国早期的短篇小说：批评理论提纲》(The Early Chinese Short Story: A Critical Theory in Outline, Harvard Journal Asiatic Studies, 1967 年)。

《关于〈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创作》(The Making of the Pearl-Sewn Shirt and the Courtesan's Jewel Box, Harvard Journal Asiatic Studies, 1973 年)。

《中国短篇小说断代、作者和创作之研究》(The Chinese Short Story: Studies in Dating, Authorship, and Compos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年)。

《鲁迅小说的技巧》(The Technique of Lu Hsun'. s Fi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年)。

《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王秋桂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 年)。

《中国白话小说》(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年)。

《李渔的创作》(The Invention of Li Yu,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年)。

《肉蒲团》(The Carnal Prayer Mat, Balantine Books, 1990 年)。

《无声戏》(Silent Operas, Hong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年)。

《恨海：两部世纪之交中国言情小说》(The Sea of Regret: Two Turn-of-the-Century Chinese Romantic Novel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年)。

《黄金崇》(The Money Demon Translated by Patrick Han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年)。

《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ovels,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年)。

《19~21 世纪初中国小说评论集》(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 年)。

《中国明代言情小说》(Falling in love: Stories from Ming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6 年)。

(八)对中国的政情、舆情和国情有深入了解的傅高义

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1930 年 7 月 11 日出生于俄亥俄州特拉华市一个犹太人家庭,1950 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安大学后曾在美军服兵役两年。1958 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同年去日本进修了两年。1960—1961 年他在耶鲁大学担任社会学助理教授,1961—1964 年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其间在香港生活了一年,为了顺应当时美国的汉学研究热潮他开始学习汉语和中国历史。此后他应聘成为费正清的助手,1972 年他接替了费正清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一职。1967—2000 年他被聘任为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教授。1993—1995 年他中断在哈佛大学的教职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局东亚处官员(U.S. National Intellegence Officer for East Asia)。

傅高义是一位通晓中文和日文的社会学家,也是中日两国事务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1966 年在助手陈仲文的帮助下傅高义几乎每天都阅读《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并常常与助手一起讨论有关文章的内容和背景,了解广东历史上政治运动的前因后果。《1949—1968 年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就是他在当时条件下撰写的有关广东的一部专著。后来他在汉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使他扬名学术界,获得了"中国先生"的称号。

1973 年傅高义参加了一个美国科学代表团来华访问,曾在广州逗留数日。1980 年他和夫人艾秀慈(Charlotte Ikels)应邀访问了中山大学,在广州的两个月中有机会与许多市民进行交流。20 世纪 80 年代初广东省与美国马萨诸塞州结为姊妹省。州长提议吸纳傅高义进入马萨诸塞州与广东省姊妹关系研究委员会。广东省领导访美时他曾先后参加会见梁灵光省长、朱森林省长、杨立副省长以及广东省经济委员会主任杨迈等人。

后来马萨诸塞州州长回访广东时傅高义也随行兼任翻译。1986 年杨迈主任询问傅高义是否有兴趣继续研究广东,得到了他的肯定答复。

《领先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就是傅高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对广东进行了为期 7 个月实地考察后开始动笔的。他的足迹遍及广东 100 个县中的 70 多个,并查阅了广东省经济委员会有关 30 多个县的经济发展简报。1980 年以后他几乎每年都访问广东一次,亲眼看到了改革给广东带来的变化。1988 年他又到广东做了一个月的研究才完成上述专著。他曾经在各种场合谈到了自己对广东发展变化的感受。他认为广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广东成功的经济发展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折射,很有代表性。作为《邓小平震撼世界》(中国学者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的英译本)的编者,傅高义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一重要事实告诉美国民众。他以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敏锐目光,对华南大地一系列重大发展进行了深度扫描,并写进了专著。

20 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初步成绩,国际政治格局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逐渐有所改变,这触动了西方少数怀有冷战思维政客的敏感神经。美国一些右翼人士也参与"中国威胁"论的大合唱,鼓吹对华实施"遏制政策"。傅高义不失时机地推出了文集《与中国共存:21 世纪的中美关系》,主张中美两国应该进一步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教育的合作关系,消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障碍势在必行。

2000 年夏天傅高义在韩国济州岛度假时一直思考着如何利用自己退休后的时间再写一部有关中国的专著,当时一起度假的《华盛顿邮报》外交事务资深记者唐·奥伯多弗(Don Oberdorfer,1931—　)建议他写一本邓小平传记。几周后傅高义接受了他的建议,并确定以"邓小平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该书主题。写作期间傅高义曾在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地访问了与邓小平接触过的各国政要,包括李光耀、卡特、蒙代尔、基辛格、美国历任驻华大使、国务卿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他还多次来华采访了江泽民、胡启立、钱其琛、邓榕和李锐,以及陈云、胡耀邦、任仲夷和陈毅等人的子女。除了阅读一些尚未公开的档案外,他还在大量中、英、日文资料中搜索权威性记录和数据。为了写好这本书他还访问了邓小平当年打游击的太行山区以及与他的童年和家族史有关的四川广安、成都和重庆等地,在历史和现实的环境中体验邓小平当年叱咤风云走南闯北的革命家生涯。2011 年他完成了一部长达 876 页的《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以丰富的史料、学界的重要研究成果、档案资料和独家访谈为依据,对邓小平的政治品格及执政风格进行了全面分析。书中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之间关系进行了细致解读,对中共三中全会、中美建交、经济特区和一国两制等重大决策的作出了详尽探讨,行文严谨、脉络清晰、观点鲜明,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有独到论述。更为重要的是,该书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中国变革与社会发展的问题,以及邓小平个人在复杂艰难的政治角逐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使中国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变成经济快速发展的东方大国,实现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追求和梦想。傅高义从客观的学术立场上向读者展示了这样的事实:过去30年的亚洲巨变发生在中国,中国巨变的主角之一就是邓小平。无论从历史文献还是从政治意义上看该书都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汉学专著,兼具客观的真实性和高度可读性,被誉为邓小平研究"纪念碑式"的著作,也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必备文献,为此曾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美国前总统卡特和克林顿以及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都推荐此书。

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美关系处于艰难时期,傅高义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于美国,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观点,敦促美国政府尽快全面恢复与中国的往来。他在一些有见地的论文中对中国全面客观的分析为化解美国政界对中国的偏见和敌视态度提供了理性支持。

1958年傅高义曾携妻儿到日本东京工作了两年多,主要研究日本的家庭和精神健康问题,撰写了《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一位工薪族及其家庭》一书。1979年他出版了另一本新著《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研究日本,被评为西方作者非小说类长期畅销书,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2000年正当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时,他又出版了《日本仍是第一吗》,目的是告诉美国读者他不相信日本面临的危机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他的善意和客观态度提升了他在学术界的知名度。2000年以来他组织了一系列由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参加的研讨会,就1937—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些敏感问题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他认为自己作为哈佛大学的教授,具有研究中日历史的十分有利的条件,希望能为加强中、日、美的友好关系和亚洲安全做出一份贡献;他坚信回避历史就无法走向未来,各方都应该在承认历史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解决问

题，以便增进交流和合作。

傅高义曾两度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写作持续了整整40年，对中国的政情、舆情以及社会经济状况有深入的了解，在哈佛大学享有“中国先生”的美誉。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时，到哈佛大学演讲。傅高义教授负责接待并主持了演讲活动。2000年6月30日退休后傅高义任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休教授，几乎每年都带领马萨诸塞州的部分中学教师到中国各地学校参观交流，为的是增加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

傅高义的主要著述有：

《现代家庭引论》(A Modern Introduction to the Family, with Norman W. Bell, 1960年)。

《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一位工薪族及其家庭》(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 1963年)。

《1949-1968年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1969年)。

《现代日本组织与抉择》(Modern Japanese Organiz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1975年)。

《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1979年)。

《逐案追溯：恢复美国外贸的活力》(Comeback, Case by Case: Building the Resurgence of American Business, 1985年)。

《意识形态与国家竞争：九国分析》(Ideology and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 Analysis of Nine Countries, 1987年)。

《中国的领先一步：改革中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1989)。

《亚洲四小龙：工业化在东亚的扩展》(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1991年)。

《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997年)。

《日本仍是第一吗?》(Is Japan Still Number One? 2000年)。

《邓小平震撼世界》(Deng Xiaoping Shakes the World, translation, 2004

年)。

《中美日三角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89)》(The Golden Age of the U.S.-China-Japan Triangle,1972—1989,with Ming Yuan and Akihiko Tanaka,2002 年)。

《战时中国:1937—1945 年中国战区》(China at War:Regions of China,1937—1945,with Stephen R.Mackinnon,Diana Lary,2007 年)。

《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年)。

(九)研究中国人性观念中的自然平等与价值平等的哲学家孟旦

孟旦(Donald J.Munro,1931—)出生于美国,祖籍苏格兰,家族世代都从事教育工作。1953 年他在哈佛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曾到美国海军服役,闲暇时间喜欢阅读英译的经史子集。他发现中国哲学是他所了解的众多人文学科中内容最丰富最有意义的学科,这一认识对他后来选择汉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有密切关系。退役后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学习,1964 年获得了博士学位。1964—1968 年他被密歇根大学聘任为哲学助理教授,1968—1973 年任副教授,1973—1996 年任哲学和汉学教授,1996 年后任哲学和汉学讲座教授。

他还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特伦特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短期任教。由于在学界的声望和影响,他还担任过不少公职,曾被任命为文理学院执行委员会委员、美国人文学会联合委员会中国思想与宗教委员会主席、中国文明研究会主席和美国亚洲学会中国与中亚委员会委员。他曾多次来华访问,先后到过北京、台湾和香港,1965—1966 年在港期间曾师从唐君毅,2003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新亚书院“钱穆讲座”的主讲人。

儒家学说的发展经历了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乾嘉汉学等不同阶段。孟旦 1969 年出版的《早期中国关于“人”的概念》、1977 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关于“人”的概念》、1988 年的《人性的形像:宋人的描述》和 1996 年的《20 世纪中华帝国式求索模式:新手段的应用》,是他多年来对儒学进行的全方位研究分析和评价。

《早期中国关于“人”的观念》是孟旦的一部代表作,2009 年由北京大

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全书 239 页，正文共八章，分别为：第一章人性与自然平等；第二章天道与人心；第三章儒家“人”的观念；第四章通往特权之路；第五章道家“人”的观念；第六章通往明镜之路；第七章道路的尽头；第八章古典的遗产。该书从儒家典籍中有关人性善恶之辩谈起，对中国历史上思想家有关人性本质的认识与实际社会待遇不一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虽然自然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上享受相同待遇，但是在等级社会中合理性是由自然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因此作为社会成员的人彼此价值并不相同。中国古代思想家承认人的自然平等（描述性平等），但儒道两派对人的价值平等（评价性平等）却意见相左。作者认为“人的自然平等”观念对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制度、儒家伦理和宗教信仰都产生了影响，是理解早期中国人性观的出发点。

《当代中国关于“人”的概念》聚焦于 20 世纪 50—70 年代中国对人性的看法。孟旦认为，虽然中国古人认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在注意到人类具有的相同属性的同时还存在着“君子”与“小人”的个性差别。而在美国人性（物质欲望、喜怒哀乐、恋母情结、自卫和同情心）不变的说法却一直占压倒优势。当代中国人更强调人性的可变性和延展性，毛泽东所说的“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成为人们所遵奉的至理名言。当代中国人有时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不加严格区分的看法也有某些合理成分。

《人性的形像：宋人的描述》也是孟旦的一部力作，重点分析和探讨了宋代硕儒的理学观念。朱熹用家、水、光、体和生等形像来比喻人性的外在特点（结构形像）和内在功能（情感表达）。根据孟旦的研究，朱熹所说的“结构形像”（structural image）是指事实，而“情感表达”则是指人们接受的价值。两者的结合反映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过中国哲学中容易混淆事实与价值关系的见解常为业外人士所诟病。

《20 世纪中华帝国式求索模式：新手段的应用》是根据 1994 年孟旦在密歇根大学所作的同名讲座整理出版的专著。该书在研究中国探索方式时对认识论（epistemology）的解读，也不可避免地涉及人性论领域。这里所说的“帝国式的求索模式”实际上是孟旦心目中的宋明理学的探索手段。他认为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决定“天人合一”（harmony in human and natural spheres）的极权主义（totalism）、供行为参照的典范（models）和反映自然模式的思想观念。在书中他详细阐述了向旧

的思维模式的挑战,同时也论述了在20世纪赖以生存的方式。他断言改变思想是了解并控制自然界的最佳办法,而天子核准的典范可为按照极权框架路线清理思想的参照标准,持久的认识(enduring assumption)包含"了解"、"觉察"和"付诸行动"三个步骤。人性与天性的沟通和谐就是社会秩序与自然规则的一致。孟旦在论证这种探索方式的积极意义时也指出了皇权干预失当的弊端,往往使学者和应用对象失去独立人格。

孟旦还致力于把传统儒家理念应用到当代人际关系和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中。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在实现现代性转换时必须超越家族的界线,而儒家传统思想却没有明确涉及这个问题。但孟旦注意到儒家鼓励人们之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恻隐之心和互惠美德价值,认为仁爱不是纯粹的付出或者给予的行为,这就使得这一理念能够超越家族范围在更广的范围内推行,成为人类伦理关怀的基础。

孟旦的主要著述有:

《早期中国关于"人"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an in Early China, Michigan Classics in Chinese Studies, New York: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年)。

《当代中国关于"人"的概念》(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 Michigan Studies of China, 1977年)。

《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儒家和道家价值观研究》(Individulism and Holism: Studies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5年)。

《人性的形像:宋代描写》(Images of Human Nature: A Sung Portrait, 1988年)。

《20世纪中华帝国式求索模式:新手段的应用》(The Imperial Style of Inqui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Emergence of New Approaches, Michigan Monographs in Chinese Studies, 1996年)。

《新世纪的中国伦理学:钱穆历史文化讲座》(A Chinese Ethics for the New Century, Ch'ien Mu Lecture in History & Culture, 2005年)。

《应用伦理学:个人和公共选择可行性指南》(Ethics in Action: Workable Guidelines for Private and Public Choices, Tang Chun-ILecture, 2008年)。

（十）引领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朝新方向发展的孔飞力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年9月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1940年就读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学。1950年他进入了哈佛大学，曾想师从人类学家克拉克洪，但是被告知起步应先学习历史学或希腊—罗马时代的经典著作。于是他开始研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希望把应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用于历史研究之中。1954年他从哈佛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后转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日语和日本历史专业。

1955年夏他返回美国后应征入伍，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军队语言学校研修中文、中国文化和历史课程。1957年学习结束后他转到东海岸继续服兵役。1958年他在乔治敦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1959年获得了硕士学位。退役后孔飞力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和史华慈攻读中文博士学位课程，论文题目是《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Militia in China During Taiping Rebellion：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uan-lien），1964年他获得了历史与远东语言博士学位。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主要受到费正清的影响。

1962年孔飞力应聘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执教期间与程吾（Sally Cheng）相识相恋成家。1963年他被提升为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讲师。1965年他以富布赖特研究员身份在日本京都大学做研究工作，1966年回国。1970—1971年他担任ACSL中国文明研究员。1971—1974年他被推选为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主任，1974年升任为正教授。1975—1977年他担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明系主任，兼任美国文理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院士和美国《历史评论》编辑委员会委员。由于史华慈教授的鼎力推荐，1978年秋孔飞力回到母校哈佛大学任教，接替费正清担任希金森（Francis Lee Higginson）历史讲座教，1980—1986年担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1979年6~7月他随美国明清史专家代表团访华，参观了中国六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系、图书馆以及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1984年他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研究员，得到了资助到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借阅了有关乾隆三十三年（1768）发生的“叫魂”清宫档案。同年8月

13~14 日他由中国人民大学韦庆远教授和辽宁省档案局领导陪同参观了抚顺市档案馆。1990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3 日孔飞力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会议上,作题为《西方对近代中国政治参与和政治体制影响》的学术演讲。1994 年 1 月他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讲学。同年 6 月 28 日他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庆祝建所 40 周年举办的“纪念郭廷以先生史学讲座”上发表了“魏源(1794—1857)政治思想中的参与与权威”演讲。

在 20 世纪 60—80 年代中期孔飞力的学术研究主要聚焦于 1796—1864 年的中国地方军事化、晚清皇权衰落、太平天国起义以及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等问题。他在多篇论述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环境,国家权威的衰落和乡绅势力的膨胀,政治实力的天平向以乡绅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一端倾斜,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孕育着推动近代社会发展的机制。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是孔飞力对自己的博士论文进行修改后出版的一部专著,对当时中国近代社会矛盾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在美国和国际中国史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利用地方志和其他中文资料,根据阶层和社会结构理论以及权力与政治相辅相成的观点,以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作为切入点,就晚清时期的团练、地方武装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政治平衡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中国地方武装是在乡绅地主的操控下组建起来的,并就此提出了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新见解。他认为 1796 年湖北、陕西和四川交界地区白莲教举事时清政府首次动用了民兵去镇压,原因之一是白莲教与人民之间联系密切,人多势众,行动规模超越了地区、社团和宗族范围,清廷求助于地方团练实属无奈。早先的乡勇团练是受制于皇室的地方武装,对后来太平天国的地方武装的建立是一种可参照的先例。该书还探讨了“股匪”和“堂匪”等各种地方武装的出现及其与国家军事力量的区别,以及两者在一定环境中相互转化的可能。

孔飞力长期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近代史承接着中华文明传统,但是历史学家对这个传统的渊源却疏于必要的考察。18 世纪明火执仗的西方军人在中国出现之前中华之邦是否已经成为王道乐土?20 世纪 80—90 年代孔飞力通过对清宫档案的解读,撰写了他的一部学术代表作《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获得了列文森奖(Joseph K. levenson Prize)。该书正文共 10 章,作者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描述了所谓的

“叫魂”事件，从历史、社会、经济、民俗、宗教和政治角度分析了1768年初春“妖术”（Sorcery）从浙江省德清县开始出现，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向全国蔓延，引起了人们的惶恐不安，影响了12个省份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开始时清廷官员采取隐瞒态度，斥之为“无知妄说”。但是不久之后割辫施法可以救赎的传闻却严重动摇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名分，惊动了皇亲国戚，全国上下无不关注。官府下令对骚乱者进行围剿并严加治罪，各府各县都几乎同时采取了行动。对于地方官员来说，清查不光是为了保护一方平安，也是对朝廷效忠的表现。于是尔虞我诈，声东击西，欺软怕硬，假戏真唱，一时间引起了社会上人人自危。许多乞丐、贫僧和流浪汉受尽冤屈。春去冬来案情才大白于天下，原来“叫魂”只是一场闹剧，戳穿之后便草草收场。但是通过这件事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宗教、政治和法律进行反思，揭开了“太平盛世”的假外衣，暴露了无处不在的社会弊端和矛盾。作者引用了大量的朱批奏折和秘档，从社会心理、区域经济、文化素养和民间习俗等方面进行扫描，揭示了晚清社会的种种矛盾。人们不禁联想到近年发生的所谓“法轮功”和“世界末日”闹剧，印证了“叫魂”作为学术研究选题的现实意义。该书通过叙事手法描写历史，内容丰满，语言生动，可读性强，堪称为史论的一种创新。

2002年孔飞力出版的《现代中国的起源》也是一部含金量高的专著，涉及了华人海外移民史领域。他认为海外移民与国内移民之间存在着形式和内容上的联系。中国海外移民运动的导因是近代商业化和城市化，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客观上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对海外移民史的研究也可用于评估近代中国的海内外形象。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孔飞力就把海外华人移民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通过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的考察，在对比和反思的语境中高瞻远瞩地审视中国历史和人民，分析那些散居世界各地的同胞与自己国家和侨居国之间的关系，寻求最大可能的身份认同，探讨改变侨居国的社会以及侨胞自身的际遇和权利。作者明确地指出海外华人史是中国近代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回顾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了解他们在异国他乡求生存求发展的拼搏历程，可以总结经验，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和国际关系角度升华人类智慧。

1993—1994年孔飞力曾在哈佛大学开设了海外华人课程。他认为中华文化赋予了中国移民在家庭制度和商业化方面的价值，中国早期商业化

的发展促进移民潮的出现原因就在这里。中国移民在海外融合和发展过程中一直注意保持和维护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宗教信仰仍然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中国移民的足迹遍布东南亚和世界各大洲。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海外移民引人注目,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产生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一些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时有人就借用"黄祸论"挑拨华人华侨与所在国人民的关系。孔飞力反对这种狭隘民族主义的观点,他把中国比喻为"移民学校",把中国沿海城市视为向海外移民的"中转站"。他们通过自己的创造性贡献获得了侨居国的认可,并通过各类商会、同乡会和慈善事业增强他们的向心力。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中国传统如何与西方文论相结合是他经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对于诸如政治参与和政治体制、知识分子与公共服务、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等重大理论问题,虽然有中国自己的历史传承,但是在历史研究中往往以西方的语汇来表达,对于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显然联系不够。这是像他这样有人类学学养的历史学家所思考的敏感问题。

孔飞力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汉学家。他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学风严谨,视角独特,方法前卫,资料翔实,结论令人信服。他重视对中国原始档案的分析,善于对基本概念的深入浅出的阐述,驾驭汉语和史学技巧的能力超群。他对待教学工作一丝不苟,许多来自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学生都愿意拜他为师,可见在美国学子中他有很好的口碑。

孔飞力的主要学术著述有: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its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 1970 年)。

《〈清代文献·前言〉第一卷阅读文献:钟人杰叛乱》(Introduction to Ch'ing Documents: Vol. 1 Reading Documents, The Rebellion of Chung Jen-Chieh. Harvard University,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With John K. Fairbank, 1986 年)。

《叫魂:1768 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 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 1990 年)。

《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The Homeland: 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97 年)。

《现代中国政体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2002 年)。

《太平叛乱时期的中国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Militia in China During Taiping Rebell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uan-lien,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64 年)。

《太平叛乱时期的地方团防制度》(The T'uan-lien Local Defense System at the Time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67 年)。

《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等问题》(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 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 in F. Wakeman and Cz Grant,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年)。

《太平理想的起源:中国叛乱的跨文化考察》(Origions of the Taiping Vision: Cross-Cultural Dimensions of a Chinese Rebell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July, 1977 年)。

《民国时期的地方税收和财政》(Local Taxation and Finance in Republican China, 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No. 3, 1978—1979 年)。

《朝代的衰落和叛乱的起源》(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1978 年)。

《太平叛乱》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1978 年)。

《晚清政体观》(Late Ch'ing View's of the Polity, Select Papers, No. 4, 1979—1980 年)。

《中国,一所移民学校》(China as a School for Emigrants, Tradition and Metamorphosi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Kwang-Ching Liu's Seventy-fifth Birthday, Volume II Essays in English, 1980 年)。

《中国人的社会等级观》(Chinese Views of Social Classification, in James L. Wanton, ed., 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年)。

《地方政府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1986 年)。

《政治罪和官僚、君主制度:1768 年中国的一个案子》Political Crime and Burueacratic Monarchy:a Chinese Case of 1768, Late Imperial China 8. 1, June,1987 年)。

《政治参与和中国宪法》(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The Role of the West. Chinese Historians Volume V, Number 2, Fall 1992 年)。

《中国现代国家的观念》(Ideas Behind China's Modern Stat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55, Issue 2, Dec., 1995 年)。

《故土:对海外移民史的思考》(The Homeland: 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Fifth-eighth George Ernest Morison Lecture in Ethnology 1997 年)。

《国家掌控对象的妖术》(Sorcery as an Object of State Control, 1999 年)。

《公民社会与宪制的发展》(Civil Society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1999 年)。

《北京政府能否治理好中国? 对改革和地区主义的反思》(Can China be Governed from Beijing? Reflections on Reform and Regionalism, 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0 年)。

《王赓武:所处时代的历史学家》(Wang Gungwu: The Historian in His Time, in Power 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ang Gungwu, edited by Billy K.L.So, John Fitzgerald, Huang Jianli, and James K.Chi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年)。

《与移民相适应的华人社会经验》(Chinese Social Experience Adaptable to Emigration, Asia-Pacific Forum No. 21, Sept. 2003 年)。

此外,他还参加过费正清主持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若干章节的编撰。

主编　阎纯德　吴志良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列国汉学史书系

美国汉学史（上册）

责任编辑：杨　雷
印章篆刻：郑怀宝
封面设计：徐道会

ISBN 978-7-5077-4699-0

9 787507 746990 >

定价：120.00元
（全两册）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美国汉学史　上
作者=熊文华著
页数=316
SS号=13854847
DX号=
出版日期=2015.03
出版社=北京学苑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美国汉学发展的漫长轨迹
　　一、美国汉学史钩沉
　　二、中美早期往来的广州记忆
　　三、通过茶叶和瓷器启动的中美双边贸易
　　四、中美文化的双向互动交流
　　五、中美关系语境中的美国汉学发展
　　六、国际政治和学术生态中的美国汉学研究
第二章　从科际整合角度扫描美国汉学
　　一、美国多维视域中的儒学：课题与精神资源
　　二、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旷达进程
　　三、中国文学在美国的翻译、研究与接受
　　四、美国学者对中国宗教的独辟蹊径研究
　　五、中华文化与文艺复兴、民主思潮和地理大发现
　　六、美国宏观视野中的中国政治研究
　　七、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三大美国流派
　　八、美国汉学与社会学的美满联姻
　　九、作为美国汉学家感知中国桥梁的汉语语言学
第三章　新教传教士为美国汉学问鼎天下创造契机
　　一、美国汉学萌发于19世纪末的海外传教运动
　　二、美国前汉学时期的历史见证人裨治文和雅裨理
　　三、开发心智与传教并举的文惠廉、狄考文和明恩溥
　　四、期待以基督精神培养变革人才的施约瑟和丁家立
　　五、丁韪良和林乐知在激流勇进中的追求
　　六、伯驾、嘉约翰和柏乐文的医药传教赢得称赞
　　七、美国传教士对西方来华鸦片商的谴责
　　八、芮思娄、高鲁甫和卜凯的农业传教新思维
　　九、传教士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期待和影响
　　十、美国传教士后代的中国情结和多维世界
第四章　洋务帮办合力推动美国汉学的发展
　　一、李鸿章幕府中的美籍幕僚

二、晚清美籍关员与中美经济文化交流
三、美籍雇员与晚清军事近代化
四、洋务文化教育中的美籍教习
第五章　美国汉学家团队及其建树
一、美国前汉学酝酿时期（18世纪下半叶至1876）
二、美国建制化和常态化的汉学研究形成时期（1877—1945）
三、美国多科与多元化汉学综合研究时期（1946—1971）
封底